

孤島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张泽石 高延赛 著



《我的朝鲜战争》姊妹篇

海内外第一部讲述14334名志愿军战俘在台湾60年生活的纪实作品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20年追寻,首次披露,《我的朝鲜战争》作者最新奉献 漂泊两岸,尘埃落定,14334名志愿军战俘60年台湾岁月

● 第一次揭秘 22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逐步分裂,最终分赴海峡两岸的大背景和详尽原因;

● 第一次揭秘台湾当局实施“心战”策略,参与志愿军战俘分化、决裂斗争的具体过程;

● 第一次揭开赴台志愿军战俘组建“海外宣讲团”在东南亚、美洲、欧洲十一国及联合国总部进行反共宣传的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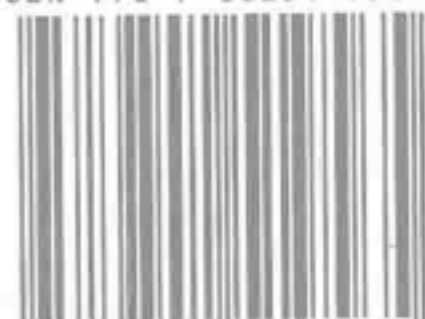
● 第一次集中展示 40 余张美国国家档案馆、麦克阿瑟将军纪念档案馆收藏的朝鲜战争彩色照片,展示战俘营里衣食住行、娱乐活动、教育培训等日常画面;

● 第一次披露 30 余张从赴台志愿军战俘家庭相簿里翻拍的生活照、纪念照,显现创伤和挣扎,虽经 60 年自我疗治而无法愈合;

● 第一次讲述 40 名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迫加入军队,经历消沉,不断奋进的故事,以及部分老兵晚年返乡、落叶归根的全部人生历程。

上架建议 战争 历史

ISBN 978-7-80251-956-5



9 787802 519565 >


定价: 39.80元

孤島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张泽石 高延赛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 张泽石，高延赛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251-956-5

I. ①孤… II. ①张… ②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2622号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著 者 张泽石 高延赛
责任编辑 荣挺进
文字编辑 杨国辉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56-5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 言

19世纪末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朝鲜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苏联共同在朝鲜半岛接受日本武装投降。美苏议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双方占领军的分界线。1948年8月，美国扶持的“大韩民国”在三八线以南宣告成立。1949年9月，苏联扶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以北宣布独立。朝鲜半岛上便出现了两个国家，他们都主张本国政府是全朝鲜的政府，都要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斗争。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日益尖锐，南北朝鲜的敌对也日益加剧。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北朝鲜的巨大变化，加上当时美国将主要军力部署在欧洲，朝鲜元首金日成遂向斯大林提出了武力解放南朝鲜的请求。斯大林为朝鲜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投入13.5万兵力及150辆坦克全面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起了强大攻势。韩国军队节节败退，6月28日，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即告陷落。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任命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联军总司令，给予的使命是：“把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将驻扎在日本的美第八集团军主力增派到韩国，阻止了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攻势，联军沿洛东江构筑了坚固的“釜山防卫圈”。朝鲜人民军则把他全部12个师的兵力在第

一线展开，向釜山突进。从7月到9月上旬，双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攻防战斗。没有空军掩护的人民军损失惨重。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以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大攻势在靠近三八线的仁川港登陆成功，随即利用人民军后方空虚，自西向东拦腰切断了朝鲜半岛蜂腰部，堵死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南面的联军乃渡过洛东江向北猛烈进攻，到9月下旬，人民军主力在南北夹击中全线瓦解。数万人被俘。九月底，联军主力抵达三八线。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讲话中严厉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不会对外国的侵略置之不理，万一帝国主义者侵入邻国领土，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八国联合提案”，允许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10月8日，中国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我们不能对北朝鲜遭受外国军队的侵略袖手旁观……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愿为保卫和平而战斗！”但麦克阿瑟仍然在10月10日向第八集团军下达了北进的命令。首先派出重型轰炸机B-52机群以无数重磅炸弹，对北朝鲜实行地毯式轰炸，将平壤、元山、新义州等主要城市变成火海、夷为平地，再以重型坦克开道多路进入北朝鲜。此时的联军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10天即攻克平壤。为庆祝占领平壤，10月21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举行了庆祝阅兵式。10月24日，麦克阿瑟亲自下达了总追击令：“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进！”而从平壤到鸭绿江、到中国国境线只有200多公里了。

1950年10月中旬开始，第一批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匆忙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朝鲜，有从华东赶来的部队连单衣、草鞋都没来得及换，只把军服上解放军的标志取掉，把部队名称由解放军改成志愿军就过江了。他们出国前被告知：美帝国主义要走日本鬼子侵华的老路，安市（今丹东市）已被轰炸了！（虽然后来史实证明美国当时没有任何进攻中国的计划。）10月25日，已经在云山、温井、熙川一线严阵以待的志愿军向着踌躇满志蜂拥北进的联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指挥下，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

线进行阻击，又集中5个军及1个师的兵力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联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军发起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时入朝部队已增至50万人的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军诱至预定地区，发起反击围攻，给予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联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为逃避被围歼，联军狼狈地放弃了平壤、元山。直到12月24日，在志愿军追击下，联军仓皇地从陆路、海路一泄千里撤退至“三八线”以南。这就是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此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在占领首都汉城后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这次战役打破了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计谋。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但此时志愿军已经远离后方又没掌握制空权，运送武器弹药与给养的后勤队伍遭受美军沿途猛烈轰炸，补给十分困难，第一线兵力亦不足。联军便迅速补充自己的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被迫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了第四次战役。

该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却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战线节节后退。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前方，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军。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战斗到4月21日，将联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损失较大，但奋力制止了联军发动的攻势。

在此期间的4月11日，联军统帅由李奇微替代了麦克阿瑟，联军对付

志愿军的战术有了明显改进。

志愿军由于第 19、第 3 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 9 兵团重返前线，在总兵力上已居优势。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指导方针，于 1951 年 4 月 22 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集中了志愿军 11 个军和人民军 1 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没有遇到联军主力的抵抗而直逼汉城；5 月 16 日，志愿军又发起了第二阶段战斗，以其主力第三兵团为先锋，由中线越过北汉江向南推进。李奇微采取“磁性战术”不战而退，吸引志愿军继续深入。等到志愿军随身所带的粮食大部消耗后，突然以优势兵力从两翼向北转入强攻，终于在 5 月 27 日在北汉江附近，将负责掩护大军后撤的志愿军第 60 军第 180 师重重包围。并对左右侧翼的其他志愿军部队给予重创。志愿军 180 师的 12000 名指战员们经过激烈战斗，最终 1/3 突围，1/3 战死，1/3 因伤、残、病、饿丧失抵抗力被俘。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被俘人数超过 15000 名，使得被俘总人数猛然上升至两万多人。联军也重新将战线向北推回至三八线。

经过 7 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认识到如将主要军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 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并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深感自己部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劣势。在现有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确实难以实现。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中方乃于 1951 年 6 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改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自 1951 年 7 月到 1953 年 7 月，战争双方举行了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中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首先是美方拒绝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的规定，坚持其“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遣返的地方”提案。1952 年 4 月，朝中方面为争取早日停战有条件地

同意根据战俘个人志愿进行遣返。当月，战争双方同时对各自拘留的战俘进行了“志愿遣返甄别”。美方对 21000 余名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是：选择回大陆的只有 7000 人，不愿回大陆的却有 14000 多人。板门店停战谈判因此中断，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了更大代价。

1954 年 1 月这 14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军用军舰运送到台湾。从此他们只能隔海遥望故乡，夜半思念亲人。

为什么竟然会有 14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大陆？

六十年来，我们通过战俘营亲历者们的集体回顾与思索，通过两岸志愿军战俘后来同样遭受过的磨难，通过阅览不断问世的朝鲜战争参与者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通过近年来对众多去台志愿军战俘的交往和深入采访，以及委托海外亲友查阅美国、台湾解密的大量史料档案，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从而不断修正它的答案。即使如此，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只能说是比较确切、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而已。

我们之所以一直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剖析它的多方面和深层次原因，不只因为它是朝鲜战争中一桩重大的历史疑案，更因为我们希望国人对那些去了台湾的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有一个全面的、公正的认识。他们曾经跟他们的志愿军战友们一起在烈火硝烟中出生入死为国征战，他们也绝对期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能回家跟亲人团聚，过一种有尊严的正常人的生活，他们这一生为国家承受了太多的牺牲与痛苦！我们还希望通过弄清问题、还原事实的真相与全貌能够有助于消除两岸历史恩怨、有助于弥合中华民族的这道深深的裂痕。

我们将由浅入深地对这个问题逐步展开来叙述。首先分三个阶段来介绍中国战俘营的有关状况：第一阶段是从 1951 年初到 1951 年 7 月停战谈判开始前中国战俘营的“内乱”情况；第二阶段是从 1951 年 7 月到 1952 年 4 月，中国战俘们被拖进一场惨烈的、战俘营内的“国共内战”，并在美军完成对中国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后，这两万多曾经携手参加保家

卫国的战友终于被分裂成“要回国”和“不愿回国”的两大敌对营垒；第三个阶段是从1952年4月到1954年1月，一万四千“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的经历和朝鲜战争停战后他们被押送到“中立区”接受“再甄别”过程以及最后被送到台湾岛上的情况。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将叙述这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当年到台湾后继续承受了多少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受的、因为民族内争所留下的历史怨仇。我们也将重点介绍他们是怎样度过自己后半生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台湾建设的贡献以及他们最后的不同归宿。

这是一段关系到上万名志愿军官兵和他们亲属命运的重大历史，是整个抗美援朝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绝不应该被舍弃被遗忘。

值此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际，仅以此书献给所有曾经为国家承受苦难与牺牲的志愿军战俘们！

张济石
高北堂

引子

我是志愿军的后代

这样的惊讶并不为过

有时和朋友聊天，提及自己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后代，知道我从台湾来的朋友无不惊讶。接着的疑问往往是：

“那你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总有些哭笑不得。通常我的回答则更令朋友们侧目：

“你们听说过志愿军战俘吗？知道有的战俘没有回来，而去了台湾吗？”

朋友们满脸狐疑的表情，往往揭示着“长篇大论”的开始。然而，通常我却寥寥数语带过。

自己也不清楚

是的，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是志愿军的后代，但我对曾身为志愿军的父亲是如何加入志愿军，如何被俘，又如何选择去了台湾，却不甚了了。记忆中家严曾只言片语地提及，但始终串不到一起。

1954年1月23日，从韩国仁川港启程的运兵舰将1万4千多名志愿军战俘送抵位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从这一天起，一位来自重庆市璧山县

的年轻人将在台湾走完他全部的人生旅程。然而，当时他不知道。

记得年幼时曾问过父亲一句玩笑话：“当年您志愿吗？”

父亲一脸严肃地回答我：“小娃儿别问那么多！”

停了好一会儿，父亲才慢慢说道：“能有选择的余地吗？”

还记得父亲沉重面容上那双迷离的眼睛，正朝着遥远的天边凝视。

娃娃兵

有次陪着父亲上市场买菜，途中碰到一位不曾谋面的叔叔对我父亲说：“×老师您好！”

寒暄过后，待那位叔叔走远，我问父亲：“您还当过老师，怎么您没和我提起过？”

父亲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在俘虏营时，我曾教过他们读书识字。”

在买完菜返家的路上，按捺不住的我又问了父亲：“刚才那位叔叔就是您当年在俘虏营里曾教过的学生？当时您有多少学生啊？”

父亲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总有二三十个吧！”



志愿军小战士

父亲顿了一顿，接着又说：“当年那些娃儿，啥都不晓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还没有名字哩！是我帮他们起的名字。”

父亲说完这些，面上还挂着不常见的微笑。我挠挠头接着问：“当年他们都多大啊？”父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回过头说：

“大多是十四五吧！比你现在小点儿。”

我无语了，脑袋里正浮出刚才碰到的那位叔叔的背影。

贼配军

打小就知道父亲的胸膛上刺着一幅美丽的“秋海棠”，在上还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逐渐懂事后，才知道类似的刺青，凡是来台的志愿军战士每一位都有。父亲曾在晚年的时候动过念头想把它除去，然而年纪大了再遭这样的罪，我深不以为然。就这么，它陪着父亲一直到了最后。

看着水浒传的故事，又想起了父亲身上的刺青。它在诉说着什么呢？一个一辈子的烙印，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段特殊的经历，不能回头的选择，命运的无奈。回家，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茫茫天涯路

由稻田而麦田，由起伏的丘陵变为一望无际的平原，轰鸣的火车载着一群战士驶向未知的遥远。看着向后散去逐渐远颺的烟雾，远在天际的白云深处，那是归乡的路途。

“不晓得到啥子地方！”父亲后来回忆着说。

就这么着，父亲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地到了安东（即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迎面而来凛冽的北风，让他知道这是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

“啥子都没得！”

就要上战场了，但是父亲告诉我当时他没有“武器”，直到要过桥的那一天。对于此，曾有过短暂军旅生涯的我，大为不解。

就在那一天，父亲拿到了“军人的第二生命”——一把俄制“转盘枪”，父亲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没有描述过那是



上为 PPD-1940 式，下则是 PPSH-41 式。老爸到底是拿那一种呢？

把什么样的枪，而我也不是军事发烧友，对此完全没有概念。尔后根据自己的揣测，大概是把俄制的PPD-1940式冲锋枪，或是PPSh-41式冲锋枪。

也是在那一天，父亲才了解，河的那一边是他们前进的方向。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父亲随着队伍缓缓地迈过鸭绿江，而迎接他的则是不可掌控、无可违逆的命运。



鸭绿江断桥。桥断了可以再修，而归乡路呢？

等待还是等待

部队打散了，一些侥幸突围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寻找安全栖身之所。

“穷啊！实在是太穷了！”父亲回忆着躲进早已空无一人的朝鲜农舍时说。

天府之国毕竟还是天府之国，父亲印象中老家的泥墙土瓦，似乎还远胜眼前所见的一切。疲累饥饿的战士们，在无情寒冷的折磨下，不由自主地瑟缩在一起，而一望无际的白雪，哪里才是回家的方向。天微明，一群不速之客彻底打乱了战士们才刚平静不久的心。

迈步前行，回头遥望着另一端的地平线。家在那里吗？无情的命运正在嘲弄着这群背井离乡的人，而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等待。

Lucky Strike——幸运出击？

放暑假从学校回家时，随手拿了盒同学给的 Lucky Strike 牌香烟扔在包里。到家后，不经意地从包里取出，搁在自己的书桌上。

“这个哪里来的？”父亲拾起香烟问道。

“同学给的。”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好久没看到这种香烟了！”父亲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带回来的 Lucky Strike 慢慢地说。

“您见过？”我好奇地问。

其实这香烟要不是那个外国同学扔下，我之前也没见过。我替父亲点了一根，烟雾自父亲的嘴里缓泻而出。

“还是那个味！”父亲随口地一句，但思绪却飘到那个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一座小岛。

“在俘虏营的时候，我们常拿东西向美国兵、印度兵换这个！”

至于父亲拿什么去换的，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在俘虏营里的生活，父亲提的很少，除了和韩国老嫗学点“韩语”，和管理俘虏营的士兵们换换香烟，以及教导那群娃娃兵读书识字外，日复一日的，似乎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美国制的 Lucky Strike
士兵们的愿望在哪都一样

命运的轮盘

“战争是残酷的。”父亲这么说。

刚从部队休假回家，拾起墙角的小板凳和父亲在厨房摘菜。肩上的少



重庆璧山县的金田寺，
父亲曾经足迹所至

尉军衔，衬着晒着黑亮的皮肤的我，抬头望着父亲。岁月的刻痕早已在父亲凝重的面庞驻足，唯一不变的还是寡言少语的性格。

“一起离家的老乡，侥幸活着的没有几个。”父亲说。

我很难想象那一百多个年轻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父亲的玩伴、同学、朋友、乡亲，就这么永远停留在时间的某个定点。他们都是某些人魂萦梦牵的主角，也都是大时代中最无奈的小人物。卑微小人物的生命铸就了某些赫赫有名的名字，而他们仅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消逝，不留痕迹。

饭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大伯一家的合影。天各一方的兄弟，五十年的别离，最终也无法相聚。父亲轻酌着陈年高粱，每每望着相片凝视，而那穿透相片的眼神，是否已经看到了故园略影。

海的那一边

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动人心魄的场面，没有豪气干云的呐喊，也没有低吟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平凡的生活，逐渐淡薄的记忆，无奈的命运抉择，和生命在下一代延续。作为一个战场老兵的后代，在父亲离去十多年后，只能凭着琐碎的记忆，追述这一切。

片段零碎的记忆，串起自己对父亲的怀念，也编织起在那个硝烟冲天、无所逃避的锁链中，无数卑微小人物共同的命运。在台的志愿军战士迄今仍在世的，不足十之一二，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年在战场上懵懂无知的少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终将成为记忆。

没有传奇，而生命仍在延续。

【本篇作者：吕荆恪，赴台志愿军战俘的后代。本文取自其新浪博客】

第一章

战 俘

(1950年11月—1953年7月)



目 录

- 001 引子 我是志愿军的后代
- 001 第一章 战俘（1950年11月—1953年7月）
-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基本情况 / 004
- 二、中国战俘营场的分布情况 / 006
- 三、联军战俘管理当局对待中国战俘政策的演变情况 / 009
- 011 第二章 分裂（1951年1月—1951年7月）
- 一、最初中国战俘营的状况 / 013
- 二、1951年6月以后的战俘营状况 / 024
- 029 第三章 内斗（1951年7月—1952年4月）
- 一、巨济孤岛上的内斗起因 / 031
- 二、“72”战俘营的“战俘内斗”怎样演变成了“国共内战” / 035
- 三、“86”战俘营的“国共内战”是如何开始的 / 047
- 053 第四章 甄别（1952年4月—6月）
- 一、中朝方面同意进行“志愿遣返甄别” / 055
- 二、“志愿遣返甄别”的准备工作 / 056
- 三、“71”战俘营的“甄别” / 058

- 四、“72”战俘营的“甄别” / 061
- 五、“86”战俘营的“甄别” / 065
- 六、“70”战俘营的“甄别” / 068
- 七、釜山战俘“志愿遣返甄别” / 072
- 八、“志愿遣返甄别”的最后统计数字 / 072
- 九、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 073

079

第五章 在济州岛（1952年6月—1953年9月）

- 一、迁移的风波 / 081
- 二、济州孤岛上的凄风苦雨 / 083
- 三、去台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 / 090
- 四、台湾当局对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声援活动 / 095

097

第六章 进中立区（1953年9月—12月）

- 一、“中立国和中立区战俘营场的设立” / 099
- 二、停战后双方执行有关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 / 102
- 三、在中立区的战俘们 / 104
- 四、解释工作的事前准备情况 / 106
- 五、在解释帐篷内外的尖锐斗争 / 114
- 六、选择的无奈、痛苦和艰难 / 116

121

第七章 踏上宝岛（1954年1月）

- 一、从“志愿军战俘”到“反共义士” / 123
- 二、旅途中的风波 / 131
- 三、隆重盛大的欢迎场面 / 133
- 四、台籍战俘母子团聚的动人场景 / 135
- 五、来自琉球的志愿军战俘 / 136
- 六、最全面的历史记录 / 139

- 149 第八章 加入国军（1950年2月—1955年3月）
- 一、被精神激励 / 151
 - 二、被思想训导 / 154
 - 三、被集体宣誓加入国军 / 155
 - 四、被正式“融入”国军 / 157
 - 五、“不愿被融入”者的遭遇 / 163
- 171 第九章 战俘访问团（1954年2月—11月）
- 一、组织“反共义士访问团”分赴台湾各地 / 173
 - 二、组织“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访问东亚、东南亚 / 175
 - 三、战俘访问团的美洲之行 / 186
 - 四、战俘海外访问团的南美、欧洲之行 / 192
- 197 第十章 消沉（1955年4月—1987年）
- 一、桃园县遇到孤身难友 / 199
 - 二、“一无所有的白” / 201
 - 三、荣民之家 / 210
 - 四、难以治愈的终生之痛 / 216
- 219 第十一章 奋进（1960年代—2000年代）
- 一、在台北难友家 / 221
 - 二、“国军英雄纪念馆”里的聚会 / 228
 - 三、诗人文晓村的成长经历 / 230
 - 四、两次被评为“模范父亲”的马守斌 / 241
 - 五、“绿庄飞阁”寄乡情 / 245
- 249 第十二章 探亲之路（1987年春至今）
- 一、台湾开放老荣民回大陆探亲的一波三折 / 252
 - 二、诗人文晓村艰难曲折的返乡探亲之路 / 256
 - 三、巾帼替夫还夙愿 / 263

- 四、有家也难归 / 268
- 五、来自异国的“华侨” / 270
- 六、四十年的旅程 / 273
- 七、二十三年寻亲路 / 274

281

第十三章 叶落归根（1970年代至今）

- 一、一个志愿军战俘的悲喜人生 / 288
- 二、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 290
- 三、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 / 295
- 四、差点被拒绝的一次探访 / 298
- 五、绕了半个地球终于回到故乡 / 301
- 六、杏花村旁是家园 / 303
- 七、叶落千里也归根 / 309

315

后记

第一章 战俘

(1950年11月—1953年7月)



韩国巨济岛战争博物馆战俘营实景模型之一

据吴金锋《安德舍笔记》第一集“战场上如何被俘”记载：志愿军战俘主要产生于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1951年5月至6月）。此前半年多的四个战役，被俘者只二三千人；此后两年多至战争结束，被俘者也只几千人，两者合计，不到全部被俘者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我军粮尽撤退，美军利用空中和地面的机械化装备，也利用我军指挥上的失误——用彭老总《彭德怀自述》里的原话：“在转移时，部署不周，遭敌机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这才产生了大量的战俘。被俘者，有蓄意投敌和在敌前放下武器投降的分子，他们“真正畏缩怕死，政治上不合格的，仅占被俘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而负伤丧失战斗力占一半以上；此外就是拼杀至阵地

战 俘			
(1) 被俘总人数			
国 籍	小批交换	大批交换	总 计
总 计	6,670	78,823	85,493
北 朝 鲜	5,640 ^a	79,183 ^b	84,823
中 国	1,030	8,640 ^c	9,670
合 计	6670	78,823	85,493
美 国	149	3,597	3,746
英 国	471	7,862	8,333
加 拿 大	33	945	978
澳 洲	16	229	245
新 西 兰	1	40	41
印 度	2	30	32
菲 律 宾	6	22	28
日 本	0	21	21
中 立 国	1	8	9
未 知	1	2	3
其 他	1	2	3
未 知	0	1	1
未 知	0	1	1
未 知	0	1	1

此即赴台战俘人数

(2) 不愿被遣返的战俘			
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的			
处 理	总 数	中 国	朝 鲜
合 计	22,604	14,794	7,800
回到共产党控制区逃遁与失踪	626	440	186
在印度看守部队看管期间死亡	17	2	11
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38	10	28
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66	12	54
回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区*	21,439	14,235	7,604

此即去台战俘人数

共产党方面控制的战俘				
处 理	总 数	美 国	英 国	朝 鲜
合 计	400	23	1	376
回到共产党控制区	347	21	1	325
随印度看守部队去印度	5	0	0	5
回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控制区	10	0	0	8

1954年7月19日完成全部战俘工作。

a. 包括444名被送到越南的平民，其中有3名女战俘和16名男战俘。
 b. 包括66,788名男战俘，473名女战俘，23名儿童，8,799名被送到越南的平民。
 c. 包括1名女战俘。

取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里的双方战俘数据

照此美军方面的统计，归俘人数 6670+440=7110 人；赴台人数 14235 人；去中立国 12 人；失踪与死亡 17 人；合计为 21974 人。由于未计入在水原、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战俘营失踪或死亡的战俘人数，该数字并非志愿军被俘人员总数。



战场上受重伤后被俘的志愿军战士

失陷被俘，作战时误入敌阵而仓猝被俘，掉队遇敌或在医院中陷敌被俘，总之，绝对多数的志愿军战俘均属在战场上无力继续作战，力尽被捉。

让我们先来看看整个志愿军被俘人员情况及联军战俘营场全貌：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基本情况

1.

被俘总人数：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22000多人被俘，其中有近千人因各种原因在战俘营去世。

2.

被俘原因：

因受伤在作战中被俘约3千多人。

因生病在战争中被俘约4千多人。

因冻饿、弹尽粮绝而失去战斗力被俘约 1 万 2 千多人。

因其他原因而被俘约 1 千多人。

在战场主动投降有数百人。

3. 被俘人员组成与最终去向：

师级干部 1 人、团级干部 5 人、营级干部 30 余人、连排干部 600 余人、普通战士 2 万 1 千余人，到朝鲜战争结束时，女战俘仅有 1 名。

这 2 万余名被俘人员中有 7094 人历尽苦难、经过斗争，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自己要求重返祖国的愿望，先后回到了祖国。其中有 1014 人于 1953 年 4 月下旬双方交换伤病战俘时先期回国，有 5640 人是在同年 7 月 27 日双方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于 8 月 5 日开始到 9 月 6 日为止交换战俘时陆续回国。还有 440 人是在中立国遣返战俘营中，经过自己斗争或我方代表解释回到了祖国的。这先后回国的 7094 人占被俘人员总数的 30%，其余的 14200 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被美军军舰运送去了台湾，21 人去了中立国。



韩国釜山战俘收容所



韩国釜山战俘营分布图 制图：吴春生

二、中国战俘营场的分布情况

志愿军人员被俘以后，被美军当局首先押往“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集中，然后押往韩国水原战俘转运站进行初步审讯、组队，再集中运往韩国釜山战俘收容所进行登记编号，最后大部分被送往距釜山不远的巨济岛战俘营场关押。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亦被关押在该岛上。所有人民军及志愿军伤病战俘都先在前方野战医院初步治疗后送往釜山各伤病战俘收容所。女战俘全部拘留在釜山第六战俘收容所。

1951年夏秋之际，中国战俘接近最高数字，以后只有零星人员被俘。在釜山第一收容所收容有志愿军被俘伤员数百名，第三、四收容所有中国战俘病员近千名，第十收容所则为登记战俘卡片与美军参谋部情报机关“G-2”（编案：G-2是美军各级参谋部门负责情报搜集单位的代号，非“特别”设置的单位。如G-1则代表人事，G-3则代表作战与训练，G-4则代表后勤等）审讯战俘的营场，第十一收容所则作为向巨济岛转运战俘的营场（后为服劳役的中国战俘营场），在第二、第五收容所有数百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巨济岛上关押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战俘营主要是第72和第86两个战俘营，“72”关押7000余人，“86”关押8000余人。这是美方看管最严，



韩国“巨济岛战争博物馆”志愿军战俘营遗址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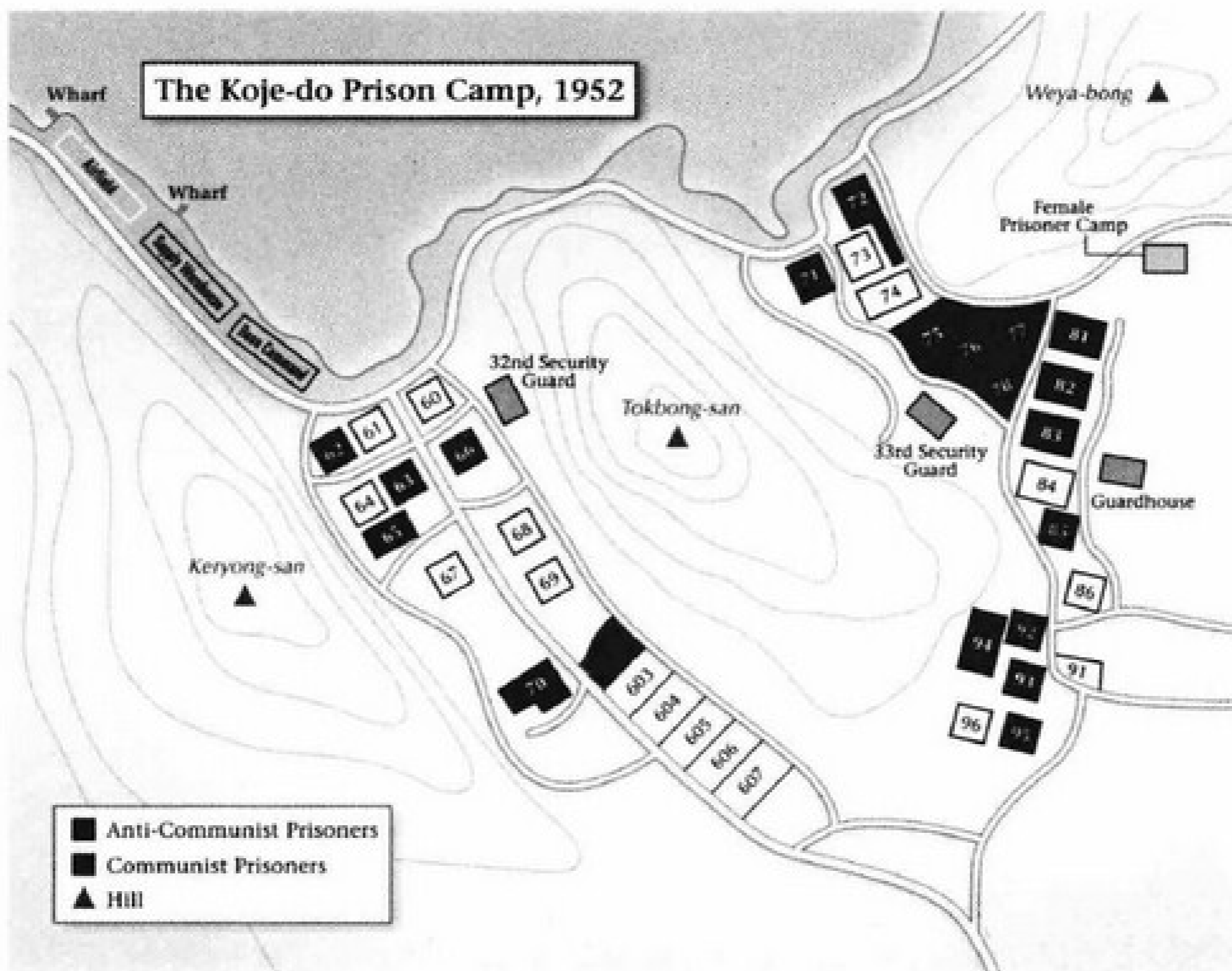
巨济岛战俘营全景之一。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



巨济岛战俘营全景之二。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

并力图利用变节者们从内部进行全面控制的两个战俘营场。1952年初又成立了第70战俘营场关押有1500余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在巨济岛第61战俘营（转运战俘营场）还有少量服劳役的中国战俘。在1951年11月8日以后，分别由“72”和“86”两个战俘营场内冲出了两股亲共战俘共219人。他们在“72”战俘营的对面“71”战俘营内建立了一个坚持遣返的回国战俘营地。

1952年4月8日以后，在美军当局进行的“志愿遣返甄别”中冒死表达回国意愿，从各战俘营冲出来的5000余名中国战俘，被集中在岛上新建的“602”战俘营。同年7月，这5000余人又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上新建的第八战俘营，直至停战后遣返为止。其余的14000余未能表达回国意愿的志愿军战俘，则于1952年4月中旬“甄别”后，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第一、第三、第六战俘营，直至停战以后，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为止。



巨济岛战俘营分布全图，其中71、72、86、602战俘营为志愿军战俘营。

三、联军战俘管理当局对待中国战俘政策的演变情况

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基本上是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善待战俘的。尽力为伤病战俘医伤治病，尽量安排好战俘的生活。在战俘营内部管理上采取“战俘自治”政策，即由战俘自己推举各级“俘虏官”实行自治。美军只派出少数管理人员负责提供日常生活与医疗卫生所需物资，不干涉战俘内部事务。

1951年3月后，美军发现上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接受金日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命令，准备越狱暴动，并积极联络志愿军战俘参与活动。美军便一方面加强了外部军事监管，包括将战俘移往巨济岛关押，一方面尽力在战俘营内部实施“战俘管制”政策，即尽可能在战俘营里寻找“战场投诚分子”或被俘后改变信仰的“变节者”来担任管理战俘营场的“俘虏官”，还授权他们成立“战俘警备队”，以维持战俘营秩序为名对“坚定共党分子”及“亲共分子”进行监控。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方采取了争取“战俘自由遣返”的谈判策略，同时在对待中国战俘的政策上，也从“加强监管、防止暴动”，改为“以俘制俘”政策，即“强化监控、支持反共战俘对亲共战俘的策反攻势”政策，并派遣反共意识强烈又会讲中文的“随军牧师”伍培礼（O' Sullivan）进入战俘营场，这位“随军牧师”直接指使反共战俘强化对亲共战俘进行控制、策反和镇压。

第二章 分裂

(1951年1月—1951年7月)



韩国巨济岛战争博物馆战俘营实景模型之二

一、最初中国战俘营的状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前四个月志愿军没有参战，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韩国仁川登陆，切断10余万朝鲜人民军退路，大部分人民军成了战俘。志愿军是在1950年10月下旬美军已经逼近鸭绿江时才入朝参战的，也才开始有了志愿军战俘。因此早期的志愿军战俘被押送到釜山进入战俘营时，先是在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内成立“中国小队”、“中国中队”、“中国大队”，直到1951年6月大批志愿军战俘下来时，才在巨济岛有了第一个独立的“中国战俘联队”：巨济岛第72号战俘营。

朝鲜战争前期，由于美军在战俘营实施“战俘自治”政策，美军只负责管理战俘营的日常生活秩序。因而朝鲜人民军战俘们在战俘营里大都恢复了原人民军部队建制，甚至秘密重建了朝鲜劳动党组织。中国战俘被送进来以后，他们就积极寻找、联系志愿军难友里的中共军官站出来组织中国战俘队伍，增强战俘营里的反



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



年仅 22 岁被俘前的营
教导员孙振冠

美斗争。

志愿军 20 军营教导员孙振冠是早在 1951 年 1 月因冻伤被俘的。孙振冠是上海人，高中文化程度，1944 年参加新四军，被俘时年仅 22 岁的他已经是营教导员。他后来成了志愿军要求归国战俘的总代表。孙振冠生前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战俘营内的中朝战友》（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其中记载了他被押送进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后那一段经历，那正是

早期战俘营场的生动写照，谨摘录于下。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期，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不幸被俘。我 1951 年 1 月中旬到釜山，因双脚严重冻伤，被送进了战俘“医院”。我与自己的同胞、同行的难友们分离了，茫茫前路，亲人何处？孑然一身，孤掌难鸣，我的心被痛苦咬啮得几乎要窒息了。

当时，志愿军被俘的人员不多，军官更少，“医院”里住的多是人民军伤病战俘。我一到“医院”，就有一些人民军战俘三三两两来到我的帐篷看望。有的可能是出于好奇，看一下就走了。有的则见面就问：“蒋介石的好？毛泽东的好？”当我回答“毛泽东好！”的时候，他们就高高地翘起拇指，露出了微笑。每当这时，一股暖流就会从我的心头涌起，使我获得莫大的安慰。住院的第二天晚上，来了一名衣着整齐的年轻人。他先用生硬的汉语问：“……毛泽东的好？”然后用英语夹着汉语悄悄对我说，有几位朝鲜同志知道我是军官，想跟我谈谈。我怀疑他这身打扮，心想，这里鱼龙混杂，我可不能上坏人的圈套。于是对他笑笑，未置可否。接连几天，一到天黑（这时看管的美军都离开战俘营），这位年轻人就把我领到他住的伙房帐篷里去，问前方战况，问我被俘情况，还找来人民军战俘医生替我洗伤口，换药。我向他谈了前方胜利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他说，他姓朴，大学生，被俘前是南朝鲜“义勇军”（人民军南进后组建的队伍），在学校里就是地

下劳动党员，现在是“医院”的英语翻译。说有几位人民军战俘中的劳动党员很想跟我见面。因为他活动比较方便，所以先让他跟我联系一下。我经过几天观察，觉得他不像坏人。心想，如果他是好人，我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是坏人设的圈套，那就随机应变，反正我已暴露了身份。经过考虑，我答应跟他说的那几位同志会面。



《考验》书影

第二天晚上，我按约定时间到老朴的住处，同几位人民军被俘的难友见了面。其中一位姓金，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据他说，他曾参加过我东北民主联军，是劳动党员。另外几位也是党员，他们已经秘密组织起来了，希望通过我这个中国军官，把“医院”里的志愿军伤病员也逐步组织起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恳切态度，使我消除了原来的怀疑，同他们愉快地交谈起来。我向他们讲了志愿军入朝后已取得的胜利和中朝战友并肩抗日的传统友谊，也表示了我与他们一起斗争的决心。谈着谈着，我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了，几双手久久地紧握在一起，激动不已。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终于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营里找到了同志。我们为正义的事业共同奋斗，正义的事业没有疆界！

那时候，“医院”里只有几十名零星散处的志愿军伤病员。我就负责做这些人的工作，经常利用夜间出去，到各帐篷看望他们，向他们传播胜利消息。鼓励他们不要忘记祖国，安慰他们好好养伤，也帮助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医生也常常同我一起去看望这些难友，精心地照顾他们。每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就会像见到亲人一样，泪流不已。有的还扑到我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表示：绝不给中国人丢脸，绝不变心。看到这种情形，朝鲜同志也热泪盈眶。几乎是每天晚上，老金他们和我都要在老朴的帐篷里会一次面，商量

怎样把一些“好同志”组织起来；怎样孤立和打击“坏蛋”；怎样发动战俘身份的医生向美军要药品，要医疗器材，监视美军“医生”不让他们制造人为的“事故”（把战俘当试验品）。一天，老金兴奋地对我说，他们已同其他战俘营的同志有了联系，打算春暖花开后，组织一部分伤病痊愈的同志，越狱到智异山去找游击队。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福音。在当时情况下，也只有这一条出路了。我们都全力以赴地为此做了种种准备，或物色对象，或储存口粮，或与李伪军“拉关系”、摸情况，等待春天的到来。

2月间，美军在“医院”里搭起了一个美军参谋部情报机构“G-2”的审讯帐篷。这是专门从战俘口中榨取情报的机关。对这类“审讯”，我已有了一些针锋相对和虚与委蛇的经验。所谓“审讯员”，都是20多岁的美籍华裔，会说普通话或广东话、上海话。审讯中，我就用上海话答对，同他们拉起了“老乡”关系。利用他们的无知和好奇心，趁机向他们谈了祖国解放以后的进步情况和对资本家、华侨的政策，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一次，我和他们争论“谁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这一话题时，其中一个姓陈的“审讯员”带着一种近乎自豪的口气对我说：“不争了，你说美国侵略，我们将军说你们侵略，这个我们说不清。我只知道，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受人家侵略的，现在你们能到朝鲜来打仗，就算是侵略吧，也说明中国比以前强大啦！”他的话引起周围几个“审讯员”的共鸣，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台湾老头（蒋介石）的政府就是腐败……只有中国强大了，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来。”看得出来，这是一些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的华人。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他们很高兴，建议我利用审讯的机会在那里设法搞一些地图、指北针之类的东西，有可能搞到武器就更好了。我答应试试看。经过几次试探，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很难，因为美军“G-2”的这些人毕竟是穿美国军装的文职人员。老金他们劝慰我说：“这不要紧，能给他们上几堂‘政治课’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于是，只要找我去审讯，我就跟那些“审讯员”们摆“龙门阵”、上“政治课”。



G-2 的讯问

当然，这只有在监督的美国军官出帐篷时才行，美国军官一进来，他们就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模样。

正当我们积极为越狱做准备的时候，3月的一天，美军“G-2”的“审讯员”陈某偷偷告诉我：“听说朝鲜人要暴动，你可千万别参加进去，死了划不来。”我估计可能有人告密，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大家研究，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作好被审被抓的准备，并注意查找告密者。不久，一些被怀疑参加活动的人民军伤病员陆续提前调出了“医院”。

很快，我也被传讯了。审讯的美国人气势汹汹地威胁我，要我承认参与了朝鲜难友准备“暴动”的活动。我矢口否认，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们拿不出，只能把我暴打一顿出气，同时通知我：“准备出院。”当天晚上，我到伙房与老金、老朴等朝鲜难友最后一次会面。他们估计，我这次出院，很可能会进监狱，也可能送到“中国大队”去。同时还向我介绍了“中国大队”的情况，说那里有不少人是原国民党军官，“心都坏了”，嘱我小心。并希望我到那里后继续做工作，团结同志，尽快同人民军战俘的“军官大队”取得联系，好配合行动。我一一答

应了，对他们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和依恋之情，也做了更坏的思想准备。

第二天，我拖着没有痊愈的双脚，被迫离开了“医院”。被俘初期朝鲜同志对我的短暂接触和帮助，犹如黑暗中迸出的一簇火花，它虽不耀目，却照亮了我脚下的路，撒下了一颗颗小小的火种。越狱计划虽然流产了，但“医院”里不少伤病员大都成了以后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位叫王云山（李春明）的同志，更成了我后来斗争中最可靠的战友。离开“医院”，我被押送到釜山的“战俘转运站”。这是一个临时战俘收容所，所有前方下来的新战俘都要经过那里编号、登记战俘卡片，然后分别送到不同的战俘营去关押。办完登记手续，我正要回到住的帐篷里去，突然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看，原来是刚才给我填写卡片的朝鲜战俘。不等我开口，他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声问我：“从医院里来的？”我点点头。他不再说什么，只让我等在那里，匆匆握了一下我的手，走了。不一会儿，他又领来了两位朝鲜战俘。他们先跟我一一握手，然后用英语介绍说，刚才那位姓崔，带眼镜的姓李，另一位姓朴。早在几天以前，他们就从出院的难友那里知道了“医院”里的一切，也知道了有我这么一个“中国大尉”。他们告诉我，在这里登记卡片的都是大学生，因为会英语，所以被留下来搞这个工作。他们几个都是劳动党员，利用比其他战俘活动方便的条件，曾掩护过一些干部。还随时了解前方的情况；经常对新来的被俘人员进行必要的鼓励和安慰，让大家振作精神，不忘祖国。发现表现较差的，就向他们提出警告，教育争取，把少数坏家伙孤立起来。他们说，这里是一道“关口”，做好这些工作，对今后的斗争有帮助。因为我会说一些英语，他们希望我能留下，跟他们一起工作。我犹豫了很久，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做中国人的工作确有困难。当时中国战俘逐渐增多，正需要会英语的中国人帮助登记卡片，我便留了下来。我很快就同转运站内“中国小队”的张鸿彬、王洪达两位同志接上了头，通过他们找一些新到的难友来谈话，鼓励他们不要忘记祖国。像在“医院”时一样，很多难友在听

到这些话的时候，都淌下了眼泪。同我一起在卡片登记科的，还有一位叫方向前的志愿军战俘，也是朝鲜同志留他在那里做填写卡片工作的。他虽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说话不多，还经常默默地帮我找人谈话，随时告诉我中国被俘人员中的思想情况。我十分感谢朝鲜同志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活动条件。在帐篷后面有一小块空地，那里有几棵歪脖子树，树枝上挂了几个练拳击的沙袋。老崔、老李、老朴和我经常在这里碰头，一边装作练习击拳，一边交谈。有时候，方向前和别的朝鲜同志就站在远处替我们望风。在一次碰头时，老崔他们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金日成将军号召战俘“自己解放自己”。说志愿军参战后节节胜利，很快就会南下，要全体战俘趁敌人溃败混乱之际举行武装暴动，上山与游击队会合，迎接反攻大军。并说，釜山的人民军战俘“军官大队”，已经指示各战俘营的地下组织要把一切工作都放到“自己解放自己”的准备上去。这使我意识到人民军被俘人员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整体，各个战俘营的活动并不是孤立和自发的行动。我钦佩他们的爱国精神和组织能力，对斗争更加充满了信心。



巨济岛战俘营里的日常娱乐：拳击

当时在釜山的人民军战俘约有 10 万人左右，组织起来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战局发展顺利，一旦行动起来，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和老崔等朝鲜同志一样，大家都兴奋不已，更加小心翼翼地加紧进行教育和物色积极分子的工作，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同时，也更加希望了解战局的发展。4 月末的一天，又来了一批新的中国战俘，我们照例向他们询问前方情况。其中有一个矮个子的家伙十分嚣张，叫嚷说他不是俘虏，是自己驾驶汽车“起义”过来，投降“联合国军”的。这把我们大家都气坏了。我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并且警告他：再做坏事，要小心他的脑袋。那家伙顿时傻了眼，又看到周围朝鲜同志一个个怒不可遏、磨拳擦掌的样子，吓得连连求饶，灰溜溜地走了。这个家伙，就是后来在战俘营里干尽坏事、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李大安。我们原以为把他教训一顿之后，他会老实一些。可是，我们太大意了。第二天，我被一个美国军官叫去进行审讯，说李大安向他们告发，我是什么“共产党派来做宣传的间谍”，“要组织暴动”。我据理驳斥，他们就找李大安与我当面对质。我说李大安是诬陷，让他拿出证据来。美国军官恼羞成怒，示意李大安打我。在主子的指使下，李大安像一条疯狗似的扑了上来，狠狠地向我挥起了拳头……这就是这条走狗在战俘营里开始罪恶生涯的第一步，也是向他主子献媚的第一个见面礼。审讯之后，我随即被命令离开转运站。在回帐篷收拾“行李”（破军毯、碗、筷）的时候，监押我的美军士兵留在帐篷外边等候。我趁机告诉老崔他们：李大安告密了，要他们小心！并怀着悲愤的心情对方向前说：“如果你能生还祖国而见不到我，就请你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不会对不起祖国，已经死在战俘营里了。”方向前泪流满面，只是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朝鲜同志也都忍不住淌下了眼泪，一个个前来同我拥抱告别。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老李仍没有忘记告诉我：如果能到中国大队，要团结中国同志，和（朝鲜战俘）“军官大队”建立联系。我感激地点点头。

乌云低垂，春寒料峭，海风掠过带刺的铁丝网发出凄厉的啸声。

我跨出转运站的大门，回头望去，老崔他们仍久久驻立在铁丝网里边，目送着我远去。去监狱？去刑场？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只是：我不能玷污自己的祖国，也不能辜负异国难友的信任 and 期望。出乎意料，我被送到距离转运站约二公里的“中国大队”——志愿军战俘营。当时，这里约有1000多名中国战俘。其中有一处用铁丝网单独隔离的小营场，关押着三四十名被俘的排以上干部，称作“军官小队”，我就被送进这个“军官小队”里。一到那里，我就感到气氛不对。担任“大队长”、“小队长”的是王顺清、魏四喜之流，都是曾经混进我军、没有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污蔑祖国，叫嚣“反共”，狐假虎威，欺压同胞，开始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队”。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进行活动，显然十分困难，必须加倍小心。刚到“军官小队”，我不说不动，默默观察。慢慢地，在我周围秘密聚集了董勤荣（化名刘光）、王云山等十几位同志。他们热爱祖国，痛恨敌人，都希望能有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急切地希望与人民军“军官大队”取得联系，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援。但我们同他们的营场相距很远，怎样才能联系上呢？正在我十分焦虑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中间的全成铉同志告诉我，他有办法了。老全是朝鲜族人，被俘前是四野某部的朝语翻译。他说，他曾到附近一个“战俘门诊部”去看过病，候诊时，从各战俘营前去看病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他就曾同朝鲜“军官大队”来看病的同志有过接触。这确是建立联系的一个好办法。我与同志们商量，决定先派全成铉去“看病”，与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挂上钩，约定日期，然后由我装病去“门诊部”与他们派去的代表正式联系。老全很快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说，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已经知道有个姓孙的“中国大尉”，他们也很想与我见面。我喜出望外。

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和老全同时装病到了“门诊部”。候诊的有好几十人，东一堆，西一群，有的蹲在地上下跳棋，有的晒太阳，有的聊天。押送的美国兵都远远站在铁丝网外边。老全机警地在人群中转了一圈回来，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说：“他就是。”那人也转过头

来望我。我俩缓缓地挪到了一起，同时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个“跳棋盘”，装作下棋的模样，通过老全的翻译，悄悄交谈起来。我俩相互介绍了自己。他姓卢，是朝鲜“军官大队”派来同我接头的代表。我简单谈了“中国大队”的情况和希望得到支援的意愿，他也扼要介绍了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概况。说大多数朝鲜战俘营内的领导权已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并有了党的秘密组织，“军官大队”的党组织已成了各个战俘营的领导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响应金首相号召，自己解放自己”，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根据前方战局胜利的情况，估计大军很快就会南下，“可能6月份就可以行动”（事后看来，当时对战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他还告诉我：他们已搞到了地图、指北针和少量武器，并与智异山游击队有了联系。希望中国同志作好一切准备，一旦行动起来，就积极配合。一旦有行动，首先从“军官大队”开始，各战俘营都听从“军官大队”的指挥。我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回来，把这次会晤情况告诉了刘光、王云山等同志，大家都异常激动。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到过“准备暴动”的消息，但都不如这次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尤其是与“军官大队”联系的成功，更使我们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使我们感到，在我们身旁，有数万名朝鲜难友做我们的后盾，我们绝不是孤立的。

这时，张福庆（原六十四军某部营长）等同志也先后到达“军官小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继续物色对象，扩大骨干队伍。正当我们紧张活动的时候，一个名叫谭兴东，自称是新四军老干部、老党员的人，主动来接近我，要求我们“不要抛弃他”。并说他听说朝鲜人可能举行暴动，他“宁死也不放弃这个机会”，希望我们到时候“不要把他忘了”。尽管他伪装逼真，手段狡猾，但由于我们有所警惕，没有中他的诡计，他最后终于暴露了丑恶的叛徒面目。通过谭兴东的表演，我们警觉到敌人可能已经嗅到了什么气味，马上把这一情况向朝鲜同志作了通报。他们也通报我们，他们那里也有几名被俘人员爬出铁丝网找美军去了，要我们提高警惕。



俯瞰巨济岛。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

6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被叫出去进行审讯。说有人报告我们要暴动，胡说什么“刘光他们已经招供”，要我承认，否则就“军法处置”。我完全相信我的战友们，知道这是拙劣的圈套。我一口咬定没有此事，并要他们找刘光等人来对质。他们作贼心虚，又拿不出证据，只得把我放回“军官小队”。我们继续做着暴动越狱的准备。为了迎接这个梦寐以求的时刻，我们仔细观察了周围岗哨的分布、哨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物。并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使用武器的分工，同时积极研究与“战士队”联系的办法。我坚定地相信，虽然当时骨干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难友内心里是热爱祖国的，决不会甘心任人宰割。一旦大军胜利南下，朝鲜同志揭竿而起，只要有少数人拼死带头，振臂一呼，就会立即汇集起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

不料，几天之后，釜山的所有中朝战俘（除伤病员和女俘），全部被美军迁移到釜山南边的一个荒岛——巨济岛去了。我们对重获自由的期盼难以实现了。

从孙振冠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951年6月之前，在釜山的中国战俘营里只有想跟朝鲜难友一起暴动越狱的“反美亲共”战俘和替

美国人监视告密的“亲美反共”战俘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出现“回大陆”与“去台湾”之争。我们同时也看到跟朝鲜人民军战俘营不同的是：早期中国战俘营的内部控制权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战场投诚”的反共战俘手中了。

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朝鲜人民军战俘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们“自己解放自己”（在必要时举行暴动）。而美军在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为防止战俘们暴动越狱，不仅强化了对战俘营的监管和情报工作，并将全部朝中战俘从釜山迁往巨济岛。

巨济岛是个离釜山百余海哩的比较荒凉的岛子，自古就是流放罪犯之地。此时美军将本来不多的岛上居民迁走，用重兵将全岛封锁起来，使之成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孤岛。

同时，出于对中共军队战斗力的畏惧，为防止中共战俘搞越狱暴动，便放手让一批原国民党分子去管制新建起第72号中国战俘营。只要这些反共分子告密说哪个共党分子要搞暴动，美军便立即将其调去“G-2”审讯甚至投入监狱。美军可能并未预见到他们的这个方针将造成何种后果。

二、1951年6月以后的战俘营状况

我们再来看看，从1951年6月开始，大批志愿军战俘下来之后新建的中国战俘营情况又如何？

志愿军180师540团的文化教员郭乃坚是五次战役中最早被俘的。郭是辽宁抚顺人，出身中农，在日伪统治下读过几年书，当过店员、工人，学会了些日语。抗战胜利后考进黄埔军校第23期，又学了些英文。成都解放前夕随军起义，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180师540团。1951年5月27日那天，他抬着负伤的指导员一起在美国军包围圈里被俘。他跟随第一批五百名中国战俘到达釜山第10收容所，成为五次战役后第一个中国战俘大队成员。他后来成了巨济岛第86号战俘营的联队部书记长，再后来

又是巨济岛第 602 要求回大陆的中国战俘营联队部书记长。他对被俘后最初那段经历有着比一般战俘更全面的了解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几十年后采访他时他回忆起来仍然相当详细、十分动人。



联合国军临时战俘收容所

我先说说被俘初期我们这一伙知识青年的情况。

我们刚被俘下来进入釜山第 10 收容所时，由于组织已经完全瘫痪，思想又十分混乱，出现了抢饭、打架现象。美军泰勒上尉叫他的翻译官、人民军难友金大全前来组建中国战俘大队。金大全也会日语。因为我曾经用日语请他过来制止打架，这时金大全就动员我出来当大队长。我对他说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老金就动员我当大队的书记，负责管理全大队战俘卡片。老金说，大队书记必需看得懂英文的人才当得了，大队书记还管着本大队人员调动，再说那大小是个俘虏官，也好保护自己。听老金这么一讲我才答应了。

我为什么拒绝当大队长？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既非有威望的共产党军官，又没有一伙原国军士兵弟兄供我调遣，孤家寡人一个，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没有可能来管理好几百个难友。

由于我拒绝当大队长，在那次集会上，半天推举不出大队长来。一个姓王的山东大汉站了起来，挥手大声说：“娘的，都不干，俺干！”于是，他就当上了那个中国战俘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那位王大队长找了几个山东老乡成立起大队部。他说：“老子从国军当了共军的俘虏，这回拿着老美的传单投诚过来当了老美的俘虏，老子还怕啥，你们跟着俺干，俺保大家伙少受罪！”王大队长又对我说：“郭书记，俺是大老粗，

您得帮兄弟一把！”我只得点头称是。但到了第三天，一伙四川籍的“袍哥弟兄”围在大队部帐篷门口抗议大队部人员多吃多占，两边差点动手。还是我出面劝阻了那伙“袍哥弟兄”的头子应祥云才平息下来。

幸而两天后又押来一批难友，其中有我的军校同学阳文华、王怀麟。我便跟他俩悉心研究如何控制局面。此时正好金大全来通知美军要从我们大队里挑选几十名中国战俘去替换在釜山货运码头卸运战俘用物资的朝鲜战俘。我便趁机将“王大队长”及其同伙一起调走，并请金大全宣布：“美军总管任命王怀麟当大队长。”王怀麟又任命阳文华当副大队长并邀请应祥云也来当副大队长，暂时稳住了局面。

不几天，12军的英语翻译员高化龙（本名高子）随着新下来的战俘到了10收容所，我们请他担任了大队翻译。同时到来的还有黄埔军校和西南军政大学的校友吴春生、李炽、王铁龙、罗厚根等人，他们分别被安排为中队书记，进一步增强了控制这个大队的爱国力量。

1951年6月中旬，我们这个千余人的中国大队首先被送进了巨济岛刚建成的第86战俘营场，成为该营场的第一大队。在“86”成立联队部时，“86”的美军老总史密斯上尉立即任命高化龙为联队部翻译，我任联队书记长。史密斯曾希望高化龙来兼任联队长，却被高婉拒，他推荐了应祥云和阳文华来当正副联队长。那是高化龙和我商定的。那时我们发现应祥云的袍哥团伙已发展成势，好在他们是以“同甘共苦”的哥们义气团聚在一起的，给应祥云一个“联队长”的头衔，可以利用他们来对付已经蠢蠢欲动的变节者们，而联队的实权则交由阳文华来掌握。后来当美军把从东京受训回来的“投诚分子”王福田任命为副联队长时，他面对“不问政治”的应祥云联队长也无可奈何，这证明了我们决策是正确的。

从1951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86联队就由一个大队扩展到六个大队共八千多人。我和高化龙、阳文华商量将会英语的安宝元、冯泽群等大学生安排在后勤、伙房等要害部门当翻译。把我们黄埔军校、西南军大校友们安插到各大队当大队书记或中队文书。有了这样一群

爱国知识青年占据着战俘营的内部管理岗位，86联队便保持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局面。

我再说说那时86联队里党员干部们的表现。

在86联队以战士身份隐藏在战士队的连排干部不少，他们被俘后思想包袱比战士们重得多，不愿出头来当“俘虏官”。后来有的人开始在暗中从事一些宣传组织活动也过于谨慎。我最佩服的是咱们539团的营长马兴旺，那真是敢做敢当！马营长在填写战俘卡片时报的是饲养员，化名为李彦。朝鲜翻译金大全了解到他是营长便给他做工作。他就同意出来当上了第二个中国大队的大队长。马营长上任后用了几天时间整顿好队伍，然后召开大会宣布：“老美要奖励主动投诚过来的人，谁是投诚的请举手！”结果有十几个人举了手。他吩咐：“把他们编成一个特别小队，给予特殊优待。”当天晚上就一个个叫出帐篷狠揍了一顿。其中一个名叫白佩鸣的家伙第二天找到老美审讯官把老马隐瞒营长身份的事给告了。美军审讯官便将马营长押走审讯，换上那个白佩鸣当了大队长。

老马结束审讯被换了军官卡片后，心有不甘，找到动员他当大队长的那位姓金的人民军难友，求他设法把自己的军官卡片重新换成战士卡片。就在二大队快上船开往巨济岛之时，老金把他送到码头一起来了“86”。

马兴旺营长一到“86”就到各个大队去“访友”，找他的老部下“聊天”，公开宣传：“停战谈判双方已经商定好，停战之后无条件交换全部战俘，等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回国了！”又特别到二大队警告那个出卖了他的白佩鸣：“你小子若不改邪归正，绝没有好下场！”

不久，马营长在四大队见到了他的通讯员杨永成，高兴之余带着小杨到处去“联欢”，让小杨带头唱《王大妈要和平》、《白毛女》、《刘胡兰》插曲，引起不小震动。他们到达六大队唱歌，那个大队长王福田是从东京受训回来的“战场投诚分子”，便下令不许唱共产党的歌曲。老马愤然质问他：“谁敢说不许唱共产党歌曲？难道要咱共产党部队唱

国民党歌曲吗？听说你手下还有人在偷偷摸摸调查党员干部，问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让他们想一想将来回国后的下场！”这事一传开，大长了爱国者的志气，灭了变节者的威风。

王福田、白佩鸣一伙苦于自己不会讲英语，无法立即向史密斯告状。但不久就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名叫伍培礼的老美，他自称是美军的随军牧师，是专门来向中国战俘传达上帝福音的。可他到“86”没几天，就把二大队长白佩鸣吸收为“基督教徒”，立即知道了马营长的活动情况。于是，马营长很快就被美军再度押送到釜山“G-2”去审讯，然后就被关进了“72”军官大队。

好在还有张城垣、赵明智、时占魁、门培英、耿基增、朱政权等一批党员连排干部在各大队继续进行反背叛活动，发挥了不小的凝聚作用。

最后我还要好好介绍一下原国军第95军起义士兵们的表现。

95军在成都起义后被合编到60军，在180师的被俘人员中有近千名是这些四川籍的起义士兵。他们不少人原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来的贫苦农民或城市贫民，在“86”四大队他们有几十个人抱团成立了取名为“弟兄会”的袍哥组织。他们打的旗号是：“患难相助、生死与共。”他们劝退了原大队长、战场投诚分子程立人，推举他们的“大哥”戴玉书当上大队长。他们崇尚关云长的忠义气节，取消了“俘虏官”吃满碗饭的特权，赢得了难友们的拥护，其他大队也有不少原95军难友来参加“弟兄会”，甚至还有赵明智、时占魁、续公度等中共党员也参加进去当上了“弟兄会”的“军师”。他们成了一支令变节者们侧目的力量，为后来“86”的反变色斗争做出过重大贡献。

通过上面郭乃坚的情况介绍，我们看见直到1951年7月初，在“86”志愿军战俘营内，也尚无明确的“回大陆”跟“去台湾”之争，但“亲共反美”与“反共亲美”的政治对立已相当明显。与“72”不同的是，“86”的志愿军战俘绝大多数是在第五次战役因战事失利陷于敌后丧失抵抗力集体被俘的，主动投敌者为数不多，从而在“86”战俘营里，一开始“亲共反美”的势力要比“反共亲美”势力强得多。

第三章

内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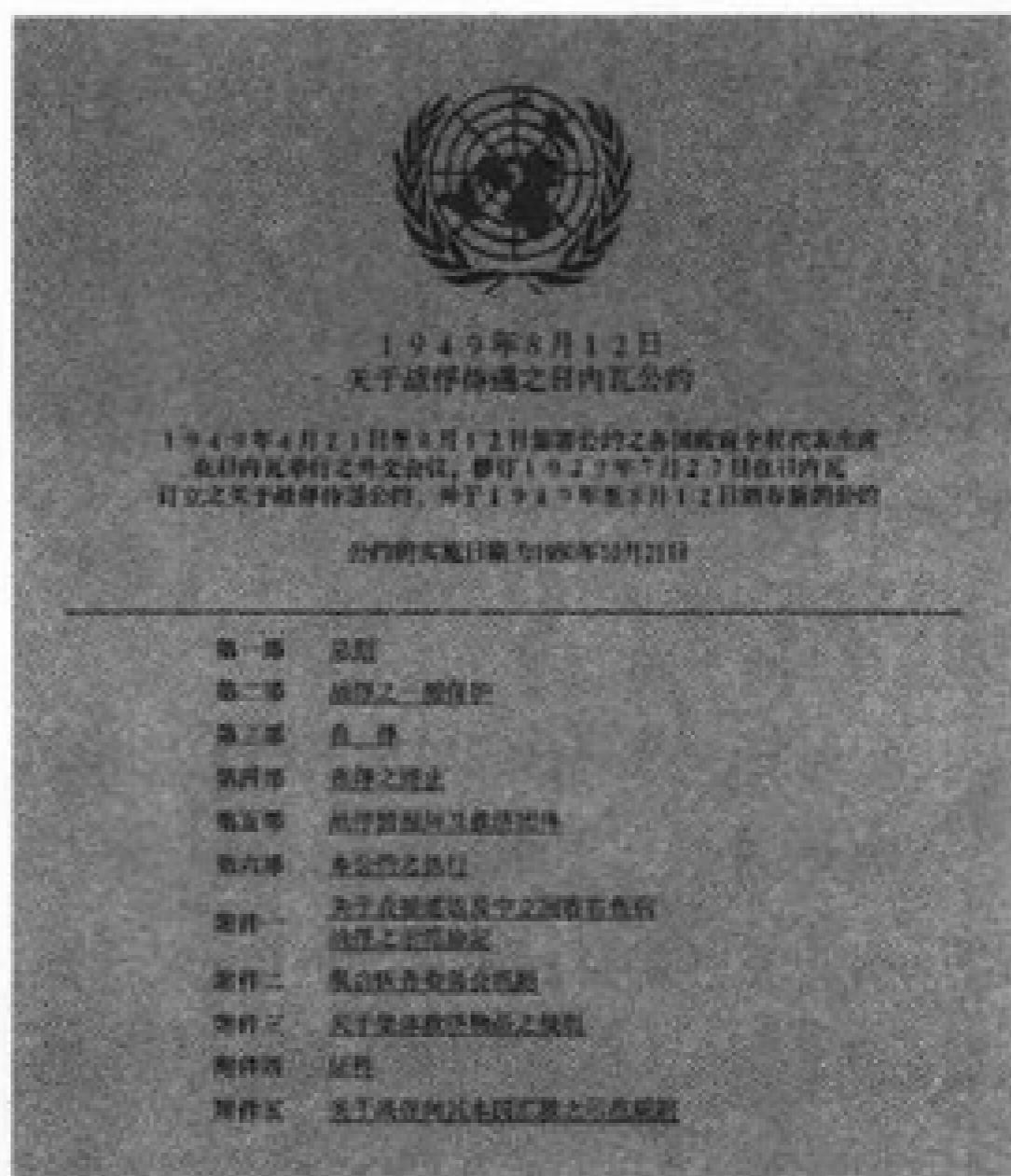
(1951年7月—1952年4月)



韩国巨济岛战争博物馆战俘营三维电子演示图像之一。

一、巨济孤岛上的内斗起因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最主要的议题一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定，二是交换战俘。而对交换战俘双方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日内瓦战俘公约第118条明文规定：“交战停止后，战俘当毫无拖延地遣返。”而且朝鲜战争开始不久，交战双方都宣布将恪守日内瓦公约。朝中方面自然提出了停战后双方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却遭到美方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网络中文版

因是当时双方所提交的本方拘留战俘数字相差太悬殊：联合国军提交的数字是人民军战俘95531人、志愿军战俘20700人、韩国义勇军战俘16243人，总共132474名；而朝中方面提交的数字是：联合国军战俘为4417名（其中美军3198人）、韩国军战俘7142名，总共才11559人。美国根本不相信这个数字，更不同意用手中的13万共军战俘交换不到1万2千联合国军人。

后来，美方提出了他们的提案：“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



被刺字的志愿军战俘

从美国、台湾已经解密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些与之有关的重要史料：

1951年7月5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研讨过一份建议：“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建议认为：“把那些原是国民党和那些害怕因投降而受共产党惩罚的中国战俘送到台湾去。因为台湾在法律上还是中国的一部份，这一计策可以保证美国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

同年7月7日，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在内部表示：“可以考虑战俘来台。”

同年7月25日，台湾“驻韩国大使馆”报告：釜山战俘营有中国战俘集体跪求译员向蒋总统转达他们要去台湾的请愿。

同年8月9日，蒋经国召集各厅局会议讨论，得到共识：“从政治着眼及兵源补充均有接收战俘来台之必要。”同年9月下旬，台湾“驻韩国大使”王东原向“外交部长”叶公超报告：“巨济岛72、86联队张思波等96人自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并请求于臂上刺‘反共抗俄’四字。美方对此

事未加阻止亦未予接受。据美方非正式表示，此事格于国际法惯例实无法将其送回台湾加入国军。”

9月29日，又报称：“72联队四大队大队长魏世喜、大队副王有敏等前本党团员多人呈请转请政府设法遣回台湾杀敌报国，如长此绝望，唯有集体自杀。”

同年10月28日，台湾再收到由印亮文、李大安带头共千余名战俘陈词“效忠党国”的血书。

1952年1月15日，王东原上书表示：“忠实问题可令自行清查联保连坐自可无虞、鉴于和谈破裂乃时间问题，似不必徒劳输送，适时就地编成一独立师代表国军作战，对于瓦解匪军收效必大。”

1952年3月19日，台“空军司令”周至柔向蒋经国上书：“我似可以提出要求，即我政府有意秘密接受全部刺臂匪俘（约8000至10000人）。”

1952年4月17日，台湾“驻韩使馆”报称：日前换俘谈判席上，共匪代表曾暗下称倘能保证遣回俘虏80%以上则可以接受志愿遣送。于是美方遂寄与幻想，竟异想天开复在巨济岛俘虏营中重行调查俘虏是否愿意遣回，逐一询问极尽劝诱之能事。其意盖欲达成80%之数又无强迫之名。……同时极力避免与台湾发生任何关系，凡有关调查俘虏事件均不派用我方译员，而改用美籍华侨担任。原任俘虏营内之我方译员闻已转往营外，在避免匪方指责台湾派人策动俘虏之借口。

另据时任国民政府“驻韩大使”王东原回忆：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共干在营内发动庆祝中共“国庆”，未获多数战俘之支持。十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反共战俘发动庆祝，共干从中阻挠，双方冲突，互有死伤。乃策动美军当局将重要共干数十人移置他处，营内空气大为澄清，反共势力日益抬头，与我译员接触更加密切。且由其媒介与我大使馆取得经常之连[联]系。

自是以后，大使馆透过译员关系，经常供给战俘营以我方报章杂志，俾能了解时事现况，又供给反共歌曲、剧本、唱片、乐器等，以



被去台战俘主导的战
俘营竖起了青天白日
满地红旗帜

供其演唱。我私人所藏音乐唱片数百张及唱机亦全部捐出，盖寓宣传教育于娱乐之中，亦示鼓动慰问之意。又供给笔墨染料，裂帛加工，制成国旗数百面，遍插各营屋顶。战俘之对外呼吁，随时代为刊登于中央日报或新闻天地，发表后，又送入战俘营，各营战俘得知自由世界之同情与关怀，益加兴奋。各营单位及营内军校学生纷纷上书蒋总统致敬，并呈上血书血旗以表忠诚，均先后获得回示。对杜鲁门总统与联合国之呼吁，亦引起自由世界之注意。于是反共怒潮风起云涌，已非潜伏共干所能控制。

各营为加强反共斗争，均着手组织爱国青年会，歃血盟誓，加强领导，全部名册均加盖血印，于一九五二年冬送达大使馆。一面发动刺臂运动，于臂上勒书“反共抗俄”、“誓灭共匪”字样，以示不返铁幕之决心，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刺臂者达数千人，而“返回台湾”遂成为反共战俘之共同目标。

（见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一期）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以下三点：

其一，自从停战谈判开始，战俘有可能在停战后无条件全部遣返，中国战俘营内那些“战场投诚”者和被俘后已明确改变其政治立场者产生了极大恐慌。他们只得把自己的前途和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台湾国民党身上，因而他们必须借助甚至骗取美军的支持，采取各种手段胁迫尽可能多的战俘跟他们捆绑在一起，以争取实现他们去台湾的生之希望。

其二，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战俘营里有反共战俘要求来台甚为欣喜、关切，且做了积极回应。蒋介石在他 1952 年 4 月 9 日的日记中甚至写到：“更可知韩战将有停战之可能，匪俘如被强制遣归，匪部所前余之忠贞志士将被共匪屠杀，应急发动舆论责美不仁，以图挽救也！”

其三，美方急于从那场付出太大又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脱身，希望停战谈判尽早签字，因而在战俘问题上，尽管它坚持“志愿遣返”，但也并不希望要求去台湾的中国战俘过多以致造成停战谈判中断。为此它甚至制止台湾国民党政府公开参与进来添乱。然而它却又支持“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分子对战俘营进行强力控制，并默许乃至纵容他们进行各种可能迫使志愿军战俘不敢回大陆的活动，终于酿成了它本不希望的恶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从 1951 年 7 月停战谈判开始到 1952 年 4 月，经过“志愿遣返甄别”造成中国战俘大分裂为止的这九个月时间里，为何巨济岛上中国战俘营内竟然会发生那样一场惨烈的“国共内战”了。

二、“72”战俘营的“战俘内斗”怎样演变成了“国共内战”

1951 年 7 月中，美军把送到东京培训后的王顺清（原国军中尉副连长，会英语，1951 年 1 月战场投敌）、李大安、魏四喜、王有敏等人带回“72”，委任王顺清、李大安二人为正副联队长，魏四喜、王有敏为军官大队的正副大队长（美军以搞



警备队控制的训诫本部



C.I.E 学校门前的战俘学员



小战俘背后的房子即 C.I.E 学校

暴乱为名将原来军官大队正副大队长孙振冠、张福庆抓进战俘监狱)。美军还授权他们成立一支协助管理当局“维持战俘营秩序与安全”的治安队伍：“战俘警备队”(Prisoner of War Guard, 简称“P.G.”), 责成他们严密监视战俘中“死硬共党分子”(Diehard Communist)的“非法暴乱活动”, 要求他们协助联合国军组建一个“安定和谐的模范战俘营”。

王顺清首先清理、整顿了全联队各级行政组织, 尽量安排“投诚人员”及原国民党军官担任各级主管; 李大安负责建立“战俘警备队”。美军用铁丝网为“P.G.”隔离出供他们专用的小营场; 魏世喜、王有敏则在军官大队暗中发展“国民党六三支部”(取“国民党流散支部”的谐音)与“反共抗俄同盟”小组, 以加强对军官大队的监控。

不久, 李大安的“P.G.”队员们戴着美军发给他们的“P.G.”袖标, 提着美军交给他们的“P.G.”警棍, 开始在营内巡逻, 监管战俘们的日常生活秩序。眼见开饭时排队整齐了, 营场里的卫生面貌改观了, 甚至外出去码头搞装卸的劳工队伍在“P.G.”队员们的监督下也步伐齐整些了。

随着用大铁棚子做房顶的“C.I.E. 学校”(C.I.E. 即 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的缩写。联合国为教化落后国家平民、难民, 包括战俘, 因

此成立此一机构，目的为提高民主认识、扫除文盲、授予职业技能的训练，灌输农场生产的知识及各种有利身心的活动。)在“72”建成，美军“上校随军牧师”伍培礼带来一座耶稣受难十字架和一台管风琴安放在讲台上，开始了他的“基督福音传布”活动。王顺清为伍牧师成立了一个“唱诗班”，又推荐原180师538团宣传队的导演骆星一担任他的琴师，推荐原黄埔军校士官张济良担任唱诗班的领唱。不久，“C.I.E.学校”里就传出了伍牧师的布道声和管风琴、唱诗班的音乐声。那在巨济岛真是一绝！



CIE 学校的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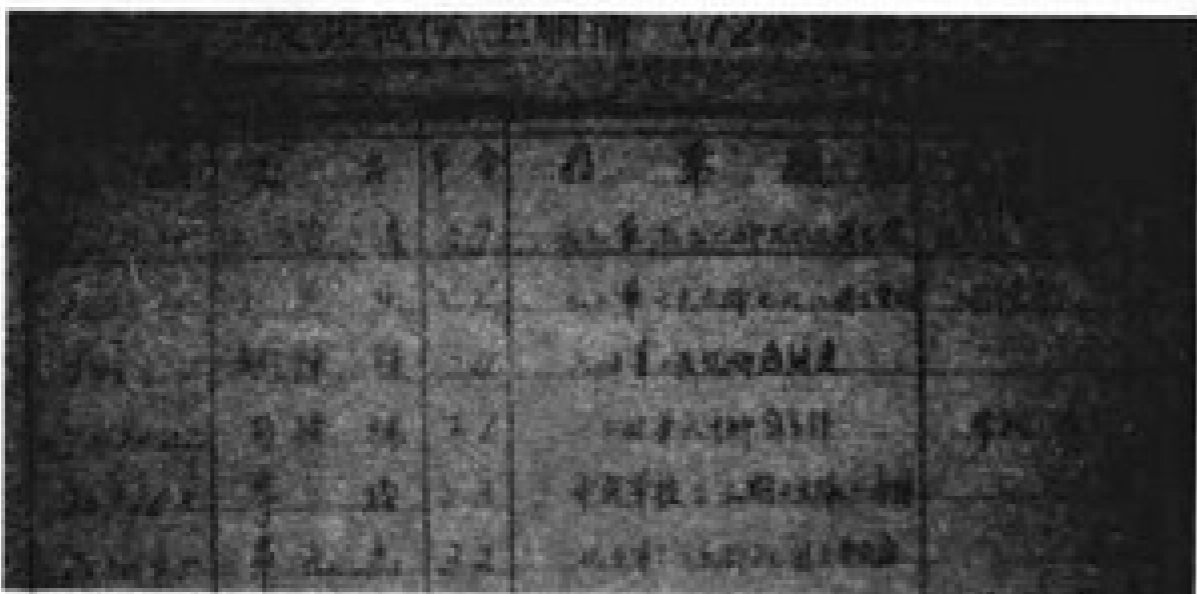
巨济岛美军司令部与“72”总管克斯上尉对王顺清、李大安他们的管理给予了赞许。王、李等人成功地获取了美军的充分信任。

到了8月中，伍培礼告诉王顺清：美国已经在停战谈判中坚持“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被遣返的地方”，而台湾当局也已经愿意接受他们去台湾的请求。王顺清和同党便在伍培礼指导下，采取多种措施对亲共战俘进行思想上、精神上、乃至人身的严密控制和促变。他们决心在战俘营内掀起一场新的“国共内战”，要借助美军力量打它一场大胜仗，“为党国在大陆的失败报仇雪耻”，更为他们到台湾后能够谋求较好的前途而奋斗。

首先是“C.I.E.”学校的宗教课换成了政治课。各大队开始轮流被“P.G.”队员们带领去听外边请来的“教员”宣讲台湾的光明和大陆的黑暗，教唱反共歌曲，到后来有人带头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再后来有军官大队的中共营级干部谭兴东上台去现身说法：讲中共对待自己军队的被俘人员



巨济岛上第72战俘营为迎接李奇微视察进行训练



台湾“国防部”战俘档案里的王顺清资料：王顺清，27岁，（原国民党）63军331师963团3营，原名王清

是何等残酷无情，等等。

同时又在营场内积极发展反共核心组织：“国民党六三支部”和其外围组织：“反共抗俄同盟”，同时搜寻破坏那些亲共的地下组织：“中共地下党团支部”、“回国同志战斗总部”、“青年团敌后斗争小组”等等。

当他们完成了对全战俘营的严密控制后，便在全营开展了三大政治运动：

(1) 检举中共党员、团员和“动员”中共党团员们自己宣布退党、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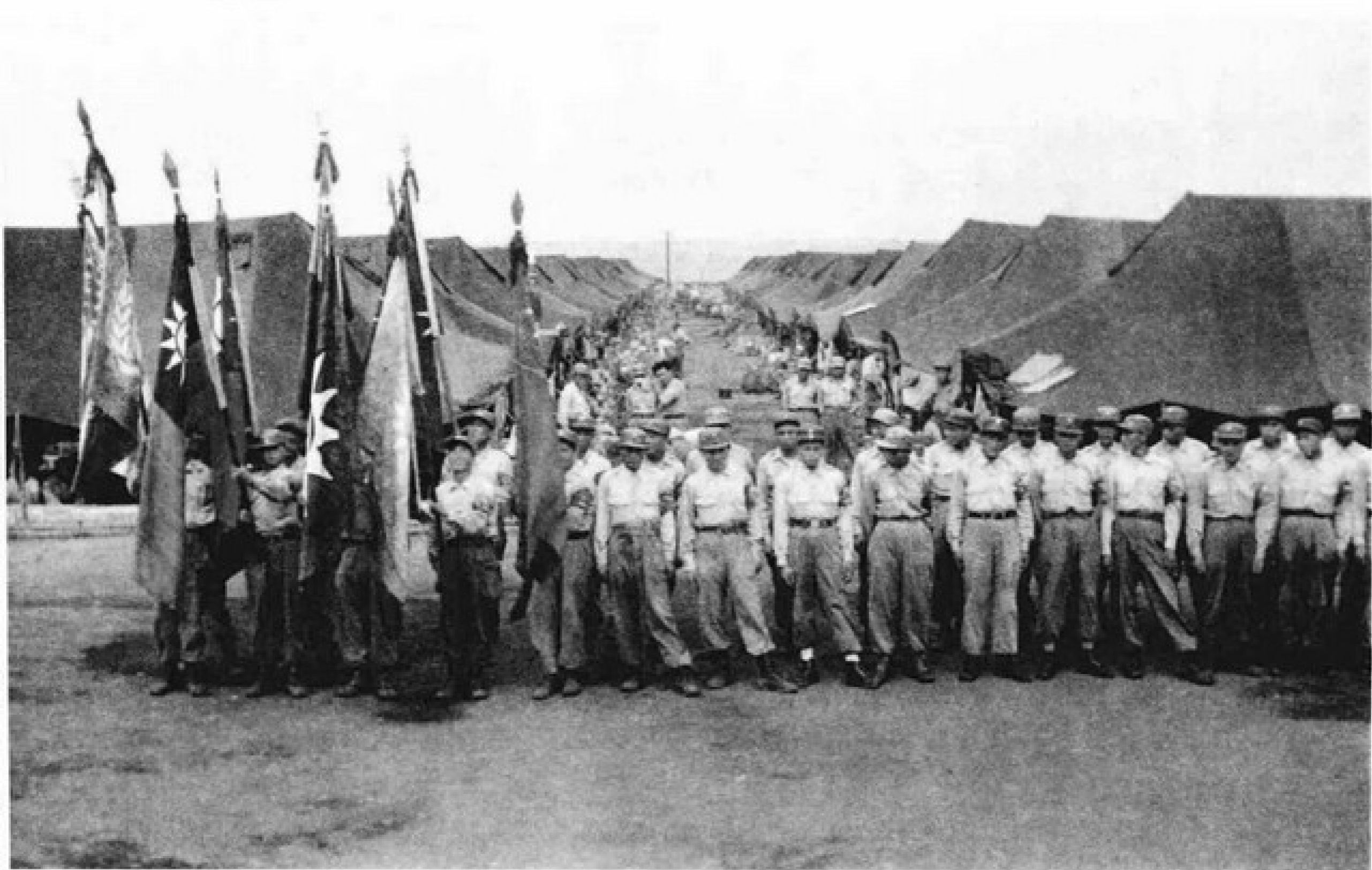
(2) 签名写血书誓死要求去台湾。

(3) 在手臂上、身上刺字：从“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到国民党党徽、中华民国国旗，以证明自己绝对不回大陆的决心。

这样大规模断绝大伙归国返家之路的阴险的政治陷害活动，必然会受到“死硬共党分子”、亲共战俘和无数仅只是渴望能回



第 72 战俘营为迎接李奇微参观的志愿军战俘乐队。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



志愿军战俘为迎接李奇微视察进行队列训练。队列旗有联合国、美国、青天白日旗三种旗帜



巨济岛上第72战俘营里的自由女神像

家跟父母妻儿团聚的战俘们的顽强抵制与坚决反抗。

于是，李大安在“P.G.”的小铁丝网里私设了刑讯室，对“死硬共党分子”及其追随者采用了当年国民党特刑庭对付共产党人那套刑罚：罚跪、罚趴、鞭打、吊打、敲脚髁、压杠子、火烙、往肛门灌辣椒水，甚至把“犯人”衣服扒光塞进装有玻璃茬子的空汽油桶里翻滚等等酷刑，直到暗中残忍杀害。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克斯上尉和伍培礼“牧师”等美军管理人员、特工人员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并由于他们的装聋作哑不予阻止，使得“72”顿时笼罩在严重的血腥恐怖之中，使得许多胆怯者、彷徨者动摇、退却。

美军在战俘营内以维持和平秩序为名设置的“战俘警备队”，实际成了残酷镇压战俘的暴力专政工具，这可能是加深那场“国共内战”的惨烈程度、决定那场“国共内战”最终以“国民党”取得大胜的最关键原因。然而，对于那些信仰十分坚定、具有很强应变能力的共产党人和崇尚气节的知识分子而言，暴力并非万能。

1951年11月8日，“72”军官大队有141人迫使美军将他们调离“72”到达“71”战俘营，成立了一个坚持返回大陆的“中国军官独立大队”。他们是在孙振冠、马兴旺、顾则圣等中共营级军官领导与一些爱国知识青年的坚决参与下，通过极其严密、机智的地下串联，开展大规模的“反迫害、反背叛”签名活动，集聚起上百名的志愿者。他们在“P.G.”队员分别抓捕他们之前，同时冲出帐篷，集中到广场上高呼口号，高唱“解放军军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强烈表达反迫害、反背叛的坚强决心，顿时轰动了全战俘营场，引起了王顺清、李大安等人的极大恐慌。美军总管克斯上尉听取了军官队代表们提出的要求，经请示司令部，克斯最后同意将签名者调离“72”。于是，孙振冠回到军官大队门口高呼：“不愿做奴隶的跟



头上别着国民党党徽军帽的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里制作装饰花坛

我走！”刹时间，该141名军官冲出军官队小营门，齐集到“72”大门口，被美军带进了对面的第71号战俘营。这141名共军军官终于摆脱了“72”反共势力的严酷控制。但他们的出走也使得“72”营内的反控制斗争被削弱。王顺清对“P.G.”队员们说：“这些死硬共党分子滚蛋了，咱们更省心些！”

1951年11月下旬，美军军车运来了一堆建材。“72”美军总管克斯(Case)上尉叫王顺清派战俘在“72”大门口修了一座影壁。影壁上面绘了一个国民党徽，影壁前面塑了一个白色的“自由女神”像，塑像前面立起三根旗杆，旗杆顶上分别挂起联合国旗、美国国旗、中国国民党党旗。克斯上尉告诉王顺清，他们的远东军司令李奇微上将要来巨济岛视察，要王顺清抓紧进行欢迎司令官的队列演练，克斯说他还将拿来一些军号、军鼓，要王顺清尽快成立起军乐队，到时候让司令官高兴高兴！王顺清惊喜不已，忙下令用美军军服赶制出大批国军军帽，还配上国民党党徽，让所有俘虏官员、警备队员、军乐队员们都戴上军帽“以振军容”。

1951年11月底，李奇微上将果然到了巨济岛，由美第八集团军军长



吴均度

范弗雷特陪同在一大群美军高级军官及记者簇拥下进入“72”，接受了战俘们队列严整、鼓乐齐鸣的“热烈欢迎”。李奇微在安静整洁的营场内转了一圈，高兴地夸奖“72”不愧是一座“模范战俘营”。李奇微最后在联队部门口接受了由副联队长孙亚辉双手捧呈的《联合国军巨济岛第七十二战俘营千名反共志士誓死不回赤色中国坚决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在该请愿书的后面有密密麻麻的签名和血手印。

那时李奇微将军大概真的相信：在他手下的这座秩序井然的“模范中国战俘营”里绝大多数战俘是真心向往“自由世界”的。他或许真的不知道以王顺清、李大安为首的“死硬反共分子”们为了停战后能去台湾，正在替代美军以各种反人权、非人性的残忍手段剥夺战俘们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而由于他这位远东军总司令的亲临助威，极大地鼓舞了“72”战俘营内的反共势力，也让亲共的和“中立的”战俘们感受到巨大压力，促使该战俘营的“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

下面我们谨介绍一位亲历者生前的回忆，供读者进行了解和判断。

【回忆者：志愿军 12 军文化教员吴均度，四川崇州市人，1950 年参军，1951 年 5 月底受伤被俘后，先在釜山治病，后被押进“72”，经历了那段难忘岁月。】

在关押中朝战俘的巨济岛上，“72”这座被美远东军司令李奇微将军称誉的“模范战俘营”，却是迫害战俘的魔窟。几十年过去了，岁月积尘淹没不了我对 72 战俘营那段苦难生活的记忆。

我是 1951 年 9 月从釜山伤病收容所押送到巨济岛 72 战俘营的。我们一行 20 多人，可我一个也不熟悉。一进营内就像落入国民党的壮丁营，四处可见国民党的党徽，眼前那些俘虏官俨然一副国民党军官的神态，处处设有岗哨，有的还手握棍子。这一切出乎我在釜山的想



巨济岛第“72”志愿军战俘营

象，顿时心里一阵悲凉。

进入营内碰上的第一课，就是逼迫签名去台湾。到达的当晚，我们被带到第一大队，编入一个中队。我们饥肠辘辘，吞下半碗饭刚回到睡铺上，就被叫起来集合到大队部签名去台湾。我趁列队时，假装解手离开。第二天，天刚亮，我便被叫起带着军毯和饭碗转移到后面的一个帐篷小队里。这真是一个大队两个天地，前面一排是铁篷屋顶的房子，住的是已签名去台湾的，后面一排是帆布帐篷，住的是不愿签名去台湾的。睡在铁篷屋子里可宽松多了，睡在帐篷里却挤死人。十几平方的帐篷睡七八十人，像干柴棍铺在地下，要一头一人互相把双腿交叉在对方肚胸上，才能睡下。吃饭也不同，他们吃满碗，我们吃半碗。

最初，行动的限制还不算严，除不许靠近铁篷屋子外，准许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动，允许在靠厕所附近空地晒太阳聊天。不久即加强了对我们的控制，不准串帐篷，甚至不准走出帐篷，解手也要请假，这种生活上的虐待，确实叫人难以忍受。时间一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

为求得一时苟安便违心地签了名。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压得消沉迷惘，浑浑噩噩用每周发的一两包烟卷进行赌博混日子。我这个解放后参军的大学生看到这一切，不能不感到惶惑。更何况我是独自在部队转移时负伤被俘的，在这里连一个能依靠的熟悉同志也没有，在釜山虽然结识了几个能心心相通，心向祖国的难友，可后来又分开了。正当我感到孤独苦闷的时候，突然碰上原在二野军政大学同中队的同学晏棟，真是喜出望外。记得当时我们装着不认识，只相互交换一下眼神，避开人后我们都来不及问各自被俘经过，我便急促问他可曾见到黎子颖，我告诉他在釜山碰见了张昌辉（他俩都是军大时同中队的同学）。他告诉我因看到战士队情况糟得很，他和黎子颖两人报成军官，在“72”的军官队。晏说：“四大队是军官队，在我们一大队对面。除星期天全联队集合做‘礼拜祷告’，平时连人影都见不到。”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见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心中唯一可靠的依托。我深信我们这批在重庆解放时参军的学生，尤其是在军大的同学是赤诚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我的到来，晏棟十分高兴，不久在一次调整中我们编在同一小队，编班时我们挤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和他头并头睡在一起。

我从晏棟那里，了解到我们被俘人员的成份复杂，有不少人是投诚起义合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集中营里那些出头露面的大都是战场上叛变投敌的，这些人为虎作伥，动不动就要打人，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心毒手狠。我们互相叮嘱要小心谨慎，那时他化名叫陈黄，我化名叫吴加明，我们都称是刚参军的初中生，连队文化教员。我嘱咐他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我是大学生，怕的是引起人们注意。他比我早来，结识了一些好同志，在别人聚集赌博时，我们便凑在一起聊天。我就讲水泊梁山打富济贫，反贪官造反的故事，有时也聊点逢年过节家乡风土人情，也吸引过一些听众，其用意，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时我只是想争取多一些难友的心与祖国联在一起，好互相关照。

初到时，由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和矜持，一次二次我都拒绝签名，

引起了狗腿子们的注意，我被传讯到战俘警备队进行盘问。我事先准备好回答，碰巧警备队中有一个是我在军大学习时的炊事员，调到连队当兵，他证明我是新参军的学生。因此开始时敌人把我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没有寻衅给我苦头吃，也没把我十分放在眼里。

我当时的处境，开展斗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受党的教育时间短，缺少实际锻炼。正好这时杜岗参谋长暗地组织“回国小组”，联络心向祖国拒绝签名的同志起来反控制和叛徒们展开斗争。记得一天晏棟告诉我：“你看见没有，那个脸上有伤疤的人，是咱们部队的一个团级干部。”我说：“我早就猜到了。”他接着说：“他正在组织拒绝签名的人成立回国小组，有个隔天串到我们小队里来打牌的人，正在暗中联系。”我问他联系上了没有，他说：“联系上了，我并提到了你。”过了两天，他告诉我，那人传话说需我这样能说几句英语的人，叫我暂不要接触，到哪天行动起来时，出面与美国人交涉。可惜后来计划落空了。

由于军官队我们一部分同志反控制斗争取得胜利，在“72”对面建立起回国阵地——“71战俘营独立中国大队”。“72”的叛徒特务提高了警觉，加以“回国小组”组织不严密，在敌人的高压下终于暴露。后来听说好些难友吃尽苦头，杜参谋长遭到毒打，担任联络的小王同志也被迫刺了字（这个同志后来在济州岛“十一升旗斗争”中英勇牺牲）。

这大约是我到“72”不过两个月发生的事情。从此狗腿子们更加强了管制：不许串帐篷，不许与别小队的人接触交谈，即使与本小队的人交谈，也暗中有人监视告密。幸好我们小队的小队长、班长这批狗腿子没有发觉我们跟回国小组有联系，我、晏棟、赵长和、李克、王根生等仍平安地活在那个小队里。

变节者们加强监控的同时，政治上的迫害也加紧了。听反动课时间增多了，听了课要讨论发言，要对签名去台湾表态。每当此时，就有许多双眼睛注视着我，晏棟他们事事都在看我行事，我就绞尽脑汁

想法对付。这种情况下，硬顶不行，只有对叛徒们诉之以理，对众人动之以情。我装着老实可怜样首先表态说：“小队长，我家有老母，有老婆、儿子（其实我连对象都没有），我不能去台湾。”针对他的诱骗：“你签了名就可出铁丝网”、“反攻大陆就可回家”，我说：“反攻大陆要等啥子时候，再上战场打死了回啥家嘛。”叛徒们觉得话不投机，也只得申斥说：“你不签就是了嘛，说那么多干啥！”无形间我成了队里难友们的航标，叛徒们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

当时板门店谈判正在谈判战俘遣返问题，但我们被封锁得一点也不知道，战俘营外面的、里面的情况也封锁得很严。长期精神上生活上的折磨，在悲苦无告的绝望中，不少人随大流签了名。特别是美国将军李奇微视察72战俘营后，狗腿子们又进一步掀起签名刺字活动，并制造谎言说，快出铁丝网了，台湾已派船来接了。签名刺字的人逐渐增多。狗腿子们在发动签名刺字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队是“老大难”，特别是我们这个班，换了几任班长就是攻不下这堡垒。他们试行分化，把我们拆开，采取个别威胁、利诱，果然个别人动摇签了名。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总设法把我调开。一次派我一个人由狗腿子领着去打厕所，在帐篷里又发动一次签名，等我转回时，李克告诉我：“陈黄签了（晏棟的化名）。”我马上责问晏棟，他惊慌地找到小队长说，他刚才听错了，他不到台湾！小队长气急败坏地骂他一顿。这一来，我可脱不了干系，被叫到警备队。这算第一次触到皮肉之苦，挨了一顿。最后被迫写下“以后规规矩矩，遵守规定，如有破坏行为，甘受惩罚”的保证书，并立即把我调到军官小队。军官小队是由隐藏身份被清查出来的各类干部组成的。

在军官小队我只呆了一宿。原因是我与六十军侦察营长张治山借抽烟接火说了话。情况是这样：我到军官队没人理睬我，见众人三三五五聚集玩牌，唯见斜对面一个人低着头，缩卷身子在角落抽闷烟。我估计是个领导干部，便假借接火抽烟，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愿，说了一句：“一个知识分子，当他认识到真理的时候，他会坚持真

理的。”小队长发现我还在搞串连，把我又调到另一小队。这小队队长很坏，我一去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找岔子整我。借我解手回帐篷迟了一步，抽出棍子准备打我，幸有釜山认识的一个人出来讲情，才幸免。没两天仍弄回原小队。我是一付学生面孔，所以别人对我总显出几分同情怜悯。狗腿子为了讨好人心，白天装着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夜里便露原形，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拖我去受刑，罚跪在罐头盒上头，让他们拳打脚踢。记得1952年春，狗腿子夜里把我和李克拉到铁丝网边，剥去我们的衣服让我们趴在地上，正值春寒料峭，寒气中陡然传来一阵歌声：“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从“71”那边飘来，顿时一股暖流温暖了我。这歌声告诉我，我们并不孤立。我相信黎子颖、张长惠定在那里。敌人的毒打越加增强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狗腿子把我们叫起，穿上衣服带回帐篷里。

现在回忆1952年“四八”甄别前的那段日子，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叛徒谭兴东，这个无耻的家伙充当教员，污蔑我们党。狗腿子把我们拖去跪在台下作“靶子”，让人吐口水，一次下来，满头都是痰。叛徒李大安甚至在我们喝的菜汤里撒尿。这种非人的折磨，也让我产生拼了的思想，但我又一想这样等于白死，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叛徒们造谣说台湾要派人派船来，要挟说，万一被扶持上船，我们就趁有人观看的时候，高喊：“我们不到台湾，我们要回大陆！”跳海以示抗议。我发现当豁出去的决心一下，就什么也不觉得可怕了。

（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三、“86”战俘营的“国共内战”是如何开始的

前面我们曾经请原“86”联队书记长郭乃坚较详细介绍了“86”成立后最初一个多月的情况，那段时间营内控制权实际掌握在亲共的知识青年、



吴春生

中共党员、和下层国军“起义”士兵手里。现在让我们接着请原“86”一大队书记长吴春生介绍“86”后来的变化。【吴春生，河南安阳人，原黄埔军校24期“起义”士官，180师539团见习参谋。】

1951年7月中旬，“72”联队全面“白色化”以后，美方将其矛头转向了“86”，于是“86”的形势开始变化。

首先是美军随军“牧师”伍培礼进入“86”来“传教”了。开始他进来出去都是十分警觉。

记得头几次来“传教”，广场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像看猴似的围着他凑热闹，还有人说风凉话。可他既不生气也不泄气，仍是一本正经地在那里表演着他对上帝的“虔诚”。日子一长，居然开始有人“信教”。再往后他就敢钻到帐篷里去秘密活动了。起初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对他多大的注意。直到在他“秘密”活动几天之后，“86”的三位最高“俘虏官”应祥云、阳文华和郭乃坚突然同时被调往釜山“G-2”审查，我们才知道伍培礼绝非简单人物，他已经开始行动：试图“偷梁换柱”用“自己人”来监控“86”。

得知应祥云要被调出审查的消息当晚，高化龙和安保元就抓紧时间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联队长”不能空着，必须马上填补一个“灰色人物”。在人选上，安保元提出了第三大队长张恒，高化龙也认为合适，当即就定下来。第二天一大早，通过应祥云的推荐，美军总管罗根（Logan）上尉说声“OK”，新任联队长便走马上任了。待到王福田听信赶来时，木已成舟，但美国人还是安排他当联队副，挤进了“86”联队部，当上了二把手。为了对付伍培礼的第一次进攻，高化龙、安保元和联队部其他难友采取了“孤立法”，让王福田和谁也说不上话，使王在联队部成为“多余”的人。王曾想把六大队一位大学生拉到联队部当翻译，高化龙听说那人曾给台湾驻韩国大使馆写过反共文章，

便在“试用”之后对罗根上尉说：“他还是以当大队翻译为宜。”就把他给打发回去。王福田在联队部受孤立，到下层更是不受欢迎。他除了和白佩鸣、程立人等人凑在一起，常常龟缩在六大队部里，很少到联队部去“办公”。

8月2日，在“72”被称为“活阎王”的联队副李大安被美军送到“86”当联队长，随他来的还有30来名“保镖”。他们一来就钻进了二大队白佩鸣的帐篷伺机行动。这是一次露骨的夺权行为，不能不引起“86”爱国力量的极大震动。高化龙匆匆赶到四大队，对戴玉书说：“李大安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那些平时看来吊儿郎当的“弟兄会”会员们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戴玉书不愧为“义军”的首领，他深知李大安当上联队长的后果。在共产党员赵明智、时占魁、耿基增的支持下，他于当晚指挥弟兄们包围了二大队部，由曾德全、陈致君等武艺出众的好汉将李大安叫出来痛打，这个“活阎王”被打得连爬带滚跑出“86”，哀求美军将他送回“72”。这次反变色斗争以胜利告终，就连王福田和白佩鸣也吓得求“伍牧师”将他们转移到“72”去避难了。

伍培礼当然不会甘心失败，几天后，就在大家欢庆胜利之际，戴玉书以“肇事犯”罪名被敌人抓走。尽管赵明智这个老侦察员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戴玉书留下的担子，但这已严重地削弱了“弟兄会”的力量。

李大安被打跑了，副联队长王福田、二大队长白佩鸣被吓跑了，这应当是爱国力量在“86”夺取全联队内部控制权的最好时机。如果这时候在“86”有一个核心领导和全联队统一的地下组织，当机立断将各大队各级俘虏官、联队警备队队长，特别是将“伍牧师”辛苦经营的特务据点“C.I.E.学校”的大权拿过来，“86”必将是另一个局面。怪只怪我们那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

亲共势力没有人出来建立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而反共势力却开始加紧发展统一的“反共抗俄同盟会”了。李大安被打跑后，伍培礼

“牧师”来传教的次数明显增加，“听传教”的人也越来越多，“校长”程立人也不务正业，忙于在“教友”中发展“反共抗俄同盟会”。与此同时，一个神秘人物周演达也来“86”担任了联队警备队长，原来那些应祥云的袍哥弟兄失去了头头，多数都跟着周演达干了。不久，“反共抗俄同盟会”完全控制了联队警备队。于是“C.I.E. 学校”增设了“政治课”，公然由联队警备队派人命令各大队轮流去“上课”。从8月初到9月中，仅仅一个多月，“86”的大好天下就乌云翻滚，迅速向着“72”演变。亲共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虽有爱国热情却缺少斗争经验。郭乃坚于9月中从釜山回到“86”，虽然官复原职，但这时他和联队部的老高、老安也只得眼看狗腿子们活动日益猖狂而没有更多办法。“弟兄会”自戴玉书被抓走后，也在日益分化，赵明智他们在忙于加强内部团结而无暇多顾。

1951年9月中旬，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张泽石按照赵佐端政委的指示从釜山来“86”协助张城垣开展斗争，张泽石来后即担任联队部翻译。他利用这个身份一方面在联队部跟老郭、老高、老安三位“同事”建立信任，一方面和张城垣一起“走访”一大队、四大队、五大队、六大队结识了那里的地下党团支部的时占魁、赵明智和“弟兄会”的王刚、岳大宏等领导人。张城垣和他打算尽快把“86”的三股爱国力量联合起来，阻止“86”形势进一步恶化。但看来为时已晚，到了10月初，我们尚未联合好，反共势力已经准备公开亮相。

1951年10月上旬，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板门店美方停战谈判代表急需“中国战俘大都不愿回国”的证据，伍培礼也就送来国民党旗叫周演达他们在“中华民国国庆”日“双十节”升旗，以便拍下照片送到谈判桌上证明“86”的中国战俘也“心向台湾”。消息传来，“86”的爱国力量忍无可忍了。张城垣、张泽石、时占魁、赵明智他们研究，决定以四大队“弟兄会”的力量为主，10月9日晚突袭联队警备队夺走国民党旗，并争取一举将狗腿子们抓起来赶出“86”。但美军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10月9日晚，在我们正与联队警备队搏斗，并已夺走国民党旗的关键时刻，美军宪兵司令部的武装部队亲自上阵了，开来了坦克和一个连的持枪士兵进入“86”，制止了这场“国共内战”。美军带队军官随即命令参与武斗的战俘全部回到各自帐篷，然后让“P.G.”队员们，按照他们事先已摸清楚的名单，将“86”的主要斗争骨干100余人逐个抓进“P.G.”的小监牢毒打，夺旗勇士王绍其被打死！美军以“暴动份子”罪名将其中81人关入宪兵司令部监狱，张泽石、时占魁、赵明智和“弟兄会”的中坚分子皆被抓进牢狱。一个月后，美军决定把他们送进“72”。当他们到达“72”大门口时，张泽石看看已经洞开的“72”大门和布置在门口的众多“P.G.”队员，回头告诉负责押送的美军少尉：“我们绝对不会进‘72’，除非你把我们的尸体拖进去！”当美军少尉示意他的一排士兵用刺刀逼向紧紧围抱在一起的81个中国战俘时，张泽石平静地说：“少尉先生，你若下令动手，我会让我的同伴跟你拼命，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把你咬死！”那个年轻少尉惊恐地后退了，跑进“72”去打电话请示司令官，出来对张泽石说：“我算见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进‘71’去吧，司令官同意让你们成立一个独立中国战俘大队。”

“夺旗之战”失败后，“86”元气大伤：高化龙于打架当天走了，安保元后来呆不下去，也设法离开了“86”。“军大校友”吴春生、王铁龙、李炽他们也经郭乃坚帮忙，趁釜山要“中国劳工”之机去了釜山第五收容所。仅郭乃坚仍坚持在“86”当他的联队书记长，尽自己力量去暗中保护一些斗争骨干。“86”终于变了颜色！

那以后，留在“86”的难友们也并未停止自己要回归故国的斗争，广大党团员、爱国知识分子及“弟兄会”成员都在继续以各种方式跟敌人“对着干”。不少人在敌人残



“弟兄会”头领：戴玉书



2011年8月本书作者张泽石（右）与吴春生（左）重逢于河南省安阳市

酷折磨下，仍然拒绝刺字、写血书，因而才会在“四八甄别”时，仍有1000多人挣脱敌人控制，来到“回国支队”。

40年后，有几十位当年“86”的老战友在成都相聚。我们流着泪深情地追忆往事，有人遗憾地说：“要是那次把李大安打跑后，咱们能够一鼓作气把所有的反动俘虏官都赶走，‘86’就是咱们的天下了！”马上有人反驳说：“你这种想法太天真，‘86’内只要有反共分子存在，他们随时都可以将情报告诉伍培礼，而美军可以随时抓走他们想要逮捕的任何‘暴乱分子’。”于是，大家认识到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在战俘营里敌人的力量远比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大得多，我们已经尽力参加那场维护自己人格尊严和捍卫国家荣誉的斗争，我们于心无愧了。

（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第四章

甄 別

(1952年4月—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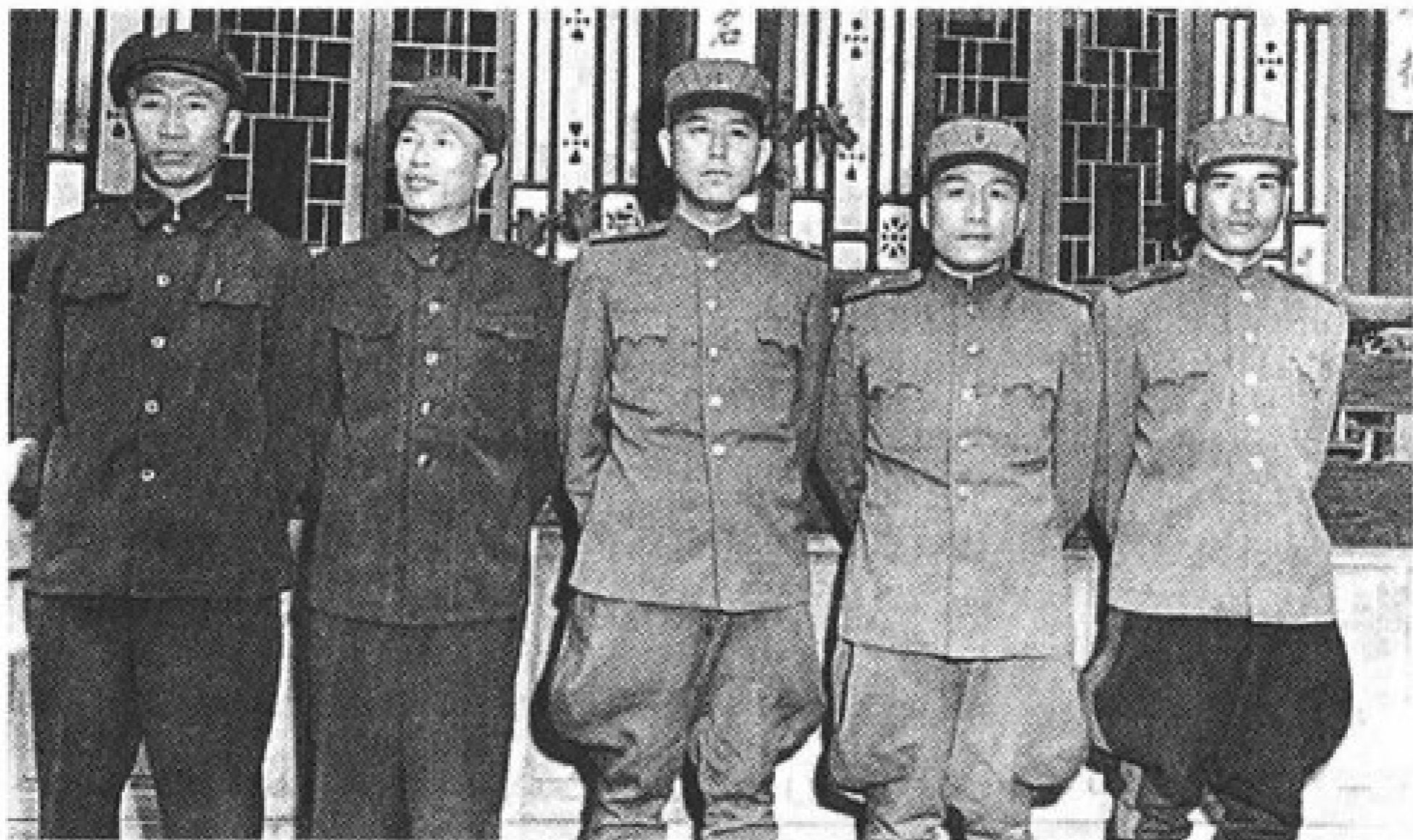


1952年6月美军在巨济岛对战俘进行甄别

一、中朝方面同意进行“志愿遣返甄别”

我们根据有关档案史料了解到的情况如下：

到了1952年3月，朝鲜战争交战双方都急于实现停战，都希望打破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僵局。朝中方面原来的“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立场已有所松动，但担心会有较多战俘拒绝遣返。板门店美方谈判代表则向中朝暗示：他们估计朝中战俘中会有80%愿意遣返回国。亦即在13.2万名朝中战俘中希望回国的战俘概算起来可能會有11.6万人左右，朝中方面认为那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他们遂于4月2日提议：“双方立即将战俘名册进行分类，在其结束之前暂时中止原则性讨论”，以此默认了志愿遣返甄别和重新登记战俘名册。



板门店谈判中朝代表，左起：解方、邓华

4月4日，美军方面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因中朝方面提案中没有“进行甄别”这样明确的文字，为了弄清这一点，美方代表建议说：“贵方在甄别之前发表一个‘战俘回国后不会因投降罪而受处罚’这样的赦免声明怎么样？联合国军方面将设法让全体战俘听取你们的声明。这样一来就可能增加愿意回国的人数……”当时中方代表虽说：“没有那个必要。为了恢复和平生活，我方全体被俘人员都会高兴地回来的！”但在4月6日那天还是亲手交给美方代表一份由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共同签署的、对战俘们实行赦免的“联合声明”。这应当是中朝方面正式同意进行“志愿遣返甄别”的有力证明了。由此，战争双方遂达成协议：双方尽快对各自拘留的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并议定了为保证朝中战俘“自由表达个人遣返意愿”美方应采取的措施。

上述史实说明朝中方面是为了争取早日实现停战、又对愿意回国战俘的人数比例有相当乐观的估计才同意美军进行“志愿遣返甄别”的。

二、“志愿遣返甄别”的准备工作

我们根据对有关史料的考证，确认美方此时也是真的希望对朝中战俘“志愿遣返甄别”的结果能尽量接近他们事先的估计，以便争取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为此，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按照美军远东司令李奇微的命令制定了具体计划。此计划旨在使表达回国志愿的战俘数量达到最大限度。

1. 美军将事先向全体战俘发布一个通告，警告所有战俘在接受口头询问之前，不得和其他战俘议论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以免他们受到暴力威胁和损害而被迫改变主意。

2. 甄别之前，要反复向全体朝中战俘广播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联合声明”以便打消某些战俘的遣返顾虑。

3. 每个战俘进入口头询问区时可携带其衣物碗筷等个人用品，所以如

果他表示愿意回国，就不需要再回到其原先的俘虏营。

4. 在进行口头询问时，不带任何武器的审问官或管理人员将向他们指出拒绝遣返的害处和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提醒他们，拒绝遣返可能给其家庭带来的后果，并提出以下七个问题：

- ①你愿意被遣返回北朝鲜或中国吗？
- ②你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
- ③你仔细想过这种行动给你家庭造成的影响吗？
- ④你意识到那些选择遣返回国的俘虏回到家园后你仍将留在巨济岛吗？
- ⑤你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保证将你送往某个地方吗？
- ⑥你仍然决心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
- ⑦如果决定将你遣返回国，你准备如何办呢？

在提问过程中，一旦战俘表示他愿被遣返回国，则不再继续往下问。另一方面，如果俘虏提出自杀、斗争到底、逃跑来抵制遣返等，则将其隔离和送入新的临时战俘营。

1952年4月6日，美军在巨济岛上开始实施对全体朝中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的准备。

当天下午，美军司令部的贝尔上校带领一排卫兵和一辆顶上装有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到达“72”营场。事先“72”、“86”、“71”、“70”等中国战俘营的“战俘代表”都被送来了。贝尔在“72”联队部跟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首先说：“板门店的共方谈判代表态度非常强硬，坚持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曾经考虑过是否答应共方要求！”“72”、“86”的代表当即高喊：“我们誓死不回大陆！”贝尔摆了摆手道：“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们有不同遣返要求，决定在两三天内对每个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调查，以获得具有不同遣返志愿战俘的确切数字。”“71”的代表孙振冠立即站起来严正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志愿遣返甄别调查！”贝尔没等翻译完孙振冠的发言，就站起来宣布：“我们将分别

到各营场广播有关公告，你们回去要组织大家认真收听，散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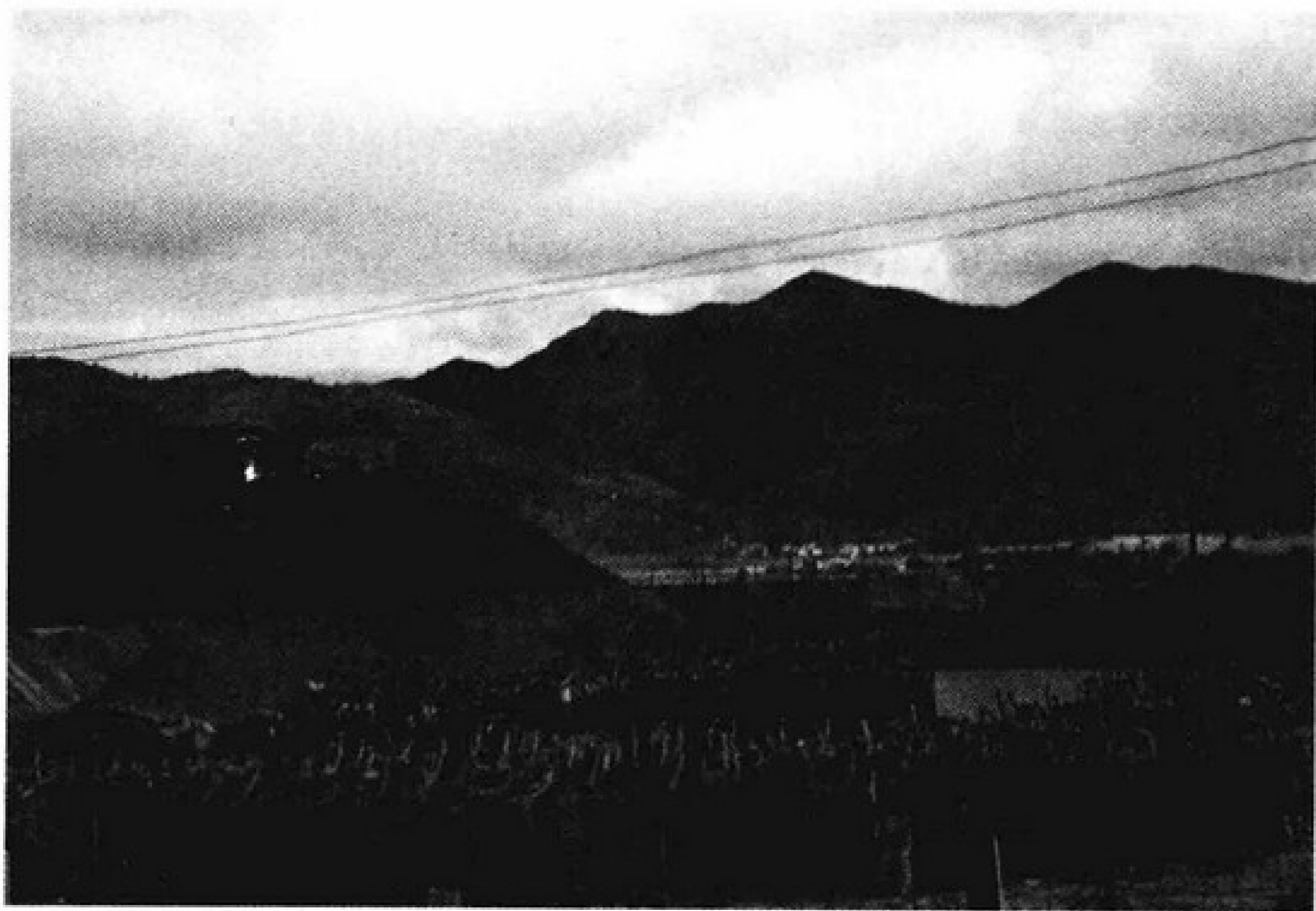
美军由此拉开了巨济岛上那场“志愿遣返甄别”的序幕。而落幕时出现的竟然是朝中方面、联合国军方面，乃至台湾方面都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下面我们扼要介绍各中国战俘营场的“甄别”结果与过程。

三、“71”战俘营的“甄别”

“71”战俘营里的 238 名中国战俘在“志愿遣返甄别”中，百分之百地要求回大陆。

在贝尔开过会约半小时之后，停在“71”、“72”两个营场大门口那辆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开始用汉语呼唤起来：“喂，喂，喂！战俘们，中国战俘们！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



战俘集合高呼口号的场面

联合国军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遣返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你们的真实意愿。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喇叭里响起一阵喘息声之后接着宣布说：“下面请注意收听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联合声明，声明全文如下：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1952年4月6日。”

“71”的中国战俘们全都拥挤在面向广播车的铁丝网前，他们屏气凝神聆听完这篇声明，猛然鼓掌欢呼、相互拥抱、热泪纵流！

高音喇叭再次响起来：“请注意，请注意！下面我们再广播一遍……”大家正准备再好好听一遍，突然对面“72”营场里喊声大作，只见许多提着棒子的“P.G.”队员，一面疯狂地吆喝：“回去！都跟我滚回去！”一面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收听广播的无数战俘。紧接着在“72”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音，广播声完全被淹没了。

“71”的中共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做出三项决定：

(1) 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2) 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对“甄别”的具体要求。

(3) 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4月7日，“71”向美军司令官杜德将军递交了《有关“志愿遣返甄别”的紧急要求》，提出了如下四项要求：

(1) 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中国战俘宣读两个公告内容。

(2) 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看管；由我方最高级别军官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 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 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488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美军司令部对他们的《紧急声明》根本不予理睬。

4月8日清晨，“71”升起了巨济岛第一面五星红旗。那面国旗是他们把军用防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用铁丝一点点擦去橡胶成为白色的尼龙绸，再用军毯向站岗的韩国士兵换来几大瓶红药水和黄色奎宁丸染出红旗与黄色五角星。旗杆是用帐篷杆捆绑起来的。就在他们一面唱国歌一面升国旗时，岗楼上的美军开枪了，吴孝宗、任全贵、孙长青身受重伤。但歌声枪声惊动了“72”的战俘，许多人跑出帐篷来看着国旗偷偷抹泪。

当天上午10点，几辆大卡车和一队美军开进“71”营，带兵的上尉对张泽石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又指着几个穿便服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成单行，带到联队部帐篷来。你们将一个一个单独地、自由地表明自己的去向，愿意回大陆的立即上车送走。”

张泽石翻译给孙振冠，孙严肃地对上尉说：“我们已经明确地向你们的杜德将军表明了我们对甄别的态度，我们全体238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那个上尉听了张泽石翻译的话，看了看“71”总管格林中尉，问：“你知道这是真的吗？”格林肯定地点了点头。上尉回过头看看正秩序井然地静坐着的战俘们的神色，挥手说道：“那就全部上车走吧！”

对“71”的“志愿遣返甄别”就这样结束了。他们作为第一批志愿返回大陆的中国战俘被运送到“602”战俘营场。



战俘营里正在登记按手印的战俘

四、“72”战俘营的“甄别”

“72”战俘营里的中国战俘经过“志愿遣返甄别”，七千多人中只有四百多人（仅占百分之五）要求回大陆。

为了更客观具体地了解那些天在“72”营场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还是接着摘录志愿军12军文化教员吴均度追述的、他在“72”甄别过程中的亲身经历。

在“甄别”前几天，全大队聚在一个铁篷子里又搞一次集体签名盖手印。说不愿签名的可以退出去时，我立即站起来向外走，接着一些人跟在我后面，等我们跨出门，警备队员握着棒子便打。我当时提出抗议：“你们说自愿，叫不愿签名的退出去，怎么打人？”他们被我问住，便停下手来。对其他人一个个问：“你以前签过名没有？”若是以前签过名现在拒签的便连骂带打。我当时免于遭打，但成为被考虑

处置的对象了。

当天，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帐篷里。派专人在身旁持棍守卫。与我同排是曾签名刺字的人，我对面一排是李克、晏棣、王根生、张治山等未签名的人。当夜对我只是些小动作，有个别家伙故意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四川人，便“赏”我两耳光。问原来是干啥的？我回答是学生，也“赏”两耳光。我身旁的守卫，不许我动，只要有一点动静，棒子就打下来。这一夜我几乎没法睡觉。但第二天夜里，李大安来了，他一只手提着用线穿着从刺字人身上割下来的肉，一进门便问：“哪些人是刺过字的？”叫人把衣服脱开，一边说：“刺的字不能叫你们带回去。”随后就动手用剃须刀挨个割这些人身上的肉，并让众人看他当面行凶。当晚被割肉的难友中，有的咬着牙、不吭声，也有的忍不住痛，发出呻吟或惨叫声。这个恶棍行凶完，经我面前出帐篷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晚，气氛确十分恐怖。

第二天，我在被押着去领饭和解手时，暗中窥察，感到营内有些异样，日常的一些活动停止了，叛徒们平时那种趾高气扬的得意劲收敛了。人们脸上的表情显得平静。铁丝网周围有喇叭不停地广播，虽然叛徒们不停敲打铁筒干扰，但也模模糊糊听到说：过两天要进行个别谈话，到台湾、回大陆将根据自愿把你们分开。我心想总算熬出来了，眼前只不过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估计叛徒们不敢再对我们下毒手，不会出现国民党败退时，重庆歌乐山渣滓洞那样的大屠杀。可是像李大安这类残暴的凶手，对个别人的报复，仍然可能。但一想到即使轮到自己也算是大限期到，得到解脱，心里反而镇静下来。因此，直到了4月8日晚上，我的头脑也是很清醒的。

4月8日晚上，大约午夜一点钟，我们被带到大队的门口，先上了绑。接着李大安提着棍子过来，叫嚣：“不忙带走，让我每人赏几棍子！”这时一大队长李××算是天良还未完全泯灭，忙对李大安说：“联队副，这些人刚才我已经捶过了。”李说：“那就减半一个一棍。”然后押解到“战俘学校”（C.I.E.）上反动课的大礼堂。夜显得特别静，空气好像凝



甄别前夜被杀害的林学通（左）和阳文华（右）。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朝鲜战争战俘档案

固了似的。我排在头，一进礼堂，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礼堂内只有正中一盏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使人感到阴森恐怖。地上趴着东一堆西一堆人，周围站着持棍的打手，像是一群魑魅魍魉。台上那鬼影分明是王顺清，只听他叫：“一大队的带到这里。”我们被带到靠讲台边上，一个个被推搡倒在地上趴着。约一分钟，突然有人喊出震撼人心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我心一震，接着一阵棍棒打人声。同时身旁那个打手用棍子杵着我的头威胁说：“你喊，打死你！”他们似乎慌了手脚，聚集在台上窃窃私语了一阵子。最后，由王顺清传出话说：“明天甄别，跟我们到台湾的，把腿翘起来。”凡是翘了腿的便被从地上提起来。我身旁的打手用脚踢我说：“你翘不翘？”连问两声，我侧头看见左右的人都站起来了，便也就翘了腿，被提了起来。接着王顺清下令，各大队把人带回去。

回到帐篷里，大队政训员（我两次进警备队都是他审问，他曾诱导我说：“你们这些学生跟着共产党跑，究竟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进帐篷来对着我咬着牙，哼了两声，吼着说：“吴加明，我恨不得挖你心！”我埋下头不作声。后来，王根生说，当时真替我捏一把汗。

挨到天明开始“甄别”时，从一大队开头，我排在队伍后面，靠近礼堂边。昨晚被杀害的林学通、阳文华的尸体就挨在我们身边。“甄

别”进行中不断传来“抓住他，打！”的吼叫声。面临这样的情况，摸不准今天究竟怎么回事，能不能出得去？当晏棟掉头望着我，我没有表示，他向我摆手，我也没作表示。我真断不定这一关是吉是凶。直到快轮到我的时候，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背上，这等于提醒我犹豫不得了，只有拼命一冲了。当我看见带有“M.P.”字样钢盔的美国宪兵时，便拿定主意：出不去就抱着美国宪兵腿喊“我要回国……”。我一进“甄别”的帐篷，主持谈话的人先说了些什么，我没认真听。当他问我愿去台湾还是回大陆时，我斩钉截铁地说：“回大陆！”他仔细地看了一看我，递给我一张卡片说：“你出去，对直朝大门走。把卡片交给美国兵。”我出了帐篷，三步当两步走近大门前。一个美军宪兵站在中央，接过我手中的卡片一看，忙把我向门外一推。我出了大门，见有一辆卡车套着布篷，一个美国兵示意我从扶梯上去，我踏上扶梯回头向“72”那边张望，他把我搽进车里面，并骂了一声：“God damn it



巨济岛 72 营场甄别时战俘们先看看那些敢表态回国的同伴们的下场

(混蛋)。”我上车一看怎么寥寥无几，晏棣、李克、王根生他们一个也不见。我急了，心中好后悔，为什么刚才不通过面部的表情给他们鼓气。到了回国战俘营“602”，与黎子颖、张长惠会面时，提到晏棣我心中好愧。在迁移去济州岛之前，盼到了第二次甄别。李克、王根生、赵长和他们都出来了，可晏棣仍未出来。李克告诉我：“那天回到一大队，陈黄（晏棣）不断说，吴加明呢？吴加明呢（我的化名）？他急得快哭了。那天他被叛徒们挟持着，这次甄别时又被一前一后紧跟着，他怕是出不来了。”

回国后，我一直感到终生遗憾的是：我对不起晏棣，我扔下了他，如果他被挟持去台湾或折磨死去，那是我的罪过。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但愿他能顺应时势，在海外幸存下来。

写这段回忆，触及到我几十年没向人透露过的隐疾。组织上可能因我在72战俘营中的那段表现，审查结论的后面写有一句“……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斗争中表现勇敢。”的评语。我扪心自问，我能算勇敢吗？我与在济州岛升旗，勇敢献身的人相比，能不汗颜么？唉！过去的应该让它过去，但愿我的子孙及我们的后辈，不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吧！

（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1952年4月8日那天晚上，在巨济岛“72”战俘营，除了林学逋、阳文华，究竟还有多少志愿军战俘死于非命？恐怕会是一个永远的历史谜团了！

五、“86”战俘营的“甄别”

“86”战俘营里的8600名中国战俘经过“志愿遣返甄别”，只有1128人（仅占百分之十三）要求回大陆。

巨济岛“86”战俘营里刚组织起来的爱国势力在1951年10月9日那

次“夺旗之战”中，由于遭受到美军武装的直接镇压，几乎全军覆没。“86”也就迅速“72”化。当然也有一些区别，那里的反共头目：程立人、周演达表面上要比王顺清、李大安和善点，手段花样也多一些。比如为了增多去台湾的签名人数他们就要了个花招。

1952年2月底，巨济岛遭受一次寒潮，“86”不少战俘冻病了。于是各大队动员大家签名，请求美军管理当局发放棉衣。等大家签完名，他们将申请棉衣的内容换成了申请去台湾，并公开张贴出来。俘虏官们告诉大家：“这份你们签了名的申请书已递交板门店共方代表，共方已经知道你们誓死不回大陆了，你们再要回大陆，只能当作派遣回去的间谍！”吓得许多战俘在甄别审查时，不敢要求回国。

1952年3月初，“P.G.”队长周演达下令将一位坚决不肯刻字的战俘掐死，然后吊在厕所里，谎报是自杀，又搞了个假绝命书，把自杀原因说成是“怕去不了台湾”。这个“自杀案”后来被美军的“刑事审讯科”（C.I.D. 即 Crime Investigation Division，宪兵刑事调查组）侦破，但犯罪嫌疑人却未受到任何惩罚。

临近“志愿遣返甄别”时，战俘警备队与各级俘虏官对“亲共分子”和“动摇分子”的监控以及营内的白色恐怖气氛已经不亚于“72”，被迫刺字和被哄骗、威胁签名写血书的人数也快赶上“72”了。

1952年4月9日晚上，整个“86”营场通宵都有殴打、哭喊声。但我们尚未查到美军的有关档案，不知道当天晚上“86”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

志愿军180师538团宣传队员赵成云是跟张泽石同时被俘的，他还参加了张泽石建立的“爱国主义小组”。后来赵成云被分编在“86”第二大队。张泽石到“86”担任联队部翻译时去联系过他。张泽石因领导“夺旗之战”被美军抓进监狱后，赵成云受到牵连，1952年4月10日“甄别”时未能出来，最后去了台湾。

2006年，赵成云在他的故乡四川大邑县接受了当年同在“86”二大队的归国难友林模丛的采访，谈及了“甄别”前后的那段经历，兹摘录于

下：

林：你在“86”时，是哪个警备队的哪个人把你叫去动刑的？

赵：是二大队的警备队，是警备队队长简云生叫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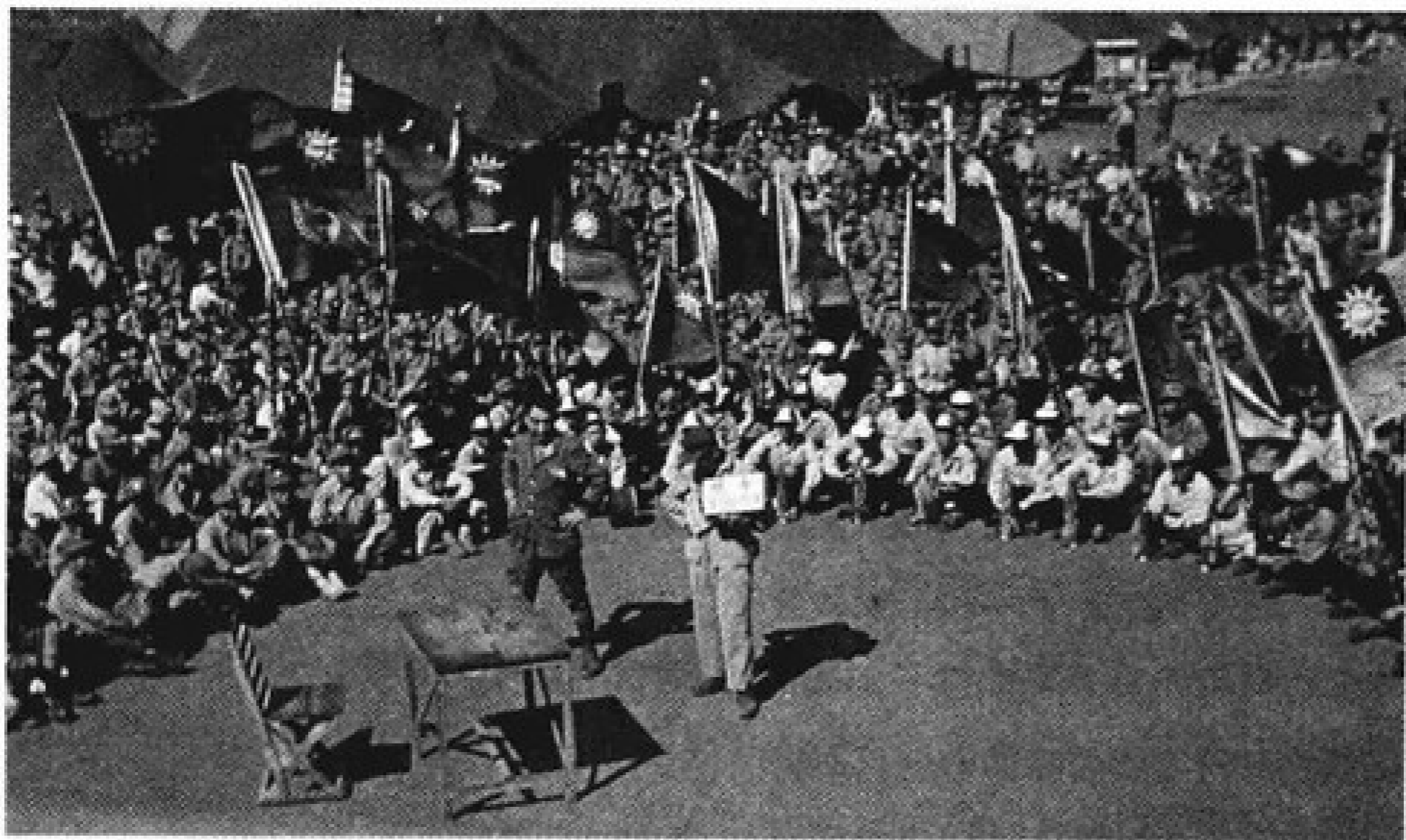
林：他问你些什么问题？

赵：他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共产党派你来做什么的？”还问我：“你跟张泽石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张泽石曾经是一个宣传队里的队员，就这个关系。”他说：“那你们之间有些什么活动？”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他们就用几个夹板使劲夹住我的十个指头，痛得我钻心！

林：受了夹指头刑罚以后又如何？

赵：我还是说：“我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我也没有在战俘营里发展什么组织活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被关在警备队帐篷里面。后来，就分到“86”战俘营的一个“共党嫌疑犯”小队里去。不久，又调到五大队的剧班（注：“剧班”指的是到“C.I.E.”上台演戏的“文娱宣传队”）。

林：“甄别”的时候，你们几个好朋友商量过不能回家了，只能去



志愿军战俘营里的戏剧表演

台湾了，是吗？

赵：对，这是大家商量的结果，那时都认为反正字也刻上了，血手印也盖上了，感到很愧疚，不好意思回来。

林：你们当时还想，我们不能忘记家乡吗？

赵：对，就是这样想的。大分家的时候，我跟剧班的人商量，大家虽然一起去台湾，但是不能忘记家乡。上海有一个小区，有很多台湾国民党退役将领，在那个地方买了房子，郝柏村都去了。在那个小区里，国民党将级军官的军衔加起来超过100颗星。可见，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没有忘记祖先。

林：你去台湾后想家吗？

赵：想得厉害！蒋经国对两岸探亲开禁以后，第二年我就回国探亲了。以后回来过好几次，退休了一直都常回来的，连这次回来已经有五次了。

有一位在“86”营场参加甄别的美方人员回忆说，有些志愿军战俘在甄别帐篷里声泪俱下诉说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觉得回国不会有好下场，但又实在无法割舍家人。

六、“70”战俘营的“甄别”

“70”战俘营里的1400名中国战俘经过“志愿遣返甄别”，有1217人（占百分之八十七）要求回大陆。

“70”战俘营设置在巨济岛西码头港口边上，是专门为装卸进港物资建立的“苦役劳工联队”。在这个联队做苦力的战俘大都是从“72”、“86”调来的“死硬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美军派遣曾经担任“72”军官大队大队长的魏四喜来当联队长。美军让魏四喜带领了两个大队长、八个中队长和百余名爪牙与打手来进行严密监控。

志愿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门培英当年曾经是该战俘营中共地下组



在巨济岛码头搬运物资的战俘们



参加物资搬运劳动的战俘。均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开放的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



门培英

织的领导人。他对进行甄别前后的经历有一篇相当具体生动的回忆，现摘录于下。

4月初，我们从美军报纸上获知和谈有重大进展。趁大家在议论纷纷之际，我们的宣传工作也逐渐转为公开，明确提出“回国光荣、去台湾可耻”的口号。4月7日，美军战俘拘留当局在“72”联队召开了由中国四个战俘联队长参加的会议，宣布了“四八甄别”的命令。魏四喜回来后，恐慌万分，急忙召集他的爪牙布置如何在“甄别”时阻止大多数战俘回大陆。

当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的“联队警备队长”高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我们后，我们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对难友们说：“祖国正在积极营救我们全部回国与家人团聚”；“我们是炎黄子孙，要有民族气节，坚决回祖国去”；“我们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我们早日回家！”对那些思想上有顾虑，特别是被刺了字的难友，我们的宣传工作则做得更细致。我们反复耐心地对他们解释说：“刺字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刺，是坏家伙强迫你们刺的，它只能暴露敌人的凶残，而不能阻挠我们回国的决心。我们在战俘营的不幸遭遇，祖国人民是同情的，被迫刺了字也会得到祖国人民的理解……”经过我们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难友打消了思想顾虑，纷纷表达了自己愿回祖国的决心。高攀原来认为自己当过警备队队长，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人民，回国后没脸见人，思想顾虑很大。经过我们耐心做思想工作后，他放下了思想包袱，不但坚决表示要返回祖国，而且答应要积极配合我们工作。

8日上午，美军开来一辆广播车，在“70”联队门外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俘问题发表的声明》（即“四六声明”）。张光普对门卫美军士兵边讲英语边打手势，

让广播车开进营场内，使全体被俘人员都能听清广播的内容。当大家听到声明中“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信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的内容时，90%以上的战俘都激动得流出了喜悦的眼泪……

听完广播后，警备队的队员们就积极行动，按照地下组织的指示，在夜间收缴了伙房的刀具，并驱散了一些由败类召开的不利于回国的活动。那些曾被集中在广场上听伍培礼“传教”的人自动解散了。而魏四喜一伙却急得团团转。

10日，在70联队门外搭起了帐篷，8时开始甄别。高攀对列队坐在广场上的难友们高声说道：“我是警备队长，我坚决要求回国！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人群中响起欢呼声。接着他立即指挥大家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难友们激动地流着热泪，纷纷走向“甄别帐篷”，坚决地喊出了“我们要回祖国，反对去台湾！”的口号。

两个小时以后，“70”联队有1217名难友经过“甄别”后到了“602”回国战俘营。

“四八甄别”后，魏四喜被撤了职，带上他的100多人回到“72”。后来魏



高攀



高攀高声说道：“我是警备队长，我坚决要求回国！”吴春生绘图

四喜被美军情报部门征用，在向北朝鲜空投后被捕，于1958年被华北军区判处死刑。

（见中国文史出版社《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七、釜山战俘“志愿遣返甄别”

1952年4月13日前后，美军在釜山对第2、4、11等收容所的约1000名中国非伤病战俘进行了“志愿遣返甄别”，愿回大陆的有880余人，不愿回大陆的有120余人。

釜山第十一收容所，是釜山做劳役的战俘集中地，有700多名中国战俘。1952年3月底有617人在该所“坚定共党分子”领导下，通过异常艰苦努力，摆脱了反共分子的严密监控，让他们得以在“甄别”时，从容地表达回国意愿。釜山第2、4收容所共有300来名为伤病战俘服务的中国战俘，甄别时他们大都表达了回国意愿。

1952年5月9日前后，美军在釜山对第1、第3两个伤病收容所里的近3000名中国伤病战俘的“甄别”结果，有1640余名愿意回国，1400余名不愿回大陆。

由于两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都曾经以绝食、示威抗议等行动拒绝美军的“志愿遣返甄别”，美军也曾经采取断水、断药等手段给予惩罚，使得对伤病战俘的“甄别”一直拖延到5月上旬。

八、“志愿遣返甄别”的最后统计数字

从我们查到的现有史料看，截止到1952年5月9日，美军拘押的志愿军战俘总共20700人，通过甄别其中有5100人要求回大陆，有15600人不愿回大陆。

到了1954年1月，中国战俘的总人数增至21300人，要求回大陆的人

数增至 7094 人，不愿回大陆的减至 14200 人。这一增一减的数字变化是来自：

(1) 自 1952 年 5 月上旬到 1953 年 7 月停战为止的 14 个月里，美军新抓捕了 600 多名志愿军战俘。

(2) 在这 14 个月里各种原因死亡的战俘。

(3) 应共方谈判代表的强烈要求，1952 年 6 月在从巨济岛转移反共战俘营到济州岛前夕，美军曾经对“不愿回大陆”的战俘进行了第二次“甄别”。有数百人改变了遣返志愿。

(4) 停战后在板门店中立区由印度军队看管的营场里，由中共“解释代表”对“不愿回大陆”的战俘进行了再次个别“解释”，有 440 人重新选择了回大陆。

九、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尽管美军在“甄别”前做了相当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甄别”过程中又力求做到“公开、公正”，但由于美方从停战谈判开始后即在战俘营内积极支持反共战俘对亲共战俘进行控制、策反和镇压（尤其严重的是在巨济岛“72”、“86”两大中国战俘营里，美军纵容反共战俘大规模地强迫战俘们在身上刺反共字样和在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上按血手印等身心摧残与政治陷害活动），造成了数万朝中战俘“拒绝遣返回国”的严重后果。同时美军在完成“甄别”后不得不将“拒绝遣返回国”战俘跟“坚持遣返回国”的战俘进行隔离关押，又使得美军失去了利用反共战俘去监控亲共战俘那种“以俘制俘”的有利条件。而这对于完全集中在一起的亲共战俘们来讲则无异于在战俘营里重新获得了“解放”！

因此在“甄别”之后的 1952 年 4 月中旬至 5 月初这段时间，巨济岛上各“坚持遣返回国”的朝中战俘营不断用游行示威、绝食抗议等方式来表



被扣押的杜德将军（上）和他的继任科尔生准将（下）



到“76”战俘营参加杜德事件志愿军战俘代表孙振冠（右）、张泽石（左）回国后合影

达他们的愤怒，要求重新甄别以解救他们那些在严重威胁下未能表达回国意愿的难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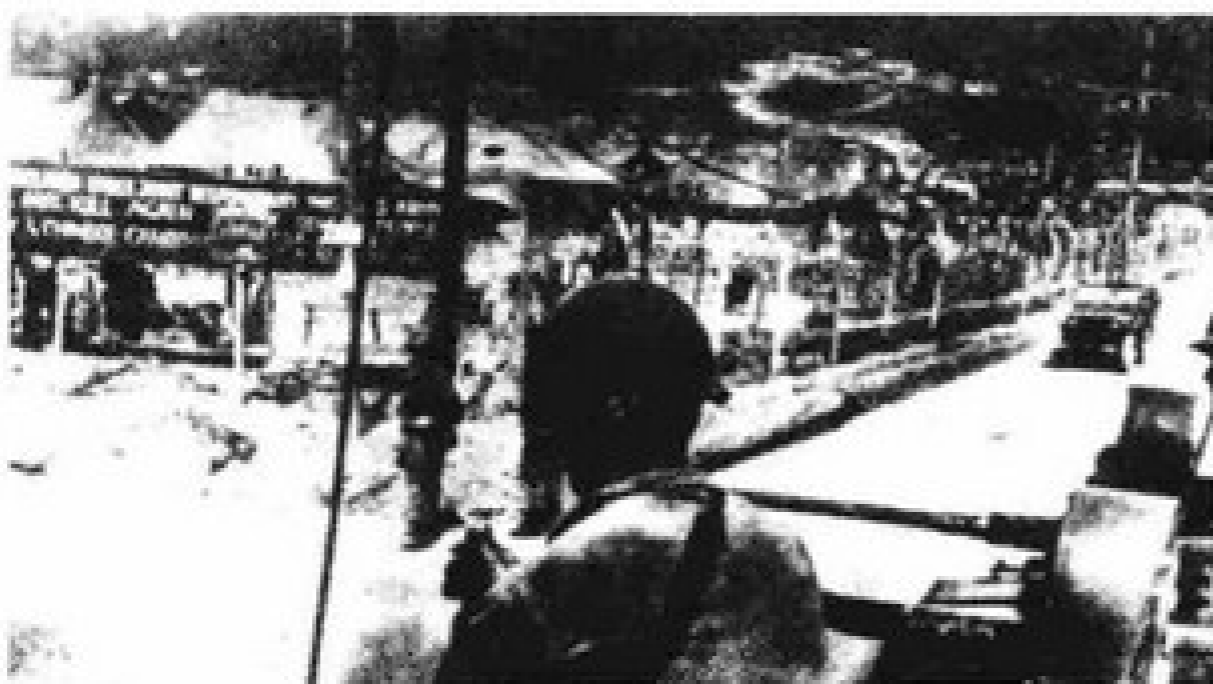
面对美军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朝中战俘中地下朝鲜劳动党、地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聪明地制定了计策：先由中国战俘进行绝食坚决要求美军巨济岛总管杜德将军到602战俘营门口听取中国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呈诉有关改善生活条件的意见，并在面见杜德之后答应立即停止绝食，让杜德对于自己确有平息战俘们愤怒抗议的威望深具信心，从而杜德也答应在1952年5月7日那天到达正在绝食抗议的“第76朝鲜战俘营”营门口，去跟该营场代表隔着铁丝网进行“谈判”，结果被外出海边倒粪回来的战俘清洁队趁机迅速将杜德抓进营场大门扣为人质。

当杜德的卫兵们反应过来打算冲进营场以武力营救杜德时，人民军战

俘们已经将一幅巨大标语悬挂出来：“我们为了和平解决问题暂时扣留了杜德将军，你们若胆敢使用武力，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当美军以重兵包围了“76”营场，形势极为严峻之时，杜德将军亲自签署的两条命令送了出来：1. 包围营场的部队立即后撤；2. 马上将岛上坚持回国的朝中战俘各营场代表送到“76”来召开“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602”营场的中国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随即被接送到“76”营场参加了历时三天的“战俘代表大会”，他们在大会上当面向杜德揭发控诉了美军在战俘营内支持反共战俘犯下的种种恶行及其严重后果。杜德最后在一份《保证书》上签了字，实际上承认了美军侵犯战俘人权的罪过，杜德在认罪后被战俘们列队欢送出“76”营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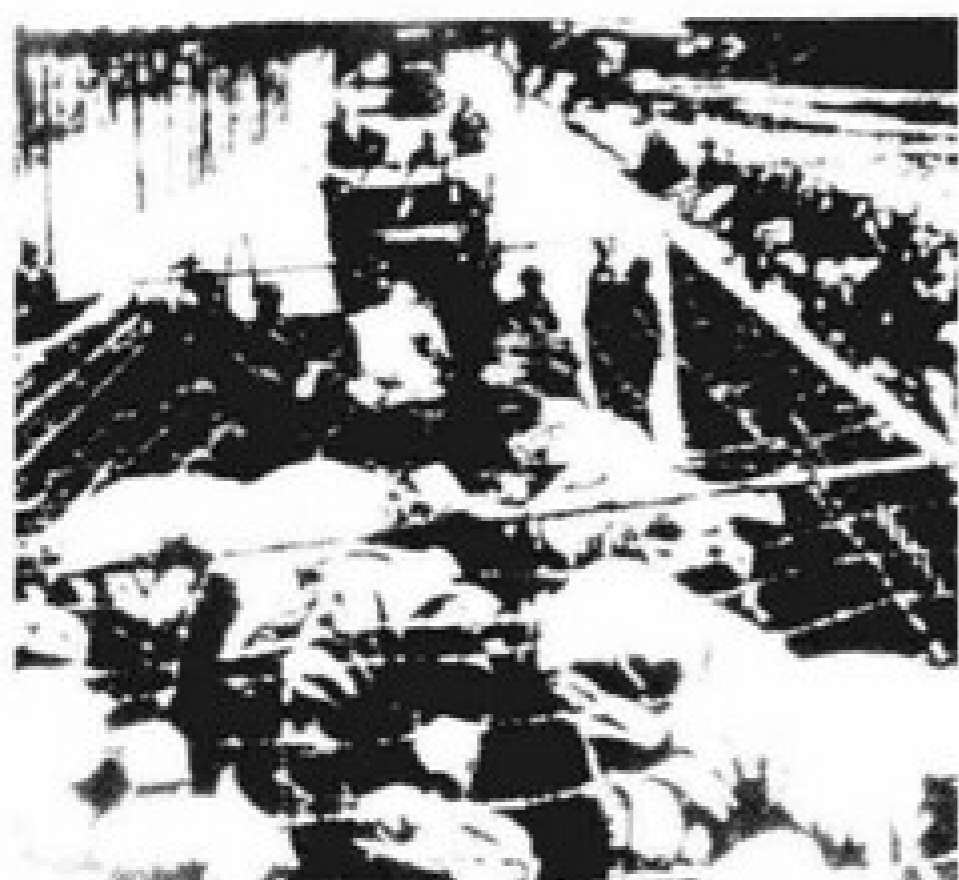
慌乱之极的美军包围了 76 战俘营（这张珍贵的照片中英文标语：“你们若胆敢开枪，杜德就性命难保！”）



美军紧急包围巨济岛第 76 战俘营



图中标语英文大意：“波特纳！与杜德谈判的公开声明正在协商！”



逮捕全体战俘代表



1952年6月10日美军强行拆迁76战俘营

“杜德事件”震惊了世界舆论，造成美国政治上、道义上的沉重损失。美军事后对“76”战俘营进行了残酷血腥报复，给全体战俘代表扣上“刑事罪犯”和“战犯”帽子，关进“最高监狱”和“战犯集中营”给予长期折磨。而杜德也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杜德事件之后，针对给联合国军带来冲击的巨济岛上的中朝俘虏，美军的态度变得非常严厉起来。他们断然决定把大集团集中收押改为以数百



图为镇压完“76”暴动之后从战俘营走出来的美军士兵。

人为一个单位的分散收押。在为此做准备的同时，美军对战俘营不断加大警备，强化管制。整个巨济岛的空气日益紧张。除美军之外，英国、加拿大、希腊、荷兰等国的增援部队也驻进巨济岛，执行警备任务。联合国军部队在执行战俘营管理任务以外的时间，不断地进行镇压暴徒的刺杀和使用火焰喷射器的训练；全体联合国军官兵为保护自身安全，从早到晚，无论去哪，都荷枪实弹并随身携带防毒面具。收容所周围的山丘上布满了坦克车，炮口一致对准战俘营。尽管如此，中朝战俘们还是高唱军歌，高挂国旗，反美气势有增无减。美军乃决定将朝中战俘完全分开，把中国战俘全部迁离巨济岛。

第五章

在济州岛

(1952年6月—1953年9月)



取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朝鲜战争新闻图片库的济州岛志愿军战俘营

一、迁移的风波

1952年5月巨济岛发生“杜德事件”之后，新任战俘营司令官波特纳准将从严治理战俘营。美军决定首先切断志愿军战俘跟朝鲜人民军战俘的联系，将全部中国战俘迁往济州岛关押。

1952年6月，美军先把一万四千“不愿回大陆”的中国战俘迁移去济州岛，以便让这些一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战俘到济州岛上为全体志愿军战俘修建新的战俘营场。美军完全没有料到迁移他们会碰到麻烦：这批战俘在到达港口码头之后，他们的首领们竟然带头拒绝上船，甚至带领战俘们



赴台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的战俘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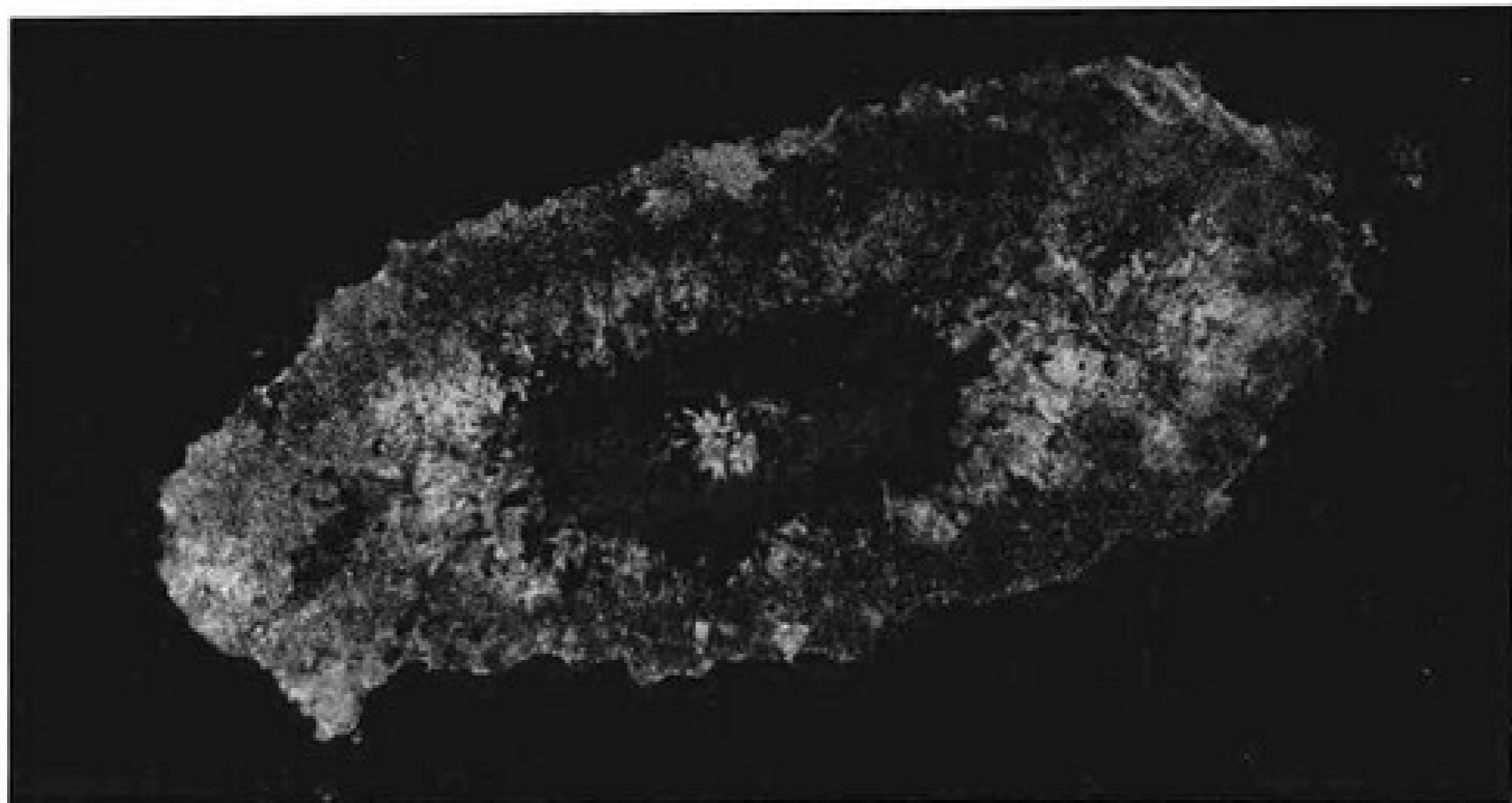


战俘转运济州岛

绝食以抗拒迁移。

原因是这些铁杆反共战俘自认为在战俘营替美军出了大力气，对“志愿遣返甄别”的胜利成果做出了大贡献，但“甄别”之后却不仅未得到美军管理当局的任何奖励，反而感受到被冷淡对待：那位对他们最亲的伍培礼“牧师大人”不见了；对他们打听何时能动身去台湾，战俘营的美军总管也不予回答，甚至很不耐烦；特别是在他们陆续进入巨济岛港口转运站时，美军又突然对他们进行了一次“遣返志愿再甄别”，竟然有数百人转而要求回大陆离开了他们的队伍。美军的这种种表现引起了他们的满腹疑虑和强烈不安。他们猜测此去很有可能被送入“共党虎口”，乃决定以死抗拒，举行绝食请愿。

波特纳在了解情况后，立刻把伍培礼从釜山接到巨济岛。由这位“牧师大人”向他们保证绝对不会把大家送给共产党。伍培礼还宣布自己与大



济州岛卫星图

家同行，共担风险。这才化解了战俘们的疑虑，结束绝食开始迁移。在航行途中战俘们仍然心神不定。一度有人自作聪明判断说船是“往青岛开”，又让大家紧张了好一阵。直到抵达济州岛后才安下心来。

1952年7月，美军在迁移602营场那六千名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时也不顺利，该营场战俘要求将他们的代表孙振冠、张泽石从最高监狱释放回来，否则拒绝迁移。波特纳下令美军武装进入602战俘营，用催泪瓦斯弹强行将战俘们驱赶出营场，并逮捕了该营场中共地下党总领导人、180师538团团政委赵佐端，才终于将这6千名亲共战俘从巨济岛押送到了济州岛，他们被关进了建在济州岛飞机场附近的第八战俘营。该战俘营场被隔离成十个小营场，把战俘们被划分为10个大队分开关押，以便于美军对这些难以管理的亲共战俘分别进行监控。

二、济州孤岛上的凄风苦雨

济州岛位于釜山东南的太平洋中，是一座远离韩国本土的孤岛。现在的济州岛已经成了风光绚丽的旅游胜地，但当年却十分荒凉。“汉拿山”高耸在济州岛上，美军将经过激烈“国共内战”被分裂成两大对立集团的志愿军战俘们的拘留营场分别建在汉拿山两侧。



今日汉拿山是韩国著名风景点





去台志愿军战俘营里的联队部

周围多加几层高铁丝网，且每个大营场里也分割出五个小营场。这一下让这些反共头头顿感失落和不满。他们又组织大家绝食抗议，拒绝施工。但美军管理当局不为所动，干脆连营区供水也断了。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面



去台战俘营里的大厨房

不但挨饿，还要忍受干渴的痛苦。“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们来到济州岛后，被美军派去建造新营区。开始时，他们修建的两派战俘营区在构造上有明显差别：给“要回大陆”的战俘修建的营区不仅分割成十个小营场，并且设有高达6层的高大铁丝网，而给他们自己修建的营区只设半人高的单层铁丝网，且只分隔成三个大营场。反共头目们很满意这样的差别。但是他们满意了没几天，美军当局又通知他们改建，要在他们自己营区

周围多加几层高铁丝网，且每个大营场里也分割出五个小营场。这一下让这些反共头头顿感失落和不满。他们又组织大家绝食抗议，拒绝施工。但美军管理当局不为所动，干脆连营区供水也断了。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面不但挨饿，还要忍受干渴的痛苦。

美军总管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脸色告诉那些战俘头头：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战俘必须参加与战俘生活有关的劳动，公约也规定战俘必须服从监管当局的命令。战俘营场建设，战俘迁移，编组分区等等均为监管当局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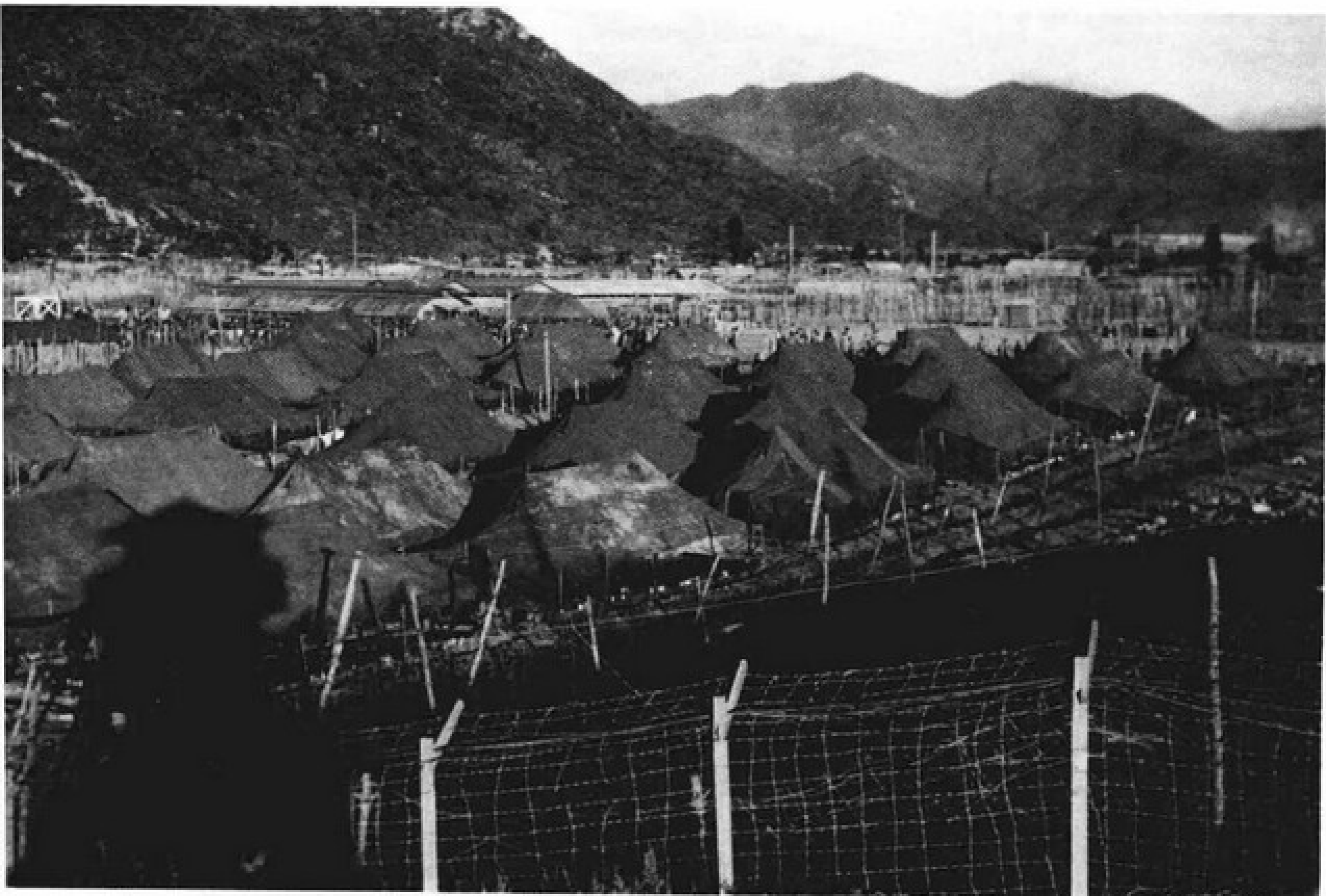
当职权。战俘们必须执行这些命令。所以他们的抗议无理，如果战俘拒不执行命令，监管当局有权强制执行。因此管理当局除了继续劝说警告以外，决不收回成命。这些反共战俘们绝食抗议几天后觉得既难受且无效，只好结束抗议恢复劳动，按照美军的要求修建起各大队生活区的帐篷城，以及联队部、诊疗所、大礼堂、大厨房、大操场、艺工队工场，乃至剧场等设施。最后两个设施是第八战俘营所没有的。这又使他们感受到美军善待他们的一面。

不料就在他们迁入新营场不久，遭遇了一场大台风袭击，营区内数百座帐篷被全部刮倒吹跑，大家只得在狂风暴雨中忍受饥寒。台风过后美军让他们搬运山石修建石头房，又辛苦劳动了一通才安定下来。

1952年10月1日，济州岛第八营场发生了一场流血惨案。

这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国庆日。济州岛第八战

归国战俘营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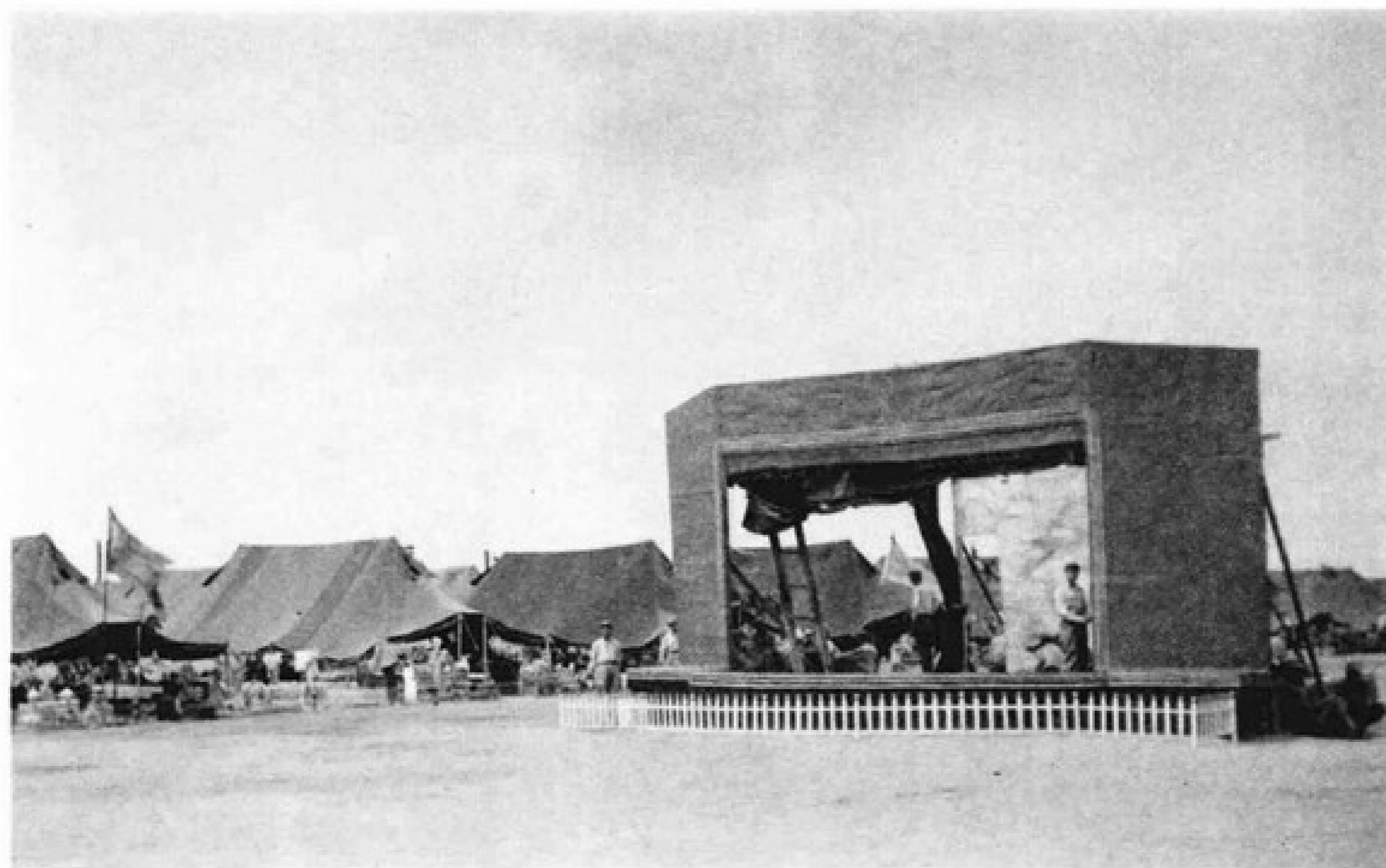




去台志愿军战俘营里的建筑装饰物



去台战俘营里的大礼堂



去台战俘营里的演戏台



去台战俘在平整大操场



战俘正在进行营区建筑

俘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会，通知各营场在当天升起五星红旗以“向全世界表达志愿军战俘坚定的回国决心”。他们也事先通知了美军管理当局，提出：“我们庆祝国庆的升旗行动符合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有保留自己信仰之自由的规定，管理当局不得阻拦。”美军管理当局回答他们：“我们不会阻拦你们保留自己的信仰，然而日内瓦公约也规定战俘不得对管理当局采取任何挑衅活动，升起敌对国家的国旗即是一种重大挑衅行为，我们将予以坚决制止。”但第八战俘营的战俘们仍然在“十·一”当天升起了九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人民共和国国旗，各营场还组织了保卫国旗的“敢死队”。于是，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给战俘们下达的降旗命令未被执行后，他随即命令美军武装持枪冲入最先升旗的第七营场强行夺旗，冲进营场的美军士兵遭受到“敢死队”队员们用石头、石灰包、汽油燃烧瓶等的阻击，士兵们开枪扫射了，那些已经留下《绝命书》的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地跟美军展开肉搏，整个第八战俘营被枪声、喊杀声、口号声所淹没，直到国旗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毁。该营场志愿军战俘当场56人牺牲、109人负伤，其中9人伤重不治死于医院！这场流血惨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和板门店中朝代表的强烈抗议。

六十五名卫旗牺牲者的遗体被美军运往济州岛慕申浦海边，由他们的昔日战友、现在是“反共战俘”进行挖坑掩埋。几十年来死者们的英灵只能在异国孤岛上听太平洋的潮起潮落，他们至今也没有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国家迎回他们的遗骸，更不用说追认他们为烈士。

三、去台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

据王东原回忆：

经此次甄别后，其坚决不返大陆之中国战俘约一万四千余人，改编为三个联队，于是年秋移住济州岛南部之摩瑟浦【编案：即慕申浦】，此即日后在中立区战胜共军疲劳洗脑之反共义士。当美军宣布移驻济

州岛时，均疑被出卖与共军，誓死不愿前往，美军当局无可如何，经华籍译员再三解释，陪同前往，方释群疑。

中国反共战俘抵摩瑟浦后，斩棘披荆，建立营地，生活较前困苦，惟反共信念益坚，与我译员之感情弥笃，营地到处国旗高竖，门前大书标语二联曰：“一条命灭共匪”、“一颗心回台湾”。十月十日国庆、卅一日蒋总统诞辰及元旦等日，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并排演话剧，暴露共军在大陆之罪行，美军观者无不感动流泪。同时又扩大刺臂运动，人人臂胸均勒书“反共抗俄”字样，以示绝对不返铁幕之决心。又再次以血书寄呈蒋总统、李承晚总统、艾森豪总统及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自由，其恳切之情，更进一步为世人所注意。联军统帅符立德将军及史倍曼大主教以次美要人先后前往集中营访问，无不寄以深切之同情。

在争夺战紧要关头，一九五三年春中央党部第六组副主任陈建中衔中央命来韩，策动争取反共义士之斗争，我乃指命馆中重要幕僚及有关单位成立“指导小组”，以任全般方略之策划及指导，并嘱卓秘书



去台战俘营里的文娱队之一



去台战俘剧班表演捉鬼戏

献书，将各项进行工作，连同名册，交由陈同志主持管理，并全力协助。指导小组既告成立，党即派人往摩瑟浦与各战俘营取得联络，同时建立釜山与济州岛间之定期交通，以便随时传达消息，指示各营行动，各战俘营得悉中央之关怀与支持，士气益为振奋。

上述介绍，概括了志愿军去台战俘在济州岛的一般情况，以及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在其间的所作所为。

1952年6月，“不愿回大陆”的战俘们押送到济州岛后，被改编成了三个联队。原巨济岛72联队的1-4大队编成济州岛第一联队，巨济岛86联队的1-4大队编成济州岛第二联队，“72”、“86”的5、6大队则合编成济州岛第三联队。济州岛的各联队编制中的第五大队是由联队警备队和联队文娱队组成，另外还有一个少年队和宗教所由各联队部直属管辖。战俘营内各级俘虏官基本仍为原班人马。

联队警备队和大队警备队员们仍然带着袖标和警棍行使其监管战俘的职责，由于没有了“死硬共党分子”，刑讯室取消了，但对那些“不稳分子”更加强了监管。另一方面，各联队扩大了联队的文娱队（又叫“剧班”），各大队也建立了文娱小队，明显加强了文宣活动：演反共剧、放黄色电影、传阅黄色书刊、播放反共新闻等。甚至有的人自编词曲，自我欣赏地传唱

他们的作品。有一首歌词是这样的：

“共产党你不要梦想，中国不是你们的天堂，洞庭湖和扬子江把你们埋葬。……来来来，中国不是你们的天堂，中国正是你们的墓场。”



1953年9月10日去台战俘营少年学校第一级毕业生合影。图片提供：陈朝勋

只是歌词结构不大像歌词，曲调旋律更如“和尚念经”，被战俘营演剧队里一些粗通音乐的叫做“狗屁歌”。

变化更大的是各联队新成立了少年队和宗教所。在少年队里集中了本联队二十岁以下的队员在一起学习，对象为不满20岁的文盲、半文盲，共约三千人，按照文化程度编为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学校建制从校长、教导主任直到各科教师均由俘虏担任，台湾老师实施监督指导。教材为台湾学校的教材，开设了识字、作文、历史、政治、园艺、木工、铁工、电工、缝纫、美术等文化学习和职业培训课程。其中也有介绍民主制度政治课程。教师最初是在战俘中选拔的，后来则有了外来教师。可以想象到：美军管理当局为了给少年队文化学习与职业培训提供教材和教学设施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这种教育实施了一年，也确有一些少年队成员在济州岛上学有所成，让他们到台湾服兵役后在升学及就业方面受益匪浅。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是他们在战俘营苦难岁月中所感受到的美军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有人后悔自己当时因为情绪消沉，成天跟着大家打纸牌、打麻将、赌烟卷，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

宗教所则发展佛教和基督教信徒，进行佛教教义与基督教圣经学习，讲经的僧人与布道的神父都是外请的（据传还有宋美龄聘请来的神父）。由于宗教所也跟少年队、文娱队、警备队同样免出公差，参加宗教活动又能填补心灵空虚，申请进入宗教所的战俘便日益增多。

还值得一提的是到济州岛后，反共战俘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加剧，在第二联队就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夺权争斗。赴台战俘王北山在他的《韩战生死恋》一书中有一段细致的叙述：

那天早晨，刚吃过饭，联队部通知各大队不出公差，把队伍带到大操场集合。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我以为是演戏，也跟着队伍去看热闹。走上了贯穿联队中央的大道，我见各大队的队伍也陆续带出。他们进了大操场，面向剧台就地坐下。剧台上站着几十个警备队员，他们频频交头接耳，神情很神秘。

不一会儿，在我背后隔着铁丝网的大礼堂的大门打开了，鱼贯地走出二十多位各大队的中小队长，警备队队长也在行列中。这可叫我大吃一惊！他们每人的左右旁，各跟随着两个手执棍棒的联队警备队员押解着。进了大操场，他们被带到剧台上一列排开，站着面对群众。台上有人发狂地咆哮了：

“大家看这一伙人！他们一天到晚捣乱闹事，让我无法安下心来替你们好好地服务，替你们争取自由！他们不断地闹，唯恐天下不乱，你们知道他们是搞的什么阴谋吗？昨晚深夜，他们企图要杀人，这该怎么办？怎么办？你们说！……”

台下有一分钟的沉寂之后，零落的三两个人喊：“打——打……”台上那群打手开始动手了，把他们一个个的按倒下来，迭起双腿，夹紧一怕打到卵子，用帐篷杆子朝腿部用力猛捶，噗、噗、噗……

全场鸦雀无声，我仿佛置身川西恐怖的斗争大会，心中难过极了！他们在巨济岛和亲共战俘斗争，拍胸脯，义无反顾；现在却被这群自命反共的混混儿扣帽子、打军棍，实为极大讽刺！

打断了三四根杆子，没“哼”一声，他们是硬汉。打完，送到诊疗所上了药，送出铁丝网。

我去诊疗所找老田，问他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一见我便气愤地说：“我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假使人家不退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老田是在诊疗所当翻译，他不是帮哪个人，或哪一派，他是为大家做事。我说：

“他们怎么会一个个被抓到大礼堂去？”

“那一撮人通知他们开会，他们都去了。”

“要是他们企图杀人，必定心虚，怎么敢去？”

“谁杀人？他们太善良了，相信那一撮人，才会上当。”老田忿忿地说。

从此以后，第二联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牢狱，伙伴们彼此不能自由地说话，自由地交往，每人内心好像被一层层无形的铁丝网裹得紧紧的，大家只得忍着，等待自由回台湾。

我敬重退出管理权的伙伴，他们深明大义，无私无我，真正为大家争自由。而那撮人，他们反共为了什么？在战俘营内除了自由外，有什么权可争、利可夺？做官？可耻！

这事件过后不到三四个月，那年的7月底，板门店停战协定签订了，韩战结束了，谢天谢地，也结束了第二联队伙伴们的恐怖噩梦。

（摘自《韩战生死恋》第7-8页）

四、台湾当局对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声援活动

一万四千“不愿回大陆”中国战俘到达济州岛后，台湾当局立即准备从人员到物资给予援助，却由于美军当局的排斥而无法到达战俘营，只有少数给少年班上课的教员及课本为美军所接受。直到1953年7月美军和中朝方签了停战协议，“反共志愿军战俘”赴台之路实际上开通，台湾才得到较多的参与机会。台湾当局非常珍视这个机会，力争在最后阶段多给反共志愿军战俘一些声援和支持。但即便到了这时，由于美军的限制，台湾的努力还是被打折扣。台湾各界曾发起多次捐献活动，汇集了大批食物衣物等生活用品试图送交给反共志愿军战俘。但这些要求多次被美军回绝。直



台湾当局送到战俘营的慰问品



本书作者高延赛在韩国志愿军战俘营遗址参观



本书作者张泽石与战友钟骏骅在观看韩国济洲岛机场
(原为志愿军战俘营)

到 1953 年 8 月下旬，台湾当局才获准向反共志愿军战俘运送慰问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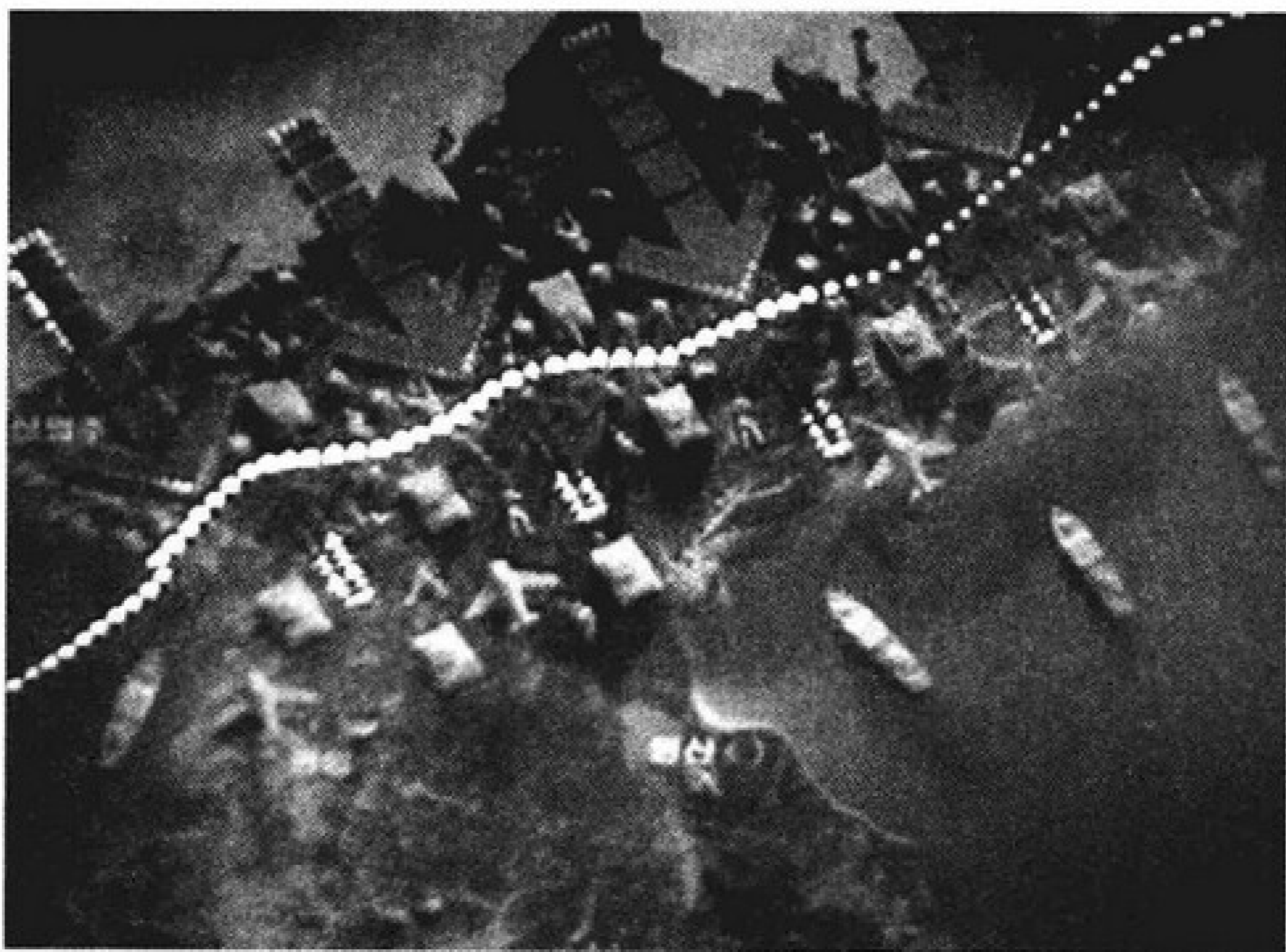
台湾空军运输机在济州岛机场降落前有意绕飞到战俘营上空，展露青天白日图徽向战俘们致意。引起那些渴望去台湾的战俘们欢呼哭泣。台湾慰问团也陆续来到战俘营。一开始美军当局不允许他们进入营区内。慰问团代表只能站在外面隔着铁丝网对战俘们“宣慰”。后经他们反复争取，由方治（时任“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秘书长）率领的慰问团才被允许进入营区内。这是台湾当局代表首次获得机会当面会见反共志愿军战俘。

1953 年 9 月中旬开始，美军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陆续将这一万四千中国战俘押送到板门店中立区，移交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军队负责看管的战俘营场，从而结束了他们在济州岛长达 15 个月的痛苦岁月。

第六章

进中立区

(1953年9月—12月)



巨济岛战争博物馆有关朝鲜战争三维演示图像

一、“中立国和中立区战俘营场的设立”

1952年5月因战俘甄别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板门店停战谈判实际上陷于破裂，战争双方再次回到战场上去厮杀较量。美军企图以其强大火力向北突破志愿军防线，志愿军则“修筑‘坑道长城’、固守反击、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最典型的战役是“上甘岭战役”。从1952年10月14日开始，美方出动六万兵力，前后43天，双方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展开了上百次的激烈争夺。美军向阵地倾泄了上百万枚炸弹、炮弹。据战地记者报道：

“山头几乎被削平了两米，山上的石头被轰击成为一米厚的粉末，走在高地上就像踩在土堆上一样，松土没膝。整个高地不要说树木光了，就连草茎也找不到。”

这次战役结果是，志愿军凭借坚固的坑道工事最终守住了阵地，但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特别是从后方冒着轰炸向阵地运送粮食、弹药的后勤部队。美方付出的



志愿军运输部队依托夜色顽强向前方运输物资弹药



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群



停战谈判时的板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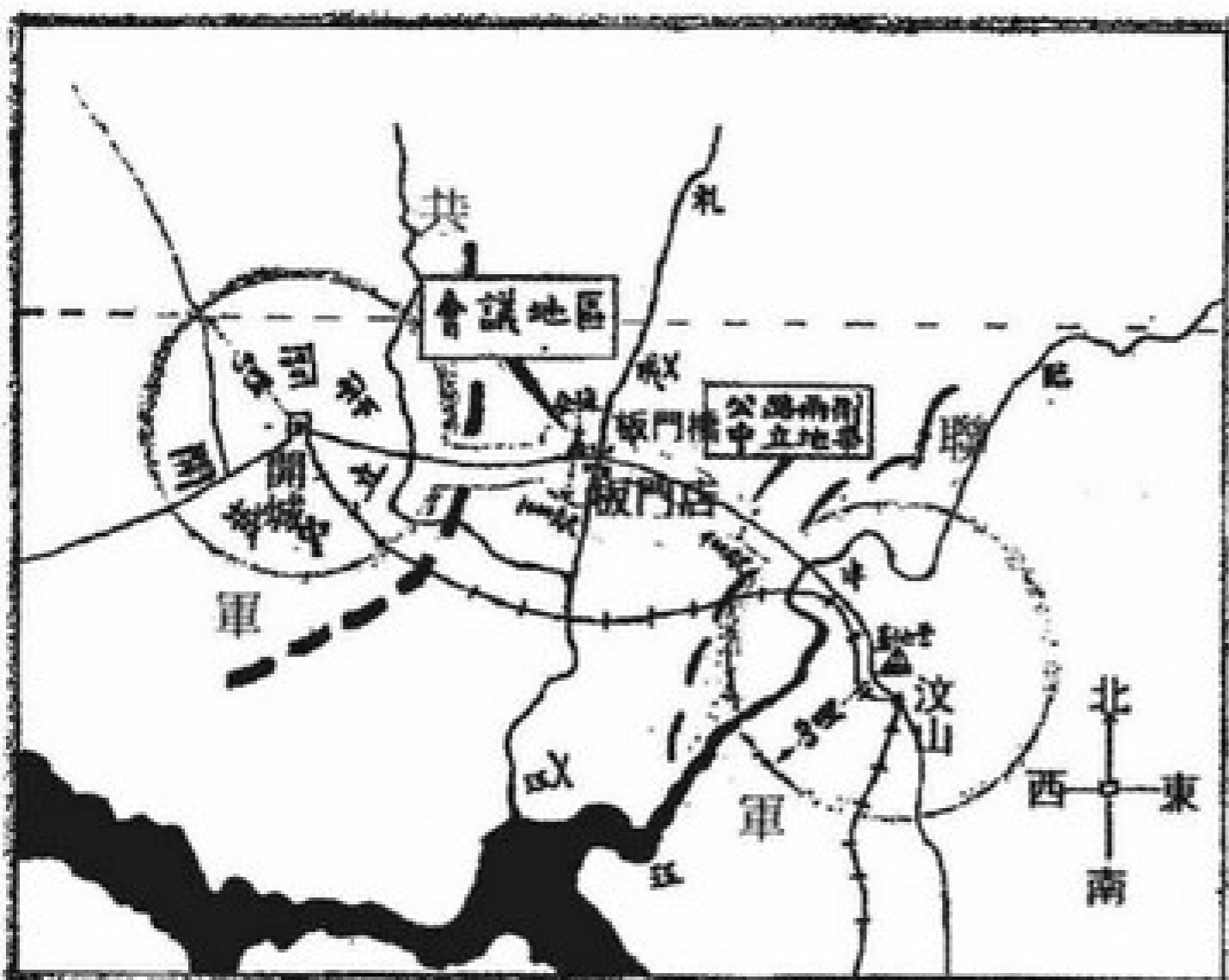
在停战谈判现场的志愿军代表柴成文（左一）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金日成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停战谈判时划定的中立区示意图

代价是近六千人伤亡、27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经过这样的战役，战争双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战胜对方。

1953年1月，美国总统换届，艾森豪威尔换下了杜鲁门。同年2月，美军司令克拉克提出先期交换伤病战俘建议。同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对阵双方的政策随政府人事更动出现松动。

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清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双方要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未遣返的战俘转交给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声明并提出：“这一提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美国所说的有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朝鲜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在停战后转交给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

同年4月6日停战谈判恢复，并达成当月20日开始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从4月20日到5月3日，1030名志愿军伤病战俘通过板门店被遣送回来。当那些躺在担架上或拄着拐杖的战俘们抵达写有“祖国怀抱”字样的牌楼下，跟迎接他们的祖国亲人相拥而泣时，那种人间少见的悲痛情景让在场的美军士兵也为之动容。

1953年6月8日，双方终于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重点是对“拒绝遣返战俘”进行个别解释，并且签订了与之相关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即“拒绝遣返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9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90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級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又未经

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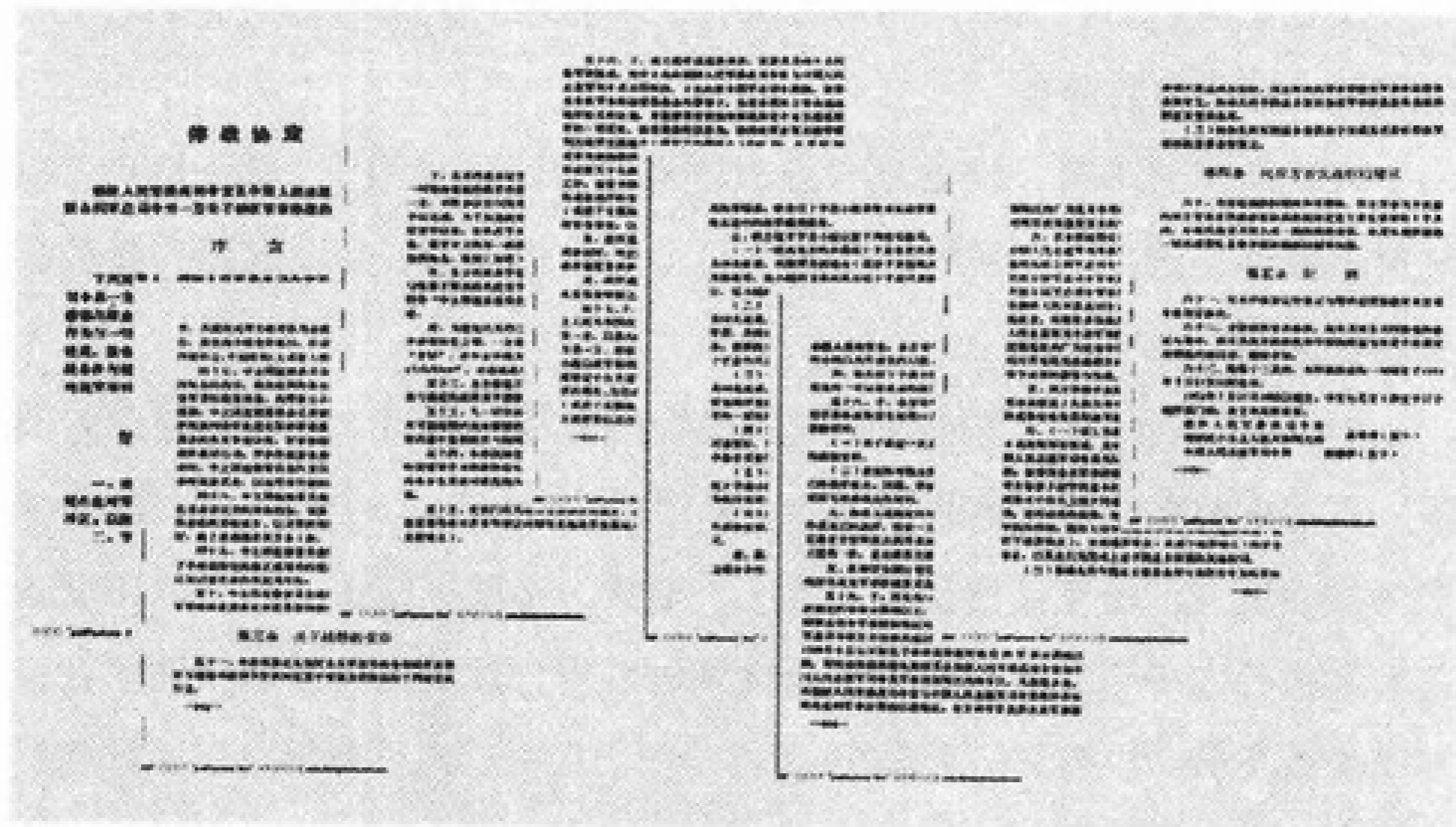
双方随后又议定由美方在板门店中立区修建战俘营场，用以接收朝中方面数万名“拒绝遣返战俘”，该营场将交由印度军队管辖，作为朝中方面派出的代表对战俘们进行解释与再次甄别的场所。

1953年7月24日双方最后一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并确定停战后双方军队同时从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从而划定了“中立区”（亦称“非军事区”）范围。即一条割裂开南北朝鲜的、从东海岸至西海岸宽四公里的隔离带。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结束了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

二、停战后双方执行有关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

《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的第三条内容如下：



附录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第一卷中译本里的《停战协定》共计20面，关于战俘部分占6面

第三条 关于战俘的安排

五十一、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的释放与遣返须按照本停战协定签字前双方所协议的下列规定执行之。

子、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六十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时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碍。遣返应依照本条的各项有关规定予以完成。为了加速此等人员的遣返过程，各方应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前，交换应予直接遣返的人员的按国籍分类的总数。送交对方的每一批战俘应附带按国籍编制的名单，其中包括姓名、级别（如有）和拘留编号或军号。

丑、各方应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按照本停战协定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各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五十二、各方保证不将任何因本停战协定之生效而被释放与遣返的战俘用于朝鲜冲突中的战争行动。

五十三、凡一切坚持遣返的病伤战俘须予优先遣返。在可能范围内应有被俘的医务人员与病伤战俘同时遣返，以便在途中提供医疗与照顾。

五十四、本停战协定第五十一款子项所规定的全部战俘的遣返须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六十天的期限内完成。在此期限内各方负责在可能范围内尽早完成其收容下的上述战俘的遣返。

五十五、定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必要时战俘遣返委员会可在非军事区内增设其他战俘交接地点（或若干



1953年5月在板门店举行伤病战俘交换仪式时的回归门

交接地点)。

停战后，双方交换“直接遣返战俘”（即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的地点仍设在板门店，从1953年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朝中方面向对方遣送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朝鲜籍战俘7848名，共计12760名。朝中方面从对方接收的朝鲜人民军战俘70159名，志愿军战俘5640名，共计75799名。

在志愿军归俘中，有战俘营爱国反美斗争中的138位领导和骨干，曾经被美军当作人质关押在济州岛“战犯营场”一直不予遣返，经过我方代表长达21天的严正交涉，美方才在最后一天遣送回来。他们之中有志愿军被俘人员级别最高的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中共战俘营地下党总委会领导人赵佐端、魏林、顾则圣、马兴旺等，有参加杜德事件后被长期监禁在巨济岛的志愿军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

在遣返战俘的那些日子里，在“祖国怀抱”牌楼前那片土地上不知洒落了多少被俘归来人员的泪水！

自9月10日开始，双方分别在板门店附近中立区的东场里营场和松谷里营场，按照协议将“不直接遣返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并随之从10月15日起进行解释工作。

三、在中立区的战俘们

志愿军战俘如何进入中立区，在中立区有怎样的遭遇，我们借台湾国民政府“驻韩大使”王东原的回忆作一个介绍。

因韩政府坚决拒绝印军登陆，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法执行其任务。联军为急求停战实现，乃再度与共军协议，将反共战俘全部送往中立区，接受共军之洗脑，并空运印军前往该处接管，以免与韩政府正面冲突。惟反共战俘均坚决不离营地，仍无法履行协定。于是美政府不得不求援于蒋总统，获得其同意支持，颁发训词，劝谕战俘与联军合作。又派宣慰团前往济州岛逐营宣慰，劝其前往中立区接受解说。

战俘聆训之余，无不感激涕零，声泪俱下。指导小组乃以下列各点，提示各营，要求联军之保证。于是中国战俘乃首肯前往中立区，接受共军之洗脑。

移动前中国反共战俘呈请联军统帅给予保证事项如下：

- (1) 抵中立区后，不得破坏各联队之行政编制；
- (2) 不被威胁绑架；
- (3) 得悬挂国旗；
- (4) 得收听广播与阅读书报；
- (5) 准许自由中国记者及红十字会人员前往视察；
- (6) 保证中立国不被共军利用。

联军统帅部均予以原则上之接受，惟求其首肯出发而已。

移动前，反共战俘为应付共军之洗脑，每日在营集议研商对策，并预想各种可能情况，日日举行演习，甚且对共军代表，预作反说服之准备。其意志之坚强，情绪之激昂，殊属可歌可泣。

九月八日移动开始，每日由海路输送二千名至仁川登陆，再由火车送往汶山转赴中立区交印军接收看管。输送期间，发动仁川华侨男女老幼，齐集码头迎送，全韩各地华侨亦均派代表参加致赠鲜花水果，并播送我以大使的身分代表总统所致训词与反共歌曲，义士闻之无不泣下。各营队均派代表与侨领一一含泪相见，再三致谢，并保证决不屈服。其辛酸场面，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

指导小组【按：见本书后文所述台湾国民政府专门设立的策动争取“反共义士”指导小组。】为应付情况之发展与适时指挥起见，即日由釜山移驻汉城，并于汶山设前进小组，由主要译员记者组成，以与中立区保持密切连络。一面发动台北加派记者来韩参加中立区工作，与扩大宣传，争取中立国代表。一面发动红十字会筹募寒衣，送往中立区分赠各营义士，同时指示各营行动之要点如下：(1) 肃清潜伏匪谍、(2) 强调坚决返回台湾、(3) 与韩籍反共义士团结一致行动、(4) 争取印度守军之好感。

九月六日印度监管军司令德拉少将发表致全体反共战俘函一件：称将以最高之热诚与友爱，给予最大的便利，并将以公正之态度，处理一切，保证战俘不受身体与精神上之虐待与侮辱。

共军知中国反共义士反共之信念甚坚，不能以解说达其牛皮攫取之目的，乃决施用阴谋，指控第二十八号收容所之中国义士在营中暗杀愿受遣返之战俘一人。十一月一日由共谋证人二人率领印兵前往该收容所搜查竟日，掘地深达六尺，终未发现尸首。翌日拂晓五时印兵一营又包围该收容所，迫令义士列队走出，由该证人指认凶手，义士不服，欲行抵抗，印兵开枪立毙一人，于是由共谋任意指认，共拘去嫌疑凶手七人，是日并宣布该收容所愿返铁幕者廿一人。

指导小组，自解说开始，即对各营义士提示：“一个信念——”坚强团结誓回台湾“；三大方针：——（1）与韩义士一致行动、（2）争取印军同情、（3）与联军合作；五项斗争：（1）反恐怖、（2）反分化、（3）反匪特、（4）反疲劳、（5）反拖延。以为其斗争准绳。同时鉴于严冬义士衣薄，发动红十字会募捐赠寒衣，并大量寄递慰问信，以提高义士之士气。

我方译员记者，既不能进入中立区，指导小组对各营之连络，仅有三条路线：（1）由驻在医院之译员传递、（2）借用韩方补给交通线、（3）直接运用韩方人员。此外，各营进入中立区时，先后运入无线电收音机二批，计第二联队二架，第一、三联队各三架，可以收听外界消息。于是与韩国当局洽妥，由韩国广播电台作华语广播。每周二次，每次十五分钟，藉以报告当前情势，并用暗语指示各营之行动。该项广播于义士回台后，改为反共人民之声，继续进行，以为对东北及华北之心战播音。

四、解释工作的事前准备情况

美军在1953年9月将一万四千名“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从济州

岛押运到中立区东场里营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后，大大地松了口气。他们总算放下了最后一个沉重包袱，因而得以正式从朝鲜战场脱身。至于这一万四千中国战俘未来的下场如何他们可以不去管了。美国政府其实很清楚：今后，对这些中国战俘的所谓“解释”、“再甄别”，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大陆跟台湾、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又一场政治争夺战。他们将站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当然也不妨暗中助台湾一臂之力。

为了取胜这场政治争夺战，海峡两岸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准备。

1. 大陆中共方面的准备

志愿军总部自1953年5月即在其“停战谈判代表团”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解释代表团”，任命68军军政委李呈瑞、38军参谋长李际泰担任解释代表团正副团长。“解释代表团”团部的直属机构有秘书组（组长齐鲁）、调查组（组长叶修直）、宣传组（组长李慎之）、方案组（组长符浩）；同时又从各部队精选出数十名师、团级政工干部前来参与具体的解释工作。这些“解释代表”们分别组成四个大组。第一大组即有“解释代表”25名，大组长为65军193师师政委贺明。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万四千名“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指战员的情况，还特意留下已遣返回来的原战俘营中共地下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赵佐端、郭兆林、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张城垣、张泽石、唐耀、张继良、钟骏骅等27人参加代表团工作。

“解释代表团”经过调查研究，对这1.4万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分类情况做出了如下的估计：

1. 可能有三千人坚决要去台湾。这些人大多是做了许多坏事的反共骨干分子，有小队长以上的头头、警备队员、政治教员、情报员及剧社演员等。这些人现在掌握着战俘营里的实权。其中一些亡命之徒，心毒手狠，抱着“一不做，二不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的态度，拼命地控制

战俘，以图到台湾邀功请赏，升官发财；

2. 动摇不定的有八千人左右，他们对回国有疑虑。一是前途问题，认为被俘是可耻的，会终生被人看不起，悲观失望；二是对宽大政策有怀疑，自己身上刺了字，写过“去台湾决心书”，按了血手印，污辱了党和领袖，虽是被迫的，回国后真能得到共产党的宽恕吗？这些人抱着等着瞧的态度；

3. 还有三千来人是真心想回国的，他们对到台湾有顾虑，更渴望早日回家照顾父母妻儿，他们盼望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挣脱暴力控制实现自己愿望。

基于上述分析认识，“解释代表团”决定采取集体解释和个别解释相结合的方针以尽力打消大多数被俘人员思想顾虑：集体解释可通过广播，反复播送关于“既往不咎”的《四六声明》（即1952年4月6日朝中方面为争取朝中战俘回国在巨济岛甄别之前发表的《告战俘书》）；个别解释则是在单独面对面条件下针对具体人的具体问题做好消除疑虑的工作。而“解释代表团”更认识到要贯彻这个方针最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除铁杆反共战俘对战俘们的暴力控制，才能确保解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于是停战委员会的朝中代表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了有关隔离战俘营内铁杆反共战俘首领的《备忘录》。我们在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于解释工作结束后所公布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临时报告》档案中，见到如下记载：

1953.9.10-9.24 移交完全部联合国军统帅部手中的朝中拒绝遣返战俘 22604 名，9月24日当天从共方手中接收联合国军拒绝遣返的战俘 359 名。委员会发现一项事实，即联合国军统帅部移交给委员会监管的战俘是经过良好组织的。此等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反抗遣返，并阻止希望遣返的战俘实施此种权利。为达到此目的，一部分战俘以暴力施加于另一部分战俘。其结果是，任何战俘如希望遣返，就必须秘密做此要求，且自恐性命不保。委员会不能说明，这些战俘是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在一个明确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他们是在如上所述的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中移交给委员会的，确为判明之事……

朝中方面力主隔离特务分子与反共首领，消除其影响以确保每个战俘免于遭受暴力的威吓能够自由选择遣返。1953年9月17日再次在其《备忘录》中提出强烈要求……

在1953年9月20日的第九次委员会会议上，捷克委员提出建议：要求立即采取步骤解散战俘营中现有组织，以孤立特务分子和反共首领，并将他们予以隔离……

1953年9月21日委员会举行了第十次会议，对上次会议中捷克委员的建议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讨论中，波兰、捷克委员力言：战俘营内的组织及领导本质上是具有恐怖性质者，其整个目在于胁迫战俘不得实行其遣返的权利。委员会不能承认此等组织及其领导。因为他们是在移交给委员会监管之前所建立，除非解散此等组织并取消其领导者，否则即无法确保完成规定任务……

讨论中，瑞士、瑞典委员认为：战俘在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下到达乃是一种事实。根据日内瓦公约的一般精神，战俘们应当获准继续留在其有组织的团体内。然而关于处罚行为不当分子一点，监管军司令应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以预防并制止暴力行为，惩罚经证明从事此等行为之分子。在此一期间内，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战俘。在进行解释期间，战俘将可获得机会，自由表达其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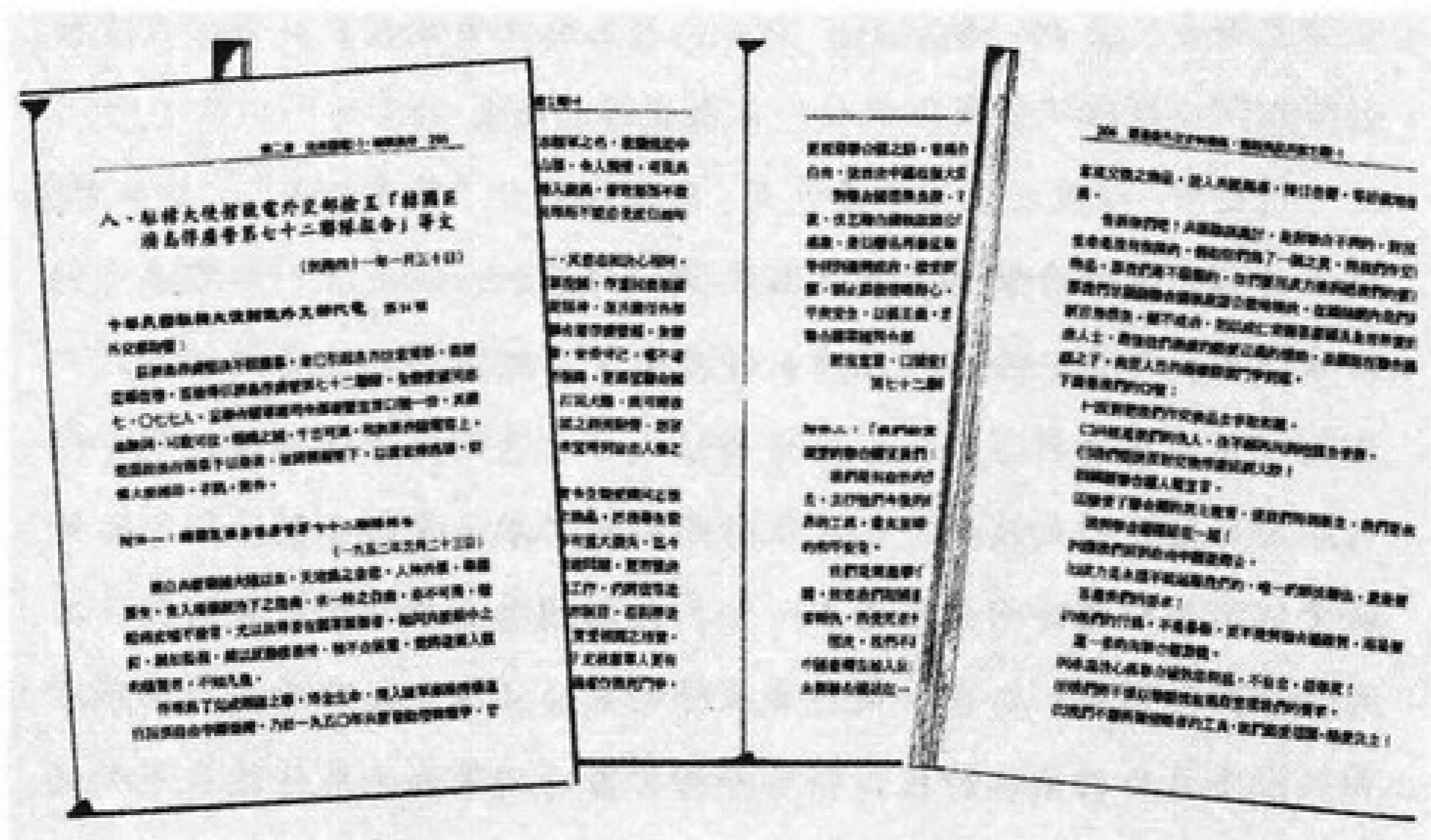
讨论中，印度代表团的意见是：隔离和移开“特务分子”、“肇事者”及其首领，虽然合宜甚至是必需之举，却感到在促成此一非常适宜的结果方面，确有一些实际困难，印度监管军指挥下的力量尚不足以一方面确保战俘的监管，同时应付战俘或其首领们对于任何改组战俘营行动所可能发动的反抗。何况战俘们的活动单位是极小的小组，可以避免任何改组程序而依然存在……，在判明特务的秘密人员方面，亦有进一步的困难……，一俟完成战俘的监管任务后，监管实力有所增加，在委员会的第二阶段，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每个战俘能在不受任何组织威胁下自由做出决定……

最后，捷克委员的建议在交付表决时未能通过！

事后来观察，捷克委员关于改组战俘营、隔离反共战俘首领的建议确属切中要害，但实施难度极大，印度代表团的意见还是较为切合实际的。然而印度监管部队关于“在正式解释工作开始后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每个战俘能在不受任何组织威胁下自由做出决定”的承诺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未能实现。

2. 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准备

1952年2月巨济岛第72战俘营反共战俘首领曾经向视察该营场的美军李奇微上将奉上要求去台湾参加反共抗俄的七千人“请愿书”；同年4月台湾驻韩大使王东原又将釜山数百名中国战俘表示效忠蒋介石的“血书”转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同年5月美军对全部朝中战俘实施“志愿遣返甄别”结束后出现了中国战俘三分之二“不愿回大陆”的结果，蒋介石大喜过望！当即命令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当时称总政治部无误，惟后来改称



1952年1月30日台湾驻韩大使馆致电台北“外交部”呈送巨济岛第72战俘营战俘要求去台的报告及宣言和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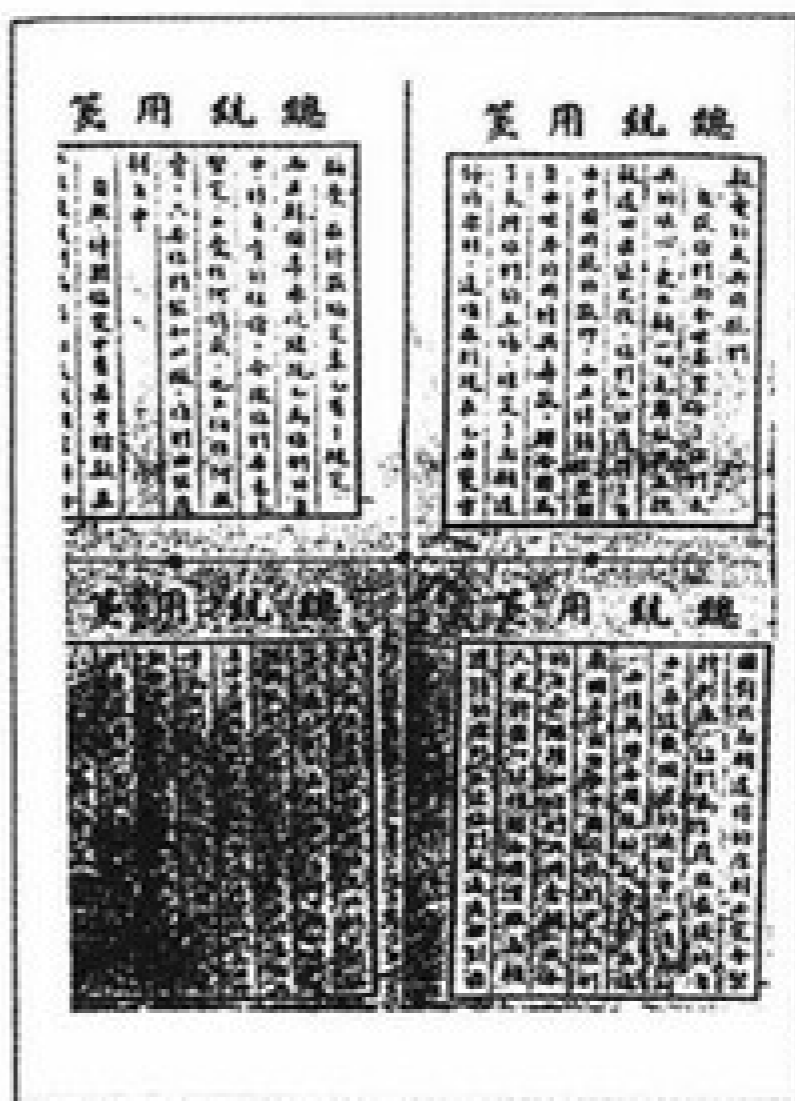
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亲自负责,以国防部第二厅为主,包括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及驻韩大使馆等部门负责人共同成立一个专属组织,从速开展争取一万四千名“不愿回大陆”中国战俘来台的活动。

1953年6月8日,板门店停战谈判达成了将“不直接遣返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监管并进行“再甄别”的有关协议,台湾国民党方面立即加速全面推动争取这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的活动。

当年中方“解释代表团”第一大组组长贺明曾经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们当时向经过解释归来人员们所调查了解的情况(以及他们所作出的分析、判断)。贺明将军后来在《板门店谈判纪实》一书中发表了长篇文章《特殊任务—参加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工作纪实》。贺明将军此文是由他当年参加解释工作时所写日记整理而成,现谨就有关内容摘要于下。

1953年6月中旬,台湾首先是派出了特工人员“马老师”、“史老师”,以美军聘请的C.I.E.(平民教育部)学校教师身份,由美籍“教师”福特博士带领从东京飞抵济州岛,前往莫瑟浦的“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召集各大队的负责人进行破坏解释工作的演习和辅导。接着,又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了“普及演习”。福特博士对演习的要求是:“要控制好战俘,只许他们说一句‘我要去台湾’,对于中共解释代表,要尽量地谩骂,殴打,能打伤、打死更好。”

7月中旬,“C.I.E.”总头目美国人汉生又专程来到济州岛,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的秘密会议,进行了破坏解释工作的动员和部署。他说:“美国已经给你们争得了‘自愿遣返’的权利,你们将来见了中共解释人员,只要说‘我不回去’就算满足了联合国军的愿望。一个人也不



蒋介石告战俘书影印件

资料来源:四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国防部转交战俘士教育文告,原刊自国防部战俘士教育文告。

外交部情报司致電駐韓大使館關於訂購臺灣報紙供戰俘閱讀事

(民國四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外交部情报司代電

外領情二字第〇〇七六二號

韓大使館：

本年元月十六日第十一號代電暨附件均悉，關於戰俘閱報，此間報紙相當注意，除將附來剪報節譯發表新聞外，並將中央日報所載有關戰俘問題之剪報檢發，即希查收運用（元月十八日十九號代電附件所發新聞在內）。又聞聯軍戰俘營中訂有臺灣《新生報》供俘讀，是否該館可設法利用聯軍軍郵訂中央日報，平寄備用，並希查復。外交部情印。

一：據在戰俘營工作友人來函，盟總訂二百五十份《新生報》運用，

戰俘營中可讀到，但《中央日報》則無。

二：聯軍軍郵無平寄或航空之分，可省郵資不少。

1952年1月26日台北“外交部”情报司致电台湾驻韩“大使馆”为志愿军战俘订阅《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

附件一：臺灣春節聯合刊（民國四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韓亞濟南共匪八十名認罪上書萬國總理 願與我軍交還
書上刺「反共抗俄」四字 寧死不願再被匪囚

【中央社訊】韓亞濟南共匪八十名認罪上書萬國總理，願與我軍交還，書上刺「反共抗俄」四字，寧死不願再被匪囚。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

韓亞濟南共匪八十名認罪上書萬國總理，願與我軍交還，書上刺「反共抗俄」四字，寧死不願再被匪囚。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

韓亞濟南共匪八十名認罪上書萬國總理，願與我軍交還，書上刺「反共抗俄」四字，寧死不願再被匪囚。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

韓亞濟南共匪八十名認罪上書萬國總理，願與我軍交還，書上刺「反共抗俄」四字，寧死不願再被匪囚。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據悉：該匪首等八十名，係在濟南被俘，現已解韓，現已解韓。

軍校學生 X X X 等呈（附件一）

1952年1月27日台北春節聯合刊刊載的85名志愿军战俘要求去台的联名信

8月28日，又有一个叫方治的带了一个来自台湾的大型“慰问团”进入战俘营，发放了大量慰问品后，又公开进行了类似的反解释工作宣传鼓动。方治说：“第一是软办法，不报姓名，问不开口。第二是硬办法，去听解释时尽量打闹。第三不要怕。我们大概有30多个同胞，以‘记者’身份进入中立区，其中就有本慰问团的魏景蒙和江海东二人在场。”说着方治就把魏、江指给大家看，并说：“他们会帮助你们，那里还有美国兵做你们的后盾。”江海东则宣称：“你们到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如果不愿留在台湾，也可选择去中立国，悉听尊便，台湾方面对你们肯定宽大为怀。”

从我们近年来走访过的回来探亲和定居的志愿军战俘的讲述中还得知，当年为对付共方解释，莫瑟浦战俘营的反共头目们除了动员骨干们喝血酒宣誓忠于蒋总统外，还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刺字活动，以表示“誓死不回大陆”的决心。这次刺上的辱骂共产党的字数和国民党党徽、国旗更多更大，不止前胸后背，有的甚至刻上了额头！在被送往中立区营场前夕，更组织了严密的“连环保”，以极力阻止战俘们回国。

五、在解释帐篷内外的尖锐斗争

在贺明将军的《特殊任务——参加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工作纪实》一文中，对解释工作从正式开始到结束的情况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按照协议，解释工作于停战后的60天之后，即1953年9月27日开始进行。在此之前，已发生了多起朝中被俘人员在中立国接管过程中乘机提出要求遣返的事件，特别是在9月25日，在第31号营场（每个营场关押约500名战俘），又有65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突破严密控制，向印度看管部队表达了要求遣返的愿望；王旭同志就是在这一天归来的。由于他曾在第31号营场里担任代理副大队长和战俘代表兼翻译，向我们提供了叛徒特务们控制战俘的许多内情。这次事件引起叛徒特务们的恐慌，10月2日，他们组织了“反共示威游行”，给印度看管部队施加压力。

10月3日，28营场的叛徒特务用吊打、火烧、剜肉和在脑门上打进钉子等酷刑，将拒绝参加“示威游行”，坚决要求回国的张子龙迫害致死。与张在同一营场的尤学和及黄立超两同志先后于10月5日和10月7日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铁丝网逃出，被印军遣送回来。他们含着眼泪向我方接待人员诉说了这一悲剧的经过。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代表随即以真凭实据坚决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看管部队以负责的态度调查此事，并逮捕杀人凶手。印度看管部队于11月1日和2日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确认张子龙惨遭杀害案情属实，并逮捕了七名凶犯。在现场查案期间，该营场又有17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趁机摆脱了叛徒特务的控制，实现了返回祖国的愿望。

尽管解释工作受阻未能展开，朝中被俘人员已接二连三地不顾美、李、蒋特务的威吓，冒险逃出，被遣送回来。至10月中旬，越网归来的人数已达120余人。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一再催促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方在10月15日总算是将东场里的解释场地帐篷设备建好

并交付使用。这一天是我方的第一次解释工作，对象是31号营场的志愿军战俘。在美方策动特务组织的破坏干扰下，当天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有张明清等10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冲破障碍，消除疑虑，提出了返回祖国的遣返要求。

然而，解释工作在第二天就被敌方控制的特务组织的肆意破坏、捣乱而中断了。此后，在规定的90天解释期内，解释工作一再被打断，12月24日后，则完全停顿了。我方只进行了十天的解释工作，以致有85%以上的战俘未能听到我方的解释。即便如此，我解释代表团全体同志仍然坚守岗位，全力以赴地投入每次解释工作，一方面据理排除美、李、蒋特务在解释现场的破坏、捣乱与干扰，另一方面，坚持耐心仔细地向朝、中被俘人员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争他们打消种种疑虑和疑惧，返回祖国怀抱。10次解释工作，每次只能会见约250名战俘，而通常每次都有10数名至20余名我方被俘人员在听取解释后提出了遣返的要求，连同自己越网逃出特务控制申请遣返的，在中立国看管期间，总共有700名朝、中被俘人员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其中志愿军被俘人员有440人。

……

1953年11月7日，印度看管部队在一桶发酵粉中查获了一架收报机，上面标注有MFCO，陆军8239部队，第一广播和传单小组，军邮500，包装日期：1953年9月等字样。

12月3日印度看管部队继11月2日逮捕了杀害志愿军战俘张子龙的七名凶手后，又逮捕了在12日晚上杀害四名要求遣返的人民军战俘的17名凶手。

12月28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多数委员通过的“临时报告”和瑞士、瑞典委员的“个别报告”提交给停战缔约双方。该“临时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证明美方利用特务破坏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瑞士、瑞典委员的“个别报告”虽然企图为美方掩饰，但也不得不承认朝中被俘人员“处于特务恐怖组织的控制之下”。

基于朝中方面在三个月内只进行了10天解释工作的事实，1953年12月23日，朝鲜停战委员会中朝方面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要求补足“职权范围”协议中所规定的90天解释期限。同时，印度尼赫鲁总理在演说中也表示对战俘的解释期应予延长。

美方耍起了无赖。12月24日，他们片面中断了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但是战俘盼望返回祖国家园的心是关不住的。12月31日，印度看管部队对一个关押500名志愿军战俘的营场清点人数时，就有128名被俘人员乘此机会脱离特务控制要求遣返。

美方恼羞成怒，于1954年1月20日，向印度看管部队施加种种压力，开始强行扣留朝中战俘的行动，他们出动了大批陆军、宪兵和警察，并出动大批飞机助阵，还在战俘营至汶山公路两边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和铁丝网，由混在战俘中的美方特务押着战俘走出中立区的营场。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被押往浦项和群山的李承晚的新兵补充站，志愿军被俘人员则在美国海空军的“监护”下押运台湾，在这最后时刻，又有99名战俘在强迫离开中立区期间逃脱特务控制，回到我方。

六、选择的无奈、痛苦和艰难

当年印度看管部队司令官齐玛亚将军于1981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立的实验》，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我的印象中，北朝鲜战俘更加迷茫，恐惧和暴力。他们的纪律不是很好。他们容易被说服，容易动摇。整体来说他们比起中国人更加无知，而且他们的犯罪分子更强大。中国战俘比较有纪律，多一点理性。他们像迷失的被抛弃的小孩，而朝鲜人像狂热暴怒的小孩。他们所有的人，当你了解他们以后，都像是极度的可怜。

没有人被允许脱离战俘营组织的钢铁般的纪律，即便只是一刻。

1953年12月23日解释结束。90天中，10天用来解释，22000人

中的3500人（包括中朝，以及北方控制的拒绝遣返的联合国战俘）接受了解释。只有不到150人，或4%多一点的人选择遣返。这个数目远远小于从围场中逃跑出来的人数。

中国战俘营一个重要的领导突然跑来要我们送他回国。

一个逃跑出来的战俘报告D-28围场里面一个想要回国的战俘被殴打致死，据称他的心肝被挖出来，让全体战俘吃掉。这位证人指认出7个嫌疑犯，而且指出了15-16位证人。奇怪的是，所有这7位嫌疑犯都是战俘营领导，而所有的证人都选择遣返，我们把他们送交中立委员会。

1954年01月20日，印度管理军把21805名战俘移交回联合国（各方）。转移过程中，又有104人选择遣返或去中立国家。毫无疑问，假如有机会，会有更多的战俘选择遣返。这里面88人选择跟随我们的部队到中立国家。有两个来自北朝鲜的战俘营，其余86人来自中方战俘营。到达印度之后，美国大使馆明确地拒绝了这些战俘去美国的要求。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战俘又要求遣返。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回到了中国大陆。

让我们再来听一听当时从中立区拼命冲出营场由印度军队护送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梁光辉的叙述：

1953年9月初，一架台湾飞机降落在济州岛机场。为首的是一个国民党中将军官，在美军管理人员陪同下巡视了营场。特务中的头面人物王顺清之流集合全场人员，听中将讲话。他首先抬出蒋介石，说：“蒋总统对你们这些‘反共义士’非常看重，特派兄弟前来慰劳大家。蒋总统欢迎大家去台湾参加反共复国的大业。弟兄们去了台湾，愿从军、愿从学、愿从事其它职业，都悉听尊便。保证提供条件，满足要求。”还假惺惺地说：“你们不久就要到中立区去，共产党要骗你们回去，这关系你们一生前途，决不可回大陆去。你们若是回去了，共产党将会用‘三头政策’收拾你们。啥叫‘三头政策’呢？就是在中立区共产党人向你微笑点头；离开中立区就强迫你认罪低头；过了鸭绿江

就判你死罪杀头。”最后，他用“兄弟代表党国及本人再次向‘反共义士’们表示敬意”结束了他的讲话。还恐怕自己诱骗不力，份量太轻，又给大家放了一通蒋介石的讲话录音。最后宣布并展示他带来的慰劳品，分给每人蒋介石照片一张，印有青天白日的背心一件，军装一套，呢大衣一件。此外糖果两包，罐头两听，香烟一条。各营场还分别给了篮球、排球、扑克、书报、铜锣、铜钵、铜号、皮鼓等。面对这些物质引诱，我不屑一顾。我一心只想早日见到祖国亲人，结束这种苦难的日子。

送走这批人后，特务们加紧了去中立区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们要难友们订立连环保，一个人回了国，就要处死前后的保人。同时还强迫大家演习对我解释代表进行攻击、辱骂、殴打、伤害的方法。

1953年9月10日，我们被移送到中立区。表面上由印度等中立国部队接管，但内部的管理依旧，特务的控制更有增无减。解释工作开始那天，不让我们前去，而由大小俘虏官、特务叛徒们轮番冒名顶替去解释场地捣乱，致使解释工作无法进行。当时能逃出魔掌的人实在太少太少，像王旭、李金泉等难友，要不是利用他们大队代表和副大队长的身份，是很难见到我解释代表，更不用说申请表示回国意愿了。我这个挂了号的“不稳定份子”，根本见不到解释代表。

眼看解释工作快要结束，特务们兴高采烈盘算着去台湾的日程，我心急如焚。想：再不采取行动，就会永远回不去祖国了。我暗地同好友刘双桂商量，决心不顾一切寻找时机拼死跑出去。一天，刘双桂终于趁机跑了出去，特务对我的控制更加紧了，屎屎尿尿都有特务跟着，机会难找，但我仍决心拼死冲出去。

1953年12月1日，早上集合点名的时候，我趁特务不备朝大门猛跑，小队长发觉后，握着匕首紧追上来。为了惩治这家伙，我有意放慢脚步，让他临近时，顺手提着身披的大衣向他扑去，就势把他按倒在地，用修鞋的锥子刺进他腰上，并向难友们高呼：“快跑呀！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一时队伍乱了套，不少难友趁机纷纷向营场大门

冲去，这次冲出的难友共 109 人。后来听说这是不直接遣返人员要求回归的最多的一次（非直接遣返申请回国的共有 424 人，这次回归的占 25%）。

可能是回来的人多吧，解释工作代表团的人员前来迎接我们。当见到亲人时，我们都泣不成声，哭成泪人，欢迎的人们也热泪盈眶。住定后，我见到了曾在济州岛秘密组织我们坚持回国斗争的车学智营长，历尽苦难之后，我们在温暖的祖国怀抱中重逢，不禁失声痛哭。次日，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团长黄华亲自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向中外记者团控诉美蒋特务的滔天罪行。

（梁光辉口述、管同应整理。此文见《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

1953 年圣诞节前夕，三个月的解释期限届满。美军拒绝中方延长解释期的要求。解释营地的解释活动终止，进入最后 30 天的观察期。次年 1 月 20 日，观察期也将届满，按照协议本来应该在 1 月 23 日正式结束整个解释活动，由于继续“观察”已毫无意义，印度监管军乃提前两天正式释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愿军战俘。

至此，这场对志愿军战俘们的再次“志愿遣返甄别”的闹剧、悲剧落下帷幕。那些渴望回家跟亲人团聚的志愿军战俘们终于丧失了回归祖国大陆的最后机会！

于是，包括营级干部五人、连级干部三十多人、排级干部三百多人在内的一万四千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彻底转变。他们之中大多数是盼望回归的，这些志愿军指战员从此将远离他们的父母妻儿，背井离乡被送到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从未想到过的孤岛台湾。他们心灵所遭受的煎熬、痛苦和迷惘决非常人能够理解。几十年来，他们在孤岛台湾的生活和命运，始终是国人心中一个极大的谜团。五十多年后，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有生之年有幸回到自己的家乡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和亲人坟头那凄凄的青草……

第七章

踏上宝岛

(1954年1月)



1954年1月25日，美军15艘登陆艇将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运往台湾。

一、从“志愿军战俘”到“反共义士”

对所有从中立区印度军队管辖下的战俘营场走出来的志愿军战俘，1954年1月20日这一天都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按照停战协议，从当天起他们即“获得了自由”，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就从一名“军人”变成了一介“平民”，而按照美国和台湾的安排，他们又从一名“志愿军战俘”变成了一个身着国军军装的“反共义士”，他们的“居住地”也由中国大陆转变为台湾岛。

这一万余人身份发生蜕变的事，本来只牵涉到这些朝鲜战争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但在1954年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他们的这种变化被看作是从大陆投奔台湾、从“铁幕”投奔“自由世界”的英勇行为，是国



走出中立区的战俘



走出中立区的原“志愿军战俘”



台湾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黄国书（右四）、“驻韩大使”王东原（右三）、“大陆救灾会”秘书长方治在板门店迎接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对共产党的一次重大胜利。因而牵动了台湾当局的党、政、军、及社会各界，成为轰动全台湾的重大事件。为了把他们从韩国迎接到台湾，蒋介石关怀备至，蒋经国亲自指挥，整个过程准备充分、安排

周到、场面热烈、气氛惊人。

首先，国民党中央党部于1954年1月16日下午3点，召开了专门会议，制定了《欢迎由韩归国反共义士办法》：

《欢迎由韩归国反共义士办法》

一、本办法系配合有关单位之各项措施拟定。

二、欢迎地点为基隆码头及台北松山飞机场，欢迎对象：基隆码头为一般义士，飞机场为重伤患义士。

三、欢迎以左列方式分别进行。

甲、基隆码头

(一) 码头欢迎，分别在第四号、第十六号、第十七号、第十八号四个码头举行。

(二) 欢迎程序如次：

(1) 推派代表二十五人，分为五组，于每日上午七时，乘艇至港外登义士专轮代表各界向联军指挥官或船长致谢，并欢迎义士，暨与随船工作人员有关下船及欢迎事宜，代表等旋即同义士专轮靠岸。

(2) 船近码头时，乐队奏乐，燃放鞭炮，广播车播送“反共义士自由歌”，欢迎群众摇旗或鼓掌高呼口号（口号另定）。

(3) 船近码头时，义士依照原建制分别下船进入礼堂（仓库）。略事休息后，由各界举行欢迎会，欢迎之程序另定。

(4) 欢迎仪式完毕后，义士就原码头登火车南行，群众就原地举行欢迎。

乙、基隆火车站广场

(1) 为便利基隆民众欢迎起见，每日第一艘船由一号之码头靠岸时，即转赴火车站广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仪式另定）

(2) 义士与参加大会后，游行基隆主要街道，游行时以广播车前导沿街群众夹道欢迎。

(3) 义士车队经过街道，住户商店可燃放鞭炮，热烈欢迎。

丙、台北市

(一) 义士于基隆游行完毕后，原车开赴台北市。

(二) 台北市应发动中等以上学校男女同学——人组成自行车队迎接于中正东路总理铜像前，一俟义车队到达，即引导进入市区，环绕主要街道一周，路线见附表。

(三) 义士车队经过街道，住户、商店可燃放鞭炮表示欢迎。群众站立马路两旁欢迎。

(四) 车队到达总统府前，全体义士应下车排队欢呼致敬，再上车前进。

(五) 游行完毕，车队集合火车站转乘火车前往台中，各界就车站予以欢送。

丁、台北松山机场

(一) 重伤患义士专机抵达时，应发动各界前往欢迎。

(二) 欢迎单位除一般性者外，应由红十字会邀约医师工会及护士学校同学参加，以便办理临时医疗看护工作。

(三) 义士下机后，即接受各界欢迎（欢迎仪式另定）。

(四) 义士离开机场，转赴医院时应坐便利伤患之救护车。（欢迎时并应准备担架）

四、义士列车经过各县市时，各该县市应在车站予以欢迎。

五、义士列车抵达目的火车站时，所在地有关单位应举行盛大欢迎。

六、每日每次欢迎会之主持人，以本会常委单位轮流担任为原则。（轮值表另定之）

七、每日参加欢迎之群众，轮流发动为原则。（群众参加表另定）

八、为维护码头及机场次序，所有欢迎人员由会制发欢迎证，凭以进入码头和机场，该项欢迎证式样，先送基隆指挥所备查。

九、本办法所需经费其预算另定之。

十、本办法提经常委会通过后施行。

1954年1月20日这天，美军立即开始了运送中国战俘去台湾的行动。联军统帅部在出动大批陆军、宪兵和警察的同时，还出动了大批飞机、火炮、坦克，以防共方部队前来抢劫这些“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这天，由战俘营到“自由门”（即“中立区”出口）的公路两旁还布置了铁丝网和严密的岗哨，在出发前整理队列时，战俘营中的骨干分子和警备队员组成两行监视人墙，将行进中的战俘夹在中间，以防有人冲出队列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要求回国。这天，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泰勒、美国陆军部长斯蒂文森以及韩国参谋总长白善驿等都亲到现场监督。

同一天，台湾当局又一次召开会议，制定了进一步的宣传计划：



在板门店迎接中国战俘的台湾当局特派人员。据王东原介绍：自中立区至仁川港口，以卡车530辆担任陆路运送，自仁川港至台湾，以登陆艇15艘担任海上输送，共派遣军官81人、士兵20人来朝鲜接收迎领。

《讨论迎接反共义士宣传工作计划会议记录》

时间：民国四十三年元月二十日

地点：中央委员会第二会议室

出席人：谷正纲 程天放 沈昌焕 朱抚松 张炎元（易家馥代） 傅允英 张彼德 谈益民 徐脉平 吴南如（朱新民代王克忠） 上官业佑（郑森启代） 王钰 冯仲达 戴彭龄 许闻渊

主席：沈昌焕 记录：沈岳

甲、报告事项

一、主席报告（略）

二、谈益民同志补充报告。

乙、讨论决定事项

一、“迎接留韩反共义士归团宣传工作计划大纲”修正通过。

二、宣传项目内文字宣传项下：

(1) 各报编印特刊，撰发社论与特写，尽量采访与报道，并配登新闻片于反共义士返抵国门时，各报联合赠送报纸，每人一份，各杂志参照办理。

决定：由省新闻处负责办理。

(2) 各界援助反共义士委员会发表反共义士各种文告。

决定：由援助委员会办理。

(3) 反共义士及援助委员会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答谢联军及韩国政府书等。

决定：请行政院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办理。

(4) 前述各项文件，并由行政院新闻局及中央社译发英文稿。

(5) 编印反共义士忠勇奋斗投奔自由之事迹，汇编“我们投奔了自由”宣传专册，并译印英、日文本散发。

决定：由第四组会同有关单位处理。

三、宣传项目内艺术宣传项下：

(1) 反共义士一切活动由各制片厂分工合作联合拍制影片，印制大量拷贝，分送海内外放映。

决定：由农教、中制、台湾省制片厂组织拍片小组，会同办理。所需经费，除各厂原列之是项预算外，不足之数由政府补助，援助委员会垫付，各机关需要拷贝时自行备款洽购。

(2) 拍制新闻照片送海内外报刊刊登，并举行展览。

决定：由援助委员会主持。

(3) 将标语制成幻灯片送影院插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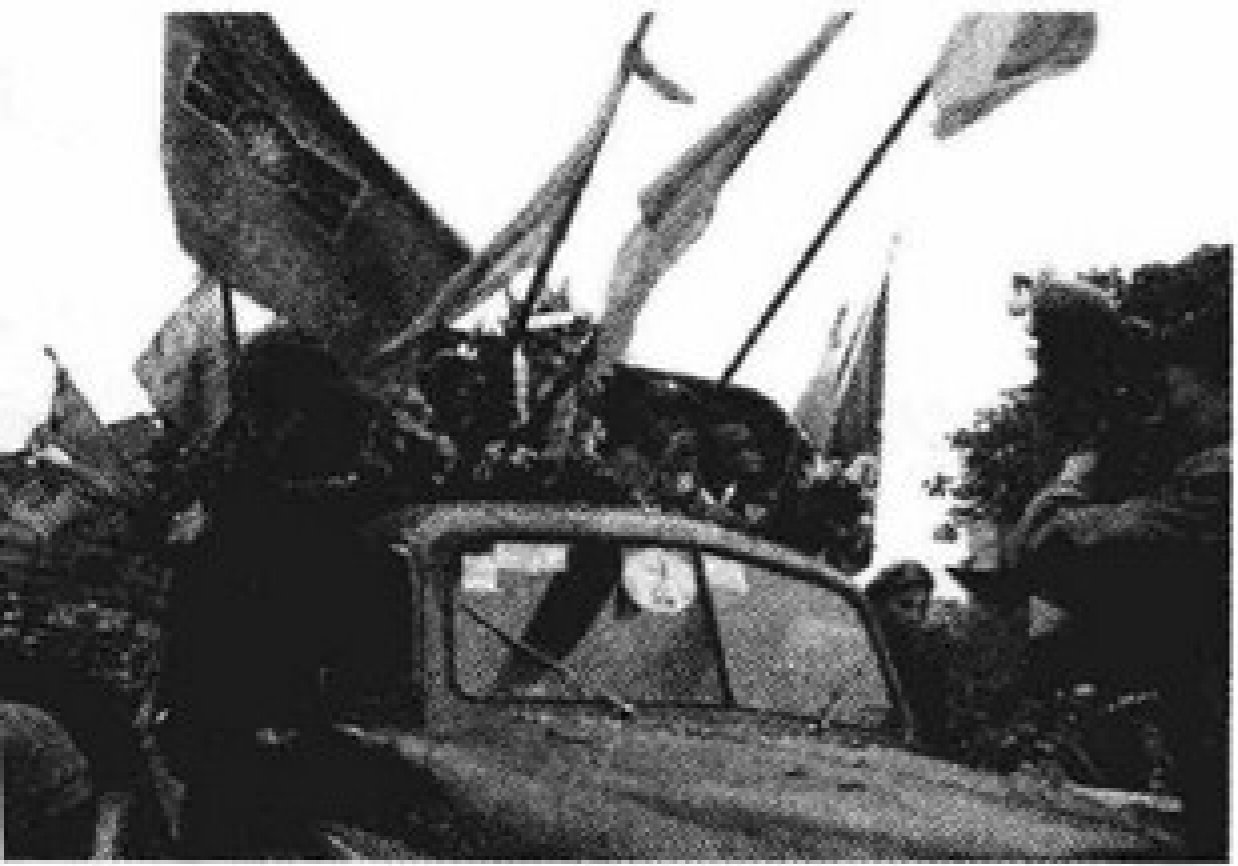


图 1-6 志愿军战俘走出中立区，坐上汽车，到达码头，挤上登陆艇，离开韩国，驶向台湾

决定：由援助委员会制成幻灯片，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转交各影院放映。

(4) 各电台对国内外加强广播，举行特别联播，并由义士向国内外广播。

决定：由援助委员会通知广播小组负责办理。

(5) 各机关学校部队编贴漫画壁报。

决定：由教育部、教育厅、国防部总政治部通知办理。

(6) 举行欢迎大会及各种游艺会与座谈会。

决定：由援助委员会及就业辅导处办理。

(7) 由文艺协会及青年写作协会尽量发动会员参加各种节目，发表文艺作品。

四、宣传项目内对大陆宣传项下：

(1) 空投各项宣传文件。

(2) 对大陆加强广播，并由义士对匪干作指名广播。

决定：均由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会同就业辅导处办理。

五、关于韩境瑞士及瑞典代表来台之接待问题：(一) 由外交部电驻韩大使询问代表姓名及人数；(二) 招待问题由行政院新闻局与招待此次随同反共义士来台之外籍记者一并办理。

六、由外交部电驻韩大使馆，查明由飞机运台之反共义士伤患人数及护送美军，飞机驾驶员等人数，以便准备招待事项。

七、欢迎归国反共义士标语修正通过。

八、欢迎归国反共义士口号修正通过。

1954年1月21日，台湾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有关新闻。《联合报》以大字标题登载消息如下：

中韩义士步出印度村高歌踏进自由门

【美联社板门店二十日电】挥旗高唱的中、韩义士，今天不顾共党的反对而开始自印军的监管下奔向自由。他们结成长长的大队自韩境非军事区的营房里经过两英里远的结有冰霜的大地，前往联军地区的接待站。中国籍义士于今日上午八时开始自他们的围场内向外移动。韩籍义士于九时开始行动，但印度卫兵使他们延搁一小时半，因为义士们拒绝以距离大的疏散队形出营，他们挤在一起，这种行动显然是为防

止有要求遣返的战俘脱离队伍。

据印度监管军的辛西准将说：共党在昨晚通夜以扩音器对战俘们广播。他说：“共党使我们整夜不能入眠。当战俘们听到共党广播时即大敲打他们的鼓，而形成一片闹哄哄。使我们不能合眼。”

他们透露印度人仍对愿意返回匪据大陆的任何人作最后的呼吁，但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中无一予以理睬。

【中央社板门店廿日专电】华籍及韩籍反共义士都不理拂晓前共匪发出要他们去共匪那边的最后呼吁，他们的叫喊声和歌声压盖了共匪的广播。共匪在广播中说：“回来，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回来，当印军今晨把门开放时，人人都掉向北方，冲向自由。”可是谁也不理这些话。

事实上，1954年1月20日当天，志愿军战俘在离开中立区营场时，共有99人最后奋力冲向印军警卫人员，被送回中共解释代表团驻地。

二、旅途中的风波

从韩国仁川到台湾基隆，他们挤在登陆艇上熬了一天一夜。途中并非一帆风顺。据赴台志愿军战俘赵英魁回忆：

战俘登上美军登陆艇后，犹如猛虎出笼，船上接二连三发生了几宗暴力报复事件。自从被俘之后，大家饱受美军、韩军、以及铁杆反共分子们的种种欺凌羞辱，



战俘赴台登上军舰



台湾当局“国防部长”郭奇嶠（右一）、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左）、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森（左二）、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右二）在台北车站欢迎



志愿军战俘抵达基隆港码头

暴力胁迫，强行刺字，强行押解台湾，战俘们敢怒不敢言。现在大家都是自由人了，平日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俘虏官们、警备队员们，人人自危！随行的台湾国军宪兵见状大为紧张，连忙设法将那些俘虏官、警备队员们隔离保护起来。等到秩序恢复，那些家伙又露出嚣张嘴脸，高声叫喊：“你们当中潜伏了许多‘匪谍’，就是这些坏分子躲藏在里头捣乱！”

（见《独家专访韩战老兵揭穿“一万四千‘反共义士’”骗局》

王丰撰稿，凤凰网 2010.0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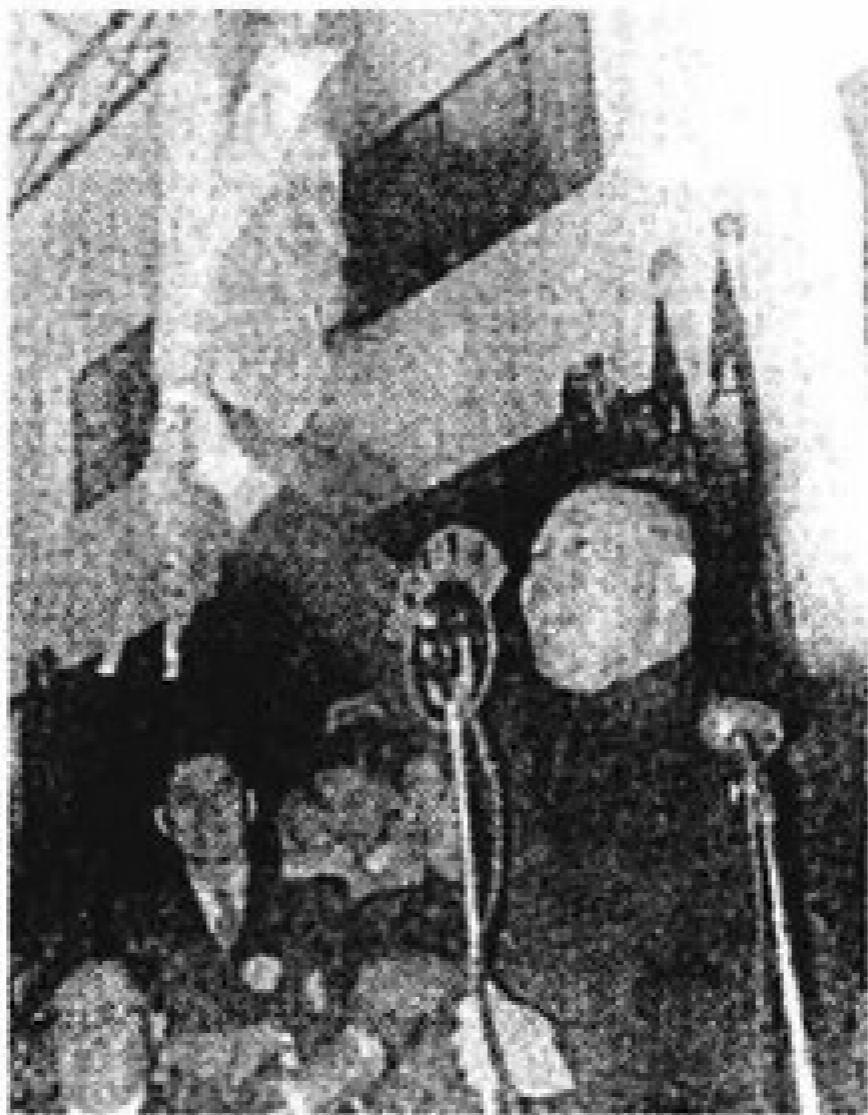
战俘冉宏图在回大陆定居后接受采访时诉说：

从韩国到台湾途中，有难友就跳了海！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我问他：“那当初为啥不回国？”他说：“我了解国内的情形，今天刺了一身字，没办法交待，只有死路一条，本想到台湾再说，现在看来也难过，我还是死了算了！”我劝他：“你别那样想，那不是个办法，我们先去台湾，活一天看一天，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形。”他没听进去，我没拉住他，他一纵身就跳海了！

（见《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凤凰网 2008.12.24）

三、隆重盛大的欢迎场面

1954年1月23日下午，志愿军战俘中的145名伤病战俘先期到达台北松山机场。随即送往荣民医院疗养。台湾当局为他们举行了欢迎集会，行政院长陈诚亲自到会致欢迎词。



蒋经国在基隆港欢迎会上

台湾随即将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设定为“一·二三自由日”，用来每年纪念“反共义士”回归“自由祖国”。

1954年1月24日，蒋介石就志愿军战俘到达台湾向全国发表文告，广播电台及各大报社进行了密集报道。

1月25日一大早，台湾基隆港岸上聚集了上万名欢迎人群，新布置的欢迎大会会场四周彩旗飘扬。当美军登陆艇陆续进入港口抵达码头，眼见一队队穿着国军军服的战俘挥舞着青天白日旗，拿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喊着反共口号从美军军舰上走了下来，整个港口沸腾了。欢迎场面极其隆重，前往码头迎接、慰问战俘的自蒋经国以下，有政府各单位首长、美军顾问团蔡斯团长、各国驻华使节团团长，及其他党政代表。在战俘们集结完毕后，“大陆救灾总会”理事长谷正纲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各界致欢迎



志愿军战俘伤兵乘坐飞机先期抵达台北



战俘乘坐登陆艇抵台



台北市街道的迎接战俘场面 (1~5)

词，“义士”代表则致词答谢自由祖国同胞的热诚欢迎。会后，战俘们分批登车，驶往台北林口的“义士村”。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人群。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部分车队专程路过总统府，那是当天整个欢迎程序的最高潮。



基隆港组织乐队欢迎志愿军战俘抵台



热闹之后的台北街头，清扫鞭炮屑

四、台籍战俘母子团聚的动人场景

台湾国防部负责接收战俘的有关人员从美军移交给他们的一万四千余名战俘卡片当中发现了两名台湾籍战俘。这让他们很兴奋，立即按照这些台湾籍战俘所登记的家庭地址进行调查，结果了解到家在台南县新营农村陈永华“义士”的老母竟然健在。他们便将老人接到台北林口去看望她的多年音讯全无的儿子。于是就有了刊登在各大报纸上的这张感人的照片。照片所表述的不是一般的亲人团聚，而是经历了生离死别战争劫难后的母子团聚。而这场亲人团聚又是在其他一万多志愿军战俘骨肉分离的背景上出现的，它就令众多也同样是离乡背井的百万国军军人及其家属唏嘘不已！

陈永华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应征加入国民党军队的。1946年9月，陈永华所在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坐军舰从台湾基隆出发被运到了秦皇岛补充到国军第62军。1947年2月他因伤被解放军所俘，一周后他逃回了自己的



在基隆码头召开的欢迎“反共义士”大会



陈永华与母亲相见

部队，但不久又再次被解放军俘虏，他便加入了解放军，接收他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的39军。于是，他跟随解放军从东北打到江南，又参加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解放台湾的战斗训练。就在他以为可以回到阔别三年的故乡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作为志愿军随部队赴朝参战，结果在汉城附近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甄别时他选择了“不去大陆”。又经过近两年的痛苦等待，才得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见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母亲。

五、来自琉球的志愿军战俘

值得一提的是，在到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中，还有五个人是没有经过“甄别”，也没有住过巨济岛、济州岛和中立区的战俘营，而是直接从琉球的美军监狱送去的。

他们就是文晓村等五个被美军长期关押在琉球美军监狱的“间谍嫌疑犯”。

1951年5月下旬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大批志愿军因战事失利被隔离在敌后，其中大部分陆续被联合国军搜山部队俘虏，少数躲进深山密林与敌周旋，或战死或病饿而死，仅有极少数坚持到1952年夏天，但仍未能逃脱被俘的命运。文晓村他们五人就是如此。不幸的是他们被俘后美军无法相信他们能度过那么严酷的“野人生活”，认定他们是志愿军派遣来的

间谍。因而文晓村他们在金浦机场战俘营接受审讯后，并未被送往釜山的战俘营，而是以“间谍嫌疑犯”罪名被送到琉球群岛的美军监狱中当了20个月的劳改犯人。那是一段更加痛苦难熬的囚徒生涯。文晓村在他的《自传》里，有如下描述。

关在琉球军监的，一共五个人，除了我和老丁、小杨是韩国同生共死的难友外，另有两位，也是五次战役中先后被俘的人员。

我们这五个 P.W. (Prisoner of War)，可能被视为特殊分子，不送到巨济岛的战俘营，而被关在韩国战区之外，美军远东军事基地琉球 (Okinawa) 的军监，显然是违背《日内瓦条约》的不法行为。

但是，被关在一间铁皮房子里，日夜有枪兵守卫，你又能向谁控诉呢？况且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想逃也逃不掉。唯一的办法，也许可以利用在营区内做工的当地居民，帮我们传一个信息给当地的报纸，把美军非法拘押战俘的行为揭发出来，以引起志愿军谈判代表的注意。可惜在严密的看管之下，没有成功。而只有等待韩战早日结束，双方交换战俘的到来。

我们这五个难友，都只有初中程度，英文报纸看不懂，英语广播



1942年在老家河南新安县的文晓村



文晓村与他的四名战友在“感训”结束后合影

听不懂。唯一获取外界消息的来源，便是当地的日文报纸。日文中央杂有大量的汉字，把汉字上下连起来，便不难了解其中的大意。我们就是利用每天出去做洗车清洁杂工时，趁卫兵不注意时，把一些日文报纸，偷偷带回房间内阅读。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韩战停火，再过几个月，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我们要求见指挥官。一位上校主管，找来一位会说华语的翻译，问我们是怎么知道停战和交换战俘的消息？我们的回答是，听广播。他们说，依照停战协议，你们可选择回中国、去台湾，或到其他中立国。并态度十分友好地一一询问我们的意愿。我们一致回答：回中国。

之后，我们又多次提出要求遣送回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但看管却更加严密了。有一段时间，整天关在铁皮房屋里，不让再到外面做洗车打扫之类的工作，警卫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时，一进门，便把收音机关掉，以免我们听到外界的消息。

再过几个月之后，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家（Go home）。我们抱着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后，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五位‘反共义士’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后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权”！美国式的“自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六、最全面的历史记录

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赖名汤曾奉命全权负责接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归国的任务。他事后对整个过程的报告：《接运一万四千反共义士归国记》。现摘录于下。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韩境中立国遣俘委员会终止解释工作。同日，联军统帅赫尔（Hull）上将宣布，将用一切便利，于一九五四年一月间，将华籍反共义士送往台湾。

有一天，周总长突然召我到他办公室，说是总统决定要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驻日联军统帅部交涉，将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接回台湾。骤听之下，颇感惶恐，因此前有关反共义士业务之联系，一向由外交部和国防部总政治部办理，突然要我去做，顿感无从下手；我当即表示，此事非常重要，总统要我去办亦深感荣幸，惟此一任务，论性质应归总政治部办理，似由总政治部派员去接运为宜。周总长认为我的见解很对，不过他表示这是总统的决定，他要我跟总政治部商量。当即去看总政治部蒋主任经国先生，他也说这是总统的决定，他并说我的英文好，交涉方便，我说张彝鼎副主任英文更好，他笑笑说还是我去好，并表示全力支持。我于是告诉他一定尽力去办，并问他，向联军统帅部办交涉，交涉些什么？如何交涉？蒋主任要我去外交部请教叶公超部长。当时的外交部是在目前的台湾银行总行办公，叶部长也表示并不清楚，他找一位司长拿来一大宗文件给我看，阅后略悉内容。叶部长要我尽快进行，希望我在两天之内出发，因为美方在催。我表示若一人去则立即可以成行，但我总要有些人去帮忙，要组成一个小组，则至少需时三日。他觉得我的意见很对，但愿我三天内一定启程，同时表示将先电我驻日大使董显光，嘱与美方联络。嗣即积极筹划，挑选人员，成立小组，召集人员分工，办好护照、经费等事项；晋见总统，并拜访美军顾问团及美国驻华大使，两天内完成行前一切手续。

因联军统帅部设在东京，接运留韩反共义士，大问题要在联军总部先解决，然后由他们转告驻韩美军办理。启程时，外交部人员告诉我，董显光大使已准备举行正式宴会，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有关将领，要为我宴会上介绍，望我能够当晚到达。于是我们乘坐的C46运输专机，经过冲绳加油后，由于东京羽田机场的天气不好，故降落在东京郊外一处美军基地。下机后冒大雨坐车一小时又三十分钟，进入东京市区，再由美军送我至董大使处，已近晚上八时，幸宴会尚未开始，宾客皆穿晚礼服，惟我穿着被雨水淋湿之军常服，颇窘，幸好有几位熟识的将军在场。我当即与联军统帅赫尔四星上将约定，翌晨拜访他的总部，望与其幕僚开会洽商接运反共战俘有关事宜。

次日，拜访赫尔上将后，当天下午参加了特别安排的幕僚会报，先说明韩战状况及战俘处理经过情形。我在会中提出接运华籍战俘的问题约为五点：（一）海上运输，应有兵舰掩护；（二）望派机担任空中掩护，以防共军拦截；（三）战俘离开俘虏营时，望给予足够的保暖服装，除身穿大衣等物外，每人军毯两条；（四）战俘从战俘营到码头上船之前的沿途运输、保护及饮食，希望有妥善的安排与充分的供应；（五）有关医疗的全部支持。联军统帅部参谋认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很合理，将请其上级决定；翌日，获知联军统帅部同意按我所提问题办理，并已电告驻韩美军第八军军长泰勒将军，嘱迅作准备，同时派机将我接往韩国。我抵东京后的第三天早上，美军即派C119运输机，将我们一行十余人全部载往汉城，王东原大使与美国军方代表在机场迎接。为办事联络方便，我要求住在美军第八军军部，他们完全同意，并拨给我办公房间、车辆、打字机等。

抵美军第八军军部之日，军长泰勒上将（Taylor）在其司令部前广场上主持一项阅兵典礼，对我表欢迎；他的旗台上，除联合国旗帜外，有美、英、澳、韩及其它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参加韩战的会员国国家的旗帜，仪队系由美、英、澳、韩及其它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队混合组成，典礼开始，先奏中华民国国歌，然后奏美国国歌，仪式庄

严隆重。我身为中华民国军官，受此礼遇，深感光荣；同时亦感到国家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我国此时仍为联合国一分子，回想当年发起筹组联合国时，我国为发起人之一，我位列五强，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虽因中共叛乱，但以时势之变，我国仍然受到友邦与国际社的尊重，我当时代表国家受此尊重，真是万分荣幸。尤其是我当时阶级仅为少将，泰勒已是四星上将，一少将接受代表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的大国上将的隆重欢迎，自是更觉殊荣！

我们住定之后，即分别拜访接洽，处理接运有关事务。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反共义士顺利接台湾，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反共义士回台湾，是令共产党最感丢脸的事，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中共和北韓的军队都可能老羞成怒，发动抢俘，也可能因此引起另一次战争。我提出些问题时，美方人员也表示值得顾虑。因此，我又与美第八军参谋长及有关人员商谈，假如北韓与中共发动抢俘，他们应如何事先计划，有所部署，策定应急措施。当反共义士离开战俘营时，车辆如何准备，队如何编成，行程如何排定，指挥、道路警戒与通信等问题如何解决；到达仁川之前如何选定休息地点以便整理东西，清点人数；上船后的组织，启航后的海上护航与空中掩护等，一切措施，均应预作详细计划。经过分别商谈后，他们深表赞同，立即分工进行有关作业。一切计划策定后，泰勒将军发出通知，约定举行一项联军释俘会议，邀请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释俘会议系在汉城郊外一个师的司令部举行，出席会议者数十人，包括美方将领，中华民国由我率的部分人员，韩国参谋总长白善驿所率有关人员。泰勒将军代表联合国主持会议，向我们提出释俘的计划纲要以及预备计划。简报约二十分钟完毕，泰勒又分别询问中华民国与韩国代表以及有关人员的意见，我觉得他的计划对我前两天所顾虑与他们提出商谈的问题均已包括在内，是一项相当完善的计划，我当即代表中华民国表示同意。韩国参谋总长亦无异议。因准备周详，如此一项重要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费时约十几分钟即告结束。于是开始

照计划执行；而美国即为此一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反共义士离开“义士村”走出大门之后，沿途一切运输、掩护、应变、安全等措施，由美军一位旅长洛逊上校（Col.Lomson）指挥，全部作业所包括的细节，叫做洛逊计划。这项计划仅仅运送中国反共义士卡车，即达五百六十辆。洛逊上校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美国军官。而包括装备（衣服、大衣、鞋、袜、军毯）、饮食、医疗、船舶调动等的后勤工作，则由联军后勤司令部负责，指挥官是一位少将，与我相处极好。此外，尚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与空军第五航空队，担任海上运输的安全掩护。

了解计划全部细节与执行情形的准备工作后，我即赴大使馆向王东原大使详细报告，并自拟电文，请转国内周总长转报总统请示。

在此同时，我觉得反共义士走出“义士村”大门之际，应该发布一项文件，也就是一篇宣言，这宣言应由反共义士的名义发布，以他们的口气，向全世界宣告，说明他们厌弃中共暴政，奔向自由，回归自由祖国的意愿，这篇宣言由我亲自起草，完稿后，我认为兹事体大，应请示政府决定，因请大使馆发国内转呈总统核定。翌日得覆，总统完全同意，无任何修改，于是印成油印稿，同时译成英文，待反共士出营时，当场向全球记者发布。随后自由世界各地报纸，均曾刊布此一反共大事的重要宣言。

我根据联军释俘计划，为实地了解反共义士出营后之路线安排及预想的各种情况，曾请美第八军派遣直升机与有关人员，陪同我赴义士们行经路线察看；若发现不妥之处，仍可商量改正，同时可以确定何处可以发动华侨欢迎，而那些地方又应有何种表示？察看后均分别与我大使馆、美军及韩国方面接洽办理。总之，此项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工作，困难在所难免，但幸参与此事者及有关方面，均能密切合作，故能奠定圆满达成任务的基础。

联军统帅部决定释俘作业在二十日开始执行，我即告王东原大使转告国内，准备接待。我于是日清晨坐直升机降落于“义士村”前草地；

其他接待工作人员则分别乘汽车前往“义士村”大门前照应。

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时零五分，在“义士村”（亦称印度营）等待了四个月的反共义士，第一批抵达自由门，自由门的彩牌上，飘扬着联合国、中华民国、大韩民国及美国的国旗，反共义士服装整齐，身背背包，走在队伍前面的高举大幅国旗，走在队伍中的则手挥小型国旗，我在门口同他们前面的领队握手，欢迎他们。同我在门口迎反共义士走出自由门者，尚有韩战停战委员会主持遣返工作的联合国代表布瑞安少将等。义士们出村后，即按规定上车，整个车队分段由车队的领队与宪兵护卫，向仁川方向出发。车队浩浩荡荡，非常雄伟壮观，而义士们于艰苦奋斗赢得自由之后的喜悦兴奋表情，尤其令人感动。车队在公路上前进时，附近民众都挤在大路两旁，热烈鼓掌，高呼欢迎口号。而我与美方计划主持人，仍在高度警觉之中，顾虑中共与北韩可能抢俘。当然，我们已有所准备，但总是希望没有意外发生。总算还好，从反共义士开始走出自由门到最后一人离开“义士村”，敌方并未采取任何骚扰行动，而有中国籍的反共义士，也按照每人自己的意愿，全部高兴地回台湾自由祖国，并无一人愿意滞留韩国。

反共义士的车队离“义士村”后数小时，抵达爱斯康城，此处距仁川十公里，为义士们上船以前的休息站，该处搭了很多帐篷，执行后勤作业人员准备好了热茶和咖啡；一月间，韩国温度低，许多地方且是白雪皑皑，义士们在此喝一杯热饮料，正可增加温暖，抵抗寒气，同时可以检查一番，看看还要准备些什么。临时有人生病则可在此处获得医疗照顾。我陪同联军统帅、美军第八军军长、后勤司令、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森（Stevenson）及美国驻韩大使等一行，同至爱斯康城，看义士们喝茶休息的情形，对接待安排的周到、义士们表现的良好，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

再转往仁川港，看义士登船情形；当日下午三时，第一批开始上船，随后依次登上十五艘中字型小登陆舰。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半，第

一艘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离开仁川，驶向自由中国，最后一艘则于是日下午启航。当义士们的车队进入仁川之际，成千上万的华侨，在码头两岸或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有的放鞭炮，有的敲锣鼓，还有各色各样的高跷队、舞狮队，场面万分感人。为解除义士们海上旅途寂寞，王昇将军率领的一批政工干校学生，分别派在各艘登陆舰上，举办康乐辅导工作，这是一项设计非常周到的安排。另外尚有部分生病不能坐船的反共义士，计一四五人，则商请美方派遣军用机，从汉城直接运送台湾，于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转入医院疗养，较船运者提前两天回到祖国。

中国籍的反共义士回到自由祖国台湾，系根据韩战停战协议的附件，与联合国的自由遣俘志愿遣俘原则。停战协议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第十一款载明：“……任何战俘凡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看管他们后的一百二十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为他们协议出任何其它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而民国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分钟过后，韩战中的战俘便开始成为平民；亦即一月二十三日凌晨第一秒钟开始，他们就恢复平民身份，这也就是“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印度籍的荷玛雅将军，因不愿得罪中共，又不敢擅自违背联合国处理战俘的原则，乃决定于战俘恢复平民身份的前两天，将战俘交还双方处理。亦即将二万二千名反共战俘交还联合国统帅部，而联军统帅赫尔将军，则坚决贯彻志愿遣俘原则，对二万二千名中韩反共战俘，于二十三日恢复平民身份后，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前往的地方，而且当遣返委员会提前两天将反共战俘交还联军统帅部时，统帅部亦提前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让他们前往他们愿意的地方；一万四千多名中国籍的反共战俘即选择了回到自由祖国的台湾复兴基地。

志愿遣俘原则是联合国的决策，联军统帅部只是此决策的执行人，执行完毕后，统帅部须向联合国有所交代。我是奉中华民国政府之命，

前往韩国接运一万四千多名反共义士的官方代表。所以当中韩反共义士分别按照志愿遣离之后，泰勒将军即与我们商量，决定在他的第八军司令部举行一项志愿遣俘交接仪式，由他代表联军统帅主持这项仪式。参加人员包括：代表联军统帅的泰勒上将、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森、美国驻韩大使、韩国首席代表参谋总长白善驿上将，我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身分参加。仪式开始，由联军统帅代表泰勒上将，在一份简略说明遣俘交接经过及人数的证书上签字，代表交接的一方在送接的一方韩国代表签字，签字毕，双方讲几句话。然后，泰勒与中国代表彼此在交接证书上签字，彼此也讲几句话。证书一式两份，交接双方各执一份。仪式完毕后，遣俘任务即告结束，当时各国来采访新闻的记者达数十人。

然后，我又留下处理一些善后问题，特别要向第八军军长泰勒与参与遣俘计划的有关负责人致谢；由于他们计划缜密，安排周到，致未发生任何不快之事，而能圆满达成任务。泰勒将军对此事理经过也表示很愉快，他曾请我到他的军部一小房子内晚餐，表示欢迎我。为感谢他的大力帮助与热诚招待我也在汉城一家中国饭馆回请他。

这次为欢迎反共义士归国，除由政府派遣我率领一个小组赴韩交涉接运外，全国各界也推派代表赴韩欢迎；代表全国各界欢迎义士的三个单位代表，包括立法院副院长黄国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大陆救灾总会理事长谷正纲、秘书长方治，不过他们都只能在码头上跟义士们见面，其它场合他们都无法参加。

当我在韩国一切事情处理完毕后，即乘我空军所派 C46 型机，从汉城飞返台北。飞机在松山机场降落后，总统官邸派了一名武官在机场等我，传总统之命，要我立即到士林官邸去见总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只好不回家，先往官邸晋见总统。进入官邸大门后，总统已在他的会客室等我。一月间台北的天气也相当冷，总统的小会客室壁炉中尚生着炭火。我入室后，先向总统一鞠躬，他要我在他旁边的沙发坐下，将交涉接运反共义士的经过提出报告。我于是即将交涉情形，

接运中的顾虑，实际经过情形，以及拟定与发布反共义士离开印度村之宣言等，……提出详细报告，总统一直面带笑容听我报告，频频点头，对我的各项措施表示满意。他说已经看过我以反共义士名义撰写的宣言，接着说：“很好！”

待载运反共义士的登陆舰进入基隆港时，我也匆匆地赶到基隆码头，一同迎接义士归国，国内各界，尤其是台湾北部的许多单位，几乎都有代表参加，而且许多单位是自动参加欢迎行列。基隆市民更是倾巢而出，码头两边，真是人山人海，这种热闹感人的盛大场面，只有抗战胜利大游行差堪比拟。我所站的欢迎行列，有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政府各单位首长、美军顾问团蔡斯团长、各国驻华使节团团团长、菲律宾驻华大使所率的各国使节，及其他党政代表等。我站在这个行列的后面，跟先下船的反共义士一一握手。义士们下船后，先在码头仓库休息、喝茶，接受各界慰劳。谷正纲先生在码头欢迎会上代表各界致欢迎词，义士代表相继致词答谢，感谢祖国同胞的热诚欢迎。嗣后，义士们又分批登车，向布置在台北林口的义士村前进。沿途所经，各要道街口，处处牌楼高耸，国旗飘扬，如同国家的大庆典一样。义士们人人面上堆满兴奋感激的表情，欢迎者同样鼓舞欢欣，好像迎接久别的亲人，迎接国家光明的前途，迎接革命战争胜利凯归的英雄；义士车队经过台北市区的时候，更是万人空巷，鞭炮喧天，鼓乐齐奏。

林口的义士村，是反共义士归国后暂时集中居住的家。在义士们归国之前，政府已临时成立一个辅导组织，这个组织由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先生负责，高魁元先生等帮助推动执行有关工作。而辅导工作的主要任务，则在先让反共义士的心情安定，然后逐步了解个别的志愿与才能，同时要注意有无共谋分子的渗透，最后再为他们进行适当工作的安排。

反共义士住定后，全国各界纷纷前往义士村慰劳和慰问；如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行政院长俞鸿钧、总统府参军长桂永清、

妇联总会总干事皮以书等，大部分由我陪同，先后前往慰问。此外，还有一些影歌星不断前往慰问。林口的义士村房舍，系临时新盖者，以物质条件所限，因陋就简之处甚多，每逢天雨，道路泥泞难走。但义士们吃得很好，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

至于战俘们是否真的如赖名汤所说“生活自由自在，精神十分愉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进行介绍。

第八章

加入国军

(1950年2月—1955年3月)



1955年11月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参加第二届“反共义士战斗团”运动大会获奖纪念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世界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更加尖锐，海峡两岸的相互敌视也更加严重。那时，大陆这边天天喊“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那边则时时不忘“反攻大陆”。当时既然有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都“投奔了自由世界”，台湾当局自然期待这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能积极加入国军参与“反共复国”大业。但这些志愿军战俘是否都真心反共、自愿来台？是否都愿意再去当兵参加“反攻大陆”的血腥厮杀？台湾领导人其实早已心知肚明。于是，我们看到台湾当局在动员社会各界给予战俘们以盛大慰问关怀的同时，又采取不少措施给予精神上的“激励”和思想上的“训导”，力求让战俘们尽早“融入”国军部队，而对其中的“顽固分子”则采取相应的特别措施，以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局所要求的目标。当然，要求战俘从军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台湾社会经济还在复苏之初，没有能力接纳这么多人就业；其二，战俘中可能有中共间谍潜伏，让一万多战俘进入社会也不利于监控。

一、被精神激励

1954年3月底，当战俘们在林口“义士村”里等待具体安排时，台湾几位主要领导人去看望了他们，召见“反共义士”代表120人，跟他们一一握手，还给每个人佩戴上“云麾勋章”、颁发了获奖证书。我们从



台湾《新生报》报道战俘有关消息

side 2000

watermark (unregistered)

watermark

曾受匪脅迫致感

義士三二九一八八

明宣誓誓脫離匪黨

【本報訊】自匪軍佔領之區，已有四千餘名義士，曾受匪脅迫，致感痛苦。現已宣誓脫離匪黨，誓死效忠國難。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本報訊】洗腦洗心，匪軍佔領之區，已有四千餘名義士，曾受匪脅迫，致感痛苦。現已宣誓脫離匪黨，誓死效忠國難。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被騙加入匪黨義士

後天舉行脫黨宣誓

【中央社訊】一千九百一十八人，曾受匪脅迫，加入匪黨。現已宣誓脫離匪黨，誓死效忠國難。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仍不失為忠貞

會經參加匪黨義士

紛紛自動聲明脫離

【本報訊】洗腦洗心，匪軍佔領之區，已有四千餘名義士，曾受匪脅迫，致感痛苦。現已宣誓脫離匪黨，誓死效忠國難。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台灣《中華日報》报道战俘有关消息

四千餘義士脫離匪黨匪團

定今舉行宣誓

蔣兼處長親臨各區主持監督

中外各界人士應速前來參觀

【本報訊】曾受匪脅迫，加入匪黨之義士，定於今日（十八日）上午八時，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台灣《民族魂》报道战俘有关消息

過去被迫參加匪黨義士

後天舉行宣誓

脫離共黨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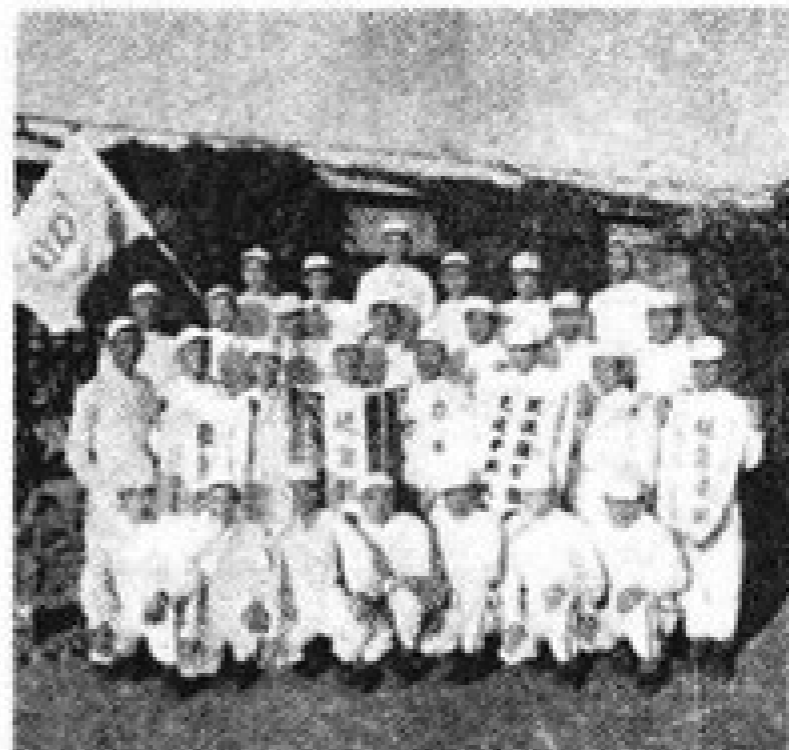
蔣經國將親往主持典禮

【本報訊】反共義士會中，曾受匪脅迫，加入匪黨之義士，定於後天（十九日）上午八時，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此項義士，係由各地各界人士，及軍中將士，共計三二九一八八人。定於十五日，在台北舉行宣誓典禮。屆時，將由蔣經國親臨主持。

台灣《聯合報》报道战俘有关消息



志愿军战俘进入“义士村”



参加当地运动会

已经解密的档案中见到了有关史料。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获奖者皆为战俘营里反共斗争中的领袖人物或有功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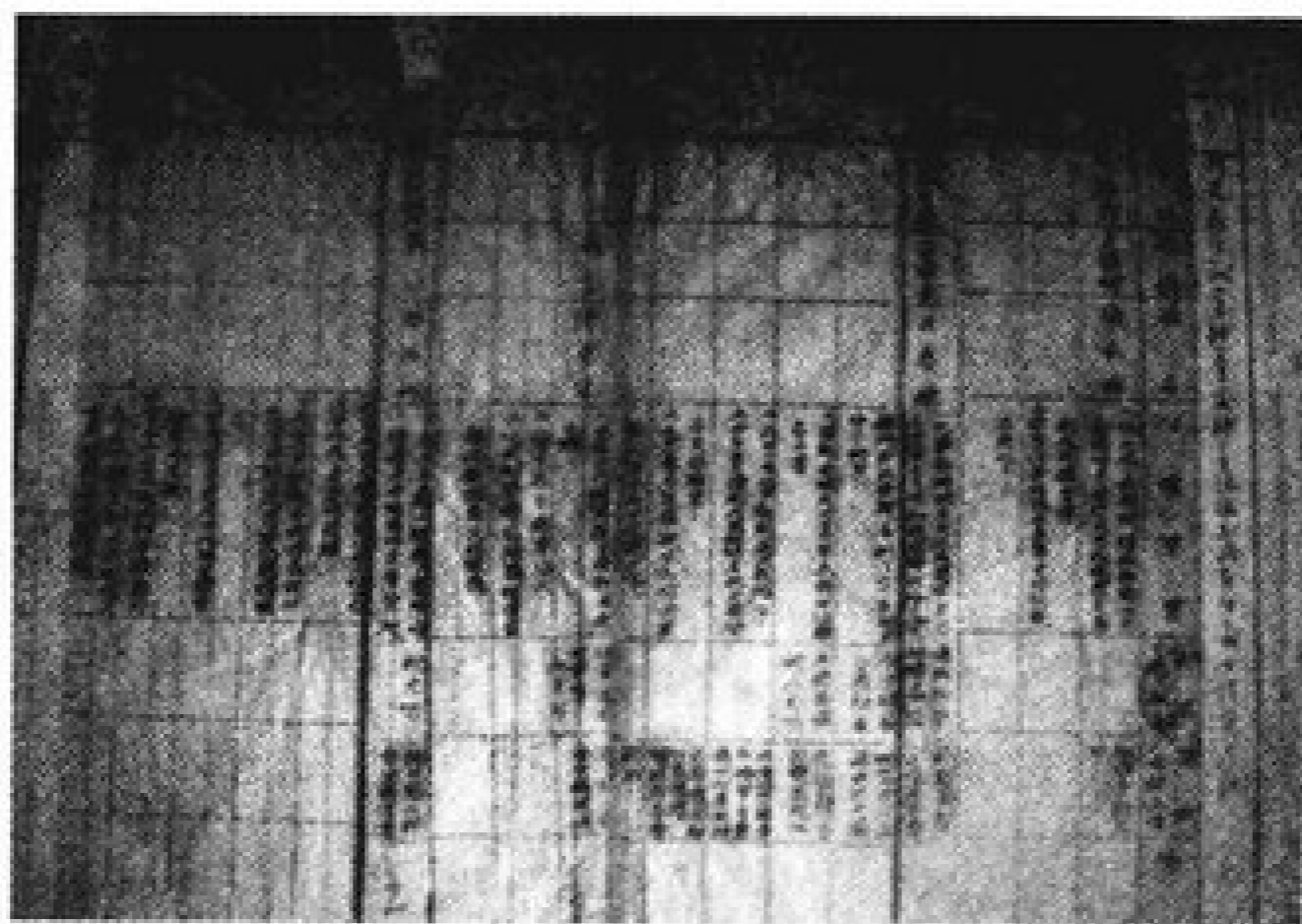
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训令

查义士×××同志由匪区冲破铁幕辗转韩国战场，历尽千辛万苦，只愿一义，甘冒生死危险与匪经年奋斗归返政府，怀抱矢志效忠总统，许身反共抗俄大业。其忠贞报国之精神殊堪嘉慰。经本处人事评议委员会评定著有功绩，除报请行政院授予奖励外特先令仰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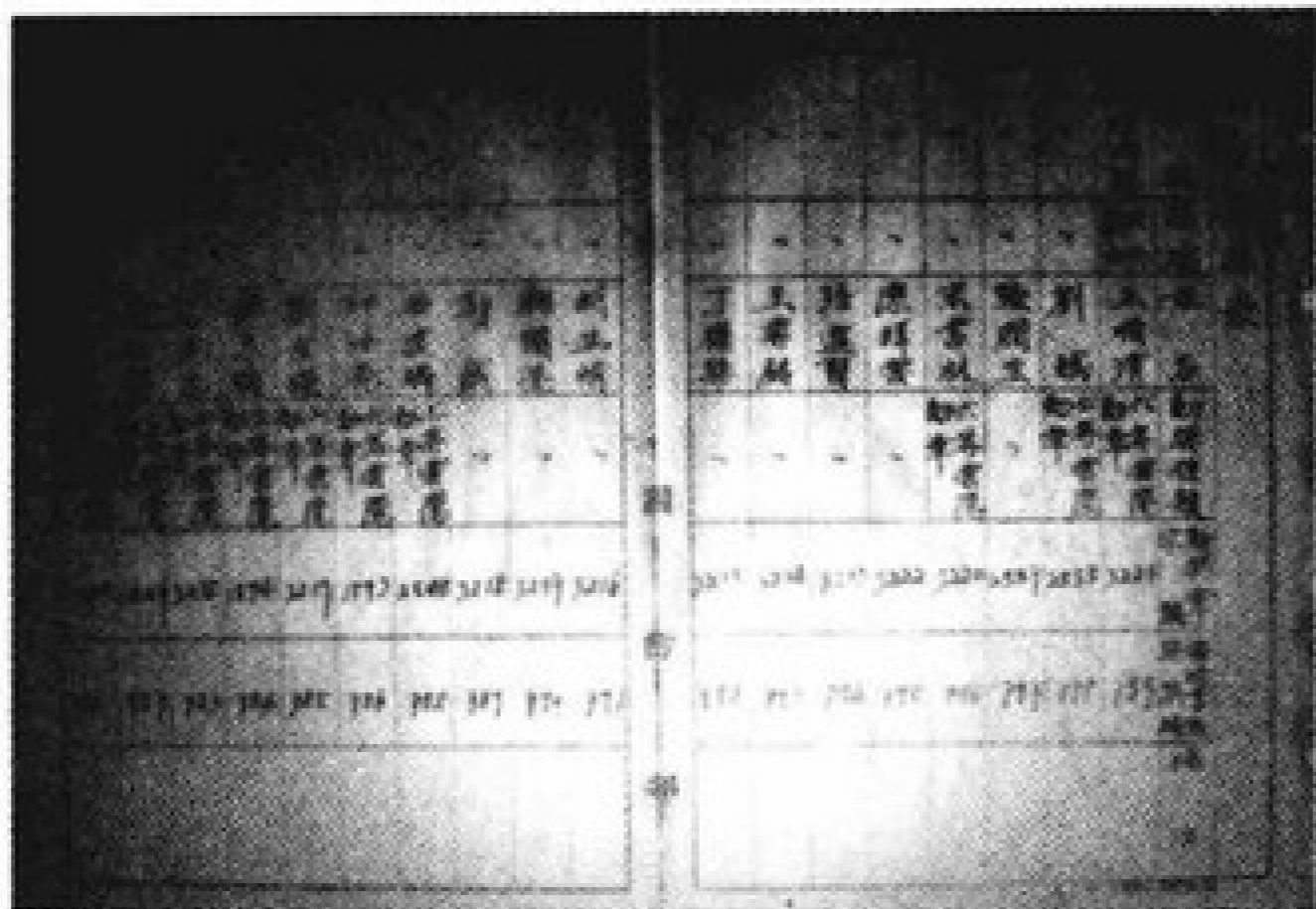
右给×××义士同志

兼处长蒋经国（签名）

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奖名册（选录）



给奖表 (第一页)

二、被思想训导

2月9日，“行政院长”陈诚在台湾“立法院”作施政报告，称台湾的军队不会衰老，兵源问题已经解决。他把一万四千余志愿军战俘的“集体归来、参加国军”，称作为战俘们的“志愿从军行动”。随后，陈诚在大湖、杨梅两地视察这些战俘的驻地时发表演说：“国家的自由与个人的自由是分不开的，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必须争取国家的自由；亦唯有国家得到自由，个人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他要求战俘们，“分担国家的困难和大陆同胞的痛苦，发扬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负起收复大陆的责任，遵照总统指示，从反共抗俄的国策中求出路，在摧毁铁幕的行动上争自由！”这实际上已经告知战俘们：除“从军”外，绝无其他任何出路。

在台北市郊的苦苓岭，台湾国军“总政治部”设有一个名叫“心战总队”的部门，战俘们即曾在该处接受集体训导。

据战俘赵英魁回忆（见《独家专访韩战老兵揭穿“一万四千反共义士”骗局》，口述：赵英魁，撰稿：王丰，2010.4.16.《凤凰网》）——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我们的意愿，送我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

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每次发生战俘自杀事件，当局搪塞的理由永远不变：“此人是匪谍，因无法开展间谍活动，畏罪自杀。”

三、被集体宣誓加入国军

在对战俘们进行两个月的训导后，台湾当局于4月5日宣布：“全体反共义士宣誓加入国军部队！”

1954年4月11日台湾《联合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如下：

义士从军今入营 特上书总统致敬并发表告同胞及三军将士书

【军闻社讯】一万三千余位反共义士请缨从军，现定于今（十一）日起入营。渠等特上书总统，誓死为反共抗俄复国建国奋斗到底。兹志全文如后：

总统，我们伟大的 领袖！

我们回到自由祖国，已二个多月了。在这二个多月当中，我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接受您慈爱的抚慰及千百万军民同胞的欢迎，使我们更感到自由的可贵与祖国的温暖。尤其我们看到了自由中国政治的修明，经济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军力的壮大，更深切地了解了您的英明和伟大，坚定了反共复国必胜必成的信心。

我们感谢您的德意，达成了我们“一颗心回台湾”的愿望，又支持了我们“一条命灭共匪”的决心，使我们能够加入“反共抗俄”的阵营，站在灭共复国的最前线，执行神圣的杀敌任务。从今天起，我们已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军人，正式成为您的部属，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我们今天向您保证，我们入营以后，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恪

守纪律，虚心学习，炼成钢铁般的身体，造就优良的技能，永远团结在您的四周，听从您的差遣，誓死为反共抗俄复国建国，奋斗到底！

太平洋的浪涛在怒吼，铁幕中的同胞在呼号！我们要跟着您打回大陆，去拯救四亿余水深火热中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现在我们要入营了，我们以满腔热血一颗赤心献给您，向您至崇高的敬意。我们欢呼：

中华民国万岁！领袖万岁！

告各界同胞书

亲爱的各界同胞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热情，谢谢你们慰劳！使我们得以从韩国回到自由温暖的祖国，完成辅导教育。祖国生气蓬勃，一片中兴气象，你们的鼓励慰勉越多，我们越感到自身责任重大，真不知如何努力，才能答谢你们的热爱和期望！

大陆正遭受俄寇的蹂躏，千万善良同胞，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从多年来的苦斗中，体验到：“我们若不消灭共匪，共匪一定杀死我们！”对待共匪俄寇的唯一办法，只有消灭他，彻底地消灭他，国家才有前途，同胞才有生路。因此，我们一致要求参加国军，请政府给我们杀敌报仇的机会。我们感激领袖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今天已经高歌入营，同伟大的三军将士，并肩奋斗了。这该是人生多光辉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今日共同许愿：“在部队中，永远做一个优良战士，在战场上，永远作一个战斗英雄，拿事实行动，来答谢各界父老！”

铁幕内部最脆弱，人人都希望推翻共匪伪政权，人人都希望起义来归。亲爱的同胞们！赶快团结起来，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最后让我们高呼：

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统万岁！蒋总统万岁！

（《告三军将士书》从略）

等专科 55 人，大学 4 人，中央军校 49 人，各军校训练班 105 人，部队军士班 146 人，其他班队 48 人，匪军校班 8 人，无学历 6986 人。

(四) 军官、士兵之比，约为 1:10。

2.

《反共义士志愿服役编调拨配计划》

(一) 志愿服役之反共义士，凡合于左列条件者，拨配国军服役。凡不合于左列条件者，由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报请行政院处理。

- (1) 志愿服兵役者。
- (2) 年龄：在 16 岁以上，40 岁以下者。
- (3) 体格：经检查合格者。
- (4) 经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初步调查考核可靠者。

右四项之调查考核及检验，由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负责办理，其不合于右项标准者，不得拨配及接收。

(二) 反共义士合于服役之人数暂行估计假定如左，以为计划拨配之基准：

- (1) 干部 1500 员。
- (2) 士兵 12300 员。

如合服兵役之人数与右述估计之人数有出入时，由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将出入情形，报请国防部酌于修正拨配计划。

(三) 反共义士运用原则：

(1) 干部运用

前曾充任军官者，集中编成军官战斗大队实施考核及专长训练后，依需要调补。前未曾充任军官者，亦予以集中暂行编成干部队由辅导处于以短期之必要处理后再行分别调拨。

(2) 士兵运用

甲. 陆军以充实接受新炮、新工兵器材、新通信器材之人员，海军以筹训接舰士兵，空军以充实高射炮兵，联勤以充实工兵及通信部

队为主。

乙.初期由各部队编成教导营连实施短期训练，俟基本教育完成并经详密考核后，再分散拨配各单位。

丙.上述(甲)项各单位，非全以义士直接拨充，由各总部计划酌以老兵互调使用，其职务之调配，由各单位依考核测验成果，酌情分别派调工作，对派任重要工作者，应特别注意考核。

丁.人员拨配及编组规定如下表。

戊.分拨各军种义士之拨配，由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按下表所列人数分拨之。陆海空军联勤各总部迳洽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办理。

3.

《反共义士编配表》

(1) 陆军：士兵 10000 人，每个整编军编成一个教导营（辖五个连），共编成十个教导营。每个整编师编成一个教导连，共编成 21 个教导连。训练时间为两个月。军官 1200 人，照现有军官战斗团之大队编制集中编成三或四个军官战斗大队。

(2) 海军：士兵 1000 人，在海军士校内编成两个教导大队，作为准备接收新舰之用，训练时间为三个月。

(3) 空军：士兵 500 人，在防空学校内编成一个教导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

(4) 联勤：士兵 800 人，在联勤学校内编成两个教导营。训练时间为二个月。

这三个编配表里的数据，值得简要分析，比如战俘总数 14334 人，应该是赴台战俘的准确数字；从他们的年龄构成，可见出今天他们的存殁，我们是直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已故去，才来了解他们，当年 21 岁的士兵，到今天也是 80 岁以上老人！籍贯分布，可见四川、山西是当年志愿军的兵源，而这样的统计，是我们自己也忽略了的；文化程度表明了战俘

们的选择自觉性较差，4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一半的文盲啊！从众、从友，相互鼓动就会不由自主。“中央军校”的49人应当提几句：小说《战废品》（作者：哈金）一书关于这群士兵的情况的介绍看来是非虚构的。还有一点，编配人数计划为13800人，实际编配12300人，和14334人的战俘总数有2000人之差，参军比例高达86%，仅有14%——其中有20岁以下、40岁以上1086人，还有1000名，是体检不合格？政治考察不合格？还是不愿参军呢？能真正享受到战俘公约里所谓“平民”待遇的，仅此而已！

4. 战俘收编为国军后的军衔、受训及待遇问题

军衔问题，原则上本应根据该所谓“义士”原在国军或志愿军或战俘营的最高官阶定，但在具体执行中问题太多，最后台湾当局决定以国军官阶为准，其他两方面向国军官阶靠拢。



1954年2月台北“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呈报“国防部”《请通飭各部队严禁与义士私相接近由》复印件

1949年以前原国民党部队的官阶和军衔并没有一个固定关系。如上将这一级，还要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中将加上将待遇等。同是团级，还有团长、副团长、团附之分；团长还有上校团长、中校团长、少校团长之分；副团长的军衔比团长低一级，团附的军衔比团长低两级。至于说到待遇，国民党对军界、政界还有一个统一界定：分为三等（简任、荐任、委任）九级。同是团级有简任二级的团长，也有委任八级的团附，差距是很大的。对于收编的原在过国军的战俘，其军衔一

般都不低于原有军衔，也有个别原是士官生混得个军官军衔的。

对于被俘前没有在过国军的战俘，因在志愿军时，同级干部的待遇是一样的，台湾当局对他们一律按低的定军衔。如营长定为中尉，副营长定为少尉，营附定为准尉，其余照此类推。机关干部更低一些，如原在72集中营首先叛变的原志愿军营级科长谭兴东仅定为少尉。其他如：宣传员、文化教员、卫生员（在我军应为班、排级）统统定为二等兵，和战士。

对那些曾在战俘营担任过俘虏官的战俘，台湾当局则按照美军编制进行挂靠：联队=团、大队=营，中队=连，小队=排、分队=班。然而战俘营不是正规部队，联队长并不等于团长，所以联队长一级如王顺清、应祥云等人均定为上尉，其他则等而下之。在集中营中耀武扬威的警备队长、副警备队长定为少尉及准尉；警备分队长、副分队长等定为中士及下士；一般警备统统定为二等兵。

这些战俘被收编后，士兵全部编入新兵营。接受新兵入队的基本训练、



从战俘营到台湾岛，曾一同接受各类培训班技能学习的四川籍战俘合影。图片提供：陈朝勋

三操两讲，这对于原国民党老兵倒是不成问题，对于知识青年和原坐机关的人就很不适应，而且他们还要接受“打骂教育”，军官被送入各兵种的短训班。陈诚是很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台主政不久时，在调整公教人员的待遇时，一般是贯彻孙中山的“均富”思想，但在对待专门技术人员时，却明令增加50—80%甚至更高的薪资或待遇，有意拉大差距。所以当新兵训练结束，陈诚鼓励他们去考各学科的特训班，接受各种专业训练，时间大约是半年左右，此时称为学兵，和从地方招收的学兵一齐受训，结业后授上等兵（成绩优秀者为下士）军衔，然后分到各相关部门工作。编配时把战俘分散分配，每个单位只分一个，这样，有利于他们很快地融入国民党军队中，也避免了他们过多地发生横向联系。以后还鼓励他们投考各兵种的专业学校，如官校、参校、机校等，毕业后即为军官，其中有少数专业人才还送到美国深造。

在战俘中，占了将近一半的文盲、半文盲，除了少部分在济州岛战俘营中的少年大队经过文化学习脱盲外，其余的经新兵入伍训练后，直接分去军队里当列兵、伙夫、马夫、勤务兵等下层工作。但也向他们说明，根据“年资加俸”办法，他们只要干到年老退休，其退休金甚至可以增加到和上校相当。但这些下层工作更新很快，最多三十多岁就得淘汰。淘汰后退伍，在地方上，只能干一些驾驶摩托车拉客、饭店里跑堂、码头上扛包、在街头擦皮鞋等粗活。

另外，根据1954年10月5日，台湾按照“立法院”通过的《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规定每个退伍士兵给年产2000斤稻谷的田地，以此稳定这批战俘的情绪。只是台湾耕地少，人口增长快，原本国民党退伍老兵就多，等轮到这批战俘退伍授田时，台湾当局只得以相当的价钱来兑现其承诺了。理由很简单，战士授田证上明文表示：俟“反攻大陆”成功后，方授田，后鉴于时局变迁，“反攻大陆”实际不可能，台湾政府乃另立相应条款，将战士授田证收回，改以现金补偿。

五、“不愿被融入”者的遭遇

1.

被驱入“反共义士感训队”

台湾当局在台北新店大崎脚“保干团”成立了“反共义士感训队”，用来“感训”那些没能很好地克服或掩盖自己对参军不满情绪的志愿军战俘。

文晓村他们五个人的遭遇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文晓村自传》中读到如下叙述。

我们五个人，被安置在台北县乌来乡乐山庄旅社。接待我们的，是文质彬彬的少校军官甘先生。

甘先生首先想要解除我们心中的疑虑。他告诉我们：“国民党自从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来台，经过几年的检讨、改造，已经不再是从前大陆时代那个贪污腐败的旧政府，而是代表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反共复国的基地。”他代表自由中国，欢迎我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他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中共建国后的社会观察，到解放军、志愿军，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要我们提出书面报告。并且特别强调，政府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审问、调查。面对昔日革命的敌人，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自我斗争和挣扎。仔细思考之后，我把自己的基本观念，做了三点调整：

第一、我在台湾，既非国军的俘虏，也不是自愿来台的“反共义士”，我应该保有最低的自尊。

第二、国共两党的革命动机，都是为国为民，应无二致。国民党过去贪污腐败，当然应该反对，甚至打倒；但如果它能彻底觉悟，大公无私，自然也该给予鼓励的掌声。

第三、我现在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在两党你死我活的斗

争中，希望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

立场观念理清之后，我对任何问题，都能坦诚以对，不加回避，对于某些错误的传言，也敢给以适当的驳正。例如甘先生曾在闲谈中问我：你对共产党新婚姻法的“一杯水主义”，和军中的“慰劳队”有何看法？我告诉他：这两点都是可笑的谣言。中共的新婚姻法中，虽然规定男的年满二十岁，女的年满十八岁，两人只要向政府机关申请登记，即算完成合法的婚姻；但对党员干部的结婚，却要先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如果未经组织批准，而发生不正常或超友谊的关系，往往会遭到调职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种封建、保守严厉制度下，又怎能产生“一杯水主义”呢？至于解放军中是否有什么色情的“慰劳队”，至少我个人是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好的宣传工作，绝对不能无的放矢。

关于个人的愿望，我想，我也真的够天真、够浪漫。在当年那样“反共抗俄”的环境中，我居然胆敢表明：如果允许我自由选择，我希望做一个平民百姓，从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或教育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做军人。

我们看见这时的文晓村，没有死在战火中、没有死在山林里、又终结了战俘生涯，还站在了“自由中国”的土地上，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只得把自己几年来梦寐以求的跟父母妻儿团聚、参加家乡和平建设的强烈愿望深深地埋进心底，只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文晓村的这点平凡不过的愿望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在乌来住了一个多月，也许我的思想问题，对别人也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吧，五月初，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新店附近的大崎脚，接受“感训教育”。

新店大崎脚保干团内，设有一个临时编组的“反共义士感训队”（如果我没有记错，队长是蓝迅云上校，广东人。第二任的指导员是郑心中校），专门收容各部队认为思想言行偏差的“反共义士”，给予感训、再教育。我们五个人，虽然不够“反共义士”的资格，但同样被

视为韩战遣送来台的分子，思想偏差，送到该队来“戒训”，却是很有资格的。

上课的内容，有《三民主义》、《总统训词》、《反共抗俄基本论》和劳动服务等。

文晓村在新店大崎脚“保干团”的“反共义士感训队”期间，除了“虚心接受感训”外还积极热情工作，如主动给学员们理发、在被选为伙食委员后千方百计改善伙食等等，深受学员们拥护，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并未得到“保干团”领导认可。因而只能当一名国军“编外人员”。

半年后，我领到了一枚“军人身份证”，兵籍号码是三一八九八八，生效日期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就是我入境台湾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阶级是“暂支准尉薪”。说明我是一个已经具有“军人身份”，但却并非真的“准尉”，而只是“暂支准尉薪”而已。

他们在“感训队”结束后，被分发到“保干团”警卫连，继续接受考察。他们也参加站岗，但手中端的枪，枪膛却是空的，没有子弹。以致文晓村夜间在营门外的桥头站岗时，心里常常嘀咕：桥下面如果突然冲上来两个坏蛋，怎么办？

他们警卫连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尉级军官，年龄大约有三四十岁，当时二十六岁的文晓村算是年轻的。为了迎接“国防部”一年一度的校阅，他第一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个月之内，单杠、木马、爬竿、跳越障碍、靶场射击等，全都达到及格的标准。顺利通过严格军训的文晓村，满以为这回可以结束监管了，哪知他们的思想表现却远没有达到“训诫”的要求，他们的厄运仍在继续，甚至更加可怕。

文晓村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在大崎脚扛空枪、站卫兵，干了半年，忽然，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被美军遣送来台的“五人小组”，又被召集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押上一辆军车。要往哪里送？不知道。

到了台北火车站，才知道是要坐火车南下。第二天早晨，经高雄转往屏东枋寮（那时候，南横铁路还未开辟），再搭军车到台东，改乘

船，到了孤悬海上的绿岛。详细日期，已经记不起，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或八月，应该不会错的，因为天气很热。

绿岛，位于台东县的外海，日据时期，叫火烧岛，是关押杀人要犯的地方。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成为关押政治犯和其他重要罪犯的监牢。名作家柏杨先生，因写文章获罪，在绿岛坐过多年牢；民进党立委施明德等，也因“美丽岛事件”，在绿岛监狱中，渡过青春的岁月。近年他们发起，要在绿岛监狱的原地，树立“垂泪碑”，后又改名“人权纪念碑”，行政院萧万长院长，也曾参加破土典礼，应有唤醒全民走过伤痛的意义。

我们被关押的单位，是“绿岛监狱”？还是什么“职训总队”？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们五个人被编在一个队中，是一个特别小组，吃饭、上课、睡觉，都在一起，但不准和队上的其他人员说话。听说，队内那些剃光头，穿灰色犯人服的，有一部份是金门古宁头战役，和东山岛战役的俘虏。我们不是俘虏，仍然穿着绿色的军服，但没有部队的徽号。

每天除了上课，劳动服务之外，起初写自传、自白，从家庭出身，父母兄弟的名字，读过什么学校？什么时候参军？什么时候入党？介绍人是谁？参加过什么战役？韩战被俘的情形？到来台之后的观感，今后的愿望等；并一再地反复询问，个别谈话，好像非要找出一些什么触犯法条的蛛丝马迹才罢休。那种气氛、压力，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经过长期的“考察”之后，队职官大概已经判定，我们这五个人虽然有些特殊，到底也不像什么造反的料子，管理上也开始松了一点，偶尔，分队长还带我们到海边去散散步。

后来，一位河南籍的分队长，劝我说：“老弟，小腿扭不过大腿，你们在这里一直呆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们下次写报告时，只要写一句‘愿意服从上级分发’，也许就会放你们走了。”

听了那位分队长的话，果然，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五个人，终

于脱离了绿岛十二个月的桎梏。

但是，四十多年来，每当听到有人唱《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飘呀飘……”便不免勾起那一段想忘也难的恐怖日子。

文晓村他们从绿岛回到台北后，在发给文晓村的军人身份证上写的却仍然是“准尉”，而文晓村被俘前已是志愿军的营级干部。这种不被信任的差别待遇，一直延续了六年五个月，直到1960年8月1日，他被核定为中尉军官为止。

2. 陷入牢狱之灾

在《独家专访韩战老兵揭穿“一万四千反共义士”骗局》一文中，“义士”赵英魁有这样的叙述：

在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的“教导营”后不久，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睬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他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我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台湾天气热，部队集合到河里洗澡，我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边洗边谈。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把他骗来台湾，明明答应他演话剧，说话不算话，骗他到台

湾当工兵。

我们部队驻扎在桃园八德，那时军人薪水微薄，礼拜天只好待在营房，靠打百分（编按：扑克牌游戏，四川人常玩）和聊天打发时间。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瞒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李国安愈讲愈激动。大伙全是战俘，彼此同病相怜，别无他法，只好互相安慰。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名为结拜兄弟，其实仅止于口头承诺，彼此留下联络地址而已，根本没什么仪式。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睬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我们被监禁在桃园龙潭第一军团军法处政四科的监狱里，在那里关了三年多，再把我送到军人监狱。想一想实在不可思议，也不过是为了结拜兄弟，竟诬指我们“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求拷打的经验。“政治部”保防科的人把我吊起来，凶神恶煞地问我：“你是想要叛乱嘛？你们是不是想上山做反动工作？”我申辩：“完全是冤枉，没有这回事啊！”保防科的特务不相信我的供诉：“那你们结拜兄弟是干什么？”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绞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

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徒刑，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却找不到“保证人”保我出狱。保证书上印着：“兹保证匪谍某某某，出狱之后不再犯…”看到这种字样的保证书，除非是很亲的亲人才敢出面作保。

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现在偶尔想起在朝鲜战俘营被凌虐，到台湾后被关押的那段艰苦岁月，心里总是很难受。

3. 铤而走险的下场

我们还从去台难友那里听到下面更为悲惨的故事。

有一位义士被分配到驻金门的部队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从连队体育器材室偷拿了两个篮球胆，将其充满气绑在身上，下到海水里游往厦门。凌晨，这位疲惫不堪的义士见到了海岸沙滩。正当他跌跌撞撞爬上岸时，忽见礁石后面有一哨兵露面，向他高呼：“不许动，举起手来！”。义士一面高举双手，一面哭喊着：“解放军同志，别开枪，我是从金门偷渡回国的志愿军呀！”说完即昏倒在地。等这位义士醒来后睁眼一看，围着他的竟是国军官兵，其中还有他的排长。原来他在海里游了半夜并没有到达厦门，而是被海水流冲回到了金门另一海角的岸边！

这则故事在台湾军中流传甚广，但故事中的主角身份并未肯定是战俘，或是 1949 年随国民党政府去台的老兵，或是不愿服役的义务役士兵。如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即是以此种方式自金门游泳至厦门！

这位志愿军战俘的下场是：经“军事法庭”审讯后按叛逃罪处以极刑，并通报全军。

第九章

战俘访问团

(1954年2月—11月)



1954年8月8日蒋介石召见即将出发欧美的战俘访问团成员

台湾当局为争取志愿军战俘由韩国来台湾付出了不少心血，接着又费心尽力去接纳、安置这上万名战俘。台湾当局自然不会期待这批原中共军队人员能够用来增强国军多大战斗力，但是这些战俘来台湾后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对于鼓舞士气作用不小。台湾当局乃决定组织“义士访问团”，让战俘们在当年激烈的国共之争中继续发挥其特殊作用。

这个活动对赴台志愿军战俘也产生了一些激励作用，但大约仅限于参与其事的那些“反共义士”。

关于“反共义士访问团”的活动情况，当时在台湾报纸上有不少宣传报道。我们也在已经解密的台湾外交部的档案中见到有关记载。这些史料上的遣词用句，和战俘们在“顾问”指导下的充满歪曲咒骂的宣讲发言，反映了当时台湾国民党人的政治悲情，如果那些国民党人现在再次读到它们多半也会哑然失笑。兹选录于下。

一、组织“反共义士访问团”分赴台湾各地

1.

访问各县市

我们从1954年2月21日的《联合报》上见到下列报道：

【彰化讯】“反共义士”齐永林、张薪尝，于廿日上午十时抵彰，第七先锋营全体学员均伫立彰化女中门口迎接，女代表李宝深、林桂仙并向义士献花致敬。十时半即由张义士对先锋营报告“匪区暴行”。他说：抱歉得很，我带给各位的都是一连串的坏消息。果然不错，他给

予听众的是连篇叠耗。继由齐义士报告“在韩国奋斗经过”，他指出一万四千义士在韩国玩弄匪帮洗脑人员，激昂、悲愤获得掌声雷动。下午三时半出席第七先锋营座谈会。齐张两义士定今（廿一）日赴嘉义。

【苗栗讯】留韩归来之“反共义士”数人，订本月廿三日上午抵达本县访问，并将公开报告匪区之一般惨况及奋斗之经过，县军之友分社暨各机关社团，准备于义士抵达时，举行盛大欢迎会，以示崇仰。

【台东讯】“反共义士”黄安道、唐道生等，由救国团军训教官李又成率领，于十九日下午五时，由屏东抵县，此间各界闻悉义士抵县，慕名前往旅社拜访者，络绎不绝。渠等并顺便向来访人员讲述共匪在大陆杀害人民之惨状，闻者无不动容，黄、唐等义士于廿日上午七时转往花蓮。

【北县讯】“反共义士”访问组定于本月二十三日起三天推派代表卅人由北区防守司令部张科长率领赴本县访问县府，军人之友北县分社，工厂，学校，驻军等单位，“反共义士”在本县访问日程地点已由有关单位筹商中，本县各界亦正在筹备欢迎事宜。

【军闻社讯】“反共义士”郭守勤、江滔，昨（廿）日下午一时卅分，前往中国青年反共救国会四十三度寒假青年先锋营第二营，作大陆实况报告，对共匪怎样奴役青年，迫害青年，欺骗青年，及强迫参军的情形，报导甚详，使团员们都悲愤填胸。嗣因天雨，该营的体能活动暂停，再请郭、江两义士继续报告争取自由的经过，至五时半始结束。“反共义士”旋与全营团员聚餐后，始在热烈掌声中离去。

【中央社金门二十日电】据此间接获台北来电：由二十三位“反共义士”组成的代表团，定二十三日专机飞金门前线，作为期两周的访问。前线军民已准备热烈欢迎，同时，金门各界慰问团，亦决定搭乘义士来金便机飞台慰问。

2. 访问各部队

在1954年2月22日的《联合报》上又报道了下列消息：

“反共义士访问团”明分十组出发前往本岛及各前线展开为期半月访问。

【军闻社讯】“反共义士访问团”，将于明（廿三）日分陆、海、空三路，前往台湾本岛及澎湖、金门、大陈、马祖各地，展开访问工作。该团共分十组，每组廿人，其中第十组则集中台湾籍义士组成，自本月廿三日起至三月九日上，作为期十五日之访问。访问方式。包括：出席各地集会发表演说，参加国军官兵座谈，个别访问国军连队官兵，参观各社团、学校、机关、村里月会，及地方建设事业等。彼等并将向各地军民控诉共匪暴行，讲述匪区生活实况，及义士本身艰苦奋斗之史实。其访问地区划分如下：

第一组：台北市；第二组：北部防守部区域；第三组：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屏东县；第四组：苗栗县、台中市、台中县、彰化县、南投县；第五组：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市、高雄县；第六组：金门；第七组：澎湖县；第八组：马祖、白肯岛；第九组：大陈；第十组：台湾各地农村及山地。

“义士访问团”到处受热烈招待日程排定行踪遍宝岛。

二、组织“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访问东亚、东南亚

自1954年4月开始，台湾当局陆续向海外选派了五个“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庞大的反共宣传与外交公关活动。这些访问团成员大都是原战俘营里的骨干和能讲一些英语的士兵。每个访问团都配有

一名情报人员担任“顾问”。我们也选录当年台湾报纸的新闻报道与“外交部”情报司的解密档案向读者简介相关情况。

1. 台湾当局给访问团规定的任务及组团名单

(1) 任务：

(一) 向访问国朝野据实揭发共匪卖国残民，帮凶侵略罪行，加强国际间对共匪罪孽本质之认识。

(二) 向访问国及联合国反映大陆一般人民之情绪与愿望，使了解自由中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希望之所寄，共匪失尽人心，终必败亡，以加深民主世界对我反攻复国必胜必成之信心。

(三) 报道自由中国进步壮大实况；澄清国际对我不正确之认识，并争取广泛钦敬与同情。

(四) 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争取访问国人民加强反共援华活动。

(五) 加强反共宣传，与美国“反对承认匪伪政权”及“反对共匪入联合国”运动呼应配合，扩大其影响。

(六) 慰问侨胞，促进其对自由祖国向心力之加强。

(七) 对共匪参加日内瓦会议，展开宣传上之反击。

(2) 先期成立四个“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分赴菲、日、泰、越，各团名单（包含“顾问”一名）如下：

菲律宾：王新耀 胡安康 吴继磷 刘化文 邱源坤。“顾问”黎世芬

日本：陈永华 王建国 岳瑞伍 陶志远 赵金钟。“顾问”王殿卿

泰国：张汉澄 谢敏综 陈晚绪 陈春荣 刘儒裕。“顾问”黄汉波

越南：陈荫芳 刘忆 姚舜 夏明芝 李忠国。“顾问”吴英竹

（据台湾当局“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2. “海外访问团”在菲律宾

由于菲律宾当时与台湾关系十分密切又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之一，因此，台湾当局首先向菲律宾派出“海外访问团”并在该国进行宣传活动长达六个星期之久。

1954年3月31日台湾《联合报》有如下报道：

【中央社马尼拉三十日专电】来菲访问之五位“反共义士”代表，今天上午至墨菲营菲国防部作礼节上拜会，并往麦金莱堡韩战菲阵亡将士墓致献花圈。义士代表至菲国防部未能拜会菲参谋长瓦加西，因奎松省菲军昨晚受菲“人民解放军”伏击，瓦加西于今晨一早前往调查此事。义士代表向菲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对在韩作战之一营



海外访问团到达菲律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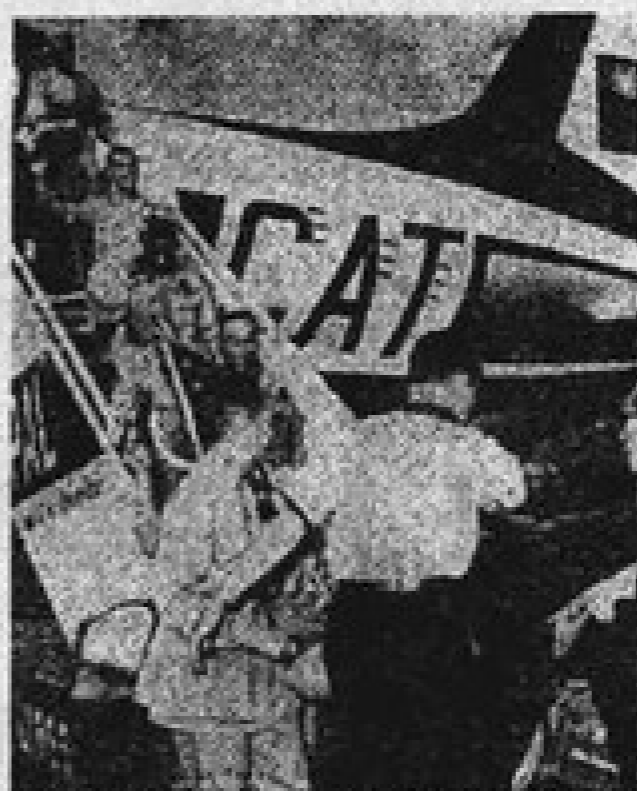
战俘访问团访问菲律宾媒体报道剪影



LOYALTY TATTOOS: Five visiting Chinese ex-combatant soldiers who refused repatriation to red China from Korean prison camps exhibited yesterday to countrymen in the U.N.C. club the tattoos they made in their arms while in prison as a sign of loyalty to Nationalist China. They are, from left, Ho An-lang, Chia Yung-lang, Wu Chih-ling, Wang Hsin-yao and Liu Hsin-wang. The Manila Daily Bulletin, March 20, 1954



CHINESE EX-COMBATANTS HERE: Five former soldier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who refused repatriation from United Nations prison camps in Korea arrived by plane yesterday from Formosa for a goodwill visit with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Led by Huang Tiao Chi, deputy commissioner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e five men are Wu Chih-ling, Wang Hsin-yao, Ho An-lang, Liu Hsin-wang and Chia Yung-lang. Photographs Chinese girl awaits greeting the former communists with girlfriends and lets upon their arrival at the Manila international airport. Bulletin March 27, 1954



FIVE CHINESE soldiers, former UN prisoners of war, who refused repatriation after fighting for the communists, arrived at the Manila international airport yesterday aboard a Civil Air Transport plane from Taipei for a six-week goodwill visit to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Photo shows the visitors going down the ramp of the plane with local CAT manager Aher Kishi (back to camera) assisting them. At right with five party leader is T. C. Huang,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ho headed the group. (PNS Photo) Philippine Herald March 27, 1954



战俘访问团访问菲律宾媒体报道剪影

菲军协助义士们重获自由，甚为感激。并对在韩从事反共战争而牺牲之八百名菲军遗属致慰问之意。五位义士代表将于明日上午十一时拜会菲副总统加西亚，十一时卅分拜会美驻菲大使普鲁恩斯，即结束在马尼拉之日程，以便转往菲律宾其它各地访问，可能将先往北吕宋城市访问。

关于 1954 年 4 月 27 日在菲律宾的眠市，当地政府组织民众欢迎、听取他们讲述“投奔自由世界事迹”的热烈情况，台湾驻菲使馆的报告如下。

外交部钧鉴：

查“反共义士”一行五人，由顾问黎世芬率领，业于上月二十六日安抵眠市，到眠以来，参加各项集会，备受各方热烈欢迎，颇收宣传效果。兹义士等在眠活动已告一段落，日内即将出发赴菲各省份访问侨胞，当能加强菲各地侨胞及外人对于大陆共匪暴政之认识，关于义士在眠各种活动情形，及先行检同有关简报三十份，呈请

鉴别。

由于班机的改期，害得挤满了机场的热心侨胞，晒太阳到了五点，才看到一架漆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民航机。原定三点抵眠，可怜不少千金小姐，奉了命令，经二点直等到日落。

机门打开以后，先走下几位外籍搭客，随即现出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天寿，紧跟着国大代表黄和德，然后才是“反共义士访问团”。五位少壮英俊的反共义士，穿着黄咔叽军装，青天白日的帽徽闪着夕阳的余辉，他们由当顾问的访韩记者黎世芬领先，竖着大旗走下机梯。

欢迎的行列随即发出雷一般的声响，夹杂着热烈的鼓掌叫喊声，一阵镁光的闪烁下，他们被拥进入验疫室，经过海关的例行检查。

这五位“反共义士”由吴继璜做领队，吴义士是四川邻水人，原是国军的军官，后来被迫作共军，其他四位是：邱源坤，江西乐平人，胡安康，广东恩平人、王新耀，广东梅县人，刘化文，福建厦门人……

昨夜陈大使官邸欢宴会中，最被广大代表包围的义士，要算是厦



战俘访问团参观菲律宾大中华日报社

门同胞刘化文，因为他是闽南人，所以纷纷被围询问乡情。据他说：他原是在厦门开营布店，抗战末期加入青年军第207师当通讯员，不料到了三十八年，在东北沈阳被共军俘虏，民国四十年十月，他以共军炮兵的身份，午夜被迫自安东渡江入韩作战，同时他还不明白跟谁战争，后来拾到美机散发的传单，知道上当，所以乘白昼逃入美军阵地，选择了自由，重归祖国的怀抱。

“浪子归来金不换”，何妨他们本是善良的同胞，在枪尖威迫下而替仇敌服务，如今他们投奔自由了，让我们希望每一个在盲目驱使下服役的铁幕后同胞，能够听到自由的钟声，奔向自由的世界，投入自由祖国的怀抱，呼吸自由的空气吧！

……

3. “海外访问团”在日本

由于首赴菲律宾的“海外访问团”行程顺利、效果甚佳，赴日的“海外访问团”随即相继启程。

1954年4月3日台湾《联合报》有如下报道：

【军闻社讯】 中华民国“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第一团员王殿卿、陈永华、赵金钟、王建国、陶志远、岳瑞伍等六义士于昨（二）日下午九时搭民航队班机，飞往日本，作为期一月之访问。此为反共义士出国访问之第二批人员。反共义士此行携有血旗、大刀、照片及“我们怎样争取自由”等，彼等除访问我旅日侨胞及日本人士外，并将晋谒联军统帅赫尔将军，代表归国之一万四千多位“反共义士”，对联军统帅维证人类自由与伸张正义的精神，及予我义士支持协助，敬致谢忱。昨晚往机场送行者，有：军人之友总社、北市军友分社、妇联会、海外侨生、辅导处及义士代表等。

【中央社东京二日专电】 联军及美远东军统帅赫尔将军将于明晨在此

附件一： 留日華僑各界歡迎反共義士訪問日程表

日期	項目	時間	場所
四月二十一日 水曜日	留日華僑各界代表歡迎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下午七時十分、 下午七時四十分、	(赤毛、博多)
四月二十二日 木曜日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上午九時、 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六時、 下午七時、	
四月二十三日 金曜日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午前、 上午十二時三十分、 下午二時至五時、 下午六時、	赤毛、博多
四月二十四日 土曜日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上午九時、 上午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六時、 下午六時、	赤毛、博多
四月二十五日 日曜日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留日華僑聯合會招待會、	午前、 十一時、 下午一時五十分、	

附件二： 反共新聞（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轉載於歡迎の花束

「反共義士」の名が長崎入り


さる三日臺灣を出発日本訪問の途についた「中華民國反共義士海外訪問団」の団長王殿卿氏（三六）ら六名は二十三

日午後四時四十五分着全行搭客皆で福岡市から來崎した、一行はお熱いのブルーの國民服姿で隨長崎駐在中國領事から歡迎の言葉をかけたのち陳嘉庚子さん（一二）から花束をうけ中國旗をもつて出迎えた時中小学校の児童に歡迎されながら長崎市中國領事館に向つた。

一行は領事館を訪問したのち長崎市新生園で開かれた陳領事招待晩さん會に出席して長崎市での第一夜を明かし、二十四、二十五の兩日間で東京に出發する。

なお団長王殿卿氏は歓迎で來崎の目的をつぎの通り語つた。

韓国で反共團體が在日華僑からだけ援助に感謝するのが定規の目的である、さらに中國大陸における中国人の悲惨な狀況なて感じたことは復興が進んでいること、秩序がよく振た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長崎市街で花束を受ける一行

战俘访问团访日行程及日媒报道剪影

间潘兴冈总部接见六名反共义士。这六位反共义士定于明晨五时自台北乘民航队飞机抵此，作一个月的演讲旅行，将竹幕后的生活及他们在韩战中遭受考验的经验，告诉此间华侨社会及日本民众。在拜访两个半月前宣布他们为“自由人”的赫尔将军之前，六位反共义士将先访晤董显光大使。明日中午，他们将在董大使官邸中午宴席上作董大使的宾客。他们预备在东京勾留一星期，然后赴大阪、神户、福岡等其它主要日本城市对关心的人士报告他们在朱毛暴政下及韩境的悲惨的经验。又据悉，他们在日本旅行的时间大约将有数星期。

1954年5月9日，台湾驻横滨“总领事馆”电呈台“外交部”汇报关于“反共义士”在横滨受到欢迎的情形：

外交部鈞鑒：

中華民國“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王殿卿等一行六名，于本月三日晨四时许，在留日华侨各界代表盛大欢迎下，抵达羽田机场，本馆孙总领事、大使馆凌秘书、留日华侨联合总会会长林以文、东京华侨

总会会长马朝茂、横滨华侨总会会长薛来宏暨各同乡会会长、国民党驻京滨两直属支部常务委员、京滨两侨校校长及大批侨生妇女代表等均赶往参加，六义士代表在欢呼雷动空前热烈之情绪下，与欢迎群众频频挥手致谢，欢迎行列手挥国旗及其它团体欢迎之旗帜，高呼反共口号，情绪激昂令人感奋，六义士代表接受学生及妇女代表献花，并在机场录音及摄制新闻影片……

但赴日“海外访问团”并非一帆风顺，下面是台湾“外交部”给当局的一份内部报告：

附件：日本外务省亚东司呈请鉴核中国义士访日事

顷准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中田丰千代来本司谈称：中国反共义士一行，昨由警务处人员陪同到本馆办理赴日签证手续，业经予以签证。关于此一问题，日本外务省前曾来电指示，谓：中国驻日大使馆事先曾派员商洽，外务省当即表示中国义士可以普通旅客身份来日，到日后接受华侨欢迎，并宣传反共等，均属自由，惟希望勿就日政府事先业经同意一点，过于渲染，以免增加日本政府对内之困难等语。昨日义士等来馆签证时，本馆松本领事，曾将上述外务省意旨，便中告知同来之警务处人员。该员反谓：菲国对我义士盛大欢迎，日本何以如此怕事？言下颇有不满之意。实则日本政府对我义士访日，衷心极表欢迎，惟日本国内反对派系甚多，往往藉故攻击政府，日本政府殊不欲因此引起许多无理之争论。再则日本共党分子尚甚活跃，而旅日亲共韩侨更为横蛮，万一对义士一行，采取危害行动，更为不妥。故日本政府除已饬令治安机关于义士在日期间随时妥为保护外，并盼外交部转告各义士及随行人员，到日后充分与中国驻日使领馆配合行动，以策万全。……

（见台湾当局“外交部”情报司档案）

4. “海外访问团”在泰国

台湾当局随后又向泰国派出了“海外访问团”，他们在该国的经历比起在日本的经历顺利些。

1954年4月8日及4月11日《联合报》的有关报道：

【中央社讯】反共义士代表六人应旅居华侨的邀请，定九日上午飞往曼谷访问，这六位义士代表是刘儒裕、张汉澄、谢敏琮、陈晚绪、陈春荣、陈凌云，他们将由黄汉波顾问率领，于九日上午九时半乘泰国航空公司班机经香港飞往曼谷。



战俘访问团泰国组成员

【本报讯】反共义士赴海外访问第三团领队刘儒裕、团员张汉澄、谢敏琮、陈晚绪、陈春荣、陈凌云、顾问黄汉波等七人已于昨（十）日上午十时搭泰国航空公司班机飞曼谷，预定在泰停留三星期，遍访旅泰各地侨胞，向全泰华侨揭发共匪在大陆上的暴行。军人之友总社，妇联总会，大陆救灾总会，青年救国团，反共义士就业辅导处等单位代表约五十余人均在机场欢送并献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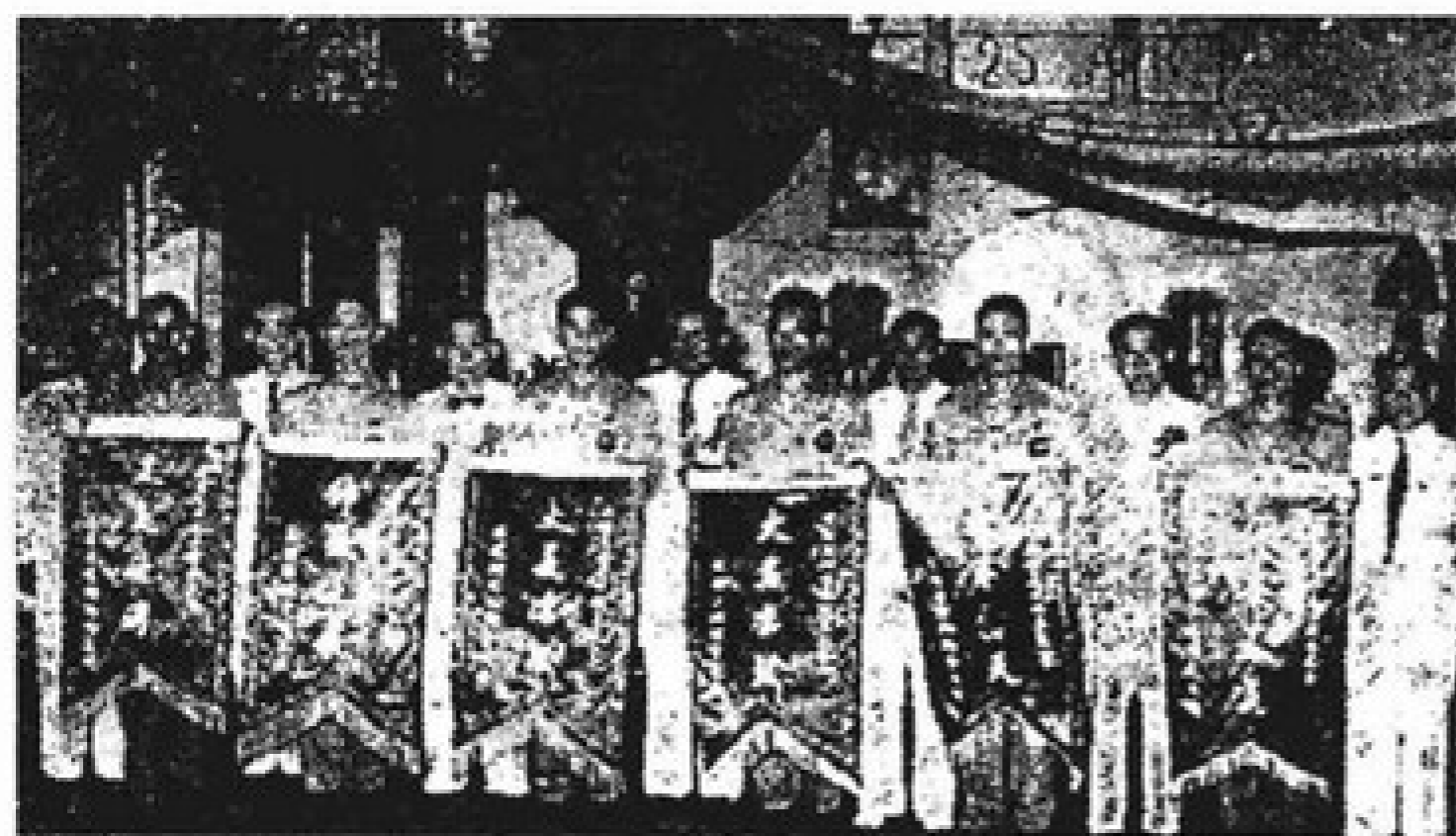
【中央社香港十日电】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第三团一行七人于访问泰国途中，十日下午一时三刻乘泰航机途经香港，在机场仅逗留一小时许，即于当日下午三时原机飞泰访问。六位义士及顾问下机后，立刻受到港九调景岭等区难胞代表三十余人，及港九一百零七个自由工会代表香港侨岭徐季良和不约而至的侨胞们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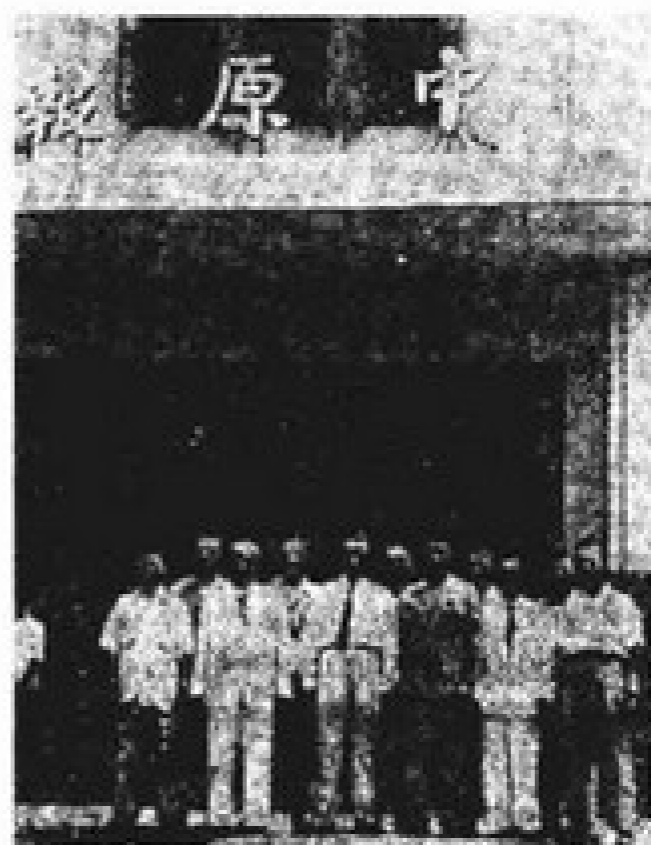
战俘访问团抵达泰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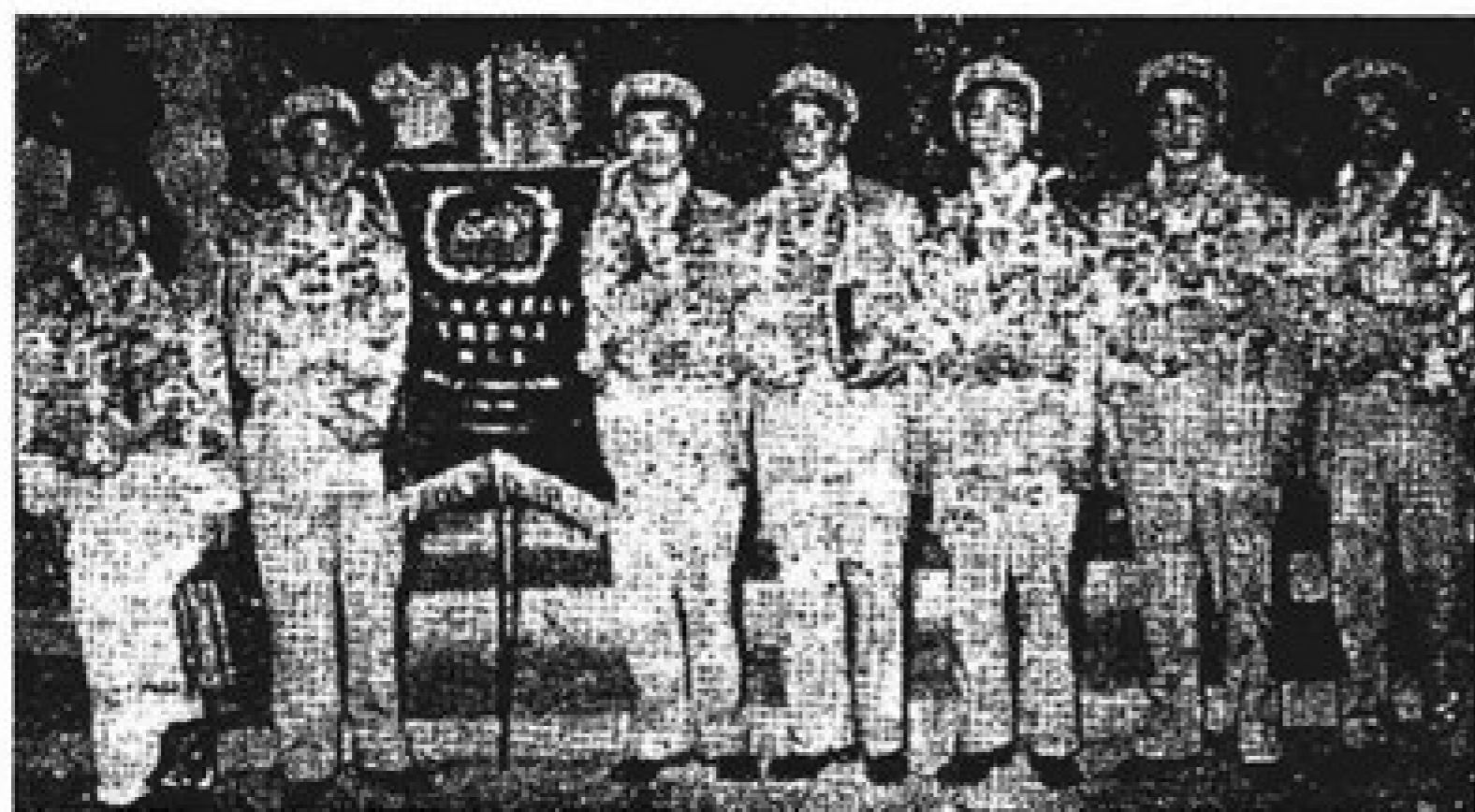
战俘访问团在泰国展示战俘营里刻下的纹身



战俘访问团在泰国接收同乡会献锦旗



战俘访问团成员访问泰国华文《中原报》社



战俘访问团泰国组成员合影

5. 去越南的“海外访问团”

1954年4月15日台湾当局派出了赴越南的“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可能由于前不久赴泰国的访问团路过香港时，台湾当局策动的迎送活动有些过火，该团在由台湾前往越南以及从越南返回台湾途经香港转机时都遇到了“麻烦”。

4月16日的《联合报》报道如下：

【本报讯】前往越南访问之反共义士夏明

芝、姚舜、陈荫芳、刘忆、李忠国及顾问吴英竹等六人于十五日下午三时乘民航队班机启程往香港转往越南，各机关团体代表及学生二百余人前往机场欢送。此五位反共义士及顾问一人原定昨日上午九时乘民航队班机起飞，不意在起飞前数分钟，因为香港英国政府的阻难，却延迟了八个小时，同时引起了在机场二百余位欢送人员之愤慨情绪，向在场的英副领事史纳格鲁夫提出质询与抗议。

在起飞前数分钟英驻台副领事史纳格鲁夫忽至松山机场向民航队宣称：香港政府将不允许载有反共义士之飞机在启德机场降落，此语甫出，当即引起全体欢送人员之义愤并向其抗议，说明我反共义士之经过香港系经过正式签证手续，不得阻难。英副领事无言以对，后经我外交部长叶公超交涉，始允予在港留宿一夜，不允我反共义士预定在港停留两日接受各界之欢迎日程，而使之隔离。次日即由香港政府负责派机送往仰光。

据悉：香港政府临时阻难我反共义士停留香港系受共匪的胁使，盖香港各华侨团体闻悉反共义士行将抵达已准备盛大欢迎，此举将给在香港之共匪以难堪之打击。

5月20日的《联合报》报道如下：



战俘访问团赴越南登机前合影



“义士访问团”在越南

【本报讯】出国访问越南的反共义士一行五人，现已达成完满任务，于昨晚八时四十分乘民航队班机飞返台北。中国大陆救灾总会曾派代表至机场迎接，并有小姐向义士们献花。

昨晚飞返台北的五位义士姚舜、刘忆、李忠国、夏明芝、陈荫芳等下机后，向欢迎群众透露：他们一行五人途经香港时，被媚共之大英帝国香港政府监禁了二十四小时。据义士向记者说：当他们十八日下午六时许所乘之飞机到达香港机场时，即被在

机场之英国警察将义士们集合在一起，后引导至机场一间小屋子里面，叫他们休息，事后引导义士的英警即将门锁住，表面上说我们是保护你们，暗中派了十几个英警在房子四周警戒，有如大敌，等于是将义士们监禁起来，向英警交涉也不得要领，义士们在里面苦捱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九时许，英警送进来食物给义士们充饥，但是我们五位义士认为这是大英帝国的食物，宁愿绝食也不吃这不讲义气的食物，这种伟大的正气使在场英警也颇受感动。后来义士们在窗户中看见我们香港的自由影帝搭机回国，义士们想从门里冲出来，将被香港政府这种行为的消息告诉回国的影星带给祖国但是被警戒的英警制止。

义士在这种武力的警察之下，滴水未进，整整过了廿四个小时，到昨日下午六时许，义士们始恢复了自由，搭上民航队的班机飞返台北。

在台北和越南之间往返均遭香港政府限制，“访问团”本拟给共和国涂抹的“难堪”最终难堪了“访问团”自己。

三、战俘访问团的美洲之行

1954年7月底，台湾当局又组织了“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第五团，

制定了“反共义士访问欧美计划书”。他们的访问名义是：“向联合国及参加韩战各国答谢坚持志愿遣俘原则及惩罚侵略之伟大行为。”

该团访问的地区以答谢或访问参加朝鲜战争十六国及与台湾有邦交者为主。该访问团在欧美历时三个半月，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回到台湾。

1954年8月6日《联合报》报道：访问欧美的“义士访问团”决定8日启程。

【本报讯】“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张遵贤、赵金钟、钱玉琪、胡安康、高振中等五人，由顾问胡旭光、朱盛荃陪同，定八日由台启程赴美及欧洲各国访问，该团定出国前一天（七日）上午十一时假新闻局招待中外记者，报告此次访美及欧洲各国之目的。

《联合报》对访问团随后的活动做了全程跟踪报道。

（一）1954年8月11日《联合报》报道出发情形：

五反共义士离日赴檀岛 董大使昨予欢宴

【中央社东京十日专电】五位前韩战反共义士今午乘泛美公司班机离此飞往檀香山，开始他们赴欧美旅行的第一段航程，他们在飞往旧金山开始访问美洲大陆各大城之前，预料将在檀香山逗留一周。此五人反共访问团于昨晨乘民航队班机抵日，联袂而来的尚有两位顾问，将在他们旅行世界的期间，担任译员和联络官的工作。中国驻日大使董显光今午在官邸设宴，款待该五位反共义士和两位顾问。该访问团将在美国作一个半月的旅行，然后前往加拿大。拉丁美洲华侨团体已邀请他们于前往欧洲之前访问牙买加、巴西和墨西哥。该团发言人告中央社记者称，他们是否访问拉丁美洲，多半将视所需之费用和入口签证而定。发言人进一步透露，当他们逗留于美国的期间，他们将参加九月二十日开幕的联大会议，同时，他们被邀于本月内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全国会议，和九月二十日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劳工协会上发表演讲，由于欧洲方面微妙的政治气氛，他们不准备访问过多的国家，他

们目前所决定访问的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希腊和土耳其，据该团发言人称，他们在欧美旅行的时间为三个月，但如有必要，尚可延长。

(二) 1954年8月12日《联合报》继续报道他们的行程：

反共义士抵达檀岛



战俘访问团在檀香山

【中央社檀香山十一日合众电】

五位中国反共义士于昨夜自台湾抵达美国领土，他们系作为时三个月的世界旅行，其目的在于驳斥共产主义。他们五人是张遵贤、赵金钟，胡安康、钱玉琪及高振中。当他们抵此时，受到五十名华侨领袖的热

迎。陪同他们并为担任译员的是中国空军的胡旭光上校，他们五人之中，仅有两人能说些微的英语。

胡上校说：访问团的目的是“揭发共产主义的罪恶，并感谢美国因其为民主的战士及和平的保卫者”。他说：“五位义士中有四人曾担任过军官，他们希望报告关于中国大陆千万人民面临着死路一条的情形。他们希望警告世界自由人民要戒备共产主义的危险。”

(3) 1954年8月19日《联合报》报道战俘访问团抵达旧金山的简讯：

我五义士抵旧金山

【中央社旧金山十七日合众电】反共义士张遵贤与其他四位反共义士自檀港抵此，系前来美国作一次旅行访问，他在记者招待会说：中共军的士气“极低落”。他说：当他在韩境为共党作战时，“士兵的食物不够吃”。他说：共军的伤亡极惨重，而且美空军力量很有效。他说：“此外，我们在共军中看到许多俄国军官，因而我们觉得我们是替俄国卖命，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正生活于极不幸之中，因为共党在进行五年计

划，以致食粮缺乏。”

张遵贤的谈话显然与事实相距甚远，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志愿军队伍里有“俄国军官”存在。

(4) 1954年8月29日《联合报》标题：



战俘访问团在旧金山中国城

反共义士殊荣洛杉矶赠与城市之钥

【中央社洛杉矶二十七日合众电】今日此间以“城市之钥”赠与前在韩国俘虏营中拒绝共产主义的五位华裔反共义士们。他们一行抵此以后，曾于昨晚参加新唐人街的欢迎会，今日上午复受此间官员欢迎。这些自由使者将赴华盛顿，出席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年会，发表演说。他们返台以前，并将访问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和欧洲。

这五位反共义士计为张遵贤，三十八岁。钱玉琪，二十六岁。胡安康，二十五岁。高振中，二十四岁。赵金钟，二十六岁。

(5) 1954年9月1日《联合报》标题：



战俘访问团在洛杉矶好莱坞与电影明星丹尼·凯 (Danny Kaye) 合影



战俘访问团在洛杉矶获赠城市之钥

我反共五义士访问美国务院并举行记者招待会

【中央社华盛顿三十日专电】昨日下午抵达华盛顿的五位反共义士，今日在美国首都访问美国政府官员，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备形忙碌。他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是上午十一时在五角大厦访问空军部次长鲁易斯，半小时后访问空军副参谋长奥丹尼尔中将。以上两次访问均系由中华民国空军武官衣复恩上校陪同前往。下午一时三十分在五角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历一小时余，曾答复许多问题，并向记者出示其身上所刺反共字样。下午三时在国务院访问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劳勃森代表杜勒斯国务卿接见他们，杜勒斯本人正忙着准备前往马尼拉出席东南亚防御公约会议。旋复访问国务院中国司司长马康卫。

(6) 1954年9月16日《联合报》则较为详尽地报道了该访问团抵达纽约的情况：

五义士飞抵纽约我侨团热烈欢迎巡游唐人街
并出席群众大会义士函诫联合国勿容匪混入

【中央社纽约十四日专电】五义士本日午间由芝加哥乘飞机抵此，作十天的节目紧凑的访问，在这个期间内，他们并将访问附近的波士顿和费城，五义士此行系得纽约中华公所和中国反共同盟所赞助。六十个以上的侨团和文化机关的近三百人在机场迎接义士并给予热烈的欢迎。两个中国女学生代表中华公所和华美协进社向义士献花。首要的欢迎者有总领事张平群、中华公所主席李觉之和中国代表团代表游建文，机场上并有大批新闻记者，电影和电视摄影员。时事片摄影公司并将在机场访问义士的镜头摄成电影，发给世界各地的电影院和电视台。义士张遵贤在机场接见记者答复问题称：“现在我们已重获自由，我们来到这里，特别向侨胞致敬，因为他们会以道义支持我们争取自由的奋斗。”张遵贤并告侨胞称：“我们看见你们愉快地在自由与民主中生活甚感愉快，但我们不可忘记现仍过着悲惨生活的同胞，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为收复大陆而奋斗，使他们从共党的枷锁中恢复自由。”由六十

辆汽车组成的队伍，护送义士从机场到唐人街，在行人最多的时候通过纽约最热闹的街道引起相当的注意。载送义士的汽车，驶在汽车队之前飘着欢迎义士的旗号，其它的汽车插上中美两国国旗并贴起“欢迎反共义士”的标语。义士抵唐人街时，即受到舞狮、侨校乐联和放爆竹的欢迎。街道两旁挤满观看的人，义士下车时，获得群众高声欢呼。义士巡游唐人街后，即参加群众大会，由李觉之代表侨团对他们正式表示欢迎。张总领事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欢迎之后。五义士和他们的两个顾问介绍与侨胞相见。唐人街满贴反共与拥护政府的标语并悬中美两国国旗。唐人街报纸并撰写社论，向义士致热烈欢迎之意，并刊出五义士的传略，在参加群众大会之前，义士为记者和摄影记者举行简短的记者招待会，摄影记者对义士在被拘禁期间在臂膀和胸前所刺的反共标语，都加以摄影，义士以自由徽散给欢迎者作纪念以表他们的谢忱。在每个自由徽上，印着一个联合国徽号，在徽号之上有一个自由钟和一面国旗，并有中华民国反共义士敬赠等字。背面印着两行字，“一颗心反攻大陆，一条命消灭共匪”。义士等今晚与唐人街领袖举行非正式聚餐。侨团领袖代表在护送义士由机场至唐人街途中，在联合国总部停下来，向秘书长哈玛绍致送信函，反对准许北平进联合国。该函的签署人是纽约中华公所主席李觉之，由执行秘书代表哈玛绍予以接受。

这篇报道提到，纽约唐人街报纸刊出了张遵贤等5名志愿军战俘的“传略”，可惜目前我们不能采集到这份材料，能了解他们的身份情况和人生履历。



战俘访问团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

四、战俘海外访问团的南美、欧洲之行

1.

战俘海外访问团在古巴

按行程安排，战俘访问团结束美国之行，即往古巴、牙买加。1954年10月29日《联合报》报道：



战俘访问团往访古巴国防部

【中央社讯】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代表张遵贤等五人刻正访问古巴，廿七日曾晋谒古巴总统巴蒂斯塔及参谋总长塔柏拉里纳将军致敬，反共义士代表等一行于廿八日赴

英属牙买加访问后，定卅日自古巴飞往马德里，开始其访问欧洲之一个月旅行，在欧洲之日程业已排定如次：十月卅日至十一月四日在西班牙，五日至十日在法国，十一日至十四日在意大利，十五日至十七日在希腊，十八日至廿一日在土耳其，预定于廿二日自土耳其之安哥拉飞往曼谷访问后，而结束其环球旅行。

2.

战俘海外访问团在西班牙

1954年10月30日《联合报》报道：

【中央社马德里二十八日专电】五位反共义士定于十月卅一日抵此，对此风光美丽之西班牙首都作为时五日的访问，此间已准备盛大欢迎。中国大使馆人员，旅西华侨以及西班牙的各反共组织代表学生届时均

将前往机场迎接。义士们到达之日将首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西班牙国家广播公司将以招待会之实况录音转播全国，当晚中国大使馆设宴为义士们洗尘，十一月一日义士们访问多勒多，向反共英雄墓献花，下午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来宾料必十分拥挤。义士们的访问日程中包括西班牙的三家大日报，所将拜会之西班牙政府官员中亦有新闻部长，中国大使馆陆军武官周上校将于十一月三日举行鸡尾酒会介绍义士们与西班牙军事将领及各国大使馆武官见面，十一月四日义士们访问各军事机构，包括战事纪念馆及圣安东尼军校，并观光名胜。十一月五日义士们离马德里往巴黎访问。

3. 战俘海外访问团在法国、意大利

1954年11月8日台湾驻法“大使馆”向“外交部”、“国防部”报告了关于战俘访问团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情况。

台北外交部并转国防部：

义士五日抵巴黎，侨胞均在机场欢迎，法国防部派代表到场。六



战俘访问团在巴黎无名英雄墓前

日晨，至无名英雄墓献花，下午在馆招待记者约六十人，问答二小时；六日晨，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招待鸡尾酒会，八时在馆宴请义士侨胞约二百人，义士答问近午夜始散。七日，侨胞开会欢迎，义士均演说并有法参加韩战志愿军司令 MONOLAR 上将致词；八时，侨胞盛宴款待，今展澜与徐武官伴访问团赴总统府呈递致谢书，由参军长代表接见并以香槟款待法方，招待尚殷勤，访问团十一日参加法国欧战纪念

典礼后，飞罗马，溯应部长谕，九日飞马德里，十四日飞罗马开会，二十日返巴，陈参事雄飞代理馆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罗马，意大利的红衣主教为访问团的高振中举行了信仰天主教的领洗典礼。1954年11月14日早10点，刚恒毅红衣主教主持授洗，刚红衣主教致贺词说：

今天我来主持高君的洗礼，参礼的人大半都是中国人，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国的情景。当年的中国是自由的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自由行动，政府当局从没有限制宗教的自由，而且处处与以便利。今天我看到你们争自由的义士，使我不胜感伤。圣经上说当时犹太的一个绅士，因为自己女儿害病将死，跑去求耶稣显灵，耶稣正走往他家时，他家里派人来说女儿已经死了，不必麻烦了。耶稣对绅士说：“你只要信就够了，女儿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耶稣进门用手拉着女孩子的手，叫她起来，女孩子立时复活了。我也可向各位说：“你们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耶稣一伸手中国就可复起。”

中国为仁义之邦，有孔子、老子、墨子的遗教，中国人最有自由的精神，公教也最主张精神的自由，在一千七百年前时，罗马皇帝君士但丁准许信仰自由，可是他在小亚细亚的代理皇帝里启尼迫害教会，



高振中接受罗马红衣主教刚恒毅施洗

下令驻防亚美尼亚的四十名公教军士背教，军士们宁死不屈，遂杀身成仁，争取精神的自由。各位义士也是争取自由的军士，各位中间今天还有一位要争取精神生活的自由，领受洗礼，我今天来主礼心中很觉高兴。圣经上若望宗徒说：我们的胜利，就在于我们的信德。有了信德，就有胜利。

战俘海外访问团的活动于1954年11月25日结束。当天《联合报》以显著标题加以报道：

我访欧美义士今由曼谷返国将对记者报告经过

【军闻社讯】前往欧美各国访问之反共义士张遵贤、赵金钟、胡安康、钱玉琪、高振中等五人，由空军上校胡旭光陪同已结束其全部访问日程，定今日（二十五）上午十一时半，乘泰国航空公司飞机自曼谷返抵台北。总政治部、军人之友社、妇联会、救国团，及反共义士战斗团等单位，均派代表前往机场欢迎。五位反共义士在国外三月余，所到之处，皆曾受到热烈的欢迎。

今日下午二时，归来之五位反共义士，将在铁路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访问欧美之经过情形。

“反共义士访问团”的活动是当年台湾当局策划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活动。从1954年4月到1954年11月的八个月时间里，台湾各大报纸及广播电台都对它有所报道。海外访问团的战俘们风风光光回到台湾后，曾受到各种褒奖。当他们那“反共义士”身份的使用价值消失殆尽，他们也就和其他赴台志愿军战俘一样，不得不埋头去为自己的生存打拼，并逐渐被历史遗忘。

第十章

消 沉

(1955年4月—1987年)



2010年6月6日山西省闻喜县回乡定居的赴台战俘手臂上的刺青。

赴台志愿军战俘从融入国军到退役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较为艰辛。他们除了文化程度较低、谋生本事较差之外，更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和战俘营里身心所受创伤太深，特别是刻在身上的那些洗不净也抹不掉的刺青，已经变成他们心上难以愈合的疤痕！这一切使得他们的情绪十分低落。再加上当时台湾的生存环境相当艰困，连国民党老兵退役之后都有“立业难、成家更难”的处境，他们不少人便陷入一种“苟且偷生于乱世”的消沉情绪。

一、桃园县遇到孤身难友

2004年6月笔者张泽石又一次随老伴去台湾探亲。他们先住在桃园县八德乡的侄女家里。在这里，他意外地遭遇一位他的志愿军战俘难友。当时，张泽石写下了一段记事：

桃园县郊区有一座著名的“反共义士之家”（后改名为“荣民之家”），当时还有上千名去台志愿军战俘群居在那里。我非常想到那里去看看，但侄女很忙没空开车陪我去。有一天我们全家到镇上一家餐馆去吃早点。餐馆用餐的人很多，大家挤坐在长排条桌前，在我右侧坐着一位比我还老些的长者。就在等待服务员上早点时，我老伴忽然拿筷子头点我的手背，示意我朝我的右侧观看。原来在我右侧平放着的那位长者裸露的手臂上，赫然刻着四个蓝色的刺字：“反共抗俄”。

“难道他是我的难友？怎么会这么巧！”我转过脸去，从侧面看他的面容相当憔悴衰老。这时他喊了声：“老板娘，再来根油条嘛！”竟然是地道的四川话！

我忍不住转身对着他用四川话说道：“老哥子，听得出来你是我的老乡，没错吧？”

“你、你、你是哪里人嘛？”他惊喜地转过头来打量着我。

“广安，重庆市上头的广安。你老兄老家是——”

“江津，重庆底下的江津，我俩离得不算远！”

“老哥子，我还猜出来，你是跟我一起跨过鸭绿江跟老美干过仗又一起住过美军战俘营的志愿军老战友！”我靠近他耳朵低声说。

“啊！”他把整个身子转过来直直地瞪着我：“你，你哪个晓得的？”他向四周看了看，见到不远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空出来的桌子，这时刚好老板娘送上油条来，他拿起油条就拉着我往角落里移了过去。

“老弟，说说你是哪个晓得的？”他也放低了声音。

“就凭它！”我微笑着指了指他手臂上的刺青。

“原来如此！我早就把它看成是遭狗咬留下的伤疤，没当回事了。”他扫了一眼那几个字，又打量了我裸露着的光洁的手臂：“你是从大陆来探亲的吧？”

“你猜对了，我陪老婆来探望我的大舅子。”我指了指正低头用餐的大舅哥，又问道：“你回老家去过了吧？”

“嗨，我老家没啥人了。”停了停，他指着那些刺青说：“再者我也懒得把这些脏字除掉，就没回去。”

“那，你把家安在哪里了？”我试探着问。

“老弟，说来惭愧，我至今还住在荣民之家里，由政府照顾我们这些老光棍！”

“老哥子，你还是回老家去看看，说不定能找个老伴成个家！不少台湾难友都回老家定居了呢！”

“谢谢你老弟的关心，我这把老骨头埋在哪儿都一样了！”

我还想劝劝他，我老伴过来招呼我该走了。我站起来跟他握手，说了声：“你老哥子多保重啊！”他点点头，紧紧抓住我的手，一直拉着我送我到餐馆门口，才放开手苦笑着跟我挥手告别，我本想回他一

笑，却见他眼里盈着泪花，便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走了老远，我一回头见他还在站在那里望着我，他那佝偻着的孤单身影深深地刺痛了我。那一刻，在我心里升起一个强烈愿望：一定要深入地去了解我的这些难友的经历，好好地写一写他们内心的苦楚。

二、“一无所有的白”

笔者张泽石一直希望能够长时间就近追踪赴台志愿军难友，观察他们，书写他们。可惜限于条件，无法在台湾展开调查。令他惊喜的是，台湾作家张晓风竟然早已关切着他们。她曾在1996年4月14日、15日的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上，连续两天发表了散文《一千二百三十点》。这篇散文所具有的婉约细腻笔调和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实在太动人了，谨转录于下：

说好了，要在这水池边上等王正福的。

水池在医院进口的地方，池里养了些白鹅。十年来，到这所医院进进出出，如果没有一百次，五十次总有了。奇怪的是唐大胜从来就没有想到来这池边坐坐。此刻坐下，才真的觉得是个好池子，快过年了，天气意外的暖和，一个小孩站在池畔喂锦鲤，他的爸爸在一旁拍照。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在散步。另外有个病人，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寡瘦寡瘦的，正愣愣地看着榕树上聒噪的麻雀。那病人倒是和气，见人就笑，由于两颊消瘦，那嘴角都要笑到耳朵孔里去了。却不知为什么，仍然一副悲苦相。

他又看了那女人一眼，大肚子的女人，不知是年前生还是年后，还有三天就是大年夜了。如果年前生，就属猪，年后，就属老鼠了。人的命都是注定的，可惜自己亲娘死得早，别说时辰是记不清了，连生日都有两个说法，爹爹说是中秋节前一天，三婶却说是后一天。早年，碰到事情，他就恨，如果有个八字时辰，好歹也可以去问问算命

先生拿个主意，这几年，日子过得淡淡的，心情也淡淡的，像听一出听熟了的戏，结局早就知道了，那命，那情节，也就可以不理它了。

据说，如果找到特别灵验的八字先生，他就有本事倒回头，对照你的一生，把你的八字找出来。可是现在真的不需要了。本来，半年前，倒还有件事等着拿主意，可是，今天，一脚踏出诊疗室，他便八成决定了，而这件事一经决定，这辈子也就再没什么大事了。

唐大胜和王正福是这篇文章的主角，他们都是当年身上刺着“青天白日”或反共标语的志愿军战俘。

王正福还没出来，王正福这人怪烦人的。其实，他只不过耳朵背，六十八岁的人，耳朵背一点不算什么，偏他这人钝得厉害，你要是不凡事盯着他一点，他真能连吃饭也给忘了。王正福身上的字多，今天是他第一次来打，怕不要打五百点，自己第一次不就打了五百四十八点？护士小姐嘴巴甜，赶着叫“伯伯”长，“伯伯”短的。

“伯伯呀，”她说，“你赚到啦，五百四十八点，都是退辅会出钱，要是自己出，每一点要一百一十二元，你今天一天就要付六万多哩！”

他苦笑了一下，小姐太年轻，没法向她解释，这种赚，谁要？民国四十二年的事了，别说这小姐没生，就连她老娘生出来没有都成问题，她懂什么？

五百四十八点，一点一点都是疼，那医生形容说，不疼不疼，就像橡皮筋弹一下。好吧，就算像橡皮筋弹一下，一连弹你五百四十八下也够受吧？那医生也是个后生家，笑嘻嘻的：

“从前刺下去才疼咧！现在除下来应该是小意思啦！”

奇怪，也许那时候年轻，刺下去好像也不怎么痛，三个针，绑成一小把，沾上黑墨，就这么往肉里扎。

“杀朱拔毛”那是左臂。

“反共抗俄”那是右臂。

前胸，则是一块地图，外加一面大旗。后背，是“不成功便成仁”。

下午的阳光暖暖的，白鹅优游，他数了一下，一共九只，池边杜

鹧花丛下面还有几只，他弄不清楚它们的数目。但不知为什么，有一只孤零零的绿头鸭子夹在白鹅中间窜游，落了单，显得十分奇怪。

一阵风过，雀榕树飘下一阵落叶。

他想起自己昨天劝王正福的话：

“不疼，也不难看，雷射，红宝石雷射，人家美国人的科学发明！不得了的！一台机器四百多万哪！你不去打那真错过了天大的好机会，又不要钱，又不疼，打完了，擦点药，三天就能洗澡，你个王正福别死脑筋了，这事如果不是好事，我会来劝你？我自己打了十一次了，明天我去打第十二次，就算功德圆满了。号，我也帮你挂了，你好好去打了，明年也好回老家，没有人敢找你麻烦，不疼的，哪个龟儿骗你？打完了，像落了几点白白的梅花点，真的不疼的。”

其实当然还是疼的，尤其是前心后背，比手上要疼得多。但王正福这人死心眼。别人都回去了，偏他胆小，不敢回去。有时想家想狠了，就抱着信哭：

“不行啊，我这一身有七面国旗，还加上‘坚持反共信念，矢志雪耻复国’，还加上八个‘围台湾’，他们饶得了我？”

王正福这人现在看来颠三倒四，想不到他当年竟在臂上刺英文，他英文大字一个不识，居然还刺了英文字！唉，说起这个王正福，笑话可多了。有一次，不知怎的，长裤脚里竟拖出二团白白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卫生裤。他说他一早明明先套卫生裤才穿外裤的，却套了个空，等发现的



刺上国民党党旗的战俘和他的姓名

时候已经是中午了。那天唐大胜一早去结汇，孩子要娶媳妇，他汇了二百美金。等回来，才发现王正福丢人现眼。他有点生气，却也说不上来该把王正福怎么办。

这种人，想当年，居然得风气之先，刺起英文字，八个“图台湾”(TO TAIWAN)据说就是“去台湾”的意思。唐大胜想到这里，不禁好笑起来。这王正福有本事把一切的话说成四川话，包括英文，包括台语粗口。八个图台湾也不知本来念成什么？

这几节，交待了志愿军战俘身上刺青的来历和去掉刺青的程序。作者有一处不够准确：“民国四十二年”，那已是尘埃已定的济州岛上，战俘们大规模的刺字，是在1952年4月甄别前后。这里丢了个“包袱”，英文to Taiwan念成四川话的“图台湾”，是有音变的，这个川话的“图”的确有“贪图”“期望”之意，无论这意愿出自主动还是被动。

这王正福还不来，不知他今天打了几点，他那人怕疼，自己只好多事，去关照医生，今天先打他两臂就可以了，前心后背留着下次再打吧！快过年了，让他过个好年。

自己第一次也是打手，五百四十八点，隔了一个月第二次来，才开始打前心后背。以后每个月来一次，一次打前，一次打后，他牢牢地记住了，一共六百八十二点。原来自己这一身刺青全部算来是一千二百三十点，换成新台币，是十三万七千七百六十元，各打六次，一共是八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元。

“我这也是有了身价的人了，我这一身‘没有’，也值一百万哩——这是在荣总，要是去美容院打，一点要五百元，那就是四百万啦。”

报上有时看到绑架的新闻，绑匪动不动要三五百万或几千万，他实在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以值那么多钱！

活到六十九岁，嘿！这辈子就是现在最值钱。刺上青，并没有让自己值钱，但这一除青，却除掉了一百万，哈，人生凡事都是注定的。

听说有位老兄刺了一身正气歌，也去打，真不知他打了几点，那人赢回的一身白皮肉，少说也值三百万。奇怪的是，正气歌干嘛要打

呢？文天祥哪一点得罪共产党了？

四十多年前咬牙忍受针扎之痛时，谁会想到老来还有这一劫呢？唉，人生没啥理可说，一切都是老天注定的。

那一年，打韩战，三十九年，六月廿五。自己是十月才去的，手里一把汉阳造，居然还是国军当年的旧货。枪还来不及开，美军的大炮就轰过来，人就这样被俘了。……

首批入朝部队的装备五花八门，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其后陆续入朝的部队，才统一使用苏式装备，这位唐大胜是首批入朝的志愿军战士吧？

把左臂刺上“杀朱拔毛”，对他来说，是心甘情愿的。

“怎么啦？不反共了啊？”

年轻的医生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也许是为了让病人轻松一点吧，他想。

“也不杀朱拔毛吗？咦？毛是毛泽东，朱又是谁啊？”

“朱是朱德，当时的总司令。”他说：

医生带个金丝边眼镜，娃娃脸，望着不过二十出头，这小龟娃儿（按：四川人骂人龟娃、龟儿并无恶意）又懂什么来着。

他从不肯说一句委屈这一身刺青的话，不像郑家孝。

郑家孝有一次在国父纪念馆，正看人放风筝，不知怎么的碰上一个民进党，民进党拉住他，说：

“喂，你这‘反共抗俄’的，你待在台湾干什么？去呀，去反攻大陆嘛！站在这里吃台湾的米干嘛？”

郑家孝给他



胸前刺下国民党党徽的战俘，照片背后是他的老家地址

扯急了，就反吼回去：

“我又不是自愿刺的，是强迫的！人家强迫我刺的。”

他有点气郑家孝，没出息，民进党又能他妈的把你怎么样，何况他脸上又没刺字，你怎么知道他是民进党？就算是民进党又怎么样？民进党也不能管你自家刺自家皮肉呀！

从前，自己这批人，这一万四千人，有个名堂，叫“反共义士”。还拍过电影，叫《一万四千个证人》。刚回台湾那天还披红挂彩游行，到处万人空巷。如今，谷正纲一死，一·二三自由日也没人过了。戏，也没人演了。这还不说，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又在堂堂国父纪念馆前面，也会冒出这种小乌龟王八蛋来，真他妈的呕人！更呕人的是郑家孝这种孬货，居然说自己是遭人强迫的，也真是丢人丢到家了。郑家孝，日你先人板板！

“你当年是志愿的吗？还是强迫的？”

他吓了一跳，怎么医生会问这种问题，那是他第二次去打雷射，一面胸膛正被那一张国旗扯得麻辣火烧。他闻到微微的肉焦味，他忽然想到那味道的几分熟悉。回一下神，才想到这是当年战场上的味道，火烧皮肉，就是这种味道。

原来那场韩战打到现在还在善后，原来四十四年之后才是尾声。

“也不能说是强迫的。”他回答医生，胸口一阵疼过一阵，“人家一万四千人都刺了，你一个人不刺，好意思吗？”

“哦，”医生扶了扶他的蓝眼罩，因为怕雷射光，他们打点的时候都戴着蓝眼罩，像电视上的蝙蝠侠什么的，“这么说来，是‘同侪压力’。”

“什么同侪？”他听不懂，“我们是‘同袍’。”

“同侪，人字边一个齐，就是同伙人的意思，同侪彼此会形成一种约束力。”

医生看来有点学问，医生的话他半懂不懂，也不想深究。胸口疼得厉害，叫疼，是不作兴的，太娘娘腔了，但眼角毕竟还是微微渗出

了泪水。

“同侪”还是“同袍”，这不只是一个词语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在一个老兵心灵上的积淀啊！

上一次流泪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是他第一次回老家，知道他在台湾没娶，女人走了二十里路来看他。一进门，就直蹶蹶地跪下了。

“没能给你守着，是我对不住你——”

扶不起人来，他只好也跪下。

“快别说这话了，我谢都来不及，一儿一女，都这么大了——连孙子都有了，也多亏你一人扛。”

他送女人一条鸡心链子，女人没收也没拒，只说：

“我不方便，我戴着，那边的会多心。还是给小红吧，看见小红戴着，就好比我自己戴着一样，我嫁你那年，也是十八。”

小红是他们的孙女，活脱脱是女人的当年。

那以后，他就没再流过泪。

背井离乡导致的情感煎熬，不单落在这些当年的好男儿身上，还有当年的好媳妇、好女人心灵里。

那时候是晚春，穿长袖衬衫，倒也不热。手臂上的字，也就掩过去了。到了晚上，去灶下洗澡，三弟为他倒水，灶间灯暗，只有五烛光吧。

“哎呀！”三弟叫起来：“二哥，你这背上怎么花里忽梢的！”

没料到他眼尖，他只好照实说了，三弟也是个小干部，听了那番话竟有点作难起来：

“这玩意儿，说严重嘛不严重——说不严重嘛说不定也有点严重。自家人看到了也就罢了，要是外人看了，怕不有麻烦！我看，还是小心点。”

那以后，他就没回去过。

王正福不知搞什么鬼，打到现在还不出来。

儿子写信来，要他回去住，他认真地考虑了一年，决定先打雷射

除了刺青再说。

这王正福是钝了一点，好在胆子小，还不出大毛病。不像黎志新，差点没弄出人命来。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了，他不知听谁说的，找了个女子美容院的老板娘，弄了些烫头发的药料，就这样腐蚀起自己的皮肤来。结果文字没除掉，皮肤溃烂红肿，惨不忍睹，挨了医官一顿好骂。

另外还有个劳久忠，这人也是异想天开。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想家想疯了，那时候又没这雷射好用，他找了个纹身店，把那些字纷纷改刺成青龙。为了将就那些字那些图形，刺的龙当然不会好看，有那缺德的人就给他取个外号叫“九龙壁”，也有人叫他“怪龙壁”，后来终于定了案，叫“劳九龙”，大概因为跟劳久忠沾点关系。那劳久忠的龙他看过，因为刺成一团，胡乱纠结，到底有几条也分不清。不过，他毕竟回了老家，这两年他儿子还过来探亲哩！劳九龙毕竟也来打雷射了，中间还费了点唇舌。人家退辅会出钱帮忙除青，除的是“忠党爱国”“解救大陆”，从来没见过来除龙的。颇经过一番解释，又请部队长出面说明，才弄懂他那一群龙的来龙去脉。只是半路上平白又多刺了那么多点，现在也只好多打，痛得他咬牙切齿，一面胸膛打满了，黑压压的，像戴上一面护心镜似的。

“劳先生呀？”医生开他玩笑，“你刺的这满身龙，倒像参加了什么帮派哩，你是青帮洪帮？”

“大夫呀！我们当年参的那个帮规矩可严哩！”这劳九龙读过中学，脑筋转得快，“我们不刺不准入帮，我们那个帮不是青帮洪帮，叫国民党帮。”

劳九龙回来还把这故事说给大伙儿听。

王正福还不来，唐大胜却坐累了，只好站起来动动，也不敢走远。不知不觉，他唱起一首歌来，打着四川调子：

“老也好，小也好，
不老不小不得了。”

唱完他逗自笑了，不知怎的，竟会想起四十多年前抓兵的歌

来。所谓老，是指四五十岁，所谓小，是指十三四岁。至于他那时才二十三岁，正是不老不小最“不得了”的年龄，当然是非抓不可。

“老也好，小也好，不老不小不得了。”

也许心情还好，他又唱了一遍。正在这时候，一个青瘦的中年人走过，塞给他一叠传单：

“伯伯，总统选林郝，国代选新党。拜托，拜托。”

他吃了一惊，噢，这里是荣总，是国民党的地盘，怎么冒出个新党来？

他一时还没有回过神，却见王正福缩头缩脑的在张望。

“我在这里呀！”他大声叫嚷。

这王正福是个五短身材，一听见声喜得眉花眼笑，两只小短腿划呀划的直往这边奔来。

“也不算疼，可也不算不疼哩！”难得，这句话他倒说得清楚，“大夫说你好，你混毕业啦，你不用再来啦，你下个月就一身细皮白肉啦！你完了，我才开始，我有得罪受哩！”

两人走到门口，要去搭公车回三峡，转白鸡。（“白鸡”是地名，即台北县三峡镇荣民之家所在地。该荣民之家主要收容志愿军战俘单身老兵，又称白鸡山庄）

唐大胜心里一阵空虚，像是肚子饿，又像头昏，然而都不是。

什么都没了，他忽然明白。“杀朱拔毛”没了，“反共抗俄”没了，地图没了，国旗没了，不成功便成仁也没了……从今以后什么都毁了迹，仿佛戴了四十年的戒指一旦除下，便只剩这指头上一圈白痕。空空洞洞的白。一无所有的白。

唐大胜回乡的遭遇，点出了他们忍痛除青的动力。无论刺青还是除青，都是政治对生命的无端拨弄。那些刺青可以用镭射去除，但心灵里的伤痕能随之褪去吗？

那些血淋淋的誓词都去了哪里呢？大夫说是钙化了，吸收了，吸收了又是去了哪里呢？血里吗？髓里吗？

下意识的，他又去摸摸背上那块碗口大的疤，疤还在，纠结如树

皮，他安了点心。

“大夫叫我再过二个月来，”王正福今天不知为什么，叽叽呱呱，说个不休，也许疼狠了就不那么钝了，“那时候，你大概回去长住喏，不过我都记下了，下次怎么转车，我都记住啦。”

他说得自己像个乖孩子。

他们刚好走到车站，两人爬上车，车一时还没开，他大声地凑在王正福耳边叫道：

“下次呀——我还陪你来！”

“什么？”王正福也大声回话：“不是说好过了年，打完字就回去跟孩子长住的吗？”

“‘长住’的话，就以后再说吧！我想通了，我下个月回去看他们一趟，给他送点安家费就好，我过了十天就回来。我今天都想过了，以后的日子，留在三峡过就好——反正回那边也是三峡嘛；留这里也有三峡。哦，对了，你要给我记清楚，三峡就是底站，三峡下来转白鸡，白鸡下来走路，回到荣民之家。别忘了。”

“你放心，我忘不了——三峡就是底站。”

车开了，两人都累了，并且两人身上都有一点奇怪的疼。王正福右臂上的八个“图台湾”抵着唐大胜左臂已经消失殆尽的“杀朱拔毛”，在车子颠簸的律动中，两只胳膊一路磨蹭着，而两人也终于头并头的一路睡着了。

张晓风文中的那两个“老荣民”，唐大胜、王正福，下车后肯定相互搀扶着一起走向“荣民之家”了。他们在那个“荣民之家”里生活得怎么样？那个“家”真让他们享受到“家”的亲情和温暖了么？

三、荣民之家

在台湾，那些在军中服务六年以上的复原退伍军人被称为“荣民”，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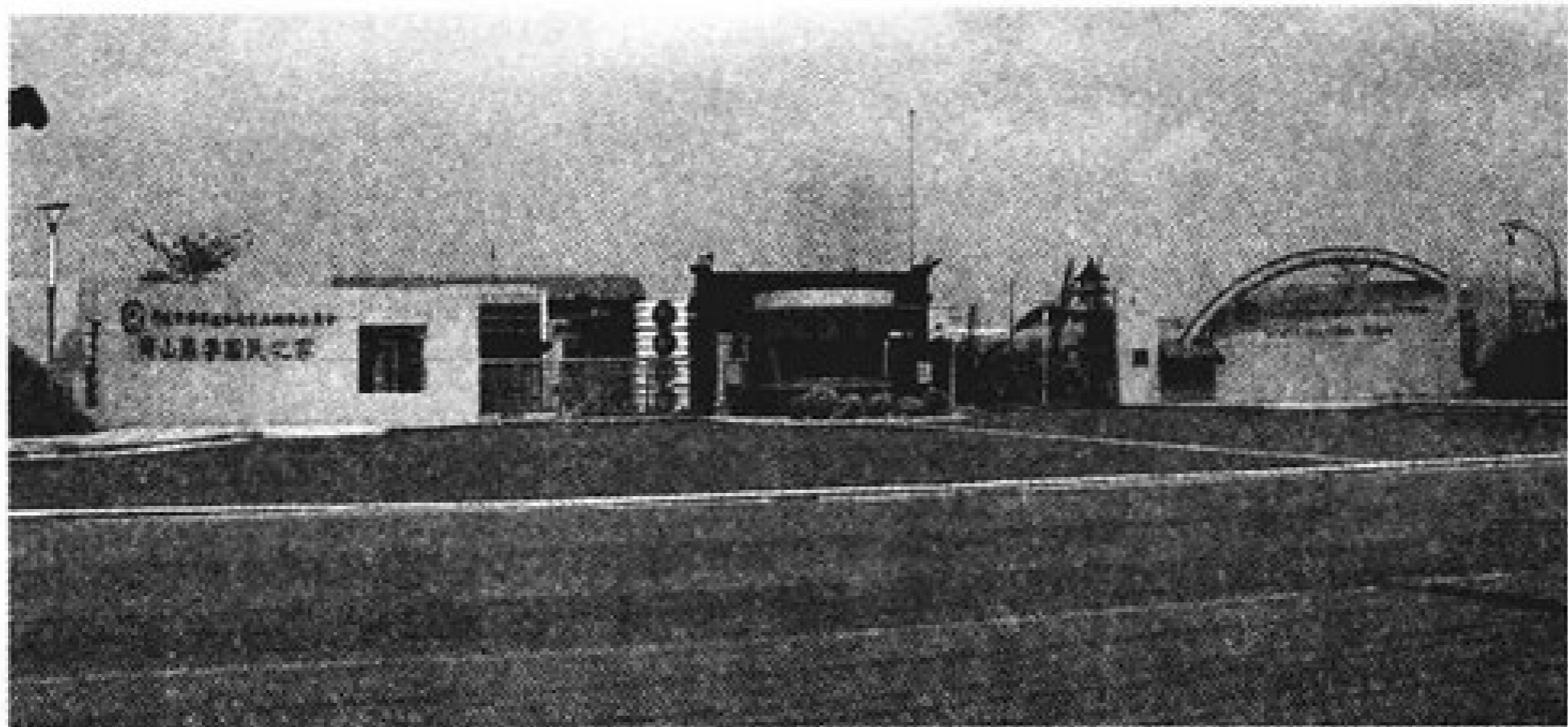
“荣誉国民”的简称。是台湾当局为了让全社会都来尊重退役军人所给予他们的尊称。而“荣民之家”则是专门为那些没有成家的孤身“荣民”修建起来的集体生活场所。

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有60来万军人随“国民政府”一起撤到台湾。其中陆军约有50万人，海军4万5千人，空军4万5千人。1954年又加上一万四千去台的志愿军战俘。在这60多万军人中除了极少数原本是台湾籍的（在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里只有两位是台籍），绝大多数人的“家”，都留在了大陆。

五十年代，台湾当局为了“反攻大陆”的需要，想方设法使军队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士兵留在部队，做出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是志愿或是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必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为了防止女共匪借结婚之名渗透部队，也避免军人们因为结婚而分心，当局还制订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军人户口查记办法”。“条例”和“办法”规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现役军人除非在军营以外的地方仍拥有家庭，拥有栖身之所，才能申请军人身份补给证。这就是说，一个低阶的士兵不可能结婚，而他们没有家庭，也就不能领取军人身份补给证。而军人身份补给证却是作为军人唯一的身份和依据。

作为外省人，他们本来就因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想融入台湾本土社会已经不易，加上这一切人为的限制，去台湾的老兵们想要成个家就十分困难。1959年，当局虽然把对他们的婚姻限制放宽到年满25岁的士官可以结婚，现役士兵服役满三年也可以结婚，并没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1968年又修正军人户口查记办法，让大多数的军人可以拥有身份补给证。但到了这时候，那些低阶士官兵差不多都已经40多岁。因为当兵不自由，老兵们一到退役年限都离开军队当上了“荣民”。于是荣民们的成家、就业、医保、养老等问题日益成为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重视。

蒋经国从1956年到1965年整整十载亲自担任第二届“退辅会”（国军



岗山荣民之家外景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提出要让荣民“有归宿、有生活、有希望、有前途”;使荣民“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废疾皆有所医”的工作目标。蒋经国曾亲自率领荣民劳工队伍参与修建“东西横贯公路”等台湾重大建设工程;又为荣民建立了全台湾最好的“荣民总医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孤身荣民们有所归宿,由政府出资修建了多所“荣民之家”。

可能是由于赴台志愿军战俘的身份和境况特殊,台湾政府曾在桃园县远郊专门为退役的原志愿军战俘修建了一所“反共义士之家”,收容那些退役后无法自谋生路又无处可以投靠的“义士”。该所收容的“光棍义士”最多时超过三千人。后来“反共义士”的政治影响在台湾社会日益淡化,“反共义士之家”也就更名为“荣民之家”了。而退役的战俘们也可进入其他的“荣民之家”养老了。

在台湾各地,共建有十几处荣民之家,修建初期规模都较小、也比较简陋。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各荣民之家都有较大改善。以高雄县的“岗山荣民之家”为例,我们从网上找到如下资料:

岗山荣民之家(“行政院”退役官兵安养机构)

地址:高雄县燕巢乡安招高村成功路一号

沿革:最早期是一破旧营房,军队撤离后,设立“岗山就业训练讲习中心”,培植政府来台后大量需要的公职人员。后来政府为扩大安置退役官兵,乃于民国四十八年(1959年)7月1日于原址成立岗山荣民之家,初隶属台湾省社会处。民国七十年(1981年)7月1日,

改隶属于“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迄今。

任务：主要任务是安置战（伤）残或年迈贫苦无依之国军退役官兵，给予生活照顾，使其安享晚年。

组织：置主任一人，全面综理安养工作，副主任一人为助手，下设辅导秘书人事政风会计保健六组，员工 168 人（职员 52 人，工级人员 116 人）。

安置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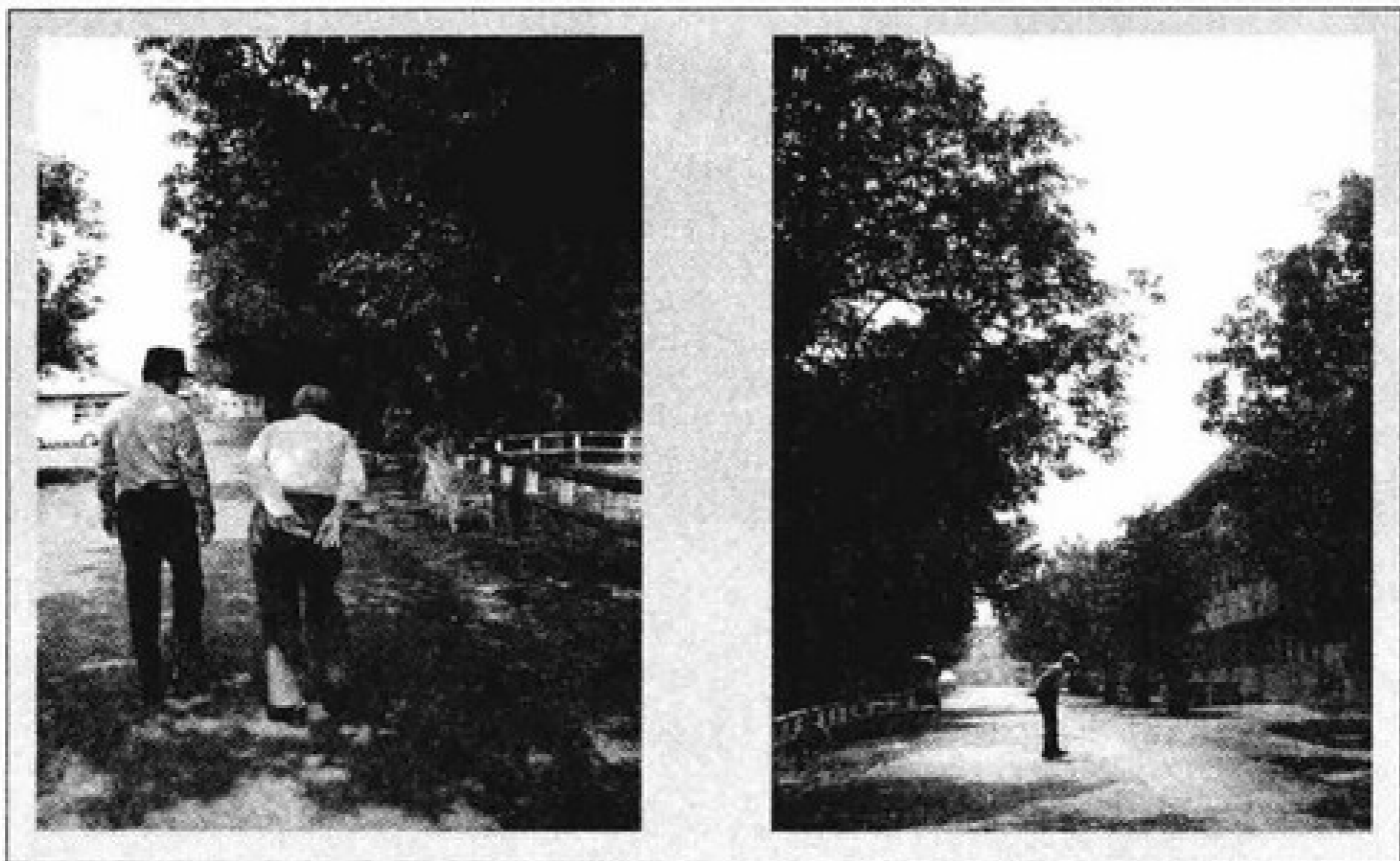
（一）国军退役官兵因战（伤）病成疾失去工作能力，经鉴定合于就养残等者。

（二）凡依法退伍除役之官兵，具有荣民身份，年满 61 周岁，未支领退休金，且无工作能力者。

安置保健服务内容：

（一）医疗保健：病重者由专车，专人送至荣总住院。本家经由地方卫生机关核准，设有荣民养护站和护理站。

（二）残瘫与失智荣民之养护与医疗服务。



荣家的老人在散步

孤独的荣家老人



屏東榮家外貌



新竹榮家的牌匾



榮民在榮家娛樂



台灣榮民在榮总医院



台北榮总医院外貌



台北榮总医院内部大厅

(三) 精神生活調理：設有“長青服務室”提倡休閒娛樂、宗教信仰、音樂治療養生會。

其他服務：大陸定居榮民返鄉探親服務、遺產繼承、清寒榮民子

女奖学金。

荣岗未来：现在的主任委员邓祖琳表示：“要将荣家美化为公园，成为优质的居住环境，以使荣民乐于住进。”他们还将依据“家区环境总体营造中程计划书”，预定五年内投资巨额资金，整建荣舍美化环境，创新经营理念，提升服务品质，使荣家达到现代化、人性化、家庭化、公园化之理想目标。

附设机构：荣岗幼儿园，为燕巢乡的年幼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环境。荣家大礼堂，在还没有活动中心的时代，提供燕巢乡各机关团体办理大型活动的场所。

我们还了解到：早期岗山荣家安置的对象，大多是属于因战或因公成疾而无法工作的荣民。里面也住了一些断腿或断手的去台志愿军战俘，他们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在战俘营里留下的刺青。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在开拓台湾中横公路的受伤者，由于当时财政困难，他们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过的并不快乐。

目前，该处安置的大部分是退役后的原国军军人，少数是原去台志愿军战俘。他们现在受到有计划的安排照顾，都过着有尊严有保障的日子。虽然规定荣民可以回大陆定居，但由于家乡的情况不同，很多荣民，尤其是原去台志愿军战俘依然愿意住在这里颐养天年。

目前安置状况：(1) 重度瘫痪 94 人 (2) 轻度瘫痪 117 人 (3) 失智 73 人 (4) 一般安养 867 人 (5) 平均年龄 77.35 岁。目前安置有近千位单身荣民，在医护、辅导人员周全、完善的照顾下，住有百岁老人四人，逾九旬老者多达 64 人，好似一个长寿村。

一些身体不错、有资历的老荣民担任“房长”，他们还自愿地照顾同伴，每天都有人推着轮椅，带着身体不便或失智的同伴锻炼或散步。他们经常打扫整理花园，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荣民，并在多余的时间里做一些休闲活动。

这里的梅园原是安置女性荣民或其他有功荣民之单身配偶，但由于适合条件者少，又因建筑老旧且功能不全，目前已经由乡公所收回，成为该

单位的办公地点，位于荣家的左前方。

据台湾媒体报道：荣总医院对 60 多名老荣民进行了专业评估，发现他们都有程度不一的躁动行为，超过 5 成有忧郁症倾向。他们因认知、定向感退化及日夜颠倒，长者们常有为琐事争执，甚至随地尿尿，三更半夜不睡觉到处逛等问题。不了解的人多认为患者有厕所不上，随地小便，是故意捣乱，其实是患者无法认知现代厕所的样子，憋急了只好乱尿。为帮助失去智力的老荣民控制病情，台北荣总医院通过环境与情境的改造对他们进行怀旧治疗。将失智患者专区的厕所门面改成老荣民们熟悉的两片木制推门，并发挥巧思，在老荣民们以前随意小便的走道、喜欢喧哗的交谊厅等地方摆放蒋介石照片。结果才一个月，老荣民们的躁动与忧郁情绪都获得了改善。晚上就寝时间到了，就播放军中晚点名歌曲，长者们听了果然都乖乖上床睡觉了。

四、难以治愈的终生之痛

台湾当局对赴台志愿军战俘生活上的关照应该说已经尽力而为，荣总医院的治疗水平也相当高超。但是，台湾当局却无法治愈他们大多数人的终生之痛。这些老兵们的终生之痛乃是不能获得正常的婚姻！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中，多数人始终未婚。其中有一部分人为了自己成家并没有住进荣民之家，而是在政府调拨给他们垦荒的土地上自己修建了简易居室，逐渐形成一个特殊村落。后来有人勉强成了家，却无家的温馨。我们仅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80 多岁的李姓老人终身未娶。他出身在山西晋南的农村，从战俘营来到台湾已经快 60 年了。由于身体非常差，生活更加困难。他建在村子里的屋子非常简陋。漆黑的屋子里只有一个陈旧的衣橱和两张桌子，人在屋里勉强能够转过身来。屋子角落里的那张桌子，就是他吃饭和活动的地方。

刘姓老人 60 多岁才娶了老朋友的女儿，结婚时，她才 22 岁，他给了



战友又将分别，前路茫然难测。照片背面“同生死共患难亲如同胞”的赠言隐忍怎样的无奈

老朋友5万块订金。年龄差距这么大的原因是这个女人脑子有病，连饭也不会做。十几年中，老刘要照顾她，还要工作养家。哪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几年前去世了。

七十年代，在台中县的后里马场，一位原志愿军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缩的媳妇，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动也不能动，每天躺在床上，连吃饭喝水都要老兵喂。老兵当时在马场工作，每天喂马、放马，还要回家照顾她，平时还要找时间上街捡垃圾，好多赚一点钱。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件事，其实这个老兵有自己的想法：这样他就可以不用花钱出去找妓女了，也不会染上什么病。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不少原国军老荣民想办法回大陆故乡去娶个妻子。那时，这些老荣民们虽然大都年过60，但他们几十年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在大陆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些大陆女人便嫁给了他们。她们不少人来台后对老荣民照顾有加，让他们晚来享福；但也有的老荣民被大陆新娘骗得很惨。

77岁的高老伯娶了一个年轻的大陆新娘，没想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他就被这位新娘用药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积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有200多万元新台币被老婆骗走，但他表现出无悔的样子，说反正是给大陆做贡献了。尽管如此，不少人还在前仆后继地迎娶大陆新娘。理由很简单，亲不亲，故乡土，人一老，就怕孤独，想念家乡。他们回不了家，但家乡的一山一水常常出现在梦中，思乡之苦无人能解。因此，大陆新娘成为他们的感情慰藉。有的老人说：这么大年纪了，娶老婆干什么啊，就想有个人陪着说说家乡话，做点家乡菜，一起回忆儿时的玩耍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枕边，多一点温暖罢了。

但是，老荣民们却少有人享受到这种温暖。压在他们身上的那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得他们很难迈出返乡的脚步，更不敢企望回去娶一个新娘。

荣民之家的一些老人们，整天在院子里游荡。有时在夕阳中，也可以看到，几个矗立在老榕树下类似唐大胜、王正福的老人，他们那满是皱褶的脸上毫无表情，只在混浊的眼里，还闪现着晶莹的泪花。

第十一章

奋 进

(1960年代—2000年代)



1979年6月18日，赴台志愿军战俘文晓村经过努力，在他52岁时获得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士学位。

上个世纪 50 年代，台湾在经济上相当困难，在政治上相当紧张，台湾当局对待赴台志愿军战俘采取了跟对待国民党军人基本上一视同仁的政策：鼓励支持他们勤学苦练、积极上进。因文化素养、智力体力以及精神心态等方面差异较大，各自发展境况不尽相同。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有些人通过自己不懈奋斗取得可喜成就，成长为教师、技师、工程师、律师、医师以及企业家、作家、诗人等等，对台湾社会发展做出了一份贡献。

一、在台北难友家

1994 年 5 月张泽石随老伴第一次去台湾探亲，在台北专门探望了他的原志愿军 180 师的几位被俘难友。其中他最熟悉的是老梁。老梁是山西阳城人，1993 年夏天回老家探亲路过北京时，张泽石曾邀集在北京的 180 师难友设宴欢迎他。当他知道张泽石有亲友在台湾，就再三说到了台湾一定要去找他。张泽石一到台北就给老梁去了电话。张泽石对这次探访有较详细的记录。

五月中旬台北的气候已经相当炎热了。



张泽石（左 3）与台北作家聚会



你在他乡还好吧：风雨同舟，团结一心加油干

去拜访的那一天，在台北市工作的大侄子开着他的私家车，载着我们老两口，按照老梁留给我的地址在台北县新店市找到了他那三楼一底的别墅小院。听到我们按门铃，老梁带领全家七口人到大门口迎接，亲切热烈的气氛跟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酒楼里聚会时那种客客气气、言不由衷完全不一样了。坐在他那宽大整洁的客厅里，喝着阿里山的香茶，我们兴奋地促膝而谈。我老伴则下厨房去陪嫂夫人做饭。

老梁笑着说他根本没想到真能在台北见到我，确实太高兴了。我说：“我也没想到你的家这么宽敞，真为你庆幸！还是让我先看看你的楼房吧。”老梁领我转了一圈，回到客厅便应我的要求从头述说他这40年来的经历。他到台湾后被分到后勤部队开军车，1968年退伍，按规定他们既可以按月认领退伍金，也可一次性领走终生的退伍金。他选了后一种办法。

“当时我就用那笔钱在眷村买了一间房子，成了家。后来我又考上了台北市公共汽车公司司机，起早贪黑地一直干到60岁退休。退休时我从公司又领了一笔养老金。现在这座楼房就是那时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添钱购置的。”老梁有些自豪地对我说。

“院子里那三辆汽车都是你的？”我从窗口望着院子问他。

“当然都是我的，那辆小轿车是我们老俩口自己用的，那辆中型面包车是全家用的，至于那辆大轿车是我现在挣钱的帮手，我用它每天接送附近的小学生上学呢！”

老梁大概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惊讶表情，便告诉我他们刚到台湾时生活很苦，每月的军饷只够个人零花，直到退伍时也没好多少。

“生活上怎么苦都没啥，难熬的是心里的苦！那时候因为想家，晚上常偷着抹眼泪。”

老梁垂下头叹了口气又说：“咳，‘四八分家’那天，要不是大队长把我打伤了又专门派人看着我，说什么我也不能走这条抛家弃亲的路！”看见他的眼里闪着泪光，我却一下说不出安慰他的话。

“我们台北的几个难友传看了你在北京送我的那本《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大伙儿对你挺感激的！”

“为什么？”这真出乎我意外。

“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当年你们确实大都是被强行送来台湾的。没料到的是你们现在回乡探亲，成了衣锦荣归了。”我笑着说。

“老张，前年我头一次回老家探亲，咱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轮流设宴招待过我，劝我投资办厂。村里的头头们更是天天来问寒问暖，弄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我是对我爸我妈实在想得不行了才厚着脸皮回去的，哪里想过什么衣锦荣归啊！”

“老兄，这个我完全理解。”我看着他眼睛说。

“可老家的人，



战友相互勉励：“胜利底向前”

特别是年轻人，只羡慕我们现在多富足、多风光，哪里知道这几十年我们受了多少歧视排挤，吃了多少苦头！”

“你要是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

“我们来了以后，台湾本土的人把我们看成是从大陆来跟他们抢饭碗的，处处排挤我们；从大陆跟随老蒋来的人又看我们是不可靠分子，常刁难我们，也瞧不起我们。更难受是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台北这么热，可我们一年到头不愿穿短袖衣服，为的是不愿让别人看见手臂上刻的那些不光彩的字。我……”老梁的目光暗淡下来。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说实话，刚来台湾那几年，我还真盼着老蒋反攻大陆。我这个侦察员出身的怕什么呀，在韩国那一仗，要不是在异国他乡，语言又不通，老子早就突围出去了！他要真把我送过海去打仗，我就不信老子跑不脱！”老梁显然有些激动了。我同情地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后来眼看老蒋光嘴巴硬，根本不可能动真的，我也就死了那条心，就一天到晚拼命干活，什么也不想了！”

“没想早点成个家？”我轻声问。

“成家？那时候台湾是男的多女的少，人家正经八百的‘国军’还有不少人当光棍，哪就轮上我们了！我们差不多都是过了40岁才结的

婚。”老梁说着扭头看了看正在厨房做饭的夫人，又低声道：“你嫂子还是个高山族呢。”

“老兄，这回我算真的弄清楚你们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了。”

“其实，在我们



师道永存于心，师生相互勉励

这些人里，我算是不错的了，在桃园县的‘荣民之家’里还有几千名咱们的人单身住在那里养老，他们这辈子里是没啥盼头了。”

老梁的这番话让我的心收紧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在呼喊：“这一切难道都是他们的错么？”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艰苦奋斗”

正当我们陷入沉默，嫂夫人来请我们入席，老梁急忙起身到酒柜里取出一瓶茅台酒，高兴地说：“这还是我从大陆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喝，今儿个咱老哥儿俩干了它！”我见他酒还没进嘴，脸已经红了。

“咱俩不能多喝，你回头还要开车送学生上学呢。”我还真怕他喝多了。

“你难得来一回，今天我让儿子替我开一趟就是了。”他一面说一面已经把酒斟满杯。

“好，谢谢，好，咱俩多喝两杯！”我发觉老伴正用膝盖在桌子底下碰我，要我赶快答应。

“老张，我得先谢谢你。你是看得起我，没有嫌弃你的这个不争气的老战友，才肯来看我。我请你干了这杯！”老梁声音发梗、眼圈发红。他们全家人都跟着站了起来。我心头一阵发紧，赶快举起酒杯说：“好，好，为了你多年艰苦奋斗建成了这么好一个家，为了40年后咱俩还能活着见面干了这杯！”

我已经很久没沾过烈酒了，这一杯茅台下肚，立即感到全身发烧，但老梁那几句话更使我心动，心痛。我没料到他内心的痛苦是如此深重！

饭后，老梁夫妇把我俩请到他们的内室，老梁从枕下取出了一块



“让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闪光的手表和一副沉甸甸的金手镯对我说：“老张，你们千里迢迢从大陆来，我们这点小礼物送你俩留着纪念。”老梁话刚说完，嫂夫人就已经将手镯给我老伴戴上了。

她还拍着手说：

“你的皮肤比我白多了，这手镯戴到你手腕上好美。”

我老伴直伸着两只胳膊，扭头为难地看着我。我见她脸都急红了，赶快向老梁说：“老兄，你俩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块手表我要了，可这副手镯在大陆确实戴不出去。请你给嫂子解释一下，别让我老伴为难了。好么？”

老梁看看我又看看我老伴，便用闽南话低声与嫂夫人商量了一下，嫂子又从自己手上将下一只金戒指对我老伴说：“大姐，我们先生早就跟我夸奖过你好贤惠，让这只戒指带给你好运气，莫再推辞了好吧！”

听着嫂子的声音都变了，我急忙向老伴使眼色、点头。老伴这才接过戒指戴到手指上说：“嫂子，戒指我带回去做纪念，谢谢你了！”说完取下手镯放在桌上，这才皆大欢喜。

老梁跟我商量，若我们时间紧，来不及各家都去，就由他召集在台北市区的五位我们原180师的战友，明天找个酒楼在一起会次餐。我提醒他别忘了通知大家带上夫人。

第二天早晨，老梁开车来接我俩前去聚会，他们五位难友早已在餐厅里等着我们。都是40年未见面了，只能依稀辨认出当年的面容。一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等我跟当年我们团宣传队的战友小赵握手时，他先是抓住我不松手，后来就一把将我抱住，最后哭出了声。



“努力学习理论，前途光明远大”



前进无疆

我也忍不住流了泪。夫人们发出了一片嘘唏，老梁这时站出来说：“嘿、嘿，有朋自远方来，应该不亦乐乎，你们怎么搞的？都坐下、坐下，喝茶、喝茶！”

通过交谈，我知道这几位战友来台湾后没有一直消沉下去，退伍后或上学或进修，很顽强、很勤奋，成了律师、教师、医生，也都有了家业。我深深为他们庆幸！只是进入老年后，他们叶落归根的愿望日益强烈，而拉家带口的现状又不允许他们自己回老家安度晚年。我只好劝他们趁走得动经常回去走走。他们抢着说，他们回去已经不止

一次了。还说，要是两岸真的实现直航，又允许把亲属接到台湾来就更好了。于是，我们大家都说：“就盼那一天早点到来！”

那次聚会没见到已经成为台湾著名诗人的文晓村难友，老梁告诉我老文正好回大陆探亲，只好下次再见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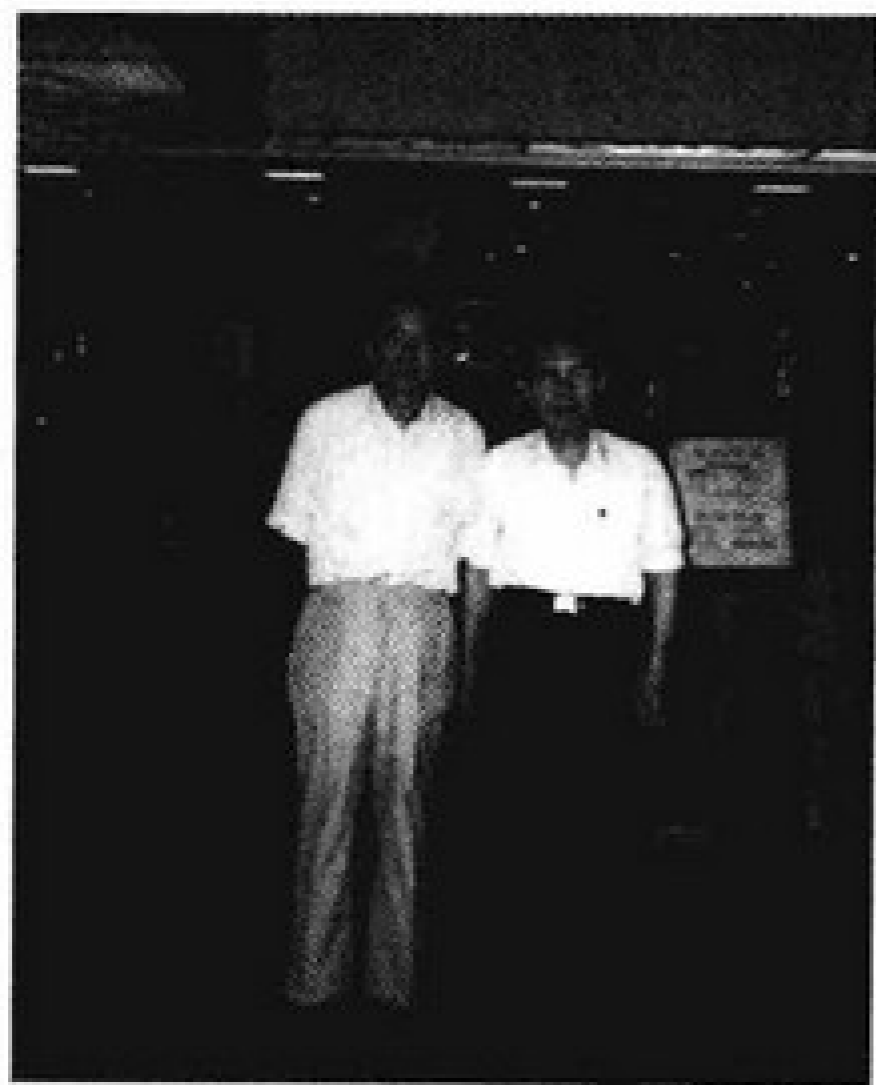
聚会结束时，我老伴再三邀请难友们带上夫人去北京玩玩，说我们在北京等他们。夫人们直点头，可高兴了！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在北京接待他们，陪着他们观光长城、颐和园、故宫等名胜古迹，实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念想。

二、“国军英雄纪念馆”里的聚会

2002年9月，张泽石再次去台湾探亲。他在屏东妻兄家接到文晓村从台北打来电话邀请他到台北聚会，说：“已经在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订好房间，让咱180师在台北的难友们住在一起好好团聚两天。”张泽石第二天一早就坐火车北上，黄昏时分抵达台北。文晓村在火车站接上他，一

起到了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老梁等六位难友已经在餐厅等着为张泽石接风了。对这次难忘的聚会张泽石记载如下：

在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我这个当年的“共军”也享受到了该馆对国军退伍军人的同样礼遇。那两天，我们这些当年的战友、难友，从早到晚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先是一起回忆了当年打太原、解放成都那些难忘的故事，回忆了入朝作战的种种艰辛；后来他们问起我们七千人归国后



文晓村（右）与张泽石在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

的实情。我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回大陆后的遭遇、我们180师的师团营领导人和我自己经历的磨难以及我们争取落实政策的经过。大家不胜唏嘘。老梁说了一句：“在咱们国家一旦当过俘虏，怎么也不会有好下场！”

文晓村安排我跟他住在同一间客房，便于我俩有更多的时间交流。台北是个不夜城，到凌晨一两点钟窗外还灯火辉煌，我俩在那个“国军英雄纪念馆”里长夜促膝交谈。



作者在台北与志愿军战友难友聚会

原来他在部队被包围后，在荒山野岭中过了13个月极其艰辛的野人生活。1952年6月他在被搜山队捕获后押送到汉城以南金浦机场战俘营。在那里，他受了一个月审讯，没有被送往巨济岛，却和另外四个难友一起被送往琉球的军事监牢里做苦工。1953年7月停战后，美军分别询问过他们的遣返志愿，他们五个一致坚决表示回大陆。他们苦苦盼望着回家，一直等到1954年3月12日，美军终于将他们送上飞机，告诉他们：“这就送你们回家！”文晓村说：“一听到要送我们回家，一想到不久就要见到父母妻儿，我在飞机上止不住泪水涌流！哪知一下飞机，看见迎接我们的军官帽子上那颗帽徽竟然是国民党军徽，我的心彻底凉了！”停了一会，他苦笑道：“这就是我亲身体验到的美国式‘尊重人权’、‘尊重战俘的自由意志’！”

由于文晓村明确表示自己并非自愿来台湾、不想当“反共义士”，他先后在台北新店“反共义士感训队”和“绿岛监狱”接受了当局两年多的审查与“感化教育”，1956年8月才被分配到部队。文晓村自幼酷爱文学诗歌，他开始写诗、发表诗，用诗歌表达自己对亲人故土

的思念和对改变不幸命运的向往。1958年退伍后，他考入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我感到他的奋进成长经历是我们去台湾一万四千难友的典型。我甚至想：他们没有像我们回国后那样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惩罚束缚，才得以按照自己的爱好与特长去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在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那次难得的聚会，让张泽石更详尽地知道了到台湾的难友们的命运并非原来想象那样凄惨，除了对亲人故土的思念之痛，他们的境遇跟我们回大陆的大多数难友截然不同。通过那次跟文晓村在台北“国军英雄纪念馆”的彻夜长谈，后来又通过他的《自传》，我们得以十分详尽地了解文晓村在台湾的奋斗历程。

三、诗人文晓村的成长经历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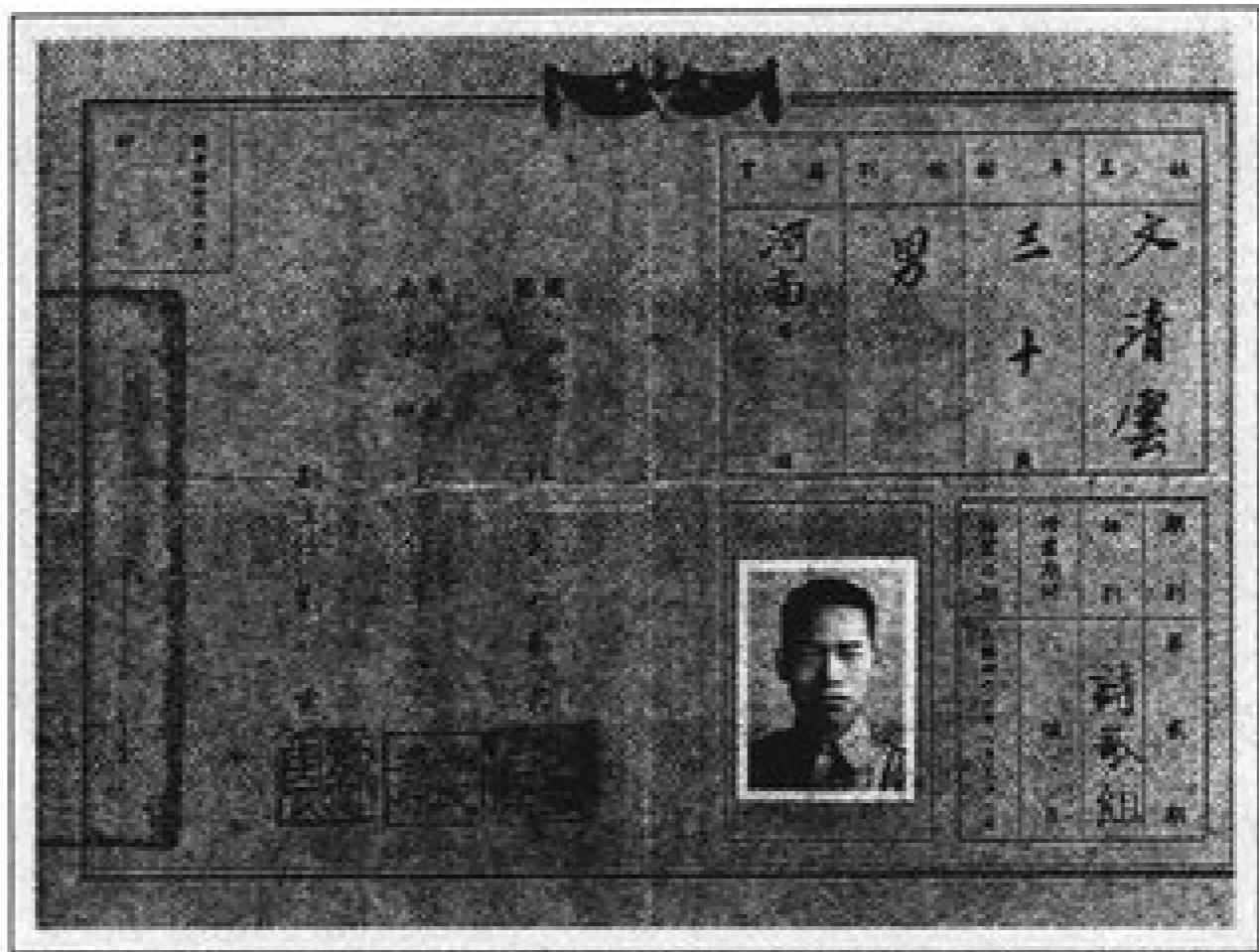
试探文学之路

文晓村在结束绿岛监狱生活后返回台北等待分配工作，他在此期间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诗歌组（学员证是2—2—030）。半年后，他取得由“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军中文艺函授班主任李辰冬、副主任刘云等三人联合署名的“结业证书”。

他之所以选择函授学习，是因为那时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读书。但他在大陆参军之前只读过一年初中，学识基础不够，再加上又背着一个“解放军”、“志愿军”的标志，想正式进任何学校的大门，恐怕比登天还难。读函授学校，既不要证件，也不考虑身份，是进修的惟一途径。而他之所以选择学文艺，是因为他明白以自己的身份绝不可以闯入台湾的“仕途”，何况他又对文学有高度的兴趣。

1957年8月，他们五个难兄难弟被派遣到台湾“国防部”的一个下属

单位，取得了正式上班领薪水的资格。1958年1月，他又参加了军中文艺函授班小说班，也是半年结业。1959年10月，文晓村接着报名参加了军中文艺函授班小说研究班。（学号是9-7-023）



1957年9月30日，作者（原名文清云，1959年12月改名文晓村）自“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军中文艺函授班诗歌组结业。

此时，他的文学才华开始显露，他写的《贼心》、《爱与幻》等四篇习作被校长发现推荐到正式刊物发表。这对他下决心踏上文学之路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60年8月1日，文晓村获得叙任陆军通信兵中尉。据说，这是比照国民党军队被俘归来人员，以降两级任用的原则核办的通案。正式当上国军军官也给了文晓村一些安全感：可能真的是解除“监管分子”身份了吧！？

同年九月，台湾“中国文艺协会”主办的文艺研究班公开招生，文晓村又悄悄地报了名。他是班上最用功的老学员。他要为自己生命开创出一条新生之路。

1961年10月，“中国诗人联谊会”与“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大楼举办的为期半年的“新诗研究班”开始上课。讲师有余光中、上官予等台湾著名诗人。文晓村再次悄悄报名，成了每周三次（晚间）准时到课的老学生。他在新诗研究班非常用功，当时的习作很多，除了上官予将其《湖畔》介绍给《幼狮文艺》发表，余光中将其《独弦琴之音》刊于他所主编的《文星诗页》外，文晓村也主动将他的《落霜之夜》、《渡者，在迷津》等诗篇，分别投给《中华副刊》、《海洋诗刊》等发表。

在结业典礼上，文晓村得奖金一百元。对他的评语是“对于新诗的理论与方法，均有较其他研究生深刻的研究与认识，为最用功的学生。”以及“专心向学，人品端正。应予奖励。”。

1962年4月28日，在新诗研究班的结业典礼中，有人提议，为了加强新诗的创作活动，应该创办一份诗刊。这个提议，犹如缪斯的召唤，同学们纷纷响应，经过一阵讨论之后，推选出王在军、李佩微、蓝云、古丁、史义仁、宋后颖、文晓村七人为筹备委员，葡萄园诗社乃由此诞生。文晓村被选为总编辑，这是他正式进入台湾诗坛的开端。

2. 战胜可怕的挫折

1962年7月15日《葡萄园诗刊》创刊号问世。它凝聚了文晓村的心血，也带给文晓村奋进的力量，只是他完全没料到自己的厄运并未终止。文晓村在他的《自传》里写到：

《葡萄园》季刊第二期提前五天，配合双十节，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出版。社论是古丁执笔的《谈诗的明朗化》，诗论有纪弦的《过分的理论化是要不得的》，译介有胡品清《法国象征派大师魏尔伦译介》，论评之外，并刊出其代表性诗作八首；写作示范有覃子豪《“金色面具”之自剖》；诗作有上官予《赏月》、张健《回翔的一周》、亚薇《爱誓外二首》、向明《声音》、文晓村《十月两题》、叶珊《永恒》、王祿松《砍断台风的翅膀》、高准《橙黄的月球》等，均为掷地有声的佳作。作为一个编者，我心里颇为得意。

就在我心里颇为得意的时候，忽然接到服务单位的一纸命令，指我参加葡萄园诗社，担任总编辑，违犯国防部四十三年通甲字多少号命令，现役军人不得参加民间社团活动。命令我三点：“第一，立刻退出葡萄园诗社；第二，立刻辞掉《葡萄园》诗刊总编辑；第三，今后不得对外私自投稿，如果投稿，必须先经呈核。否则，严惩不贷。”还有

附带的处罚：“检束半年。”

辞去《葡萄园》总编辑之后，精神所受打击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到以自杀来结束这痛苦的人生。我之所以没有走上自杀的路，主要是内心有一股强大的生命热流。我无以命之，就姑且称之为诗歌的生命支撑着我，使我活了下来。其次，我觉得，如果我这样不清不白地死掉，只会让迫害者得逞，毫无意义。



诗人文晓村

不能让痛苦一直压迫着我，我要把这内心的痛苦释放出来。于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深夜，我把自己想像成一尊木讷的灵魂，如何遭受不公平的审判，面对冰雪封冻的世界，如何让不死的灵魂，像大戈壁沙漠之下的塔里木河般地流下去，从而完成了一首《木讷的灵魂》，投寄给朱啸秋先生主编的《诗、散文、木刻》杂志，在次年二月的第五期登了出来。不久，《火炬》诗刊第二期又加以转载。

为了使读者朋友了解，那时候，甚至是那个时代，我内心的痛苦和不屈，现将全诗原文，抄录如下，请读者指教：

一尊木讷的灵魂

被置于十字架下 审判台前

等候审判者降临

神祇在上 手握律令

木讷者在下 静聆命运的判决

证人和律师席上坐着旁听者

因此 罪 是确定了的

没有辩护
 没有怨愁
 且不闻哭泣之声
 心灵是一束白色的檀木

这是冬季
 冬在此树起它的权威
 皑皑的白雪 冷冷地

禁锢着荒漠的原野
 旷野 没有一只兔子的足迹
 蝙蝠和蛇的氏族们 如僵尸一般
 在黑暗的洞穴中寂然冬眠
 森林凋零 音乐鸟全都遁逸
 满目尽是鹿族吊丧的长角
 伤感的太阳 脸色苍白
 风的哭声凄凄

在木讷的深处
 不死的灵魂 恒然存在
 一如大戈壁的沙漠之下
 隐藏着一条塔里木河
 幽幽地 微微地
 奏着神秘的音乐

文晓村没有在人生的挫折中消沉，他用诗歌去抗争。1964年他的第一本诗集《第八根琴弦》问世。

不幸的是，1965年3月，文晓村因在《家庭教育》第十、十一期合刊



上发表了一篇《小简》，他所服务的单位又给他扣上了一顶“有泄露机密嫌疑”的大帽子。当即押送到屏东外海小琉球某单位，第三次接受“检束感训”。且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

小琉球有一个职训总队，管训流氓和被判刑的罪犯，一律剃光头、着灰服。我被“检束感训”的这个单位，全街名称叫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大门口挂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什么“所”（我们私下戏称它为“研究所”）。所的主管是一位上校，姓岳，河南人，我的同乡，人品端正，性情温和，颇受敬重。指导员是一位中校，湖北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敏感多疑，绰号紧张大师，被他管理的人员，好像都是犯了什么天条的罪犯。实际上，我们这些学员，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有上自上校，下至少尉的军官，也有治安单位的官员；共同点是，都犯有“过错”，却不是判刑的“罪犯”。学员进进出出，多则二十几人，少则十儿人。穿着是中山服。每天的功课，就是研读国父思想、总统训词，写心得报告。和往常受训不同的是，每天早上，由学员轮流宣读蒋经国先生的《自反自勉录》。

“检束感训”结束后，文晓村在朋友帮助下离开了台北那个两次整他的服



文晓村的自考文凭



文晓村的自考证书

务单位，于1967年2月调到高雄的凤山陆军步兵学校。此时的文晓村已经变得很坚强，苦难只会更加激起他奋进的决心。

1968年2月台湾《青年战士报》刊登了“第四届军中文艺金像奖征文公告”，文晓村用半年时间埋头创作了歌颂中华文明的1200行长诗《这一代的乐章》应征，结果获得了第三名。当年10月31日，年满四十岁的文晓村在颁奖典礼上从“参谋总长”高魁元上将手中得到获奖证书及一万五千元奖金！文晓村说：

“荣誉、金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对赢得了在台湾合法作家的资格，却真的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从1968年到1973年，文晓村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的工作和薪俸为生活基础，以“葡萄园诗社”为创作园地，一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诗作，一方面为建设台湾新诗的中国风格：“健康、明朗、与中国”而竭尽全力。在台湾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1973年8月“葡萄园诗社”决定请文晓村重新出任总编。这一年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3. 当上师范大学老童生

1973年，文晓村已年满45岁，竟以待退军官之身，考取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他说他并非为了想当官去重复古人范进中举之路。那他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学得怎样呢？让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回顾。

我从小第一志愿，就是从事国民教育，后来因为抗战，放弃了读师范做教师的机会。到台湾，迫于客观环境，做军人成了唯一的选择，再没敢期盼有一天我会走入师范大学的校门。

但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我终于走进了台湾师大文学院国文专修科的教室，开始了回味无穷的两年师范专科教育的大学生生活。尽管授课地点是板桥市中正路四三五号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教育中心，而不是师范大学的校本部。

我们这一期，是国文专修科第十期，共录取了一百四十人，分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班。我被编入乙班，学号是六二三一七一。第十一期起，改为四年制的国文系，只办了两期，因大陆来台服役的军官，基本都已退役，这个由退辅会委办的国专科和国文系，便告结束。前后十二期毕业的老童生，约计一千四百人。一方面解决了一千四百位退役军官的生活，一方面也为国家社会



文晓村大学毕业照

造就了一大批教育人才。说起来，不能不感谢蒋经国在退辅会主任委员任内，开办国文专修科的德政。而我们这一批被称为老童生的求学精神，可用“夜以继日，勤勉不懈”八个字来形容。我们这些四十多岁进大学的老童生，大都是因为抗战、内战。离乡背井，失学流浪，或自愿或被迫从军来台，临老退休转业，却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读书求学的机会，无不兢兢业业，力求上进。

每天早上，我们把教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窗玻璃擦得一尘不染。开学后不久，班会即决定，要为每位老师准备一只茶杯，还要弄清楚，哪位老师喜欢喝什么茶，是龙井，铁观音，还是菊花？每节上课前，把茶泡好，放在讲桌的右前方。在茶杯旁边，另置一个小盘子，置放洒有香水的小毛巾，让老师随时擦手。上课时，老师走进教室，值日生要喊：“起立！”等老师走上讲台，全班齐声高喊：“老师好！”下课时，值日再喊：“起立！”全班再高声齐呼：“谢谢老师！”有几位老师，只有三十来岁，很年轻，但我们仍是恭谨有礼，一丝不苟，赢得许多老师的好感。国文系老教授江应龙老师（已去世）曾公开写文章，表扬“国专科的学生，是全校最能尊师重道的一群。他们喊口令，问候老师好的声音之洪亮，几乎把屋顶的瓦都震落下来”。

文晓村以他原有的初中学业基础要在两年内完成大学学业，除了他本

人的玩命之外，还有他遇到的老师都很尽责，有的还十分优秀。他在《自传》中动情地叙述了其中两位：

王更生博士，是当今台湾研究《文心雕龙》的大师。……王老师上课态度非常认真；课文讲解尤其详细，往往旁征博引，非至完善境界不为功。王老师又常借板书为助。每讲完一节，即有综评及翻译。而其板书之工整端秀，粉笔过处，犹见毫锋，若毛笔书法。此虽小节，却能见其教学态度认真之一斑。王老师也是一位诗词吟唱和古文美读专家。有一天，同学们要求他为我们作示范吟唱，他也欣然允诺。并当堂借了一本教学实习的课本，以河南曲子戏的声调，将周敦颐的《爱莲说》唱了一遍，让我们享受耳福之时，也大开心窍。我在心底，不禁悄然有赞：大师风范，其此之谓乎！

教《国学概论》课的黄丽贞老师年轻贤淑，是另一种典范。……论年龄，黄丽贞老师大约比我们这些老童生要小十岁，但她上课时，那种女性特有的丰采，不急不徐的声调，我总觉得，她不仅是一位谆谆教诲、令人尊敬的老师，而且是一位年轻、温柔、慈爱的母亲。她的脸色、眼神，充满女性教师、母爱的光辉。有一次，期中考后，黄老师亲自点名，发考卷。点到我的名字时，黄老师说：“我教《国学概论》以来，从来没有人考过一百分。本班文晓村同学，这次四道申论题的答案，几乎是完美无缺，我扣了他一分。但他的答案实在很好，我要给他加一分，让他成为破纪录的一百分！”全班响起一阵轰然的掌声。从黄老师手中接过那张一百分的考卷时，我忍不住流出了感激的眼泪。

文晓村于1975年国专科毕业，该年8月，他被分派到台北市立松山国中任教，圆了他少年时的教师梦。但他并未放弃继续深造的追求。1976年夏，文晓村又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完成本科学业。他写道：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在国父纪念馆所举行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六十八级毕业典礼中，一生戎马、脱掉军衣、重披青衫、苦读五年，终能戴上方帽子的一百四十七位老童生，难免会有人流出喜悦的眼泪。而我却把这些泪水吞进肚子里，留待明天，浇灌我们的民族

幼苗。

4. 万里姻缘一线牵

1960年台湾当局曾经准许军人向大陆家人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书由当局统一寄出。文晓村也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并得到了回信，给他最大的安慰是父母健在，最大的痛苦是他的妻子已经被迫带着他的儿子改嫁。文晓村把妻离子散的悲痛压在心底，全力投入了上学进修。直到15年后他47岁时、大专毕业当上教师真正“立了业”，才迫切感到该成家了。其实，曾经有两位女子对作为诗人的文晓村钟情，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而被女方家长阻止。“特殊身份”是那时一万四千去台战俘迟迟不能成家的重要原因。老天有眼，让文晓村终于在苦难中获得了新的姻缘。

1975年清明节，我从高雄北返。我搭的是一班平快车，不对号。又是春假的最后一天，返回机关学校上班上课的旅客很多，车厢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车抵彰化时，上车的人好像比下车的人还要多。火车开动后。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一位小姐，满脸汗水，不停地用手帕擦汗，肩头上还背着一只看来颇为沉重的袋子，我便伸手帮她把肩上的袋子拿下来，塞进头顶的行李架上，她回报一声羞涩的“谢谢”！

后来，又见这位小姐，几次连番地往额头上猛擦绿油精，好像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示意请她坐下。她道谢后，欠身落座。但不到五分钟，她便站起来，把座位又让给我。我觉得这位小姐很有礼貌，顿生好感。过了一会儿，我又让位给她。就这样，因相互让座，不知不觉地开始交谈起来。

她说，她是桃园一家针织厂的女工，昨天周末，几位同事一道来彰化玫瑰中心赏花，今天在彰化上车时挤散了。我也告诉她，我是一个脱掉军衣的老学生，再过两个月，会到国中去教书。她在桃园下车前，我请她在我的日记簿上留下了通信地址。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叫

邱淑嫦。

适值蒋公辞世之际，过了一周之后，便以瞻仰蒋公遗容为借口，写信邀请那位小姐，来板桥相会。想不到她真的来了，且是一身素色便装，未敷脂粉，正是赴丧致哀的模样，而无半点赴男友约会的样子。

我们搭车直奔乌来，观赏瀑布，乘缆车，游览云仙乐园。忽逢午后降雨，二人坐于池边石崖之下，借避雨而深谈。接着，又有阳明山和石门水库之游。多次交往之后，我觉得这位小姐善良、开朗，虽然读书不多，但应该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而我自己，国专科毕业后，马上要进入学校，开始教书生涯，必须把生活安定下来，才能面对陌生的未来。就在这一念之间，我决定速战速决，在一次周末约会中，我坦白表明：“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谈恋爱，如果你愿意，我希望在九月开学之前，我们就结婚，好吗？”她以点头代替回答。

举行婚礼的前夕，在8月2日下午在电视新闻中，文晓村突然看到强烈台风波蜜拉，将于3日上午通过台北的消息。结婚请帖在一周前都已发出，临时改期，已不可能。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有硬着头皮，照常举行婚礼。

八月三日上午九时，礼车由桃园出发，开往台北。走的是高速公路，一路上，惊险万状，尤其是在林口高地那一段，风狂雨骤，小轿车迎风疾驰，颠簸起伏，好像随时随地都有被吹翻的危险。到台北时，街上人车几乎已经绝迹，我真担心，餐厅会不会开门？即使餐厅开门，会有几个人胆敢冒着强烈台风，来吃这可怕的喜酒呢？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一进门，便被满屋的人声、掌声、道贺声所包围。诗人、作家、亲朋好友这份情谊，暖流般地流入我的心坎。

新婚后的文晓村夫妇比翼双飞，溪头、阿里山、澄清湖、垦丁公园，留下了爱的影踪。为蜜月之旅，他写下了散文诗《溪头行》，全文如下：

不再去乌来，撕瀑布为手帕，揩我们湿湿的双足。也不再去阳明山，躺在情人峰下，枕一下午的流泉——约会已经结束。

这是第一度，我们张开脚掌的翅膀，若比翼之鸚鵡。飞向南方，

飞向森林的深处，看松涛的风韵，听蝉鸣的琴音。

纵然夜寒如秋水，浸透我们的肌肤，季候雨的千丝万缕情，把我们织进锦绉网里；那低低的风韵，柔柔的琴音，依然伴随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在溪水的尽头。

5. 诗坛展现才华、推进两岸交流

1987年10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1988年7月在回乡探亲路过香港途中，在文晓村建议之下与香港诗人蓝海文、丁平，大陆诗人雁翼共同发起组织“世界华文诗人协会”并起草了会章。1989年12月，由《世界中国诗刊》宣布“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正式成立，促进了广大海外诗人的交流和联谊。文晓村在河南老家结束探亲后，又有不公开的北京行，跟邹荻帆、邵燕祥等著名诗人愉快会面，探讨了如何加强两岸诗歌交流。不久，文晓村编辑出版了《大陆诗选三十家》，香港蓝海文编辑出版了《当代台湾诗萃》，大陆诗评家谢冕、杨匡汉编辑出版了《中国新诗萃》，引发了海峡两岸和大陆、台湾、香港三地诗歌交流的开端。

1993年8月，刚从教师岗位退休的文晓村，第一次带领“葡萄园诗社大陆访问团”，在北京、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武汉、重庆、贵阳等八大城市进行了三十天的诗歌之旅，会见了各地的诗人、诗评家，掀起了两岸诗歌交流的高潮。后来，文晓村又多次带队访问大陆。他是怀着对故国的一片深情不辞辛劳奔波于两岸的！

四、两次被评为“模范父亲”的马守斌

如果说文晓村的经历是赴台难友中的特殊个案，马守斌的经历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马守斌 1930 年出生于山东泗水县农村，少年时只念了两年学。1951 年 3 月入朝作战当年 6 月被俘。到台湾后被分到第七军 19 师炮兵指挥部，他在 1954 年学会了汽车驾驶，以后还在炮兵部队干过通信、观测等。后来，他随部队在台湾本岛、金门、马祖各处驻守了两年，到外岛共去过六次。

到台湾本岛后，又先后在桃园、台北、彰化、台南、屏东等地驻防。因为那时候炮兵不住彰化就住云林，在浊水溪两岸训练，南边向北打、北边向南打。台湾当局在那时候经常宣传的就是要“反攻大陆”，要打回老家，他们也不懂，上面长官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到了 1965 年，他想退伍，但是上级说他们没到规定年龄不能退，没办法他们很多人就去考官校，读官校专修班，马守斌文化底子薄，发奋努力，竟然考上官校。到 1967 年毕业后又回到炮兵，当观测官、副连长，一直当到连长，他由于勤奋、敬业，到 1977 年退役时他的军衔上升到了少校。



马守斌的炮兵连



解放军炮击金门



金门国民党军队和地下工事

当炮兵的时候，他的部队经常对着大陆打传单炮，那些传单的内容很多，什么台湾的“总统”就职，节日庆典，以及对大陆的反攻宣传等。这些炮弹打过去一爆炸，传单就满天飞。他们每天打 11 发到 22 发，把炮拉到海边，临时找个阵地就开始打，连长带着打，下午 5 点多钟出发，到了海边，布置好以后天黑了就开始打，打也不是连续打，三分钟左右打一发，打的方向也不一定，经常是这里打两发，转个方向又打几发，反正打得到大陆上就行。整个打完以后，马上得把炮拉起来，用汽车拉回来离开，不然的话对方发现目标就打你，马守斌当时是副连长，在金门时带部队打了

几年的时间，直到他回到台北才结束任务。

在台湾军队里面，10年之内再没有升迁的话，一般就要退役了，马守斌年近40还是个连长，在体力和学识各个方面都已经落伍了。就是不退役，像他这样的，最多可以升到中校。但是一百个人里面也难得有一两个，因而他选择了退役。

马守斌退役后原来想做生意，但是一没本钱，二没经验，只能选择做工。起先，他在高雄中日合作的木材公司工作，非常辛苦，一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还得经常加班加点。马守斌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差点累垮。无奈之际，正赶上南迴铁路招工，他在南迴铁路一干就是13年。在南迴铁路的建设中，他担任餐厅的管理，负责采买柴米油盐以及杂货。为了工作方便，单位还给他配了一台汽车，每个月给20升汽油，不够的话自己负责，一般情况下，这些油都用不完。在南迴铁路上班马守斌觉得很方便，因为时间自由，他可以照顾三个孩子。当时，由于高中、大学都是私立的，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学费就得一万元台币。他和太太两个人的工资，也刚够开销。

在婚姻方面，马守斌算是幸运的。他们当兵的时候没有机会谈恋爱，也没有多少钱，而且在金门和马祖时也根本不可能谈。1964年，马守斌的一个朋友退伍后找他借钱，说是想做生意，马守斌就借给那个朋友五千元。后来，他的这个朋友发了财，刚过了两年，就给马守斌还了二万元。马守斌拿着朋友还的钱对朋友说：“这笔钱你可以继续用，我要钱也没有什么用。我们是军人，工作很危险，说不定哪天打仗就死了。”朋友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没有用呢？你可以用它结婚啊，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帮忙。”

有一次，马守斌所在部队一个朋友结婚，约他去吃喜酒，新娘的妹妹问他结婚了没有。马守斌说结什么婚，现在想都不敢想。这个热心的女人就给马守斌介绍了一个16岁的女孩子。订婚的时候马守斌到女孩子家里和她见了面，这个女孩子家里很穷，但她个子很高，马守斌基本上就同意了。第二天，女孩子的父母就来找他，说他们也同意了，只是聘金要两万，一毛也不能少。对于马守斌来说，这件事就好像买东西一样。他把朋友还的两

万块钱都给了女孩子的父母。1969年5月8日，马守斌和这个名叫徐英妹的女孩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那时候台湾的女人相对较少，愿意和军人结婚的女人，不是贫穷就是身体有残疾或者智力有障碍的。马守斌结婚的时候都快40岁了，但在军人里面，像他这样幸运的也不多。结婚后的马守斌很少回家，基本上都是三个月才能坐船回家一次，而且顶多只能在家里呆一个星期。马守斌的太太比较内向，开始在一家食品加工厂上班，后来也到南迴铁路去工作，如今她还在台湾东部铁路工程处上班。马守斌和太太对孩子们教育的很严格，他们的孩子们也很上进，大儿子在屏东高中毕业后就读于中原大学，现在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他的大女儿现在在中厉电子公司工作，小儿子现在在上海昆山的万瑞科技公司工作，是那个公司的高级专员，每两个月可以回台湾休假一次。他虽然在大陆工作，但是在台湾公司的薪金照发，每个月有600元的美金，往返的机票都是公司负责。马守斌夫妇对待孩子们虽然很好，但是绝不溺爱他们，让他们自己奋斗，在社会上去拼搏。

从80年代开始，马守斌就回过大陆老家几次，他的家人如今在世的只有妹妹了，他每次回去，都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马守斌感到了家乡人们的热情，因为他是台胞，每次回去，都受到乡里和村里领导人的招待。他亲眼看到，大陆现在变化很大，乡下也是一样。开始他和儿子女儿回去时，孩子们一天都不上厕所，要上厕所的话，就得拿一把伞，因为当地的厕所都没有门。当他在90年代再回去时，他妹妹在他帮助下已经盖起了一栋小楼，楼里面的设施非常好，和台湾都差不多了。

马守斌是个热心肠和闲不住的人，他在南迴铁路退休以后，就给荣民们当义工。他经常给荣民们办事，和他们聊天，帮一些不识字的荣民代写家信。其实，他在没有退休前也一直在帮助这些人，所以，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热心助人、教子有方的马守斌在台湾两次被评为模范父亲，第二次还得到了由“内政部长”吴伯雄亲手发给他的一块纯金的奖牌。

【摘录整理自台湾退役军人辅导委员会属下的“荣民历史文化网”】

站”所刊载的《韩战战俘口述历史——马守斌访谈录》(2006年8月2日)】

五、“绿庄飞阁”寄乡情

2007年12月1日，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最优美的民宿“绿庄飞阁”度假山庄落成启用。该山庄董事长陈光兴的“老兵奋斗史”事迹，使得参与启用典礼的所有嘉宾动容。而其四个子女的孝心与亲情，胼手胝足，合作无间，建造出傲视全县的这座民宿度假山庄，也令人赞誉不已。

“绿庄飞阁”山庄占地五千二百坪，它座落于埔里郊区灵岩山寺附近，亭台楼阁、奇花异木、小桥流水，处处散发出“江南骨日本风”的幽雅秀美景色。就连小池塘中悠游的锦鲤都是比赛获奖的特选品种，可见董事长陈光兴的用心。

度假山庄内的一花一木都有着特殊的来历。山庄餐厅门前，左右各有一株松柏，董事长陈光兴兴致勃勃地向参加开业的嘉宾介绍说：“大



台湾高山农场景色

家现在看到的这两株松柏，以后枝叶会衔结在一起，游客进出餐厅时就能享受‘松柏常青’的意境。另外，庭园中有一棵真柏，是园艺业者花数十年培植而成，造型奇特，我也是花高价购来的。”

山庄的院子里面，有些银梧已开花；有一棵“九芎接紫薇”：以九芎为树头，上接紫薇，求其造型兼花开之美；黄杞花开时，满园花香，更可引蝶，增添园区情趣。

“绿庄飞阁”的室内设计很宽敞，也很讲究温馨典雅的气氛，让游客在

室外沐浴于绿草花香之余，回到室内可以放松心情，享受另一番柔情蜜意。

在“绿庄飞阁”向南投县政府申请民宿经营许可证时，县里的有关人员到现场考察，即被它的秀美所折服，赞誉全县第一民宿度假山庄。他们建议由“普通民宿”改为“特色民宿”。陈光兴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可以说，山庄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是因建造者的用心异于常人。陈光兴的长子陈明顺大学研究所毕业，现从事教育工作，次子陈尚纬擅长营造，开了一家营造公司，三子陈鼎均是装潢专才，长女陈芳玉大学毕业，与夫婿从事电气行业。

令人敬佩的是近四年来，陈光兴一家人为了建造这一座美轮美奂的“南投第一度假山庄”，从设计规划、建材与花木鱼草的选购，到一草一木的配置，都是用全家人的心血凝结而成的。陈家四子女不分彼此，团结合作，几乎全年无休地工作，除了使得建园工作进展顺利之外，更因为他们的孝顺父母、兄弟姐妹团结一条心，使得家庭和乐、事业成功，树立了“兄弟同心，点石成金”的典范。陈光兴的夫人林玉惠不顾疾病的折磨，也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山庄。

除此之外，陈光兴一生出生入死，从困顿中走向小有成就的传奇故事，更令人动容。

1931年，陈光兴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十一岁时因伤寒高烧一周，病得只剩皮包骨，父亲见他如此光景，只好含泪为他买了一口棺木，随时准备安葬他。谁知阎王爷没有收留他，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是同样得了伤寒病的母亲却没有他这样的命运，在病魔的折磨下，离他们而去。

1946年陈光兴15岁时被抓丁入伍，他在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虏，在抗美援朝时，随军进入朝鲜作战，在冰天雪地中行军。有一次，他因脚趾起泡而掉队，部队开拔时，他却因近乎昏迷而深陷雪中，未被战友发现，冰天雪地的荒野中只剩奄奄一息的他，所幸后来被人发现而救回一命。在一次极为残酷的战斗中，连长阵亡后，他背了连长的尸体继续匍匐前进，连长的身上再度中了数枪，他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又被美军所俘。

陈光兴来台后被安排住在林口，两年后被编入军队，并被派到南投县的雾社，部队协助开辟中部横贯公路，陈光兴开大卡车载运食粮建材等补给品。在山区工作约两年后，他认识了不少当地的民众，大家都很谈得来，居民有什么困难，他都乐于协助。有一次有一户人家兴建房子，陈光兴不但开车代运建材，还利用休息时间协助挑砖搬石砌墙，不取分文。他的这种热情让居民感动得热泪盈眶。陈光兴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不但拉近了与当地居民的情谊，且促成了他日后一段好姻缘，娶得美娇娘。

陈光兴的妻子叫林玉惠，林玉惠的母亲听亲戚说陈光兴虽然是外省人，却有好品德，热心助人不取分毫，就同意将年仅16岁的林玉惠许配给陈光兴。在订婚时，许多亲友都冷嘲热讽，说将女儿许配给外省的穷光蛋，难道不怕日后女儿饿肚皮？连老实的陈光兴也向她母亲说：“你把女儿许配给我，我是穷光蛋，很怕将来养不起妻子。”但林玉惠的母亲独排众议，对亲友说：“我女儿饿不饿是她自家的事，别人不必操心，我不会看错人的，即使将来陈光兴养不起，我也会予以协助。”岳母的这段话至今仍让陈光兴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1960年，陈光兴在军中同袍协助下，迎娶了18岁的林玉惠。婚后陈光兴更加勤奋，除了部队发给的薪金之外，能有赚钱的机会他绝不错过。陈光兴在军中待了十三年后退伍，转业入公路局开车，由于表现良好，年年考绩优良。因此，依规定都开好车。

林玉惠婚后除了照顾小孩及处理家务之外，就做家庭代工，增加一点收入。陈光兴更是多方攒营，能增加收入的事都不放过，例如由埔里到台中上班，就带录音带销售，收入虽不多，却能贴补一点家用，工作虽忙，回家还帮太太洗衣煮饭，一天只睡约五小时。后来还开杂货店，当过汽水产品南投县总经销及卖茶叶等等。手握方向盘，即使还赚点外快，要养四个小孩而想存钱仍不容易。后来，他从事房地产的中介工作，由于他待人友善，交游广阔，中介成功许多房地产，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埔里有一个建筑案，共有三十多间房子出售，他就成功中介出20多间，这也使他发了一笔小财。

其实，“绿庄飞阁”的土地取得经过也有一段感人故事。该地原是养鸡场，主人是一名寡妇，因负债养鸡场的土地被银行查封拍卖，数次都卖不出去，后来银行方面与陈家洽购，经双方及场主协商后订约。依约场主应清理场地，不料签约后场主又诉苦说，她是一个妇女，无法清除场内笨重的物品。陈家人见其可怜，也确实难以清除那么大的场地，因此允诺由陈家清理。不料清除后，那名寡妇又哭诉说：“我的售价仍不足抵债，我担保的亲友还会被银行追讨债务三十多万元。”面对如此变故，陈家人深明大义，又多出资三十五万元给她。这笔买卖不但感动了那名寡妇，连银行的主管都说：“我从业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买主！”邻近的灵岩山寺有个师父汇智也说：“陈光兴买下这座养鸡场辟建度假山庄是一件功德，他做了减少杀生、造福游客的大好事。”

2005年，陈光兴第一次回到万县故乡。然而，父亲兄长及所有长辈都已去世，他见到的都是一些晚辈，陈光兴特别到父亲兄长的坟前祭拜。母亲由于去世较早，她的坟墓因年久已找不到了，这件事，令他非常怅然。回想起自己15岁离家，重回家乡已是六十年之后的事，令他感慨万千！

本章列举了几位赴台志愿军战俘奋斗成功的实例，他们从一开始只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到后来进一步为生命的尊严与幸福而奋斗，表现不屈服于被强加命运的顽强斗志。当年他们不少人还是带着巨大的身心创痛开始自己奋斗历程的，这种成功就更加来之不易了！

不幸的是，像他们这样不屈奋进并取得成功的难友在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中只是少数。

第十二章

探親之路

(1987年春至今)



1988年夏天，要求回乡探亲的赴台老兵在街头游行。

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在朝鲜战争过去三十年之后，台海两岸各自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陆结束了“十年动乱”走上改革开放大道，志愿军归国战俘们所受的不公正对待也基本上得到了改正。台湾在经济上实现腾飞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也有所松动。赴台志愿军战俘大都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在身份上也已获得台湾同胞更多的认同，成了“台胞”的一份子。只是进入老年后他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更加强烈。而几十万原本是国军老兵的“台胞”，比他们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思乡情。至于那些跑到外国去奋斗且事业有成的老荣民，更是提前以“华侨”的身份回到大陆探亲。

1988 年初，台湾当局针对赴台志愿军战俘的探亲愿望，也出台了允准他们还乡的规定：

韩战期间来台反共义士得依规定前往大陆探亲

【台北讯】内政部邀集有关单位会商决定，韩战期间来台的反共义士申请前往大陆探亲，得依现行一般规定办理。

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韩战时由韩国归来的部分反共义士，日前向境管局提出出境申请欲赴大陆探亲。据知，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曾以安全理由相告，劝其暂勿前往。

内政部乃邀集有关单位研商反共义士前往大陆探亲问题。警备总部代表在会中表示，一般反共义士的辅考时间为十五年。如无特殊事故者则应予撤考，即准其赴大陆探亲。警政署表示，反共义士与难胞一般均无问题，应无限制出境之必要，如有特殊情况可采个案处理。调查局认为反共义士如担任公职者仍不得前赴大陆探亲。会中作成决

议，韩战来台的反共义士申请前往大陆探亲依现行规定办理。

[1988-G1-29 / 联合报 / 02 版]

一、台湾开放老荣民回大陆探亲的一波三折

1987年春，台湾《中华杂志》刊登了大陆去台老兵的两封公开信。

第一封信中说：

我们是国民党的退伍老兵，……每个老人都会想念在家的亲人，……我们都已等了三四十年之久，一部分思乡过分的都已成了精神病人，可以在街头巷尾看到自圆其说的精神错乱者，情景十分凄惨！许多人因为在台孤苦伶仃，自杀病死的不计其数……我们三军老人，有数十万之多，十多岁出来到台湾，把我们简直不当成人，用完了就丢了。我们到现在这种年龄，只想回家乡看看我们的家园。

第二封信中说：

我们三军退伍老兵都已超过知命之年。40余年来，从未与大陆亲人通信，又不能返乡探亲，“内心痛苦，一言难尽”。我们总统再三训示我们三军以孝为先，我们连父母都不要，我们还算是人吗？

尤其是众多赴台志愿军战俘，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他们本来早就应该回归大陆的。此时他们不但思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也思念曾经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同生死共患难，情同骨肉的战友难友，只因甄别时的不同境遇而生离死别，隔离在海峡两岸，想到他们都能与亲人团聚，而自己却浪迹天涯，能不痛彻心骨？

国军老荣民们在发表他们的公开信后，又在台北举行了要求返乡探亲的请愿游行，在台湾岛内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关注，台湾当局不得不检讨其大陆政策以顺应民心。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乃召集国民党要员，研讨拟开放台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但国民党内数十年的反共“惯性”积重难返，保守气氛浓厚，阻力巨大。蒋经国极不满意，随

即让他的秘书马英九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

1987年6月，马英九起草的“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告竣，即“颖考专案”。“颖考”取材于《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郑国发生内乱，郑庄公打败其弟于鄢，并放逐其母姜氏，发下毒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后郑国大夫颖考叔以事亲至孝的行动感动郑庄公，并挖了一条能见到泉水的地道使郑庄公母子于此地道相聚，和好如初。这个故事让后人尊称颖考叔为“纯孝”。此“颖考专案”交由各方讨论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李焕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把开放探亲作为调整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后继续开放观光、贸易、体育与文化交流。具体主张是：

两岸官方关系仍坚持“三不政策”，民间则开放接触，使台海两岸由封闭进入互动关系，由紧张对峙进入和平竞赛，开放探亲事实上等于打破两岸的封闭关系，今后不宜再加阻拦。台湾经济上与政治上已有优越性，可以经由积极开放的大陆政策对大陆进行政治反攻，开放接触对台湾有利无害。开放探亲，进入祖国大陆的台湾人将是免费宣传者，同时开放对祖国大陆的接触，也有助于减低台湾人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从而减少“台独”的影响。

另一派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代表，主张维持官方“三不”立场不变，保持海峡两岸敌对状态。

结果，蒋经国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即仍然保留“反共”的基调，但有限制地开放回大陆探亲。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解除了在台湾已维持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了党禁、报禁，放宽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同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大陆官方立即表示欢迎台胞来大陆探亲观光。岛内老荣民便掀起了返乡探亲热潮。只是许多老荣民由于经济拮据碍难成行。

1988年11月，二千多国民党老荣民在台北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回乡经费没有着落的问题。根据1954年的《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应给予每一个退伍军人（包括“反共义士”在内）年产2000斤稻谷的土地，并发给

“土地证”，但在“土地改革”完成多年之后，台湾已基本上无地可分。台湾当局不得不收回“土地证”，按等级发给每人五万元、十万元、十五万元台币不等的补偿。于是次年申请回大陆探亲的人数激增，再次突破当局对申请回大陆探亲的人数限制。

去台志愿军战俘由于身上刺有反共字样及图案，难以回大陆探亲，遂要求当局设法消除刺青。“退辅会”决定由荣总医院进口一台激光扫描设备，通过激光手术去掉这些反共痕迹。既完全免费又没有太大痛苦，大家都很满意。申请返乡探亲的人也日益增多。

1988年春，大陆各地迎来了台湾老荣民返乡探亲的第一次高潮。成千上万个有亲人去台湾的大陆家庭在骨肉分离40年之后终于盼来了团聚的一刻。

1988年5月10日，笔者张泽石的妻兄一家人从台湾飞经香港再乘火车回北京来探亲，他陪同妻子及儿女到北京站迎接，亲身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张泽石的妻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国军空军飞行员。曾在对日寇空战中出生入死，屡建战功。1945年抗战胜利，妻兄次年即从成都调来北平任南苑机场站长，满足了他就近侍奉父母照顾弟妹的请求。可惜好景不长，当1948年内战烽火逼近北平时，妻兄奉命携带妻儿离别父母，从北平随部队撤往台湾。他到退役时军阶为空军上校，安家在屏东县里的空军眷村。其时妻兄夫妇的五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且皆侍亲至孝，他们本应十分满足，却因自己未能对父母尽孝而常于心不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两岸对立有所松动，妻兄乃托友人将一封“平安家书”从美国转寄回家，那封信给张泽石的岳父和妻子带来极大惊喜。遗憾的是岳母已在“文革”中去世，未能等到她儿子的这封抵万金的家书。

张泽石的岳父祖籍河北行唐县，是北平交通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铁路部门从事管理工作。解放前夕任清华园火车站站长。解放后被“留用”任资料员直到退休。“文革”期间因其“国民党空军家属”身份，被残酷批斗抄家。老人坚强地挺了过来。自从读到儿子第一封信，已经年近九十的老人健康状况大有好转，热切地期盼着跟儿子见面。



1994年本书作者张泽石与妻兄同游日月潭

1988年春节后，妻兄来信说他已获准带领家眷回北京探亲，将于5月成行。张泽石一家立即进行迎接准备，决定首先修建一个“洗手间”。当时张泽石的岳父还住在西城新街口那座老式平房里，解手必须去胡同口的公共厕所，那个厕所既脏且臭又没有隔板，上个月张家的邻居中有从台湾回来的亲属即因实在经受不住那种严峻考验而提前走人了。当时张泽石家境困难，幸好他曾在“右派劳改队”里干过泥瓦工、水暖工活，便自己动手在院子里掏挖渗井，购置及安装抽水马桶与上下水管道，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妻妹夫则自告奋勇专程前去香港迎接他们。

5月10号那天，张泽石请老岳父在家等着，自己带领穿戴整齐的亲属们早早到了北京站，那时不许进站接客，他们只得在出站口等待。妻子和她妹妹不敢确定在40年之后是否还能认出自己的亲哥哥。她们姐妹俩在潮涌而出的旅客中紧张地搜寻着记忆中的大哥大嫂，还要不断擦拭不听话的泪水。终于，妻兄一家在妻妹夫的陪同下出来了。两个妹妹扑上去紧紧拥

抱着哥哥嫂子，那样子是要确认自己并非做梦、是怕他们再飞走了！回到家里，就在当年父子告别的那间堂屋里，妻兄以标准军人姿态挺立在父亲跟前，沙哑地叫了声：“老爸！”便再也说不出话来，老岳父用颤抖的手无声地擦抹自己的眼泪，张泽石耳边响起了一大片抑制不住的饮泣声……

二、诗人文晓村艰难曲折的返乡探亲之路

1.

儿子的第一封来信

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可以间接通信后，文晓村思子心切，他在给二弟写家书的同时，也给已经随母远走的儿子晋生写了封信。信一发出，文晓村就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儿子是否还会认他这个无情无义的亲爹！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天晚餐后，我妻淑坤说：“你书桌上有封信，你慢慢看吧！”

我接亮书房的灯，坐在桌前，一眼便看到，用两张横写稿纸粘在一起的长信，开头的称谓是“敬爱的父亲大人”。再看最后的署名，竟是“儿晋生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写于侯马”。我迫不及待地再看信的内文，只看了两行，竟然泪如泉涌，看不下去。只好去浴室用冷水洗脸后，再回到书房来看信。仍然是看了两行，又泪眼模糊，看不成句，只好再去浴室洗脸。就这样，书房——浴室，浴室——书房，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才把一封四百多字的信看完。

下面是这封信的第一段：

当我接到经千曲百折由二叔转来的父亲大人的亲笔手书时，当我手捧着父亲大人寄来的“学士照片”和“全家福”时，我又一次止不住热泪如泉涌，感情的闸门终于被撞开了！从书信的字里行中，从照片的容颜笑貌上，我仿佛听见您大声疾呼儿子的声音，我仿佛看见您用颤抖的手，数次擦拭着串串珠泪，在深夜的灯光下，伏案疾书。儿

虽已虚度三十五岁，但生父的容颜，却始终是一个未知数。多么可怕而又可悲的问号呀？！终于我盼来了，我看见了，多么陌生而又可亲的面孔呀！做儿子的虽不能面见生父，但父子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历史虽无情地中断了父子之间的联系达三十余年，但却似有意于今日使我们又叙家常。万幸的是，您老人家历经千难万险，苦度生涯，健康而又愉快地生活在异地，这使我的心稍微得到了宽慰。更得知您老人家能在高龄下，获得学士学位，真是令儿肃然起敬！



1950年文晓村原配夫人全秋及儿子

事后，我知道，我妻淑嫦，已经在我之前，先看过此信，不知她是否跟我一样，也流过眼泪？

2. 先去香港会亲

文晓村和大陆家人通信数年之后，顿生回乡探亲扫墓之思，但按照台湾当局有关规定，出国观光旅游不准第一站先到香港，以免有些民众一到香港，就溜进大陆。身为公立学校教师的文晓村，为了保住一家五口的饭碗，当然不能“违法”。他和夫人商量，决定他俩利用暑假，参加新、马、泰、港的旅游，在回程最后一站，可以在香港会亲。就这样，1987年7月8日，文晓村夫妇参加了一个全程十一天的东南亚旅游团。7月18日上午，旅游团完成东南亚旅游返台，文晓村夫妇则脱队，搭计程车，直奔新界上水老友蓝海文家。

香港诗人蓝海文，是文晓村的挚友，也是一位干练的事业家，在新界



文晓村和他的父亲

上水新成路开设有大昌百货公司，通常上午9时开门营业，一面顾店，一面看书或写作，从容自如。

七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和内人到达新界上水，蓝海文在家中等候。我们一面聊天，一面等罗湖打来的电话。等电话的焦虑心情，实际上等于在读秒。读秒读到十二时，预计从广州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罗湖，电话铃仍然不响。我们开始猜想：不知是家人没有港币打电话，还是不会拨电话？海文说：“与其在家里坐等，何不到罗湖去接他们。”

于是，我和内人、海文三人，

便从上水搭火车，只一站路，一会儿就到了罗湖车站。

罗湖是广东和香港的交界站，出入境的旅客，都要经过安全检查。我们到达时，火车也已同时到站了，不知临时发生了什么麻烦，苦苦等了三个小时，直到下午三时三十分，终于和来自河南偃师老家的三弟立奇、妹妹群定，以及来自山西侯马的儿子晋生、儿媳凤兰、孙儿延龙、孙女延娜，在罗湖车站，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

特别是当我第一眼看见两个孙儿女，在三十米之外的禁区出现的刹那，我高声喊出：“延龙！延娜！”他们也几乎同时呼唤：“爷爷！爷爷！”并向栅栏后等候的我们直奔而来，我俯身将他们从一米高的栅栏外抱进来，然后，一手牵孙儿，一手抱孙女，那份祖孙之间，第一次血肉相拥的欣喜之情，真是永生难忘。

到了蓝海文家中，我妻淑嫦迫不及待打开行李箱，先取出两套童装，一套蓝色牛仔褲头，圆领衫，给十岁的孙儿延龙换上。一套白色

连衣裙的洋装，给六岁的孙女延娜换上，顿时，一个小帅哥，一个小仙女，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都鼓掌叫好。立奇、晋生带来的家乡土产，有小米、绿豆、红枣、核桃，扑鼻的乡土味，亦令人为之一振。

最令人感谢的是，老友海文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担心我们异地相会的老少三代八口，在消费高昂的香港，住旅馆（香港叫酒店）花费太多，坚邀我们住在他家，那份真挚的情谊，我也只能诚恳地接受。海文夫妇，更是日夕相陪，殷殷款待，比亲人还亲。

在海文家中，住了五天四夜，除了一天去香港市区逛街观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闲话家常。谈到父母生前过年过节，不忘为身在异乡的孩子放一双碗筷；母亲临终时，仍要弟妹们记住大哥的生日，而我此生对父母未尽半点报答之情，内心只有愧疚。惟在儿孙面前，也只能把泪水吞进肚里。令人稍慰的是，弟妹各家的生活，比起从前，都已大加改善。晋生的母亲和继父身体都还健康。我默默为他们祝福。

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在海文家的第一天深夜，闲话家常中。我妻淑嫦突然跟我弟妹说：“我跟你们一道回偃师老家看看好吗？”弟妹虽感意外，却七嘴八舌一致表示欢迎。三弟怕我不答应，拍着胸脯向我保证道：“大哥，你放心，我负责把大嫂送回香港。”

对妻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老实说，我真的不放心。况且这样私自去大陆，是否会触犯法律？经反复讨论后，结论是：妻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与任何公职无关，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政府应该是不会过问的，这从近来不少民众曾经返回大陆探亲，并未受到追究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而我知道，妻的用意，无非是趁这个机会，回到我的故乡，替我在父母坟前磕个头，烧点纸，以稍减我内心一生不曾尽过孝道的愧疚，我还能说什么呢？

就这样，我那年轻的、出生在台湾、对大陆故乡完全陌生的妻子，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我和海文夫妇祝福声中，跟随我的弟妹儿媳等家人，从罗湖车站离开香港进入大陆，展开一段不一样的探亲记。

3.

妻子先替他探亲

1987年夏，文晓村夫人代他回河南老家探亲，是文晓村生命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章。他在《会亲与探亲》一文中，对这段往事，有翔实的报道，现摘录于此。惟叙述者是文晓村夫人邱淑嫦。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从罗湖进入深圳，下午二时许，搭火车去广州。当晚，住进一家招待所，是套房，有浴室，但无热水，洗澡时，须用水桶到供应热水的地方去提取。房间费用，以床位计，每床人民币（以下同）十元。因太劳累，未吃晚餐，约九时半即入睡。

次日上午，因买不到火车票，趁便参观了中山纪念馆、广州博物馆，并游览越秀公园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公墓，在国父铜像前及国父手植的松树下摄影留念。中午，吃了一碗生炒牛肉的窝窝面，味道还不错。下午，原定搭二时的火车，因不知什么地方发生水灾，火车误点，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才搭上了火车。票价，自广州到洛阳，直达快车加卧铺，九十元。车行约三十四小时，二十五日上午到达洛阳。下车后，吃了一只味道颇甜的玉米穗，代替了午餐。然后，找了一家澡堂，花五角钱，洗了个热水澡，长途坐车的劳累，于焉解除。

下午，改乘汽车，回到偃师乡下老家，住在三弟家中。当晚，二弟、四弟和妹夫等，带领各家大小，齐集三弟家中欢聚，邻居村人也来了很多，可说是川流不息，气氛很是热闹。年轻的侄儿侄女们，喜欢问东问西，问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大伯在哪里教书，甚至问我和大伯怎么认识、结婚等等，我都一一据实相告。但当我谈到，台湾一般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时，孩子们多是疑信参半。

二十六日上午，诸弟妹各家大小，浩浩荡荡，不下二十人之多，带着水果蛋糕，香纸供品，陪我一道去父母坟上祭拜。坟地在村子的西边，周围种有蔬菜和玉米，因玉米已有半人高，挡住了坟墓，侄儿们动手清除了一片，把带来的各类供品摆好，焚香烧纸后，大家一齐

跪下祭拜。我在心里也默默地献上祷词：“敬爱的公婆：我是您们没有见过面的儿媳妇，从几千里外的台湾，回到老家来看您们，也代表我的丈夫和三个孩子，来给老人家烧纸，磕头，请老人家在天之灵接纳。”我默默地诉说着，心一酸，竟流出泪来。当时，也拍了纪念照，不知哪个小侄儿不小心，把那卷底片曝了光，这是我此行最感遗憾的事情。

下午，二弟陪我去看村边的那条晓村常常提起的伊河，现在，不但有很多人在河里洗澡，还有很多妇女在河里洗织布的线，河水被污染得比大汉溪还厉害，大概一般人还没有环境保护的观念吧！

我在老家一共住了七天六夜，诸弟妹和几个侄儿，轮流陪我到附近的名胜区去参观游览，先后去过少林寺、中岳庙、白马寺、龙门石窟等。最后一天，还专程去新安县，探望舅母和姨母。舅母七十多岁，身体尚健朗，还在表弟经营的面馆里招呼客人。姨母已八十多岁，耳聩目盲，十分衰老，当她弄清楚我是谁时，紧紧地抱着我，哭个不停，我和所有陪我同去的弟妹等，无不同感悲伤而泫然泪下。

想要动身回来时，家人都劝我，既然好不容易回到了老家，何不到处多看看，也可饱饱眼福。实在，欣赏大陆的名胜风景，也是我此行的愿望之一。于是，大家商量，晋生夫妇要回去上班，他们一家四口，先回山西。由三弟和妹夫妹妹，还有他们的小儿子，陪我去北京玩了几天。参观了颐和园、北海公园，吃了许多香甜可口的水蜜桃也游览了明陵和长城，看了那些古老雄伟的建筑，更觉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特别是站在长城上，极目远望，千山叠翠，尽收眼底，好像自己也跟着万里长城而伟大起来。

凭良心说，这次跟随弟妹返乡探亲扫墓，我也享受到家人很浓的亲情，特别是住在家里的那几天，几个侄儿、侄媳、侄女，一有机会就围在我身边，大娘大娘地喊个不停，好亲切，好温暖。临别的那个早上，几个女孩子，都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流下难舍难分的眼泪。在北京的几天，也玩得很开心。但是，每天晚上，眼皮一合，就会想到台湾的家和孩子。有时做梦，也梦见晓村给孩子们吃面食的情形，醒

来便担心，孩子们天天吃肉酱面，恐怕营养不够。后来，妹夫建议我再去西湖玩时，我便只有婉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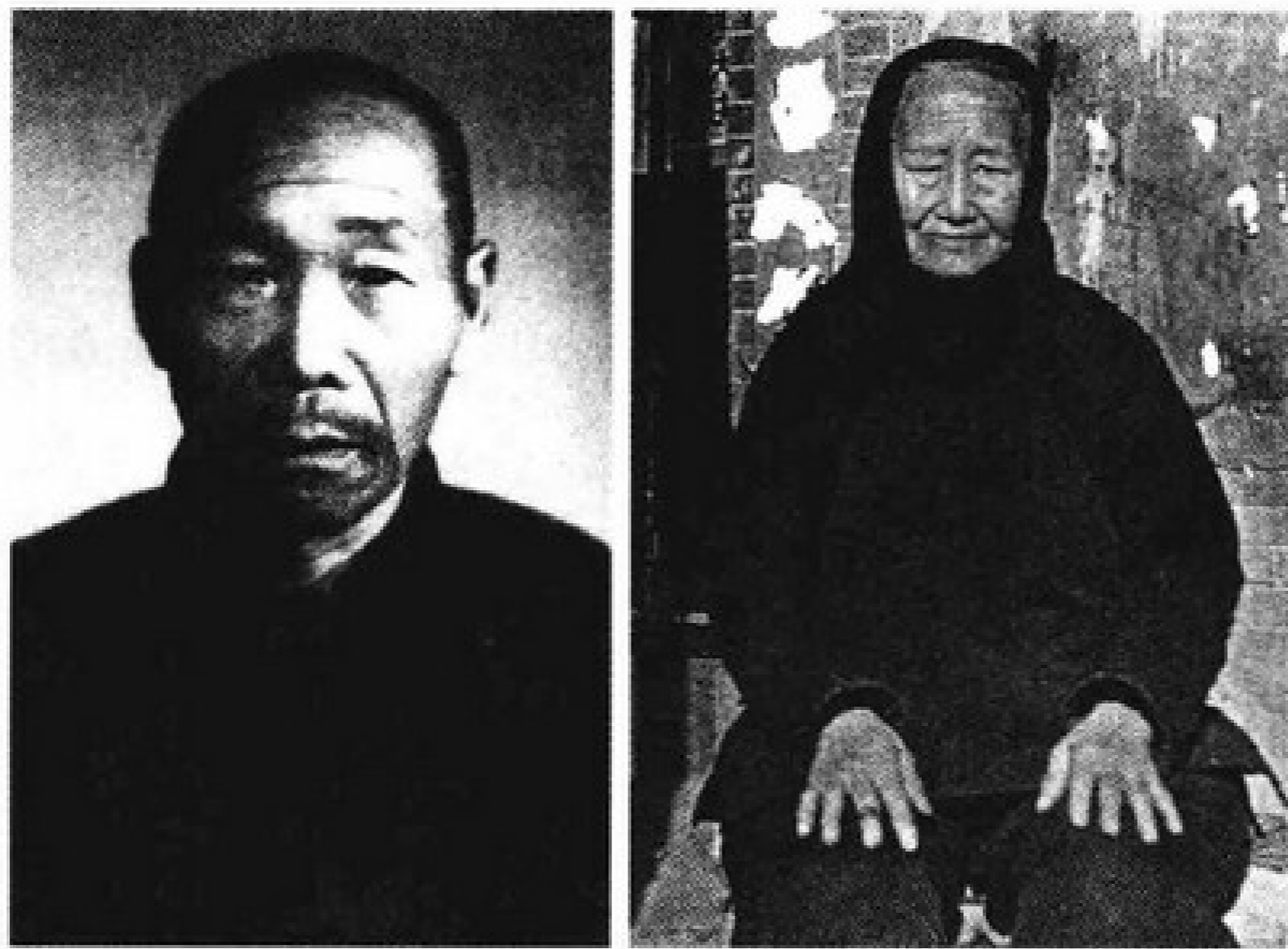
想到回家，真是归心似箭。八月五日下午，在北京车站，和群定妹夫妇，依依话别，互相祝福全家早日大团圆。他们搭普通快车回河南老家；三弟为我买了直达广州有空调设备的软席票，他自己则买了硬席票，和我同乘一列车，送我到广州。八月七日晚回到香港。

在香港等飞机的那几天，虽然海文的夫人天天陪我聊天解闷，心里却一直惦念晓村和孩子们，着急得很。今天，回到台北家里，真好！

4. 永难弥补的愧疚

1988年7月30日，文晓村终于跟随着台湾开禁后的返乡探亲大潮，回到睽违四十四年的老家。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全家老少十多口，带着香果，到村边父母的坟前祭拜。想到四十四年前，十六岁离家出走，投身抗战，今天以花



文晓村的父母像

甲之龄回到老家，生我养我的父母，早已入土，而我，只能跪在父母的坟前，面对黄土，哀哀哭嚎，苍天不仁，徒叹愧疚。

中午，在二弟老屋的院子里聚餐，面对厨房的屋门，不禁想起四十四年前，我就是站在这个厨房的门口，对十六岁的未婚妻，狠心地说出，我决心要参加抗战，打日本鬼子，为了不让她做年轻的寡妇，我不能和她结婚，伤了未婚妻的心。那餐饭，我吃得很苦。

在四弟家吃过一次晚饭后，我就搬到妹妹家里去住。妹夫王才高，头脑灵活，当政府鼓励人民发财致富、多数人还在犹豫不决时。他即大胆地向银行贷款，买机器，盖工厂，成了农村先进的纺织企业家。十年后，甄家庄村，像妹夫王才高搞农村纺织致富的，已不下数十家之多。四弟和洪涛、宏勋两个侄儿，也都盖了属于自己的新砖房。

八月二日，包了一辆计程车，由弟妹陪同，到一百二十里外的新安县城，先看了身体尚健朗的舅母，再到城西十里的寨湾村，看望八十多岁、耳聋目盲的大姨妈。当老人家弄清我是谁时，一直紧紧地抱着我，不知是心疼还是安慰地连说：“乖娃儿，乖娃儿！”好像她搂抱的，还是四五十年前的小孩子。又说：“你知道吗？我和你妈，好想你。”我只有感动，愧疚地满脸流泪。

从那以后，文晓村几乎每年都要回去给双亲扫墓，企望能够减轻自己对双亲的深深愧疚之情。去年文晓村病故于台北，如若他在九泉之下见到他的父母，他父母一定会安慰他说：“儿子，那不是你的错，我们不怪你！”

三、巾幗替夫还夙愿

闻喜历史上是出人才的地方，见之史册的有地理学家裴秀、文学家郭璞、历史家裴松之、法学家裴政以及唐代名相裴度、南宋名相赵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等。仅裴氏一门历代做过宰相的有五十九人，做过将军、尚书、御史等的有二百多人。正如宋代名相司马光所说：“闻喜士大夫之林



山西闻喜县城街景

藪也。”

然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这块土地上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战士，先后有四十多人被俘，他们在后来的甄别遣返中，有一半去了台湾，有一半回到了家乡。在去台湾的人员中，有个名叫王宗海的人，他在台湾的妻子却

在两岸封锁的年代，勇敢地替夫返乡探亲，传为佳话。

王宗海原是 180 师 540 团的小卫生员，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了。他在战俘营中渡过了刻骨铭心的艰难日子，最后也是到了台湾。刚到台湾时，他还是干自己的老本行。但他是个有心人，在台湾当兵的那段时间，他认真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医务技术，希望在自己离开部队以后能派上用场。果然，他离开部队以后，用自己的复转费在台北市附近开了个诊所。以后，随着台北市的不断扩大，他的诊所也被改造了，他利用改造的费用，开了一个更大更好一点的诊所。这时候，一个温柔美丽贤惠的女子闯入了他的生活。

林秀春，一个台湾实业家的女儿，她在台湾出生，因她的父亲希望她嫁一个出生大陆的人，姻缘巧合嫁给了大她 16 岁的医生王宗海。应该说，这是一段很美满的婚姻，结婚后，很快有了三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但林秀春发现，王宗海时常郁郁寡欢、暗暗发呆。在他内心深处，好像有一些难言的苦衷。

起初，王宗海说什么也不愿意告诉她自己郁郁寡欢的原由。林秀春动情地对他说：“中国古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王林秀春不光是姓了你的姓（台湾风俗）为你生儿育女，在这个世界上，最疼你关心你爱你的人就是我，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告诉我呢？”开放党禁、报禁之前的台湾，人们也是不敢随便说话的，为防止“隔墙有耳”，王宗海骑上摩托车，把妻

子带到远离市区的海边，向相濡以沫的爱妻吐露了心声。

他向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然后对爱妻说：“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忠孝两全，我虽然在台湾生活得很好，可是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



王宗海的全家福

如何，我的父母是死是活，我也不能为他们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最大的心病啊！”了解了丈夫的心事，林秀春下了决心，她要替夫回大陆老家，替夫尽忠尽孝。

1987年初的一天，林秀春以出国旅游为名，踏上就像后来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破冰之旅”一样的探亲之行。

林秀春不能直接到大陆，她先飞到日本东京，再从东京转飞北京，到北京后，她又乘坐到山西侯马的火车，由侯马转乘汽车去闻喜。林秀春牢记着王宗海的话：“你到闻喜，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王官虎，他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被俘，但是他回了大陆，他的话你可以相信。”

王宗海和王官虎，两个老乡加战友的好朋友，他们在朝鲜战场一别就是三十五年，尽管回大陆的王官虎的情况王宗海不是十分清楚，但这是他在大陆家乡最信任的人了。

提起王官虎，在闻喜县也是个名人。1951年，他入朝作战时是部队的营管理员，在五次战役中不幸被俘。在战俘营里，他斗争非常勇敢。但回归后，依然受到很不公正的处理，被开除党籍，并被复原回到原籍，在农村劳动。那时候，他的村子是乡政府所在地，那时候乡里缺人才，工作人员大都是从农村来的，出去讲话，掌握国家政策水平都不太高。1955年征兵的时候，乡领导也把王官虎带上，叫他给村民说说部队生活的实际情况，



王官虎当选人民代表大会的证书



王官虎对台工作成绩优异获得的证书

宣传当兵怎么好。尽管他在部队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他从大局出发，讲了部队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讲了参加解放军的责任和光荣。从那以后，群众对他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乡里的领导也被感动了，说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人能行。当时成立农村供销、合作、信用三社，领导和群众一致推举他到信用社，开始是业务员，干了一年就提成副主任，到县上汇报工作都让他去。有一年，山西省在壶关县开金融现场会，他作为闻喜县的唯一代表与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反响很好。人民公社成立后又当了社里的财贸部部长管金融，1965年以非党人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停止了工作，有人要把他作为反面典型，但还负责工作的书记说，人家老王是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总政已经有结论，现在是看他有没有新问题。那些想搞他的人拿不出新问题。于是，别人抓革命，他抓生产。“文化大革命”中间，公社所有领导因为派别都有大字报，而他却一张都没有，因为他管两派的事，什么领肥料、什么领结婚证都归他管，他的威信在群众中还提高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在拖拉机站当站长，因为管理得好，还得到了省里面的奖励。省里奖励了两千块钱，全县的工作人员每人得到了20元，大家很高兴，说这是王站长给大家争取来的。1980年落实74号文件后，他恢复了党籍，被调到县政府工作，当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管对台工作。

闻喜县的台胞比较多，除当年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外，还有一些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人员。有几个在解放前的民愤都比较大，他们回闻喜时比较麻烦一些，王官虎就和具体接待的单位一起想办法化解矛盾。有一个原来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回来还自己买了一辆吉普车，王官虎动员他给村里修路，请运城的蒲剧团到村里唱戏。还以他母亲的名义办了一个基金会，奖励村里考生。时间一长，大家才知道这些人也开始变了。王官虎管理的对台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

林秀春当然不知道王官虎的这些情况，她费尽周折找到他时，让王官虎又惊又喜，35年来，他第一次见到了台湾老战友们的“代表”。

从林秀春的介绍中，王官虎知道了去台湾老战友们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对林秀春真诚地说：“过去的事都已经成为历史了，政府也不会再追究他们当年的选择，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闻喜的老乡，你就是我们闻喜的儿媳妇。我们真诚地欢迎大家回来探家，在家乡走走看看，欢迎大家在家乡发挥积极作用。”后来的情况让林秀春也十分感动，王官虎代表地方政府热情接待了她，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对她投来了热情和关切的眼神。

第二天，在王官虎的陪同下，王宗海的老家——闻喜县柏林乡陈家庄村里的人，迎来了从台湾回来的媳妇。大家都赶到王宗海家看这个台湾媳妇。林秀春人长得十分漂亮，对王宗海的父母还特别的孝顺，她用台湾国语，问候每一个来看她的人，还给每一个亲戚送上了珍贵的戒指、项链等礼物，引来了众人夸奖。在家乡期间，林秀春还代表王宗海祭拜了祖坟，她跪在祖坟前，眼含热泪，替远在台湾的丈夫点燃了一束香：“列祖列宗在上，我和宗海直到今天，才能踏上家乡的土地，才能在你们面前尽孝，请你们的在天之灵，接受我们的敬拜吧！”

在家乡住了一些日子后，林秀春又转弯抹角回到台湾的家中。听了爱妻的话，王宗海这个经历了无数艰难的汉子，流下了热泪。谁知，第二天，当地警署有几个人来到了他家，开口就问林秀春这些日子去哪里了？林秀春回答说是去日本探亲。警署的人又问她还去过哪里，林秀春感觉出了异常，只好以沉默相对。警署的人问她：“你是不是还去过大陆？”她摇了摇

头，警署的人说出她去日本、北京所乘坐飞机的航班号，并拿出她去北京航班上的照片。她只好解释说：“我的丈夫行动不便，我只不过是替他回老家看看。”警署的人对她说：“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规定，两年内不许再出境。”

所幸的是，半年之后，台海破冰，禁足令无疾而终，王宗海迫不及待首批返乡，探望他阔别了35年尚健在的父母。王宗海在家乡还见到了往日的老战友，这些当年的战友，相见时良久无语、感慨不已。王宗海请老战友们吃饭，看到身在农村、经济困难的昔日战友，他心里非常酸楚。以后，他每次回来，都给在农村生活困难的战友一些钱。当年那些在战火中生死与共，后来选择了不同归宿的人们，无论贫富，无论在天涯海角，他们之间还是保留了最珍贵的战友情谊。



王官虎和他去台湾的两个难友，中为王官虎，右为王宗海



王官虎宴请王宗海夫妇

此后，王氏夫妇先后三度返乡，送别了自己的父母亲，尽了一个做儿子的责任。

四、有家也难归

当众多国军老荣民从大陆平安高兴地探亲归来后，赴台志愿军战俘越

来越多的难友踏上返乡探亲之路。特别是众多难友身上的刺青得到免费清除后，他们返乡探亲乃形成高潮。当时国家对台办下达了接待赴台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赴台志愿军战俘回来探亲的有关政策，多数难友顺利地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但他们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也留下一些特殊故事。

两岸可以间接通邮后，有不少难友怕给家里造成不利影响一直没敢写信联系，在下决心探亲后又想尽可能低调回去，也没有事先告知家人，结果是有的难友在迈进家门之前，看见大门上竟然挂着“光荣烈属”牌匾。原来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失踪”后，被他们的部队列入“战场牺牲者”名单，通知了当地民政部门，他们家便成为“光荣烈属”，一直享受着烈属待遇。如今，先是这些难友站在那个牌匾下不知进退、左右为难的样子，然后是他们的亲人出来发现他们还真的活着时那种又惊喜、又悲痛情景，便成了朝鲜战争留下的又一组催人泪下的历史镜头。

一位老家在河北唐县农村、善于农耕的志愿军战俘从国军退役后，在当地政府划分给他的荒地上奋力开垦了十几坪山坡地种花生，因政府兴修高速公路时土地被征购得到了一大笔钱。他在返乡探亲时为了答谢乡亲们多年来对自己家人的关照，买了几十只金戒指带回去送人。镇上领导得知此事后，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面宴请这位从台湾回来的“富翁”，动员他回家乡来投资办厂。身着西装革履的他再三解释自己确非资本家，最后只好答应自己回台湾后一定联络有财力的同乡回来投资，以满足“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这位战俘后来没敢再直接回老家探亲，而是自己到石家庄住旅馆，让弟妹悄悄送父母到石家庄来团聚。

另一位辽宁锦州籍的战俘，参军时给妻子留下了“遗腹子”。几十年后在他回乡探亲时，父母妻子都已去世，未曾谋面的儿子带领已经长大成人的孙子孙女，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硬纸板在锦州火车站月台上等他。当他下了火车，一眼看见那块硬纸板上自己的名字和名字前面“热烈欢迎”几个大字，立即老泪纵横，一家人站在月台上抱头痛哭。这位难友在子孙的簇拥下回到家里，儿媳妇已经做好一桌为他接风的酒菜。饭后，他把身上带的钱除留下回程费用之外，全部给了儿子，让儿子给家徒四壁的家里添置电视机和冰箱。

第二天一大早，18岁的孙子站在他床前说：“爷爷，给我买辆摩托车，行不？”这位难友告诉孙子：“今年钱不够了，爷爷明年回来一定给你买。”孙子说了句：“我不信你会没钱！”转身走了。等到这位难友离家的那天，全家人在火车站跟他告别，火车开动后，他的孙子追着火车骂他：“连辆摩托车都舍不得给我，你他妈的算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战俘第二年真的没有回去，尽管他的儿子再三来信道歉。他跟别的难友说：“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不称职的爷爷，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五、来自异国的“华侨”

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平塘县主管外事工作的石县长接待了两个从外国来的“侨商”。经过交谈才知道，原来这两个人也姓石，都是该县人，而且都跟石县长一样是毛南族人。他们两人一个穿着笔挺西服，一个穿着中式对襟锦缎褂子，一起在外国经商多年。他们已经回家看望了亲人，给家里留了一些钱，又专程前来向县里领导商谈有关在他们毛楠族家乡开展旅游业务的建议。在交谈中，石县长又了解到他们原本是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并在该县还有三个战友，这三个战友当年从战俘营直接遣返回归并复原回到该县农村。石县长立即派人把他们接来，并招待他们用餐。席间，这两位“华侨”说：他们长期在海外，不了解大陆的情况，但又思乡心切，他们便想，自己当年参加抗美援朝，也是不怕死才去的，所以就“冒死”回来探亲了，没想到竟会受到县领导如此亲切的接待。

看到这几个战友在乡下生活困难，这两位“华侨”就拿出一些钱给他们，但三个战友说什么也不要。后来石县长仔细询问，他们讲了原因：一是感到人家的钱来的不容易，二是给他们的是外币（美元），他们也没有地方去用。

1990年，有一个西班牙华侨从万里之外来到四川绵阳，他就是阔别了40年故土的阿东（化名）。华侨阿东有着令人慨叹的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30年代末，阿东出生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绵阳。家境富裕且是独

生子的阿东曾经在快乐中度过了小学、中学的校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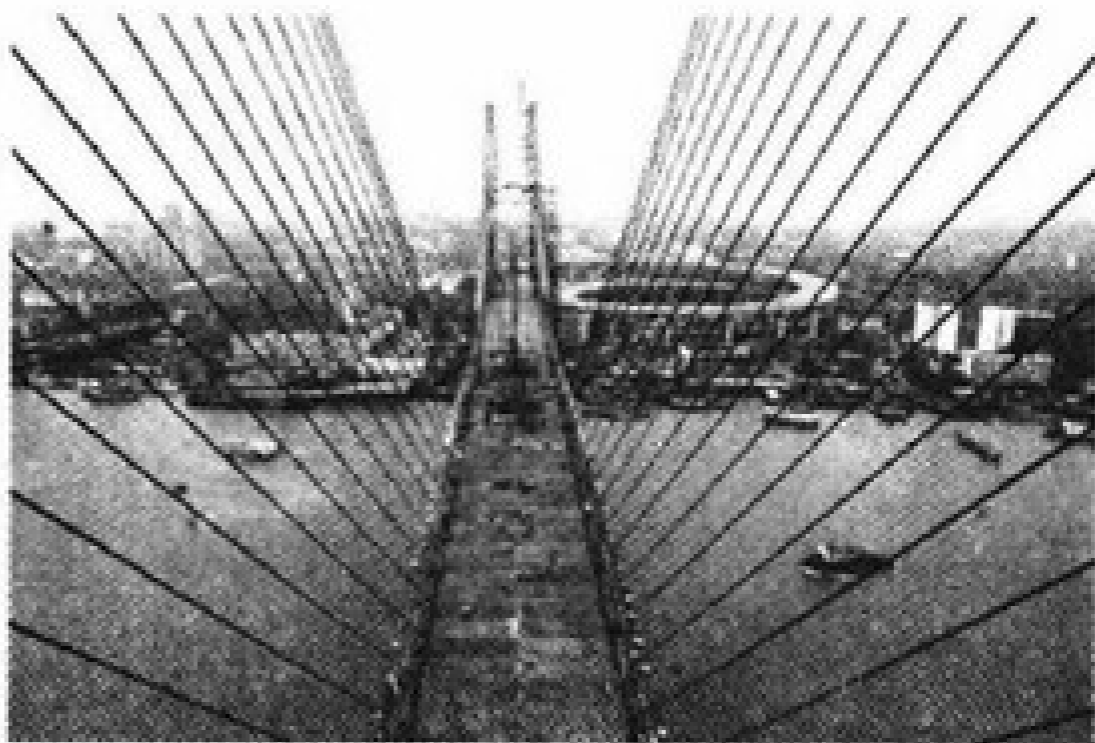
1948年，四川陷于兵荒马乱之中，阿东先是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当壮丁，后来幸逢一个做军官的亲戚介绍他到军官集训队学习，当上了一名准尉，但他还没有感受到当官是何种滋味，就在战争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阿东随后被发了路费回到绵阳家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阿东放弃考大学的愿望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战场。命运好像和阿东有意作对，在第五次战役中，部队陷入敌围，阿东和许多战友不幸被俘。在1952年4月的“志愿遣返甄别”中，阿东带着身上的多处刺青，选择了“不回大陆”。1954年1月，阿东和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一起被送往台湾。

到台湾后，阿东在国民党通讯部队中服役了10年。1964年阿东实在厌倦了戎马生涯，想方设法从部队退了役，过上平民生活。

阿东很聪明，他退役后尝试过各种生意，都不太赚钱。后来，他开了一个四川小吃店，生意逐渐火起来。到了1975年，阿东熟悉的一个难友执意要让阿东把店转让给他，阿东碍于面子，把小吃店让给了那个人，自己再去想别的办法。阿东很勤奋，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进入到台湾的一个船员机械培训班学习。1977年，在培训班结业的阿东被西班牙招聘到加那利群岛（Canarias）修船。阿东的人生旅途又一次改变了航线。

从离开家乡到台湾，再到西班牙，阿东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故土。他不知道年迈的父母是否健在，翠竹下的老屋是否需要返修。一些和他一起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台湾人建议他写信给四川绵阳老家探探虚实。没想到过了不久，阿东就收到母亲从故乡的回信，母亲在信中告知阿东，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她自己年龄大了，虽然有政府的生活补助，但一个人生活得也很艰难。



西班牙特立尼达港



西班牙某造船厂

为了早日回去照顾母亲，阿东一个人悄悄脱离公司，只身去了南部马德里，在一个越南人开的亚洲餐馆做厨师。在这家餐馆，阿东一面打工，一面与中国驻西使馆联系，在使馆的帮助下，1990年阿东终于离开了西班牙，踏上回归故乡之路。

回到家乡，母亲已到暮年，而母亲见儿子仍然孤身一人也是伤感不止。她给阿东找了一个小他20多岁的乡下女人，他们结了婚，但婚后生活并不和谐，跟母亲的感情也不融洽。为了不再给年迈的母亲增加负担，阿东决定给老婆和孩子换个环境。1993年，阿东以华侨身份将老婆和孩子申请到了西班牙。

刚到西班牙时，阿东的媳妇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和阿东的关系也变好了许多。但阿东的媳妇毕竟太年轻，她在西语熟悉起来后，利用阿东在南部打工的时间，竟然带着孩子脱离了阿东，跟了别人。这件事对阿东的打击非常大。1999年，阿东办了离婚手续，独自在餐馆做着厨师。到了2000年，年迈力衰的阿东实在做不动了，通过别人的指点，他通过当地的申请，住进了一个叫CARITAS的救济中心，那个救济中心有免费的吃住。阿东在这里一直住到了2008年11月。

虽然阿东在西班牙辛苦做工将近30年，保险局提供的保险单却只有7年零8个月的保险时间，阿东栖身的救济中心，突然向他发出了逐客令，说是按照当地的规定，阿东已经不符合条件，勒令他离开。母亲早已作古，家乡老屋也卖给了他人，故乡已经没有他栖身的地方了。生活无着、告状无门的阿东，只得拖着病躯来到华人聚集区，向西班牙四川同乡会求助。在同乡会资助下，阿东回到了台湾，那里有他昔日的难友，有荣民之家，可以作为他最终的归宿之地。

六、四十年的旅程

2011年11月，张泽石随央视口述历史团队赴四川省寻访志愿军老兵，在成都遇见一位赴台复归的志愿军战俘，他叫赵成云，他向老张讲述了自己从宝岛到大陆那一段四十年的旅程：

1988年冬天开始，大批国军老兵蜂涌回大陆探亲。我心急如火，却不知四十年以来二老尚健在否？故乡的老屋拆迁了没有？

当时，我正在一家台湾海运公司谋生，长年奔波在海上。面对大洋上无边无际的风浪和冷漠的残月孤星，我思乡之情更加难熬了！那年年底，我们的货轮路过日本横滨港。我上岸找到当地一位台湾侨胞，借用他的华侨身份向四川崇庆县我的老父亲试投了一封家书。那位朋友答应一旦有回信，他将立即转寄往台湾基隆我的家中。

为了等候那封从大陆来的回信，我一再请求船运公司老板允许推迟我上船出海的日期。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苦苦期盼的那封回信毫无踪影！

1989年4月，我带着深深的失望上船出海了。我争取到公司对我这个工作出色的轮机长的照顾，同意我上了往返日本的货轮。船一到达横滨，我就赶往那位台湾侨胞家里打听有无新的消息。他同情地摇摇头，劝我再写封信给别的亲友打听家人情况。我便向我的叔父写了封信托他寄出。我怀着新的希望回到基隆家中，天天去看大门口信箱里有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家书。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不敢再去打开信箱查看。这时公司有一艘去美洲的货轮，指令我去执掌轮机班工作，暗示我若再推脱恐难以留在公司。我为了生计，带着对父母亲人的牵挂、忧心，踏上了这艘行将远涉重洋的巨轮，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个未能给父母尽孝的逆子！

1989年10月，我们的货轮从南美洲返回台湾。在路经檀香山停

港补充给养后，船长派人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老船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眼看出那个黄色信封上写的是汉字，心就狂跳不止，再仔细认清寄信人地址确实是“中国、四川、崇庆县”，泪水一涌而出！老船长起身拍着我的肩说：“祝贺你终于收到了久盼的家信！你得感谢你那位在日本横滨的朋友，是他通过国际邮政，追踪我们的货轮航线，刚才从檀香山送上来的！”

我赶回自己住的舵房，从我侄子来信的叙述中，知道了我家的老屋早已拆迁；知道了母亲已于10年前病故；还知道了叔父家也更换了地址，幸好遇到一位好心的邮递员，四处打听后，找到我的堂姐曾经教书的学校！这才让我的老爸得以读到我的第二封信。我侄子在回信中说：“大伯读了你的信，老泪纵横！他老人家要我在回信中写上：你妈没有福气等到你见一面，你要再不回来，怕是也见不到我了！”

1990年春节，我带着妻儿赶回家。那时，我们只能从台北坐飞机到澳门再转乘机去北京，再坐火车去成都。我感觉比我坐货轮转地球一圈还要远，还要费时！等我们的汽车终于抵达崇庆县，见到长途汽车站等我们的一大群亲友时，我才真切感受到隔离开我和大陆亲人的远不只是台湾海峡，而我从台湾回到故乡走了整整四十年！

七、二十三年寻亲路

在赴台志愿军战俘辗转反侧，返乡寻亲的时候，他们在老家的亲人，其实一刻也未忘记他们，经历过一系列政治斗争之后，甚至在斗争之中，他们已经把被压抑的思念转化为寻找飘落在外的亲人的行动。我们搜集到四川省成都市一位战俘外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9团8营机炮连傅健铭侄子沈德成的来稿，记录着他和他的家人二十三年寻找骨肉亲人的曲折历程：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她有一个哥哥，即我的舅舅存在。

但在老家双流，母亲的姐姐、妹妹，我都见过，却从未与这个舅舅谋过面，每每听大人们说起也是讳莫如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一位经历了淮海、渡江、抗美援朝战役从戎14年的老战士（转业前部队三野27军整编大队四营16连），却与大姑一家关系很是紧张。记忆中的父亲一年四季上衣风紧扣永远是紧扣，表情严肃。在敬畏父亲中，往往是母亲悄悄带我到大姑家。

父亲因冒严寒坚守工作岗位，旧病复发，不幸于1973年5月带着一身战争的创伤去世，享年仅仅60岁。

父亲的去世，却使我们和大姑家的关系拉近了。1973年十岁的我，终于从大姑父口中得知了两家不和的缘由，竟然是舅舅的存在，原因是因为舅舅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从成都市双流县离家前，给大姑父留下一双军用鞋，并从北京发回一封信，说他在部队担任机枪班长。但随着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舅舅并没有回到双流。只是政府来人草草通知说，舅舅去了台湾。随后摘下了家中《革命军属》的牌子。

1966年开始了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受影响，与舅舅交往过密的大姑父一家，被扣上了“台属”罪名，全家受到冲击。大姑父在单位被人批斗，表哥、表姐入党、工作均受阻。而因舅舅离家时尚年幼的我母亲及小姑一家，则幸免于难。父亲，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老军人，不得不选择了疏远与大姑父一家的关系。

随着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政治气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十天的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其中第一次用了“亲爱的台湾同胞”字眼，让我深受感动，从此，我们家人就不忌讳谈论舅舅一事了。

80年代后期，断断续续传来在台老兵回乡探亲的消息，点燃已经八十多岁的大姑父寻找他妻弟的希望，不断重复叙述他们交往的点点滴滴，手足同胞之情溢于言表。因我在1983年学校毕业后即分配到成都工作，家人便委托我寻找舅舅相关信息。

1985年12月19日，我试探性地给成都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发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舅舅傅健民，双流县人氏，1950年抗美援朝，奔赴朝鲜，但战争结束后，却没有了音讯，县上告知，他所在部队被俘去了台湾”，在信中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朝鲜战争果真有人被俘送往台湾？二是如果真在台湾我们如何打听？三是国家对在台人员大陆家属的定性？大约一月余，姐姐来电话告诉，双流县民政局同志找过她，说收到成都市台办转到县上的寻亲信，并告诉时间过去了30多年，不容易查找。第一次寻亲没有任何结果就宣告结束。

80年代末期，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老兵越来越多，我们一家就感奇怪，如果舅舅真在台湾，为什么就不回来呢？他生于1928年，80年代末期，也就60岁左右。88年9月7日，姐姐听别人从双流金花镇传来消息，说有人在台湾见过舅舅，个子不高、黑黑的，爱说笑话，上房捡瓦摔坏了一条腿，没有结婚，还记得自己的父亲是傅鞋匠。传言与大姑父印象中的舅舅十分吻合，尽管消息无从考证，也让我们相信他还生活在台湾。

于是，当年9月8日，我去了成都市东胜街的对台办，打听如何给台湾去信。但得知，此事归在“十二桥”的省红十字会。记得在二楼一间办公室，一年轻小伙子问明来意，即给了两张表，填上被寻人情况，说有消息会通知我们。但第二次寻亲仍无结果。

一直沉浸在这种亲情思念中的大姑父，直至1988年9月14日，终未能等到亲人相见，以87岁高龄，合上了双眼。一年后，大姑也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死竟然叫出了舅舅小名“傅世洪”。两位老人的离世，也加快了我寻亲的步伐。1990年11月，得到一位被俘志愿军去台人员的地址：桃园市阳明九街，我立马去信，却石沉大海，第三次寻亲无果。

其间我又数次去过东胜街台办，均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漫漫寻亲路，在1994年夏天一个芙蓉花盛开的日子，终于迎来了转机。

当年5月27日的《成都晚报》，登载了“市台办紧急寻找以下在台湾亡故人员的亲属，请见报后速来东胜街二十四号联系”。在双流县17人中，舅舅“傅健铭”名字赫然在列。从86年第一次寻亲，整整八年过去，却让我们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亲人，的确在台湾，尽管他已经故去。

我立即赶往东胜街台办，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尽管我不停地向他口述我知道的“傅健铭”情况，但苦于文革中烧毁了一切有关舅舅的书信，无从证明报上寻找的“傅健铭”就是我们的亲人。记得台办人员拿着一份《荣军报》(?)，(因我没有提供书面的证明材料，未能给看报纸)报上应该就有“在台湾亡故人员”详细信息。台办告知，相认的结果是涉及在台亡故人员遗产的继承，所以必须慎重。

5月29日，回到双流，第二天，和母亲、姐姐一同去了县武装部准备查询舅舅信息，武装部同志告诉50年代军人的资料已经移交县档案馆。

带着一线希望，我们娘仨来到位于县政府内的县档案馆，尽管表示难度不小，但管理员听明来意后，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详细记录了母亲的身份证信息后，让我们查找1950-1954年双流县军人档案。

经过我们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翻看上百卷发黄的卷宗，突然一页写着军人姓名：“傅健民”，任职军队“一野六十军一八〇师五三九团八营机炮连”，及家庭情况的简历竖列表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顿时，泪水湿透了我的双眼。这就是我要查找的舅舅啊！兴奋、激动之余，档案管理员复印下这一页记载舅舅信息的资料，并在复印件上写下“证明，此件复印于双流县民政科1950年1卷58页，双流县档案馆，1994.5.30”，郑重盖上“四川省双流县档案馆”公章。

5月31日，带上复印件，立即奔赴了东胜街，仍然是那位同志接待了我，见过“复印件”后，明确告知不能说明问题，要证明与“傅健铭”的关系，必须按程序由傅健铭亲属当地居委会出具证明，办理

他直系亲属的“委托书”。并告知“遗产”继承一事，可回当地由县台办负责办理公证事宜。

我们家人按照要求办理完公证送去市台办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而那张记载着“傅健铭”信息的《荣军报》，我也再没有见到，从此失去了最近距离了解舅舅生前详细情况的最佳时机，第四次寻亲仍无结果。

从1985年到1994年，九年间，我经历了结婚、生子，亲情的浓厚、血缘的牵挂，让我更加思念舅舅，想知晓他生前的一切，哪怕一张照片、一个居住地址，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纵有千山万水，也隔不断亲情的思念。

在后来的漫漫寻亲路上，小姑、小姑父、母亲相继去世，至2002年，“傅健民”在大陆同辈亲人，无一存世，更感觉到我寻亲担子的沉重。

2006年12月9日，偶然得知同单位的杨克强叔叔有亲人在台湾高雄市，立即就发了封信去，不久又在我们单位统战办，见到了1994年为台湾亡故人员的亲属办理遗产继承的香港公证律师联系地址，立即给“王震南”律师去了一封信，告诉寻亲一事，但这第五次寻亲仍然是石沉大海。

2009年5月初，当我再一次来到东胜街，得知，台办已经搬迁到了高新区，查询到台办电话，一李姓同志了解我情况后告诉说，可以与市西华门“成都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联系。

5月11日，我来到成都市西华门市台联，受到王联华会长非常热情的接待。他听完来意，当即表示，可以通过台联去信台湾，帮助我实现寻亲的愿望。王会长认真阅读了我的寻亲资料，帮忙改写，并在电脑中转换为繁体字，即发往台湾省台北市“辅导委员会统计处”，内容是“近日，我会接到四川双流县沈德成先生来函，希望我会协助他寻找去台湾的舅舅的完整信息，以了却全家几代人的思念心愿。故今函特别拜托贵会帮助查询傅健民生前相关的信息”。

漫长的等待，在不安和煎熬中渡过，6月11日，距离发信到台湾，整整一个月，王联华会长来电告知，台湾方面来函，确认了“傅健铭”的情况，让我立即去台联。

一进入台联办公室，王会长向我表示祝贺，并展示了台湾来函“贵会寻傅健铭先生一案敬悉，经查本会荣民资料中傅君於民国49年退伍，民国63年7月26日因脑溢血，於嘉义荣民医院病故，未婚且无眷属记载，请查照”，区区60多个字，让我从1986年至2009年苦苦寻找的舅舅，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果。

想起从发出第一封信到收到台湾的这封来信竟然用了整整23年，而在这23年中，舅舅的亲人们一个又一个都带着对他的无限思念相继逝去，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非常激动地向王会长表示了感谢，并立即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傅健铭在大陆的亲人们。

23年的寻亲路，并没有终结，我们在大陆没有舅舅傅健铭一张照片，其生前生活状况、家居何处、葬于何方，一无所知，我会继续努力下去。

我的舅舅，您为了保卫年轻的新中国，雄赳赳气昂昂高唱战歌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赢得战争胜利，实现和平停战。因为所在部队战场上的失利，做出了身不由己的选择，客死他乡，不管别人怎么看，您仍然是我心中的英雄。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相信有一天，我会跨过茫茫海峡，寻找到你生命的最后栖息地，献上一束鲜花、燃上一柱香、敬上一杯酒，让你游走的灵魂得以安息。

2011年11月16日写于成都

（后记：在此感谢张泽石、钟骏骅、金恕、杨克强叔叔，感谢网友LAN、武子。另注：傅健民——是舅舅在大陆档案记载名字；傅健铭——是台湾档案记载名字）

第十三章

叶落归根

(1970年代至今)



2010年6月6日，张泽石、王官虎（中）与回乡安度晚年的史兴贵老人（右）合影于其小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共同人生轨迹是：从普通百姓到解放军（其中许多人还先当过国军），再到志愿军、志愿军战俘、“反共义士”、国军、荣民、台胞，有的还当上了华侨；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的磨难、承受过丧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痛苦、遭遇过政治上和生活中的疾风暴雨，到了老年都需要一个安定温暖的家、期盼一个理想的归宿。他们之中不少人经过奋斗已经成家立业，把根子扎在了台湾。但多数人没能成家，一旦允许回乡定居，当然急切希望飞回大陆与亲人团聚，就此叶落归根。

其实有的去台志愿军战俘早就“归心似箭”，没等“开禁”去大陆探亲就已付诸行动了。

杨通达是我们所知第一个返回大陆定居的原志愿军战俘。他是在1974年途经日本回到大陆老家贵州省黄平县定居的。回国后他仅有的愿望是：是否可以按起义投诚人员发给抚恤金。但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没有被当成国民党间谍就算对他很宽大了。

1979年7月5日，原志愿军战俘黄永斌从台湾绕道香港回到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定居。他的运气就好得多，由于受到《人民日报》在内的几家有影响的报纸采访而知名。他因没有文化，在台湾军队和地方干过不少粗活，始终想念家乡。1979年，他变卖了所有财产，申请去香港旅游，在香港中国旅行社的帮助下返回故乡。回乡后，被吸收为县政协委员，生活还不错。

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罗治方，是在驾机到前线执行任务时被击落后当上战俘的。1986年初，他卖掉在台湾所有的东西，以上泰国旅游为名，试图偷越国境回家。哪知他的运气太差，遭遇了重重困难，结果耗尽全



张万富，家住黑龙江省庆城县大罗镇王家油封乡



杨光武，家在四川安岳姚市镇江西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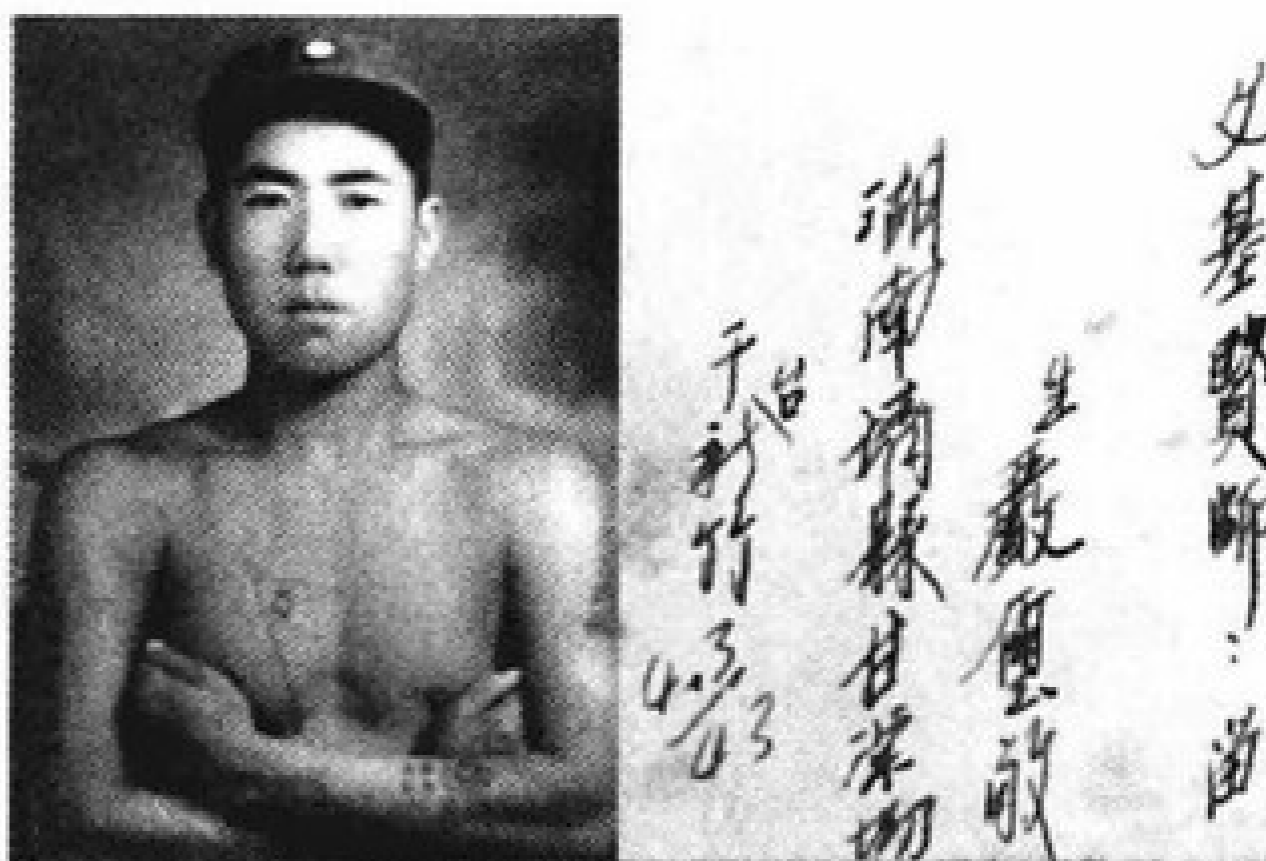
姓名不详，四川彭水（今重庆市）



□天才，四川云阳县养鹿乡（今属重庆市）



宫吉德，山东历城十区党家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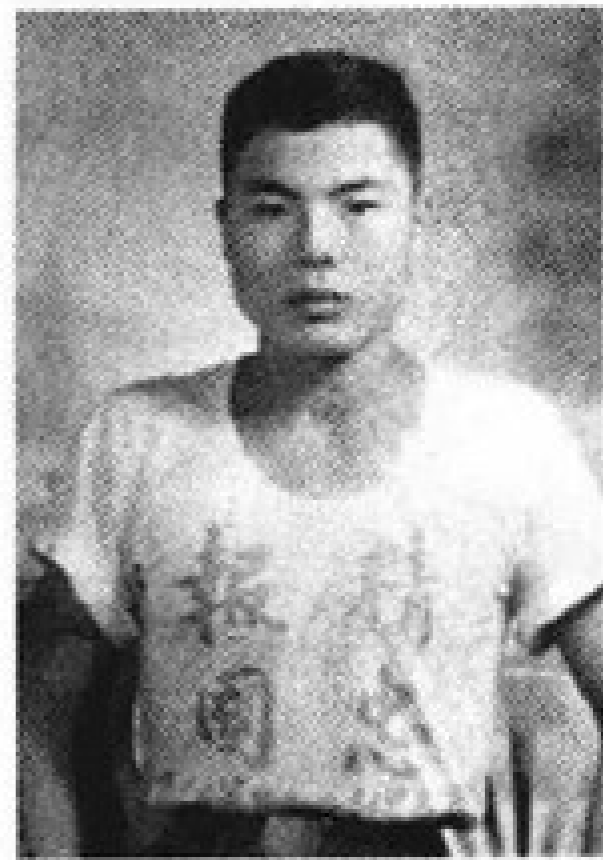
严玺，湖南靖县甘棠场

文基吾師恩德
四川安岳縣
孔雀市一交楊烈武
楊成福
離別紀念日四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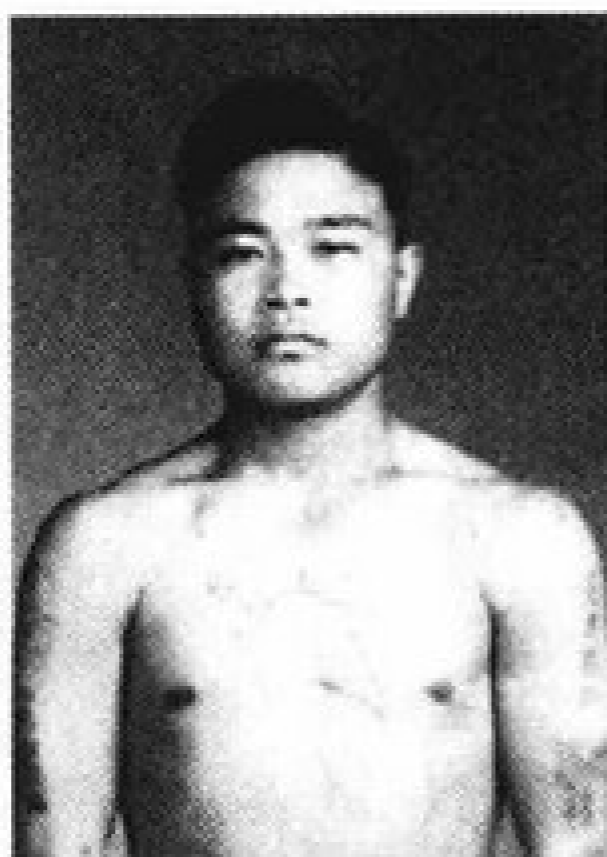
楊成福，家在四川安岳縣孔雀鄉

文基兄惠存
四川名山縣車嶺鄉
弟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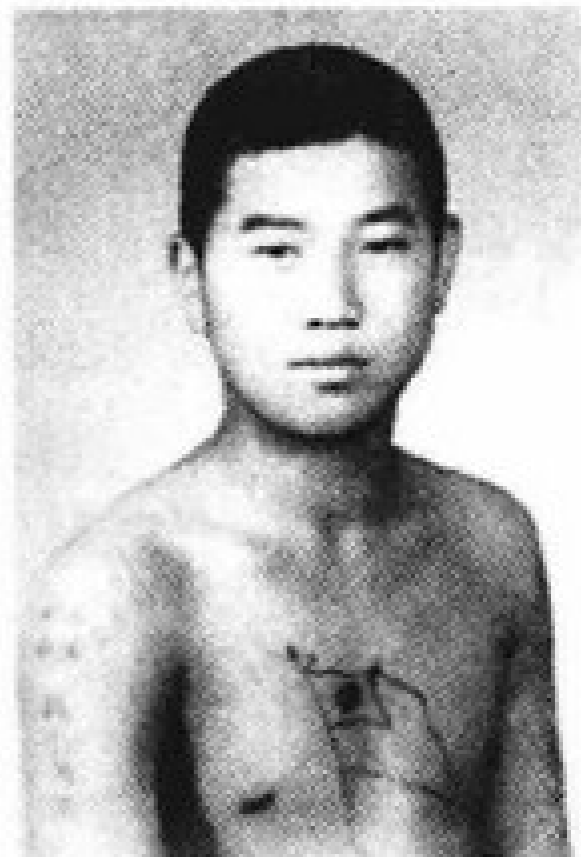
榮光，四川名山縣車嶺鄉

文基鄉兄之惠存
攜手並進
一同歸故鄉
小弟劉郁文
四川新津縣仁和鄉



劉郁文，四川新津縣仁和鄉

陳老師
幸得三年訓示
才得今日這時
東港縣學生趙寶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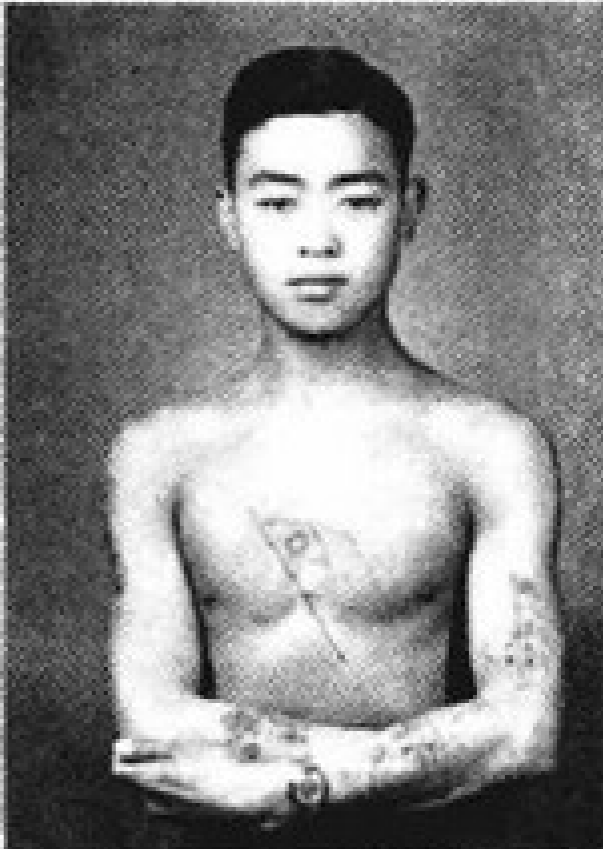
趙寶璋，山東歷城

文基老師道念
何時能建不地我而方求建
陝西華縣下廟鎮姜田村
安平心



安平心，陝西華縣下廟鎮姜田村

文基明帥 惠存
通訊處
四川彭水縣茶園鄉厚厚灣
恩徒劉世孝



劉世孝，四川彭水縣茶園鄉厚厚灣（今屬重慶市）

有家難歸，惟余紙上地址

照片提供：陳朝勳



陈文基，（台北）桃园新美四三（1954年）四月摄。他是今重庆璧山县人。黄埔军校第24期未入学学员，入朝被俘后，曾在济州岛战俘营担任第二联队“反共抗俄”少年学校文化教员。

照片提供：陈朝勋

部积蓄，卖掉身上衣物，沿路乞讨，忍饥挨饿，流浪了11个月。最后从缅甸进入国境，找到我边防站请求救助，才得以回到家乡湖南溆浦县。罗治方入境时，只剩下一根树枝做的拐棍和一条破烂不堪的裤衩。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终于开放老荣民返乡探亲，谢天谢地，大家可以不必费尽周折回大陆定居了。

1989年1月3日，大陆也出台了《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的处理意见》的通知，全文如下：

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总政治部印发

《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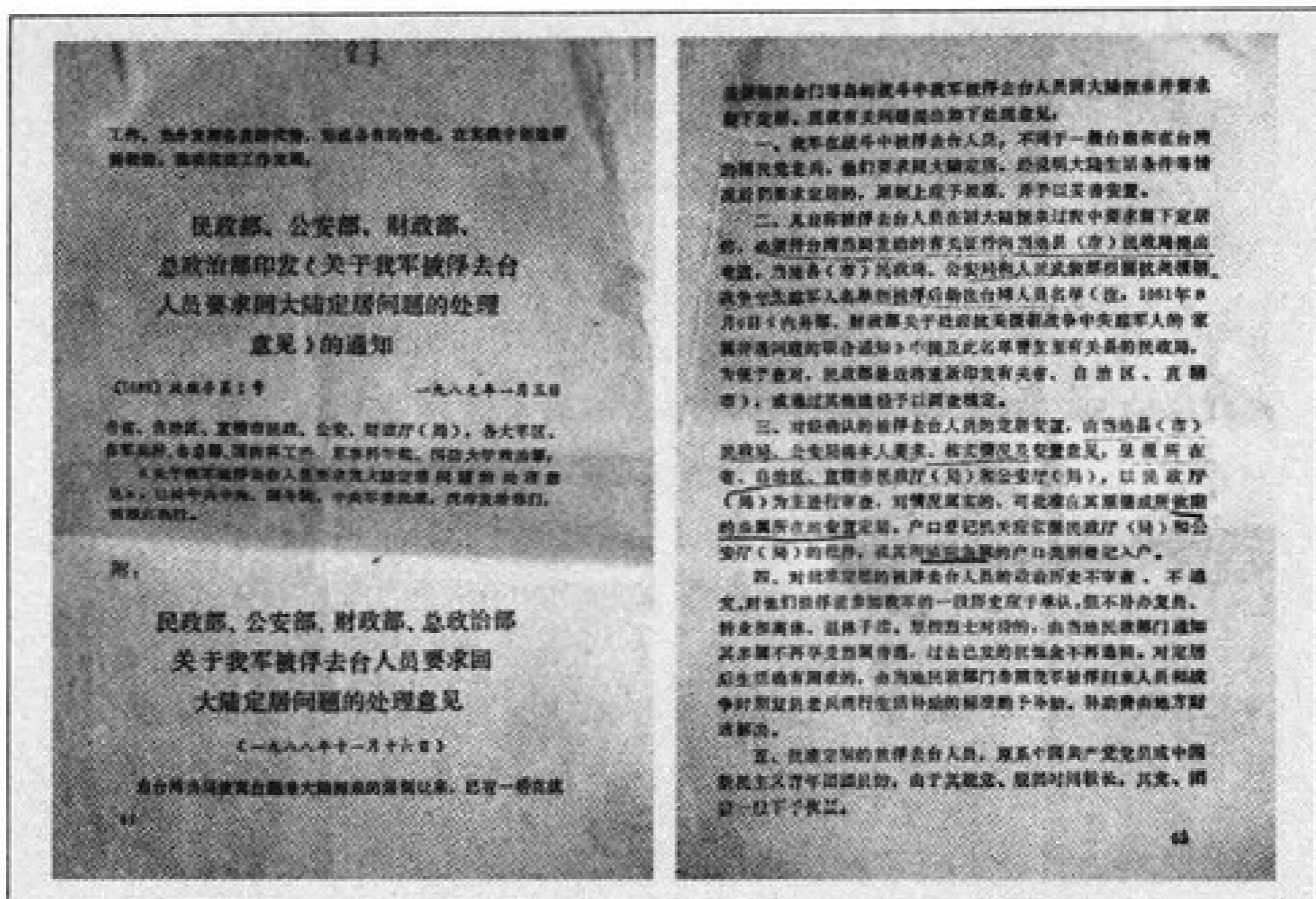
【(1989)政联字第1号】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公安、财政厅（局），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政治部：

《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问题的处理意见》，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附：



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总政治部
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问题的处理意见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自台湾当局放宽台胞来大陆探亲的限制以来，已有一些在抗美援朝和金门等岛屿战斗中我军被俘去台人员回大陆探亲并要求留下定居。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我军在战斗中被俘去台人员，不同于一般台胞和在台湾的国民党老兵。他们要求回大陆定居，经说明大陆生活条件等情况后仍要求定居的，原则上应予批准，并予以妥善安置。

二、凡自称被俘去台人员在回大陆探亲过程中要求留下定居的，必须持台湾当局发给的有关证件向当地县（市）民政局提出申请。当地县（市）民政局、公安局和人民武装部根据抗美援朝战争中失踪军人名单和被俘后劫往台湾人员名单（注：1961年8月9日《内务部、财政部关于处理抗美援朝战争中失踪军人的家属待遇问题的联合通知》

中提及此名单曾发至有关县的民政局，为便于查对，民政部最近将重新印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或通过其它途径予以调查核定。

三、对经确认的被俘去台人员的定居安置，由当地县（市）民政局、公安局将本人要求、核实情况及安置意见，呈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和公安厅（局），以民政厅（局）为主进行审查，对情况属实的，可批准在其原籍或所依附的亲属所在地安置定居。户口登记机关应依据民政厅（局）和公安厅（局）的批件，视其所依附亲属的户口类别登记入户。

四、对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的政治历史不审查、不追究。对他们被俘前参加我军的一段历史应予承认，但不补办复员、转业和离休、退休手续。原按烈士对待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通知其亲属不再享受烈属待遇，过去已发的抚恤金不再追回。对定居后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参照我军被俘归来人员和战争时期复员老兵现行生活补助的标准酌予补助。补助费由地方财政解决。

五、批准定居的被俘去台人员，原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的，由于其脱党、脱团时间较长，其党团籍一般不予恢复。

上述文件公布之后，回乡定居的难友便日益增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在报上、网上的有关报道也多了起来，

谨摘要选录几则于下。

一、一个志愿军战俘的悲喜人生

2003年6月号《四川统一战线》刊登了刘邦琨的“特别稿件”《一个志愿军战俘的悲喜人生》，它记载了一位叫周后林的赴台志愿军战俘落叶归根的经过。

小汽车在四川什邡市共和村小学操场上停了下来。从车上下下来一位西装革履，戴着眼镜，手拄拐杖的老人，他举目四望，发出由衷的感叹：“我终于回来了！”他就是从台湾归来的志愿军老兵周后林老人，回大陆是他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心愿。当妻子黄珍秀和儿子周乐术出现在眼前时，老人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是呀，37年了，为了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老人这眼泪里包含着多少艰辛与追求呀。

（中略）1950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周后林报了名，随即入朝参战。1951年周后林所在的部队奉命掩护友军撤退，因弹尽粮绝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尽管他奋力抗敌，仍不幸中弹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在敌人的战俘营他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后来他被美国兵押到了台湾。（中略）他想自己今生即使回不了大陆，心也要回到大陆去，魂也要飞过海峡回到大陆去。

（中略）每年的中秋、春节，周后林都会情不自禁地站在海边眺望大陆思念亲人，不知有多少次海风轻轻吹拂的夜晚，他和大陆籍台湾老兵跪在海边泪花盈盈，发誓一定要回到大陆去。大陆才是自己的家，那里有亲人，有自己熟悉和难以忘怀的山山水水。

（中略）

1988年初，在台湾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望回家的周后林，收到了大陆妻子黄珍秀和儿子周乐术的来信。他拿着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信中得知，大陆那边共产党关心着他家人的生活，将他作为失踪人员处理，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他扳着手指计



周后林与妻儿在一起

算着，儿子该40岁了，妻子也60多岁了。特别是看到信中写到，我们在大陆托共产党的福，生活安定，全家幸福，儿子周乐术已有3个子女了，一家人和和睦睦就等你回来与家人团聚。周后林兴奋了几天几夜。他向台湾当局写了申请，要求立即回大陆与亲人团聚。1988年国庆前夕，周后林乘飞机经香港转飞成都，下了飞机周后林就“打的”直奔什邡老家，成为什邡历史上第一位台湾返乡志愿军老兵。

周后林下车后，见到家乡沟端路直树成行，没有了昔日的茅草房和羊肠小道，他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当村里人告诉他这里的确是他的家乡时，他感叹不已：家乡的变化真大啊，还是共产党有能耐，改变了农村贫穷的面貌。这次回来，什邡市有关部门和民主乡党委政府专门开会欢迎他，又带他去县内外游览。（中略）……他看到家乡纵横交错的公路、拔地而起的工厂、繁华的城市和乡村勤劳致富的人家，特别是风景秀丽的家乡的山水，以及热情友好的家乡人民，他不想走了。可是不行呀！他办的签证只有半年时间。不得已，周后林1989年春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回到了台湾。

时隔13年之后的2001年春天，当笔者前去访问这位刚从台湾归来的老人时，他说，这次回来，我真的不想走了。（下略）

周后林老人的悲，悲妻离子散三十八年，悲背井离乡三十八载，悲明知牵挂所在却不能与之相聚。而他的喜，只是太多悲痛之后的一点安慰，喜还能在有生之年与亲人重逢，喜还能重返家乡，喜自己漂泊数十载终于在暮年回家了。

二、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2008年12月24日，香港凤凰卫视台以《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为题，播放了对原赴台志愿军战俘冉宏图的采访专题片。

主持人：朝鲜战争当中，志愿军战俘有两万二千多名，其中六千六百七十三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返回了祖国大陆，而有一万四千多

人被送往台湾。比起那些在战俘营里殊死搏斗最终回国的人来讲，这一万四千多去台湾的战俘，他们的命运其实绝少有人提起，而在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些战俘营里的斗争故事当中，这一群人也不过是一些模糊的或者我们愿意忽略的背景。那么他们是不是懦夫，他们究竟是不是叛徒？就此一别之后，他们还能不能走上回家的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冉宏图就是其中一人。

冉宏图，八十三岁，去年在台湾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大陆定居，现在和任子一家住在宜昌郊外的一个小山村。冉宏图祖籍四川云阳，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被保长抓了壮丁，一根绳索让他离开了家乡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士兵。我们的来访让老人的记忆又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冉宏图：被抓走那时候哭了好几天，把我抓到乡里，去了三天，紧跟着就送我去当兵去了。

主持人：一九四六年，冉宏图在团长张剑秋带领下全团投诚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冉宏图所在六十七军二百师六百团于一九五一年六月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美军联合李承晚部队以四个师的兵力向六十七军坚守的沿三八线二十五公里的正面防御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双方伤亡惨重。冉宏图所在的预备队最后也冲上了前沿阵地。

冉宏图：一上去我们那个班就去了一半，班长和组长当时就打懵了，我们就只有进入掩体。有一个碉堡口，那个碉堡口做得很小，做得不理想，打过去都是平的，你打下一点打不到，你往左边右边也打不到。

主持人：在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联军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进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各个高地的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进行“逐山占领”。冉宏图和他的战友最终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冉宏图：我那个弟兄说：“班长这样子不行了，我们是死路一条，我们不如放下武器。”我说：“你胡说，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把你打死！”他说：“我走。”我说：“你走，死了我可以替你报仇。我就是被打死，也不会放下武器，不会轻易让敌人把我抓走。”结果说着说着，伸进来了敌人的枪，我还没反转过去，枪响了，把我的腿打得鲜血直流。

主持人：冉宏图出身农民，从小他说他根本没想到过要当兵，当年在村里已经定下了娃娃亲，那时候他全部的梦想就是娶妻生子，守着自己的家，守着自己的地。让他没想到的是自从十七岁那年的某个下午被抓了壮丁，这一别会是如此的漫长，遥遥无期。他参加国民党打过抗日战争，解放之后又加入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成了志愿军。青春岁月始终是在战场上度过。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战俘。更没有想到到了战俘营之后，会遭到残酷迫害，最后被押送到台湾去，再度成为一名国军士兵。甚至还要他再度成为国民党党员。

冉宏图：他要我参加他的组织，我说我不参加。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要我讲原因。我讲不出什么原因，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参加国民党。他说你们来的时候脱离了，你不参加，你没有希望了。我说没有希望我也不后悔。所以过那个生活够黑暗了、够羞耻了，他不说你是中国人，（说你）是战俘。他说我们都是坏人。

主持人：好人、坏人、中国人，来到台湾之后再宏图内心始终被这些混乱的概念纠缠着，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他来到这块陌生土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家乡父老面前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机会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到了台湾他依然还是个兵，依然背负着战俘的标志，依然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坏人。他自己明白，他没有超越一切的勇气，不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但他在放弃升迁、拒绝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总算让他自己体会到了一点点自尊。可能正是这残存的一点点自尊让他还觉得自己不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他还活着；但也正是因了这点自尊，他依然痛苦、无法安宁。冉宏图在台湾的所见所闻让

他心灰意懒，此时他已不再关心政治，不考虑自己的前程。每到清明节前后，他总是面对着大海，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牵挂。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到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

主持人：冉宏图一辈子当兵，国民党兵、解放军、志愿军、战俘，被迫去了台湾，又在那儿当了二十年的台湾老兵。一九七五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小兵，军衔中士而且孤身一人。冉宏图说他不知道这一辈子究竟是怎么了，好像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控制着，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不知道应该怨谁，或许只能怨恨他所在的这个年代里太多的战争。当一切都破灭之后，对冉宏图来讲只有家乡还依然真切而且竟然变得越来越真切。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已经成了冉宏图唯一拥有的具体的思念。

随着反攻大陆的破灭，很多台湾退役的老兵对叶落归根、荣归故里也慢慢地失去了信心。冉宏图退役后，靠微薄的退休金一个人生活。此时，一些偶尔从街头巷尾听来的小道消息会给冉宏图带来些许的安慰。

冉宏图：偷渡，上船偷渡，朝菲律宾。有钱的私下给人家塞腰包买通，从香港转回来或者从印度尼西亚那边那样转。跑回来的不回去了也有，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也老了、退伍也没有钱，你叫我们怎么去过日子。有的就想不开就自杀了。我这一辈子我说我要扛下去，

我说我们只要身体好、不生病，活到有一天……。等到今天，结果我的话实现了。

主持人：一九八七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却不能回家，他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他回大陆探亲的路费。

冉宏图：想回来没有钱就必须得赚钱，打那个工。开始语言不通，那是相当辛苦，相当受人家的歧视。我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就在水里泡着，擦去擦来的，洗胶袋。我的手为什么起那个点点，一个是我下来打工受不了。晚上就睡觉，没有铺没有地方睡，我们就上楼梯口、在梯子旁边，睡在角落里。人家说你还这样做啊？我说我没有钱，有几个钱想回大陆。他说你在做梦。我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赚钱，弄几个钱，一心想回家来看看自己那块土地。

主持人：从十七岁抓壮丁，一别几十年，冉宏图再也没有回过家，虽然天天念叨着回家，但真的想到回家他的心情仍然很复杂，既急切又有点担心。担心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且跟在别人后面喊了二十几年的反攻大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可以真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他的故乡。

一九八九年以来，回乡探亲的人越来越多，冉宏图的思乡之情更加的热烈。但是每每想到身上那无处不在的刺青，想到自己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他突然又觉得这条路看起来那么近，其实又是那么的远。冉宏图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也做着回家的各种打算。他不知道像他这样被刻了一身反共标语，由志愿军战俘变节为国民党军人的退伍老兵回大陆探亲会遭遇一种怎样的情景。家乡还是儿时模样吗？四十八年的乡音变了吗？游子归乡的路上还会有眼泪吗？

冉宏图：一个成都人对我说：“老冉，我已经去过了，安全得很，你回去。”他还说：“我身上刺的字前后左右都给乡长、县长看了，都见了，莫得问题！”我就觉得没有问题了。三月二十九号，我就决定和我们同乡一起回来。到成都，到机场下飞机，那高兴得不得了。一路简直是，有的在车上掉眼泪，高兴得掉眼泪，那不是悲伤掉眼泪。

说起认识，看亲人面容不认识了，都掉着眼泪讲着话。我还记得我们旁边老家的柿子和橙子相当好吃的，那些树还在不在？他说：“那个橙子树不在了，那个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人一样也已经老了。

主持人：回到大陆的冉宏图没有选择回家乡，而是在宜昌度过余生。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是他当年抗日的时候打过仗的地方。他说其实在家乡，他觉着很难向别人解释他的身份，但至少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可以简单回答一句，说我当年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不过，这唯一的一点点骄傲，平时冉宏图也很少向别人提起，因为他始终觉得在他身上那一段耻辱是那么大，大于所有的光荣。

冉宏图离乡背井五十多年之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那一片故土。他并没有给家乡父老带来一段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讲这一切他可以平静地接受，因为至少活着见到了家乡，见到了亲人，他已经觉得知足了。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可能这样的隐居生活对他来讲多少是种慰藉，因为他用不着再向别人表白，也用不着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不管怎么说，八十岁了，冉宏图终于过上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生活，虽然周围没什么朋友，也几乎没什么亲人。可是在这块土地上，他终于不再做恶梦，他总算睡得踏实了。用他的话来说，能活到这把年纪，能这样了此一生就是他的福分。

三、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

搜索“崆峒”一词，无意间在甘肃省静宁县民政局的网上看到《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魏柏树 / 《驼铃》一九九九年四月号）。这篇纪实文学是在十年前发表的，看得出作者是费了很大功夫采访，许多细节做了一定的核实，力求还原现场，很是难能可贵。就志愿军战俘这个特殊群体来说，此文不失为对史料的一种补救，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2009年

在北京档案局机关刊物《北京档案》第9期上全文转刊了这篇动人的文章。

自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期间，京台两地的人员往来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从民间到政党、到官方，如今是遍及多领域、多层次，交流与合作络绎不绝。时光不会倒转，但台湾工作者、文史工作者、档案工作者或许都有责任在前进中回望历史，为后人留下研究相关文史、档案的实证和佐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在岛内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过了五十天，我和同事第一次接待绕道日本回来的在台志愿军战俘，他就是张旗。同时，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待台湾僧人，他就是释会善。

九月五日上午，张旗从北京站下了火车。出站后，他向一位出租车司机打听，那位师傅直接把他送到北京市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问讯处。

接到消息，小彭带我赶了过去，见到穿着灰蓝色袈裟的客人，我们愣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称呼好。还在犹豫是不是称师父，他先爽快地说：“我叫张旗。”我们赶紧顺着称呼他“张先生！”，他反而说：“还是叫我‘张旗’比较好。”

张旗把身份证件给我们看，是中国驻日使馆签发的旅行证，写着：“持此证者系台湾同胞”（大意）等字样。他自述原名叫张琦，是甘肃人，当过和尚、乡长，后来又当了和尚。一九五一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受伤、被俘、进战俘营。一九五四年被强迫去了台湾。在台湾，住过监狱、当过苦工，最后又当了和尚，云游四方。他一口气讲完曲折的人生，我们听得都懵了。

下午，我和小彭回单位后迅速报告接待情况。主任与有关方面联系、协调之后，由中旅北京分社台胞接待部负责安排张旗的食宿。经理李自卫亲自送张旗在侨园饭店住下。张旗住在侨园时，我随主任去看望，同他交谈。他非常健谈，非常激动，谈了几个小时还停不下来。谈到他在巨济岛战俘营的苦难，他先把袖子挽起，后又把领襟拉下，

揭开他觉得最耻辱的部分（反共内容的刺青）给我们看。看着他手臂、后背上被暴力刻下的字和他经年刮磨留下的伤疤，真是一字一泪，如泣如诉，令人不忍卒读。

我们按照与他交谈的内容以及他所希望的，如实向上简报了他对有关在台志愿军战俘境遇和心路的反映。

张旗是一万多去台志愿军战俘中的一员，他反映的情况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交谈后不到两个月，即十一月二日，台湾当

局有限度地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老兵如潮水般向大陆涌来。一如舆论评说的：“他们一天也不能再多等！”只是多数的志愿军战俘，还缺少张旗所具有的勇气，他们宁愿先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强忍住对父母妻儿的无尽思念。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犹豫和顾虑不能不说就是身上的“字”。一些人最终还是选择了走进美容院去“洗字”，尽管那很痛也很贵。

张旗是拜观音菩萨、皈依净土宗的。回到故乡，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对台办根据张旗本人的意愿，将他安置在天水市崆峒山，由政府每月发给生活费用。

每每见到来京的甘肃对台办同事，我们总会问到张旗。因为见过他以后，都有几分牵挂。我们知道省里对他还是尽力照顾的。他很信任甘肃省台办的一位老主任，有事没事都会找他，和他聊上一阵子。

很快，二十年过去了。在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的《平凉日报上》，有以《甘肃省台办领导看望慰问台胞台属》为标题的一条消息。报导



该故事原刊页面

说：“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甘肃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省政府对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赵少智一行四人，在平凉市崆峒区台办负责同志陪同下，带着慰问金和礼品登门看望了平凉市台湾籍人士林爱玉女士、定居台胞王清海、张旗老人及其家属，向他们送上了党的关怀和问候。”这条消息传达的意思就是：“张旗还好！”

张旗曾给过我一张名片，是油印的那种。上面极其简单地写着“观音阁主持释会善 平凉市崆峒山”，没有联系电话，没有通信邮编。

崆峒山，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都会对它神往。资料介绍它位于甘肃省平凉市西十一公里处，属六盘山支脉。佛、道、儒三教并存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崆峒山管理局信息中心的网页上，官方发布的有关资料如是说：“观音阁，旧址在月石峡路口东侧。元代创建，清咸丰年间废。一九九七年，由台湾归来和尚释会善多方募资复建，大殿三楹、厢房六间。”尽管是寥寥数语，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

（供稿人：吉路）

从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至今已有24年了。这些年来究竟有多少赴台志愿军战俘回大陆定居，确切人数只可能国家民政部有统计数据。我们只是陆陆续续从报刊上看到、从各地原归国战友那里听到一些从台湾回来定居的难友们的消息，印象中回到四川和山西定居的要多些。在报刊、电台零星的报道之外，我们很想更多地知道这些难友们回来定居后的真实生活情况。

四、差点被拒绝的一次探访

2010年初夏，本书作者张泽石、高延赛，和本书责任编辑荣挺进、战俘问题研究者常成一起专程赴山西晋东南地区、晋中地区、晋西南地区，在当地原归国战友及其亲属们的热情协助下，走访了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收获颇丰。

538团的战友。其中明贵生、祁金保、祁建章三人曾不止一次回来探亲，但都没有定居。回来定居的有韩福恒、祁顺法、冯国荣三位。冯国荣已于前几年病故。祁顺法前不久因脑梗住院了，现在只有韩福恒在家，可韩福恒也因百病缠身行动困难了。

“您要想看望他们得赶早别赶晚！”刘有忠在信的末尾这样说。正是这句话促使张泽石下决心尽快动身去山西。

我们到达高平市时，刘有忠已经在事先约定的地点等着我们，他立即领着我们直奔米山镇孝义村韩福恒家。

途中，张泽石问小刘是否已经打好招呼？他说：“昨天一早我就上门告诉韩叔叔，明天有北京的大作家来采访您！”张泽石一听立即感到麻烦大了，小刘太不了解这些难友们自卑心有多么严重！果然我们在韩福恒的大门口被他的儿子挡住了。韩福恒的儿子说：“我爸病得不行，他不能接受采访呢。”张泽石赶紧说：“我们不是来采访而是来看望慰问你爸的！”他说：“你们要慰问我爸，请把县台办的介绍信给我看看嘛。”这下大家傻眼了。

张泽石恳切地对韩福恒的儿子说：“我不是什么大作家，我跟你爸是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他们几个都是我的战友的孩子和亲属，我们专程从北京来看望你爸，他肯定还认得出我！”韩福恒的儿子这才勉强同意我们进去。

韩福恒住的屋子有些阴冷，他斜靠在沙发上，脸色憔悴苍白，老张连忙赶过去坐在他身边大声说：“老韩，我是张泽石，是咱们538团宣传队的。”他听了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看我。老张接着说：“咱们538团打过运城、临汾、参加过太原大会战，还千里挺进四川，解放成都！”这时，他那浑浊的眼睛里闪烁出亮光，老张便抓住他干枯的手喊道：“老韩，你肯定看过我们宣传队演的《白毛女》，我就是演杨白劳的张泽石呀！”他转过身来盯住老张，稍倾，声音嘶哑地说：“你、你，你是杨白劳、你是张泽石！”老张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韩福恒回过头来对围站在他身边的大伙儿说：“别都站着啦，请坐呀！”又指着他儿子吩咐道：“你赶快给客人上茶呀！”屋里的气氛热络起来。

“老韩，你还记得是在哪里看我们宣传队演出《白毛女》的么？”

“记得、记得，是在大邑县双河场，咱们团在那里围剿土匪郭保芝！”

“都过去六十年啦，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你的记性太好了！”

“咱就这么点光荣事，不敢忘了！”

“老韩，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嗨，说起来一言难尽！”

接着，韩福恒主动讲起他在台湾的经历：“被押送台湾，当兵17年，每月15元生活费。1971年退役，咱没文化，给人看过大门、当过清洁工，每月挣一千多新台币，几十年都是一个人吃饱了一家人不饿！实在说，我真是不想再提这些伤心事。老战友，你莫怪我那小子刚才慢待了你们，是我不愿让人来采访我的。”

“你问我在台湾想不想家？哪能不想呢！1988年蒋经国说：‘我从大陆、韩国把你们接到台湾，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回大陆去。’开放大陆探亲后，我已回家三四次，最后一次是1995年，家里人再也不让我回台湾去了。好在那边还照旧寄给我退伍津贴。”

“你问政府对我如何？每年中秋节送我二斤月饼、一瓶油、上门问寒问暖，这两年加大慰问礼品，每年春节送一袋大米、一桶油、二百元钱，用车送到家。体现了政府对我们的关怀，真是感激不尽！”

“你问我的病情，我现在算是百病缠身，每天得用药维持，下肢到脚都浮肿，行走困难。老张，你们大老远的来看咱，咱打心眼里过意不去，真得谢谢你还惦记着我！”

临别，老张拥抱了韩福恒，在他耳边嘱咐道：“后会有期，多多保重！”他说，他听到一阵深沉的呜咽在他的胸腔里响起。

五、绕了半个地球终于回到故乡

随后，我们商量，决定不去医院打搅祁顺法了。张泽石写了张便签：

“顺法老战友：我见过韩福恒战友了，也很想见见您，想知道您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艰难经过，老韩告诉我您在住院，我就不去添乱了。我请刘汉温战友的儿子刘有忠带去我的问候，也顺便向您了解一些情况，盼能得到您的帮助。祝你早日康复！五三八团宣传队老战友张泽石谨致。”

老张嘱咐小刘选个双休日在医院清净时，带着他的便签去探视他的祁顺法老伯，要见机行事，能多少采访些情况就行了，千万别让老人不高兴。

回到北京后，张泽石见到了刘有忠寄来的《医院访谈笔录》：

刘：祁老伯，您老人家是哪年出生？哪年参军的？

祁：我是1927年出生的。1947年参加了解放军，参加过解放山西的很多战斗，像解放运城、平遥、太谷、祁县、文水、交城的战斗我都参加过。1948年参加过解放太原的东、西山战役，太原解放后，随部队一路战斗到四川。

刘：您是怎样被俘的？

祁：我也是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被俘的。那时候的情况，你们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了，高平县包括你爸和我们几个去台湾的战友，大都是在这个时间被俘的。

刘：那您是怎么去台湾的？

祁：在战俘营的时候，生活和心情都非常糟糕，生活苦还能坚持下去。但是，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每天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活下去。到后来，天天想、夜夜盼回家的希望也没有了，就随大流一起去了台湾。

刘：您在台湾的情况如何呢？

祁：我在台湾当了17年的兵，每个月补助的15元钱，还分两次发。1971年退伍后，我就自己去做买卖，当时台湾的经济还可以，我每月能有3000多元新台币的收入，一年下来也能挣四五万元钱。那时候挣了点钱，更想家了，我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有机会回到大陆老家。1976年，我乘飞机到过巴西，又从巴西到日本，从日本到香港，但因各种原因，没有回来成。

刘：您为回家费了很多周折啊。

祁：是啊，回家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回到台湾后，做工攒了点钱后，又去了巴西。1981年，我从巴西到了巴拉圭。在巴拉圭，我又折腾着开饭馆、做买卖，这一折腾就是三年多。1985年3月，我花钱在巴拉圭搞到了他们的国民护照，就乘飞机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飞机到了郑州，从郑州坐火车回到家的。

刘：您为回家真是费尽了周折，后来又怎样了呢？

祁：我回来后政府把我按照归国华侨对待，安排到了县粮食局，当时能有80多块钱的工资。政府看我年龄大了没有人照顾，又安排了我弟弟的儿子到粮食局工作，以便让他来照顾我。到去年，我已经有2000多块钱的工资，但是我因脑血栓、脑梗塞的问题，现在半身不能动了，瘫痪在炕上，不能下床。最近半年多因为胃口不好，不能吃饭。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想办法给我医治，做手术。我现在已经做完了手术，正在康复中。

刘：祁老伯，您的一生太不容易了，希望您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

读完这篇《医院访谈笔录》，张泽石真是后悔不迭。原来祁顺法难友早在1985年就回来定居了，还受到当地政府吸收他为国家公务员的特殊优待。而他从南美州绕了半个地球寻求落叶归根之路是何等不易！那决不是一纸《医院访谈笔录》就能说明白的。我们要是早两年来探访他，肯定能够更详尽地了解他曾经的不屈不挠与曲折艰辛！

六、杏花村旁是家园

我们一行四人离开高平后便坐车前往晋中吕梁市。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吕梁市的政协委员武跃征，他是张泽石的180师老战友武腾海的儿子。武腾海曾经是180师的特级战斗英雄，被俘后在战俘营的爱国斗争中表现也十分出色，但归国后仍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武跃征曾经为了给他爸

落实政策到北京找过张泽石。关于吕梁地区有志愿军难友从台湾回乡定居的情况也是他早先告诉张泽石的。他先开车送我们去会见吕梁市对台办主任，由于小武已经事先告诉他我们的身份和此行目的，对台办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和我们一起研讨了探访方案。

吕梁地区共有四位回来定居的去台难友，一位已病故，其余三位住得相当分散，且其中两位健康状况不佳，最后确定集中精力深入采访家住汾

阳的王春生老人。并由副主任再开一辆小车亲自陪送我们一起去探访。

有了对台办带领，这次探访行程就比在高平市的探访顺利得太多。王春生难友的老家离汾阳杏花村不远。在去的路上，看见汾阳一带的美景，看到路边高大的汾酒厂的广告牌，大家自然想起那首著名的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们的“车队”还没抵达王春生家的院子大门口，就已看见他们一家人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了。



王春生八十寿辰时的照片

王春生老人从2003年回大陆定居已经七年，他如今和自己的侄子生活在一起。别看他已经86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非常好。他不但每天练习字画，还经常骑着一辆大摩托车出门办事，实在令人惊讶不已。他现在住在侄子家的一间大平房里，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利落，整个房间不但阳光、温馨，而且充满了艺术氛围。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他的小侄孙为他画的大油画两幅、素描一幅。墙上镜框里面的老照片中有半个多世纪前他与战友的合影，也有几年前和自家侄儿一家的喜庆彩照。六年前，汾阳县台办庆贺他的80大寿，特别为他送了一幅大红的中堂。他现在的穿着打扮，不知道的人，也许会把当作一位归国华侨呢。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队很快入侵山西，到处是民不聊生，生活没着落。为了混口饭吃，才十来岁的王春生开始赚钱养家，从给日本人“每天送平安无事的条子”，到在日本人开的电厂上班，再到参加替日本人卖命的皇协军，在这支为日本人当差的军队里，他受够了日本人和军官们的气。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所在的队伍被山西军阀阎锡山改编，因为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又被选入了阎锡山的卫队。时间不长，在1948年底，他又在太原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随后，他加入了解放军，他所在的部队是60军180师，他成了师直炮兵团的一名战士，负责饲养拉炮的马匹。

1951年3月，他随部队入朝作战，在第5次战役中被俘。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阴差阳错地去了台湾。在巨济岛的战俘营里，他一直被关押在72联队，这个战俘营，是被要去台湾的战俘们控制得最严格的一个战俘营。为了迫使战俘们去台湾，稍有反抗的人，挨打受饿成了家常便饭。最恶毒的是往人身体上刺字和刺各种反共图案。无论是否情愿，也不管刺



王春生在台湾的工作照

字有多疼，那些铁青色的“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精忠党国”等语句和青天白日旗等图案，就像一个个冰冷的幽灵，深深地渗入了他们的骨髓。反抗刺字者，被虐待，甚至被活埋。他的胳膊和后背也被刺上字，阻断了他的归国路。

86岁的老人在回忆那些伤心事时依然泪眼朦胧。谈到当年在“接受解释”时的情景，老人说：“在中立区战俘营解释的日子里，我们大队是派代表去接受‘共党洗脑劝说’的，根本就轮不到我。在那些日子里，中共方面的大喇叭反复广播说：‘亲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友们，祖国人民在欢迎你们归来，家乡的亲人在盼望你们回家，盼望你们回家过和平幸福的生活。’我听了心里乱极了，整晚整晚的无法入睡。我明白：到台湾去要想再回家，恐怕得等来世了。”

1954年1月，王春生和许多人一起，离开了战俘营，第一次登上冰冷的军舰，在茫茫的大海里向台湾驶去。晚上，看到其他人都睡了，他也渐渐麻木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管他呢，听天由命吧！自己这辈子

够倒霉的了，我从皇协军到阎锡山部队，再变成解放军，又投奔国民党，也许都是命中注定的吧？”

到台湾以后，“统共吃了三天好饭”之后，王春生还是摆脱不了当兵的命运，他在国军51师炮兵部队一共服役了15年，服役时，他学会了开汽车，他在金门驻扎期间，虽然隔着海水，但他依然可以看到对面解放军的活动，能听到解放军的号声，所有这些，都像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虽然大陆就在眼前，但他也只能望海兴叹。再后来，他就以上士副班长军衔退役，因无



1989年5月王春生跟父亲留影



王春生的“坐骑”

文化、无恒产，他只好靠自己的驾驶技能从事建筑劳动，他先后参加过澎湖跨海大桥、高雄地下隧道等大型工程的建设。

王春生至今一直是单身，他年轻的时候，在山西老家，在日本人投降撤离中国之后，他看到一位被日本人、当地电厂的厂长霸占并丢弃的中国女子非常可怜，便和她成了亲，还养有一女。到台湾后，在退役 17 年的日子里，因为生活艰难，一直无条件结婚。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和一位漂亮的已婚原住民妇女同居过一段时间，可是人家嫌他穷离开了他。从那以后，孑身一人的他在台湾一直工作，和朋友合伙的生意，合伙买房子，还攒下了 50 两黄金。

1988 年，这一年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但对于年近七旬的王春生老人来说，好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这一年，台湾方面开始允许老兵们回大陆探亲了。他的思乡之情一发不可收拾：年迈的老父亲在老家不知生死，张着小手让他抱的小女儿可否还在人间？但作为俘虏和身上有刺字的耻辱感，就像一把沉重的铁锁，紧紧地锁住了他的心，使他想回来又有

深深的顾虑。同年，有位同乡难友返乡探亲，带着他的托付，找到并看望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喜出望外，让这位同乡战友给他带回去自己的一寸小像片。

1989年5月，台湾的机场上出现了离开家乡近40年的王春生的身影。他的怀中，抱着在台湾用一寸小照片放大的老父亲的照片，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他把老父亲的照片一路抱回到山西汾阳的家中！在他的心里，他抱回来的岂止是父亲的照片，他抱回来的，是一个中国人比泰山还重的亲情！

90年代初，台湾当局拨专款帮助赴台战俘用激光技术销褪刺青，王春生接受了手术，彻底销褪了胳膊和背部的刺字。根据大陆和台湾方面的有关规定，2003年王春生办理了回大陆定居的有关手续。他终于实现了几十年的夙愿，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园。

回到家乡之后，他把一个长大成人的外甥女嫁到了台湾。2001年，92岁高龄的老父亲在他的泪眼中驾鹤西去。

王春生目前在家乡颐养天年，仍然接受台湾当局发放的荣退军人养老金，但需要每年给台湾相关机构邮寄指纹记录，以确定他人还在世。因台湾实行全民医疗保险，老人看病全免费用，因此，王春生老人在特别需要治病时就赴台治疗。他同时也享受着大陆生活补贴，与其兄长的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得很融洽。他的父亲原来绘画技艺很高，他的一个侄孙承此祖业，习西洋油画，功力不俗，屋中画像均出自他侄孙的手笔。

对自己的一生，王春生老人颇有感慨，他庆幸自己戎马半生，没有过受伤的经历，他诙谐地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辛苦挣钱，从玩四个轮子（小汽车）、到十六个轮子（大卡车）、到玩二个轮子（摩托车），但到头来就只为自己挣来了一副柏木棺材。”

王春生老人告诉我们：汾阳还有一位赴台难友，生前也是孤苦一人，因老家已无亲人，他想回乡养老又恐生病无钱医治，因此在多次返乡探望后仍定居台湾，后来在荣民之家终其天年。他在临终前请律师立一遗嘱，希望死后将骨灰和个人财产送回汾阳老家，并请人代为安葬。两年多以前，

王春生的这位难友在台湾故去，汾阳县台办工作人员遵照其遗嘱，到台湾将他的骨灰接回来安葬。

【2012年3月张泽石随同崔永元“口述历史”记录片摄制组再到汾阳，探访王春生老人，王老人已从侄子家搬到敬老院安身。本篇根据网友转角处的现场记录有所调整。】

七、叶落千里也归根

我们一行四人离开晋中汾阳县后，赶到了中条山麓河谷地带的闻喜县。我们在闻喜县对台办老主任王官虎先生父子和台办一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酒务头乡桃沟村探访史兴贵老先生。

出发之前，我们在闻喜县县政府大楼一层的对台办公室里，看到了整



史兴贵和老伴卫夏枝（前排左一）



史兴贵老人的来往书信和台湾证件

个闻喜县战俘返乡记录的档案，厚厚的两大本档案册里，记录着史兴贵老人和其他回来探亲、定居人员的姓名。史兴贵老人的个人登记档案非常齐全，既有历次从台湾返乡的登记，还有申请定居、处理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文字材料，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轨迹。

汽车出了县城不到 20 分钟，便离开了宽阔平坦的大路，向弯弯曲曲、地势险峻的中条山腹地驶去。虽然时间刚到阳历 6 月，晋北还是乍暖还寒，但这里黄灿灿的小麦已经开始收割，狭窄的乡村盘山公路上，当地的老乡把大片的麦穗铺在路上，让过往的车辆免费为他们碾压脱粒。汽车驶过一座将被拆除的水泥桥后，又在层层梯田和稀疏的榆树、灌木之间穿行着。没有多久，汽车就在一块黄土混合麦壳碾压平整的宽大土台上停下，这里正是史兴贵先生居住的院门前。

站在这里极目远望，美丽的中条山峰峦叠翠。凉风习习中，初夏的炎热悄然而去，使人心旷神怡。史家大院正面是砖砌再覆以白色墙砖的齐整院门，院门上镶着彩砖金字“福寿康宁”，两边有一幅金字对联：“家居黄金珠宝地；人在潇洒富贵中。”

闻听到院门外的响动，已经 86 岁、虽清瘦却精气神十足的史兴贵老人



史兴贵在战俘营被纹身的刺青

连忙走出院们。王官虎、张泽石、史兴贵三位曾经在朝鲜战场并肩作战、随后六十多年遭际迥异的老战友在笑声里相见。重逢之间，当年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无数道铁丝网、一湾海峡和六十年时光恍若隔世。

史兴贵老人居住的庭院宽阔敞亮，一排未加雕饰的窑洞前，有一小块翠绿的菜地，墙边和菜地前沿篱笆外，开放着红艳艳的月季花，已经挂果的苹果树迎风摇曳。

进到史兴贵老人住的窑洞，宽敞明亮、凉爽清静。餐桌、灶台、大炕等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未等我们坐稳，史兴贵老人的一位英俊帅气的侄孙，在闻喜县城开了一家公司，听闻我们的到来，立刻在县城买鱼买菜买水果赶回老家，他切开一个沙瓤大西瓜，请大家在凉爽的窑洞里解渴。

史兴贵，1924年出生于闻喜县酒务头乡桃沟村，他3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在亲戚朋友的照顾下，从小吃百家饭长大成人，他25岁时和一闫姓女子结婚。史先生之参军源于解放军攻占太原后进军大西南的兵源补充，当时，晋南各县许多村民踊跃参军。1949年7月，婚后半年的他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部队是第60军180师539团机关连，1951年随部队赴朝作战，在战场不幸被俘。

史兴贵老人回忆说：“我所在的巨济岛第72战俘营，许多人闹着要去台湾，给我也强行刺上了文字和图案。”说完，老人卷起袖子，我们看到已经刻在他胳膊上近六十年的刺青：左胳膊上是“杀朱拔毛”，右胳膊上是“效忠党国”和一面小国旗、一面小党旗。那幽蓝幽蓝的墨迹，仍然清晰如初；他又用枯干的大手，解开深青色中山装外衣，从脖颈下往下拉他的贴身汗



史兴贵老人的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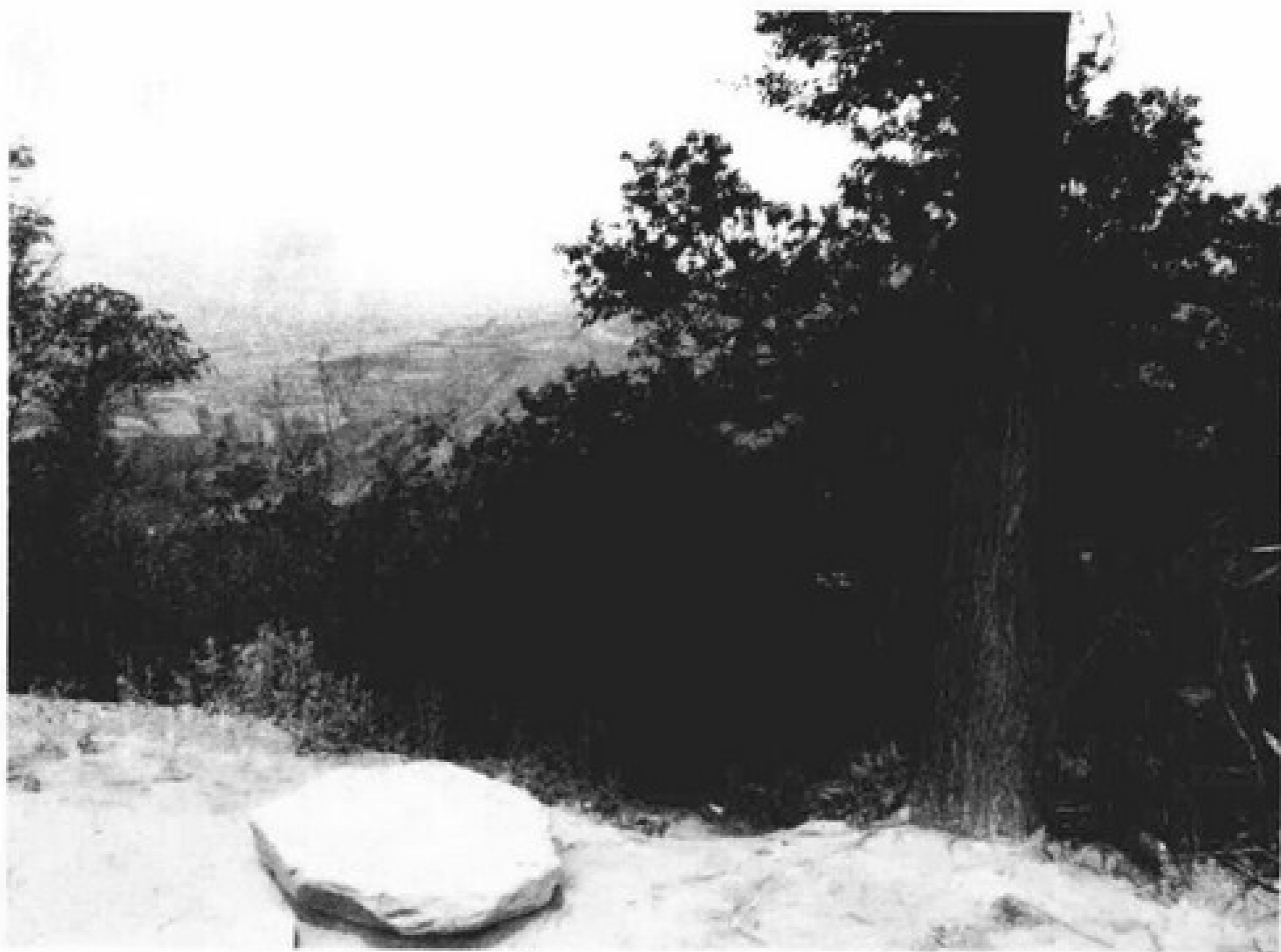
衫，我们看到了刺在他胸前的一面国民党党旗：这些文字、图案已经生长为他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在汾阳王春生老人的胳膊上，只看到刺青褪尽后如鱼鳞般不平的皮肤。此时，亲眼见到史兴贵老人身上的刺青，幽灵般狰狞地凸现在老人青筋毕露的皮肤上，不能不让我们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史兴贵老人在战俘营关押三年后被遣送台湾。在台湾当兵15年，做工12年，在台退役以后，既无文化，也无技能的他，所做工作只能是在建筑工地上干苦力。

史兴贵在台湾当兵15年没机会恋爱结婚，退役后已经年过四十，穷困潦倒，没能力结婚，回大陆定居前，他只好住在台南县“荣民之家”。因他人朝之后杳无音信，1953年，原配闫氏改嫁他人，和史家脱离关系。1962年闻喜县政府根据《抗美援朝军人牺牲证明书》追认其为烈士，其家属按

烈属对待。史先生在台四十年未成家，孤身一人。自台湾当局放宽台胞来大陆探亲的限制以后，1989年、1991年两度回乡，见亲兄嫂健在，侄子侄孙满堂，经与兄侄协商，他决定返乡定居，由其三侄史鸿洁（退伍军人）顶门立户，给他养老送终。第二次回乡前，他立即处理掉在台全部财产，什么手续也未办理，离开台湾。1991年4月他向闻喜县人民政府提出回乡定居申请。闻喜县民政局、公安局根据1989年《关于我军被俘去台人员要求回大陆定居问题的处理意见》，同意该申请，并办理了相关手续。

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史兴贵老人的回大陆定居还颇费周折，他被俘以后，在战俘营里登记姓名时，知识文化水平很低的史兴贵被误听误记为支仁全。去台湾之后，他便一直使用该姓名，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在闻喜县台办登记簿上，依然照其证件登记，直到1991年4月申请定居方改回原名。他在给当地政府的《关于我变姓名的情况说明》里说：“现在我回故乡定居，特向政府说明，支仁全即是当年的史兴贵，待政府批准我回故乡



从史兴贵老人的庭院远眺中条山

定居之后，我决定使用原姓名史兴贵。”回家，恢复本名，急切里又有多少阻隔消失后的欣慰和安宁。

1991年8月，年近七十岁的他经人介绍后和本县村民、小他五岁的卫夏枝结了婚，两个老人相互关心照顾，共同渡过了难忘的岁月，享受到婚姻和家庭的安宁。虽然卫夏枝老人前年不幸因病去世，但从她留下的几张照片中，我们仍然看到了老人生前幸福的神态。

回乡之后，他曾经领到四个月台湾方面由朋友汇寄的退休金，之后就与台湾失去了任何联系。现在在他的家里，还留有他往返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很多证件。随行的战俘研究者常成见到这些资料后，便主动提出来由他带到台湾去向台湾“退辅会”进行交涉，要求“退辅会”按政策继续给老人退休金。令大家惊喜的是常成先生去台湾不久，即有台湾“退辅会”的人员不辞辛劳专程前来调查史兴贵的实情，并当即决定恢复给老人中断了20年的退休金。

我们告别史兴贵老人后，大家共同的感受是：60年一个轮回，史兴贵先生的人生经历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人生就如同参天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当你历经了狂风暴雨，当你与大树母亲脱离以后，你还能飘落在母亲的脚下，纵然化为泥土也与母亲永不分离，那是人生的幸事！史兴贵先生是幸运的，当一切都成为往事，他从千里之外的台湾飘来，落在母亲树的身边，落在滋润万物的中条山，这应该是他人生最完美的结局。

后 记

2003年，为纪念七千名坚持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归国五十周年，我们编著出版了《祖国，我们回来了！——志愿军战俘风雨回归历程》一书。该书发行后，即有不少难友和知情者建议我们再写一本书，好好讲一下：为何还有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国来？他们是怎么去的台湾？他们去台湾后的遭遇如何？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给历史留下一点见证。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得首先克服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障碍，从不愿触及这个让我们心痛的问题转变为直面它们、探究它们！然后，我们必须理清我们两万二千多名志愿军被俘难友在战俘营里发生大分裂的来龙去脉，找出造成这个大分裂的确切原因。最后，我们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一万四千难友们到台湾后情况的真实史料。

促使我们下决心动笔的原因，除了回避不了的责任感之外，还由于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接触到不少去台难友，见到了不少有关史料，接受到许多热心朋友的支持鼓励。在收集资料和采访过程中又不断听到一些去台难友离世的消息，产生了应抓紧抢救史料的紧迫感。但真正动起手来，发现困难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使得此书前后花了七年才得以收笔。

我们高兴的是通过撰写本书首先是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纠偏、解惑与提升，并推动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

我们首先着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选择不回大陆？”现在看来，它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当年美国当局对待志愿军战俘前后变化的政策取向，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志愿军战俘群体本身存在着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古今传承的封建战俘观与羞辱感带给他们的巨大精神压力，然后是当时志愿军部队普遍较低的文化素养和较弱的应变能力，再加上志愿军战俘中众多原国民党军人的复杂心态以及国共两党经历多年内战积累的深刻对立与怨恨在战俘营内被引爆，最后还涉及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和人们一旦失去人格尊严，就可能陷于“哀莫大于心死”的境地，甚至导致其人性异化为同类相残的兽性等更深层次原因。

为了撰写本书，我们比较深入地调查采访了没有回归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们后来在台湾的境遇。他们跟那些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的60万国民党军人一样经受了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苦，但除了部分原本就是国军而且在战俘营的国共之争中有立功表现的人外，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还承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重压！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何罪之有？”

返回来再看看当年拼死回归的志愿军战俘们的境遇又如何呢？他们曾经被当成“变节者”甚至“叛徒”对待，绝大多数受到开除军籍、党籍处分，全部给予“终身控制使用”监控，并因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一直到1980年中央发布（74号）文件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为止。但由于在经济上未给予他们任何改善措施，他们大多数至今依然陷于贫困或早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这二万二千多名志愿军战俘，他们生活在海峡两岸、世界各地，却同样遭受了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和情感煎熬！

诚然，战争是造成这一切历史悲剧的总根源。然而，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发生战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与苦难促使亿万受难者觉醒，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遏制了战争的猖獗，促进了世界的和谐、和平。当我们的目光越过六十年尘封岁月，我们看到了曾经在朝鲜战场上血火相拼的中美

两国正在携手共同维护东亚和平；曾经激荡着险风恶浪的台湾海峡如今已是风平浪静，让满载货物游客之船穿梭往来；而当年在巨济岛战俘营里誓不两立的“反共”与“亲共”战俘们早就同桌畅饮了。历史有了多么惊人的进步！

通过这些年来我们调查收集到的有关资讯，我们欣慰地看到海峡两岸政府现在都能够善待这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了。他们不论是已经植根台湾成家立业的，还是叶落归根返回故乡定居的，或是仍然留在台湾荣民之家的，大都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祥和的、享有尊严的晚年。遗憾的是有相当多的战俘尚未来得及享受到这个“善待”就去世了！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极为特殊的经历是一个涉及到政治、人文、社会、心理等学科的十分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由于我们在掌握史料上和学识上的不足，本书只做了部分的史实陈述和粗浅的分析认识。

我们期待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对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进行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研究，找到更为透彻的真相和更为明确的答案，将这个巨大的历史悲剧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也更加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广大读者更深刻的有关国际战争与人类文明的认识，以及有关维护人权、回归人性、发扬人道的思考。

尤其是今年10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郑重提出：“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也道出了我们回顾60年前这段惨痛历史的心声。揭开两岸志愿军老兵们心底冻结已久的坚冰，增强两岸休戚与共的亲情认同，“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此书如能实现、或者部分实现上述目的，应首先归功于同意接受我们采访的众多去台志愿军战俘人士；也归功于为我们提供已经回国定居的原去台战俘线索且不辞辛劳陪同我们采访的王官虎、武跃征、钟骏骅、林模

丛、刘有忠等原归国志愿军战俘及其亲属、和山西吕梁市、闻喜县对台办的积极协助。当然还要归功于为我们提供大量珍贵史料的历史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常成，赴台志愿军战俘的后人陈朝勋——从他父亲的家庭相簿里特意提供数十张背面有赠言、有家庭地址的老照片，以及积极促成此书问世的北京金城出版社领导同志和本书责任编辑荣挺进先生。谨在此一并致谢！

张泽石 高延霆

2011年10月27日